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GF89/18

前 言

小孩子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成人学习。最值得我们成人学习的一点是：好奇，好问。

当一个人赤条条无牵挂地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一无所知。渐渐地他学会了说话，形成了思想，懂得许多自然和社会方面的知识，天文地理、声光化电、成语典故，都懂得一些。这，通常也不过是十来年时间。这一速度是惊人的。须知，一个成年人，十来年间一无长进的，还不少呢。

为什么成人进步颇慢而孩子进步极快呢？我以为原因之一是：孩子好奇、好问，对什么都感兴趣，对什么都要问一个“为什么”，而且是“打破砂锅问到底”。这就是说，他勇敢地向一切未知领域进军，探索自然、社会、人生的一切奥秘。而成人呢？往往安于现状，见怪不怪，把一切都看得那么自然，那么合理，那么平淡无奇。有一些成人已失去了向未知领域进军的勇气了。当然，并非所有的成年人都如此。

所以，我们说，一个成年人，如果想要有所长进，就应当学学小孩子，要好奇，要好问。

语言是平凡的，但又是神奇的。语言是简单的，但又是复杂的。语言的作用是有限的，一万句空话抵不上一个行动；语言的威力又是无限的，有时一个词、一句话能够唤醒千万人，甚至“一言以兴邦，一言以丧邦”！

语言学是古老的，但又是年青的。语言学是枯燥而难学

的，但也并非一点趣味也没有的。既然我们人人都会讲话，那么语言学也就不至于“难于上青天”了。语言学过去在社会科学中是领先的科学，未来应该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都发挥积极的作用。在国外，语言学常被称为“当代领先的社会科学”，有人就曾以《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为题发表过论文。

所以，语言和语言学都是值得我们一问再问的。

在我国，语言和语言学，尤其是值得我们一问再问的。因为在我国，语言科学还不普及，往往由于枯燥和难学而无人问津。其实，世界上本没有绝对枯燥或绝对有趣的东西，所谓枯燥和有趣都是相对的。看芭蕾舞，听音乐会，当然比做数学习题有趣，但是来它个一天十场，那可就受不了了！文化局里审查影片的人是会有这样的感受的。大多数人见到数学习题感到头疼，但是那个数学家陈景润却从中得到无穷的乐趣。公正一点说，语言学比文学要枯燥一些；——不过，研究一个古典作家的生平事迹，作大量的考证，也未必是什么有趣的事情。——但是比起天文、数学、地质学来，总要有趣一点吧？

至于说难学，我看不见得。任何一门学问，如果你具有大量的感性知识，学起来就不会那么困难了。语言这个东西，除了聋哑人，人人皆会。人们从两岁时就学会讲话了，天天说话听话，读书看报，看电影听相声，写文章做报告，……既然我们每时每刻都要和语言打交道，有这么丰富的感性知识，学习语言学怎么可能那样困难呢！我们说，语言学应当普及，也能够普及。

因此，我们编辑了《语言学百题》。

编辑《语言学百题》的念头，起于一九七九年春天。有一

天，我随同张志公、张静诸位先生驱车到驰名中外的白马寺，谁知吃了“闭门羹”：寺门关闭，已经下班，概不接待。语言学家们一再恳商，但是以“慈悲为本”的和尚们却一点慈悲也不肯发。在回郑州的途中，在汽车上，我陷入了沉思：此时谁能对我讲几句白马寺，那多好啊。哪怕不是百分之百的准确，我还是要表示感谢的。语言学不也同这神秘的白马寺一样吗？我来编一本《语言学百题》，恐怕……

一年过去了，《语言学百题》已经编成了。

在这里，首先我应当感谢各位作者的信任和支持。特别是岑麒祥老师的信任和支持，是我终生难忘的。

我以为还有一点值得一说，那就是：当你站在白马寺外面，面对着关闭的大门而不能入其内的时候，你觉得很神秘，不知道里面是些啥玩艺儿。待到你进得那个大门，逛它一个小时之后，你会想：也不过如此，没啥。语言学的情况有那么一点仿佛。站在大门之外，觉得神秘莫测，翻它一两本书，——啊，也不过如此，没啥！但是，那个神秘的白马寺，花一两个小时是弄不明白的，我们的语言学当然也不是一两本书就能说得清楚的。而对于世界上的许多事情，我们又不能满足于一知半解！

我们的《语言学百题》，是为站在语言学的大门口或刚进入语言学的大门的人而编辑的。所以不能把问题复杂化，尽量简明一些。有志于语言研究的人，再前进一步，可能发觉本书解决不了自己面临的许多问题，甚至有点儿失望。这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事情，也是我们所希望的事情。反之，如果谁想用它来代替自己对语言科学的进一步学习和研究，那倒不是我们所希望的。

最后，我诚恳地希望专家、读者批评指正。因为如果有可能，我们以后还会做一些语言学的普及工作。而谁要想把工作做好，那就得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这本是很平常的一个道理！

王 希 杰

一九八〇年春天于南京大学中文系

目 录

- 1 什么是语言学?王希杰(1)
- 2 语言学有什么用?岑麒祥(4)
- 3 什么是普通语言学?岑麒祥(7)
- 4 什么是历史比较语言学?岑麒祥(10)
- 5 什么是应用语言学?刘涌泉(13)
- 6 什么是社会语言学?伍铁平、蔡富有(16)
- 7 什么是语言工程?林书武(24)
- 8 什么是心理语言学?蔡富有(28)
- 9 什么是话语语言学?蔡富有(33)
- 10 什么是数理语言学?蔡富有(37)
- 11 什么是统计语言学?伍铁平(41)
- 12 什么是语言信息处理学?蔡富有(44)
- 13 什么是宇宙语言学?蔡富有(47)
- 14 什么是媒介语?王德春(51)
- 15 美国描写语言学派是怎样产生和发展的?
.....赵世开(55)
- 16 什么是“转换-生成语法”?赵世开(59)

- 17 乔姆斯基提出了一些什么新的观点?赵世开(63)
- 18 什么是“直接成分”?伍铁平(66)
- 19 什么是深层结构? 什么是表层结构?
.....赵世开(71)
- 20 什么是音韵学?杨耐思(74)
- 21 什么是训诂学?王希杰(78)
- 22 《尔雅》是一部什么书?徐家埴(81)
- 23 《说文解字》为什么重要?田小琳(85)
- 24 《方言》是一部什么书?许惟贤(89)
- 25 《中原音韵》是一部什么书?杨耐思(92)
- 26 清代有哪些重要的语言学家? 有哪些成就?
.....严 修(96)
- 27 《马氏文通》在汉语语言学史上有什么地位?
.....龚千炎(101)
- 28 “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是怎样产生的?
.....张志公(105)
- 29 什么叫新洪堡特学说,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
.....伍铁平(109)
- 30 语言是什么?王希杰(115)
- 31 语言是怎样产生的?王德春(119)
- 32 语言和思维的关系如何?王德春(122)

- 33 语言符号有什么特点?徐思益(125)
- 34 语言有哪些变体?王希杰(128)
- 35 世界上有多少语言?林书武(132)
- 36 我国有多少种语言文字?陈章太(135)
- 37 什么是语言的类型分类?王希杰(139)
- 38 印欧语系有哪些语言?有些什么特点?.....徐通锵(142)
- 39 阿尔泰语系有哪些语言?有些什么特点?
.....叶适良(145)
- 40 现代英语有什么特点?梁小平(149)
- 41 什么是语言内部的发展规律?徐通锵(152)
- 42 社会发展是怎样推动语言发展的?刘 晓(156)
- 43 现代汉语是怎样形成的?龚千炎(158)
- 44 现代英语是怎样形成的?梁小平(162)
- 45 汉语有多少种方言?陈章太(166)
- 46 什么是方言间的语音对应规律?许宝华(173)
- 47 方言研究有什么用?许宝华(177)
- 48 什么是文白异读?严 修(180)
- 49 口语和书面语的关系怎样?王希杰(183)
- 50 什么是文学语言?彭嘉强(186)
- 51 什么是元音? 什么是辅音?刘建设(188)
- 52 什么是音位?许宝华(190)
- 53 什么是音节?杨知文(193)

- 54 什么叫语流音变?杨知文(196)
- 55 什么是汉语的四声?杨耐思(199)
- 56 什么是声母? 什么是韵母?姚律人(202)
- 57 什么是双声、叠韵?陈天福(205)
- 58 什么是实验语音学?曹剑芬(208)
- 59 实验语音学常用哪些仪器和方法?曹剑芬(213)
- 60 语音“四要素”有哪些物理特性?曹剑芬(216)
- 61 什么是“国际音标”?赵世开(220)
- 62 文字是怎样产生的?王伯熙(222)
- 63 什么是象形文字?王伯熙(226)
- 64 什么叫“六书”?陈天福(231)
- 65 汉字有多少?姚律人(236)
- 66 字母是从哪里来的? 怎样演变的?王希杰(239)
- 67 《汉语拼音方案》是怎样产生的?乔 风(243)
- 68 什么是语义学?王 勤(247)
- 69 什么是词义?武占坤(250)
- 70 什么是词的本义、转义、引申义、比喻义?
.....田小琳(253)
- 71 什么是语义演变的绵延式和放射式?王希杰(256)
- 72 什么是词义的扩大、缩小和转移?
.....王希杰、刘建设(260)
- 73 分析词义有哪些方法?王 勤(262)

- 74 什么叫义素分析法?王德春(266)
- 75 解释词义有哪些方式?吴崇廉(269)
- 76 释义的科学性方面有哪些要求?周钟灵(273)
- 77 什么是基本词汇?刘云泉(277)
- 78 什么是同音词? 是怎样产生的?韩敬体(281)
- 79 什么是谚语?马国凡(284)
- 80 什么是歇后语?马国凡(287)
- 81 什么是禁忌语?周家筠(290)
- 82 什么是委婉语?周家筠(293)
- 83 复合词有哪几种?陈建民(296)
- 84 什么是偏义复词?马国凡(302)
- 85 什么叫语法手段?周家筠(305)
- 86 什么是语法范畴?徐立芳(312)
- 87 词类划分应根据什么标准?陈建民(316)
- 88 什么是句子?陈建民(321)
- 89 汉语语法有什么特点?陈建民(324)
- 90 什么是中心词分析法?奚千炎(327)
- 91 语法意义有哪些类型?张 静(331)
- 92 语法形式有哪些类型?张 静(335)
- 93 在语法分析中意义和形式怎样结合?张 静(340)
- 94 古今汉语人称代词有什么不同?严 修(346)
- 95 怎样检查句子的语法错误?蒋荫楠(350)

- 96 什么是修辞? 什么是修辞学?王希杰(353)
- 97 什么是同义异形?王希杰(357)
- 98 什么是语言风格?王伯熙(361)
- 99 什么是语体?王希杰(364)
- 100 学习语言学有哪些基本的参考书?岑 瑜(368)

什么是语言学？

语言学是研究语言的科学。

语言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青的科学。在古代中国、印度、埃及、亚述、巴比伦、希腊，学者们早就开始探索语言的奥妙了。在我国，春秋战国时代就开始了“名”和“实”的争论，汉代就诞生了训诂学。在印度和希腊，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到三世纪，就建立了语法学，这就是古印度的波尼尼(Panini)语法和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的语法学说。可见语言学是一门古老的科学。近几十年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各门学科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渗透，语言学同社会学、心理学、数学、逻辑学、信息论、神经生理学、电子计算机、通讯工程等发生了各种各样的联系，这大大扩大了现代语言学的视野，诞生了许多边缘学科，如：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应用语言学、数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语言病理学、实验语音学、宇宙语言学等等。因此我们也可以说，语言学是一门年青的科学。

人类最早的语言研究是从解释古代文献开始的，是为了达到研究哲学、文学或历史的目的而研究语言的。因此，在我国，传统的语言学，如：音韵学、训诂学、文字学，长期以来是经学的附庸。人们通常把这种传统的语言学称之为“语文学”

(philology),以区别于现代的以语言本身为研究对象的“语言学”(linguistics)。现代的语言学建立于十九世纪头二十五年,它是随着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诞生而诞生的。它以语言本身为其研究对象,它要解答“语言是什么?”这个问题。也正如斯大林所说,“语言学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语言发展的内在规律”(《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

对语言的研究,又有个别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之分。以个别语言为其研究对象的就是个别语言学。如研究汉语的叫做汉语语言学;研究英语的叫做英语语言学等。研究有亲属关系的一些语言的,也属于个别语言学的范围。如研究汉语、藏语、壮语等汉藏语的,叫做汉藏语言学;研究俄语、乌克兰语、保加利亚语等斯拉夫语的,叫做斯拉夫语言学。综合各种语言的研究成果,一般地研究人类语言的,叫做普通语言学,也叫做一般语言学。普通语言学研究人类语言的起源、本质和发展,内部结构,分类,研究方法,以及语言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等问题。

语言是语音和语义组合而成的词汇、语法体系。对语言的不同方面的研究,便构成了语言学的各个部门。如:语音学、语义学、词汇学、语法学、修辞学、文字学、方言学等。这些研究可以是个别的,也可以是一般的,如:汉语语音学、英语语音学、德语语音学等和普通语音学的区别,汉语词汇学、英语词汇学、德语词汇学等和普通词汇学的区别。

对语言的研究也可以分为共时的研究和历时的研究两种。所谓共时的研究,指的是截取某一个时代的横断面,进行静态的描写研究。如研究现代汉语的各个方面,基本上不牵涉到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的历史演变问题,因为它是以某

一语言的相对静止的状态为其研究对象的。所谓历时的研究，就是对语言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发展过程进行纵的历史的研究，如汉语史研究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的历史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共时和历时的研究都可以以一种语言的各个方面为其研究对象，如：汉语史、英语史、法语史等；也可以截取语言的某一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如：汉语词源学，汉语语音史、汉语语法史等。

对语言的研究也可以通过比较的方法来进行。对具有亲属关系的语言进行比较研究的，就是历史比较语言学。对没有亲属关系的语言也可以进行比较研究，有从类型上进行比较的，叫做语言类型学；也有为语言教学服务的，为机器翻译等服务的，如：英汉语对比研究等。比较研究可以在一种语言的内部进行，把一种语言的不同历史时期的状态相比较；也可以比较它的不同的方言，比较它的方言和共同语。

语言的研究，也可以因为研究者的语言观、研究方法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学说。如：语法学有“传统语法”、“结构主义语法”、“转换——深层语法”、“层次语法”、“格位语法”等等。

总之，语言学的领域是广阔的；语言的研究是大有可为的。

（王希杰）

2

语言学有什么用？

语言学有什么用？许久以来，这是一个存在于许多人脑子里的疑难问题。有人说，语言学是一门以人类语言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一个人自呱呱堕地以至牙牙学语，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语言学，可是经过无数次的模仿、改正，不消几年就学会了一口很漂亮的口语；其正确性往往为大人们所羡慕，自叹弗如。语言学跟他有什么关系呢？这确是事实。小孩的脑子比较灵活，没有其他负担，在他开始学话的时候，有大人从旁指点，一个个词，一句句话，从易到难，从简单到复杂，经过一定时间的实践，是完全能够掌握一种语言或方言的口语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了语言学的功用。

语言，不管是什么语言，自有文字以来就有了书面语言和口语之分。口语只能当面使用，不能传诸远方或留给后代。口语和书面语言比较起来，有的比较接近，有的却相差得很远，特别是那些有悠久历史的书面语言相差得更远。同是口语，也有本民族语言和外语或普通话和方言土语之分，其间差别有些很大，不容忽视。所以我们要学习书面语言或不同的口语决不能象小孩学说话那样去进行，而必须有人把所要学习的书面语言或口语用语言学的方法加以分析和综合的研究，

编成各种词典和教科书等等，以便大家学习。这些都是语言学的工作。哪能说语言学没有用呢？

以上只是就语文教育这个角度来说的。语言学除了这个一般用途以外，还有许多特殊的用途。

大家知道，人类语言本身实际上是一套用声音表达意义的符号系统。语言的声音是由人类的发音器官形成和发出的物理现象，意义却跟人们的思维 and 思想有关，怎样在脑子里形成一种概念，然后由有关中枢神经督指各发音器官发出声音来，这就是一种心理活动。有时有些中枢神经因病或其他事故受到伤害，就会导致失语症、错语症、失书症或错书症。所以语言学在这些地方常跟生理学、物理学、心理学以至某些病理学都有极其密切的关系。语言的声音本来是不能传诸久远的，但自从电话、电报等发明后，这种限制早已被打破，特别是近些年来，物理学中什么信息论、控制论的探讨，工艺中机器翻译、电子计算机等的设计创制，都竞相要求语言学为它们提供可靠的理据，语言学的用途就更为广泛了。

不仅如此。语言究竟是一种社会现象。举凡社会上的规章制度、风俗习惯以至人类社会的分离聚合等等，都可以在语言里面得到反映。因此不独研究政治、经济、文化等要靠语言学为他们提供资料，就连研究人类学、人种学以至史前史的也要等待语言研究的结果。这不都成了尽人皆知的事实了吗？

语言学的范围既然这样广，它跟其他科学的关系又这样复杂，以致近年来在有些国家出现了一大批以“语言学”或“语音学”为标榜的名称，如什么“大语言学”（macrolinguistics，又译“宏观语言学”）、“小语言学”（microlinguistics，又译“微观语言学”）、“前语言学”（prelinguistics）、“后语言学”（me-

tal linguistics)、“人类语言学”(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民族语言学”(ethno-linguistics)、“数理语言学”(mathematical linguistics)、
“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
“心理语言学”(psycholinguistics)以至“声学语音学”(acoustic phonetics)和
“生理语音学”(physiological phonetics)等等,不一而足,令人目迷五色,
不知所适从,弄到连美国语言学会会长特雷格(C. L. Trager)于1960年年会上也不能不大声疾呼提醒大家说“语言学就是语言学”,并指出:“语言是由音、形、义三者构成的;肯定了
这个前提就不难确定语言学的研究范围。”^①确实的,语言学的范围虽然很广,情况很复杂,但它的本份工作实际上不外是形、音、义三者,或者更通俗些说即语音、文字、语法、词汇这几部分的研究。超过了这个范围,如有必要,只好和其他科学部门协作解决,要语言学全都包起来是不切实际的,但这已经可以表明不是语言学没有用,而是用途太多了。

(岑麒祥)

^① 见 Studies in Linguistics, Occasional Papers, 10. pp5—28, 1963.

3

什么是普通语言学？

普通语言学又称一般语言学。它的特点是把人们对于人类语言的看法和语言研究的成果概括成一般理论，因此这种语言学常是当人们对语言研究达到一定阶段时才能出现的。在古代，人们对于语言只知研究它的书面形式，其目的是为了要看懂古代文献、解读各种碑文，借以对古书作一番校勘诠释的工作，对当前的口语不感兴趣，对语言的本质和演变等不求甚解，总而言之，那是要把语言当作一种了解古代文物和风俗习惯等的工具，而不是要把它当作研究的对象。其后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文化的进步，大家才逐渐醒悟单纯古文的研究已不能解决日益纷繁的实际问题，许多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又促进了人们对语言结构的分析研究及其历史演变的探讨，所用方法也日益趋于完善。十九世纪以来，人们按照所用的研究方法大致把语言学分成了以下几个部门：

1. 采用静态分析法研究语言在发展过程中某一时期的状况、它的各种结构要素及其组合方式并加以描写的，叫做描写语言学或共时语言学。

2. 采用一般历史法把语言于不同时期的状况及其结构要素和组合方式加以比较研究，整理出它们的历史发展和演

变规律的,叫做历史语言学或历时语言学。

3. 采用历史比较法研究语言或方言的亲属关系及其历史发展,从而整理出它们的结构要素和组合方式的演变规律的,叫做历史比较语言学。

无论是描写语言学、历史语言学或历史比较语言学都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语言所由构成的语音、文字、语法和词汇等各个部分,其后由于材料的积累和分析研究的逐步深入,这几部分又逐渐分别形成了语音学、文字学、语法学和词汇学,各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特殊方法,俨然是附庸蔚成了大国,语言学的分部就更加完密了。

话虽这样说,可是作为语言学研究对象的人类语言有许多一般性问题如语言的本质、语言的发展和起源以及语言的类型和分类等等是不能割裂开来进行研究的。语言学中专门研究这些问题使成为有系统的理论的,就叫做普通语言学。一般地说,普通语言学可以有广义的和狭义的之分。广义的普通语言学除一般理论问题以外还包括语音、文字、语法和词汇等部分的问题;狭义的普通语言学却专门讲语言学中的一般理论问题,有关语音、文字、语法和词汇等部分的问题则让它们分别在语音学、文字学、语法学和词汇学中去叙述,更进一步,甚至语音学、文字学、语法学、词汇学也可以因采用的方法不同分成描写语音学、历史语音学、历史比较语音学和普通语音学等等。

普通语言学常与其他许多科学有紧密的联系。

首先,人类语言都是有声语言,它本身是要用声音表达意义的。语言的声音是由人类发音器官调节和发出来的,意义跟人们的思维 and 思想活动有关。这就决定了语言学跟生理学、

物理学和心理学都有一定的联系。

然而,语言究竟是人类社会中的一种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它不仅有它的内部结构,而且跟社会上的一切活动、文化的进展和人群的分离聚合等都有极其密切的联系。这就决定了它与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发展史、文化交流史以至史前史等等都有不可忽视的关系。

由此可见普通语言学的内容是很纷繁的,它与许多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有错综复杂的关系。向来从事这种研究的人,由于经历不同,学殖有深有浅,加以各式各样思潮的影响,他们对于普通语言学的许多问题有不同的理解,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学派,那是不足为奇的。重要的是怎样把他们的这种种联系,如德国施来歇尔(August Schleicher)之与达尔文学说和黑格尔的哲学思想,瑞士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之与涂尔干的社会学学说和本世纪初在欧洲风行一时的“格士塔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 又译“完形心理学”),美国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之与行为主义心理学等等研究清楚,把这些当作阿莉阿德尼线,将语言学从他们所造成的迷宫中引导出来,才能对他们作出恰如其分的估计,而所有这些都需要耐心地进行一番比较深入细致的研究。

(岑麒祥)

4 什么是历史比较语言学？

历史比较语言学是语言学中一个采用历史比较法研究语言或方言的亲属关系及其历史发展的部门。

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语言和方言，其中有些是很相近似的，有些却相差得很远。相近似的容易理解；相差得很远的用来交谈就会好象鸭子听雷一样，谁也不知道对方说的是什么。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可是在古代，人们不晓得这是什么一回事，凡遇到语言可以相通的人就油然而产生一种亲切之感，对语言不通的人却往往认为是“非我族类”，不免存着鄙视或戒惧的心理，直到十九世纪初由于种种原因对各种语言的材料积累得越来越多，并且受到其他科学的影响，才逐渐知道用历史比较法去探索其中的奥妙。

所谓历史比较法就是把相近似的语言或方言互相比较，找出它们的对应关系，借以确定它们的共同来源和历史发展的一种方法，因为凡有共同来源的语言和方言，虽然它们发展的趋向各不相同，但是无论在语音方面、语法方面或词汇方面都一定有许多互相对应的地方。我们根据这些对应规律就可以推知它们的原始形式和各自发展的过程。试举些汉语和汉语方言的例子。“三”北京话叫做 *san*，上海话叫做 *se*，福州

话叫做₃saŋ, 广州话叫做₃sam。“担”北京话叫做₃tan, 上海话叫做₃te, 福州话叫做₃taŋ, 广州话叫做₃tam, 我们可以根据这些形式为“三”和“担”各构拟出一个“一般历史性公分母”₃*sam和₃*tam, 这些就是它们的原始形式, 其他各方言的形式都是由它们派生出来的。又如“谈”北京话叫做₃t'an, 上海话叫做₃de, 福州话叫做₃taŋ, 广州话叫做₃t'am; “蓝”北京话叫做₃lan, 上海话叫做₃le, 福州话叫做₃laŋ, 广州话叫做₃lam, 我们又可以根据这些形式分别为“谈”和“蓝”各构拟出一个“一般历史性公分母”₃*dam和₃*lam。循此渐进就可以从语音、语法和词汇等方面确定各种语言或方言的亲属关系和它们的发展过程。

语言或方言的亲属关系各有亲疏远近的不同。亲属关系越亲近的, 相同之点就多些, 对应关系也比较显著; 亲属关系越疏远的, 相同之点就少些, 对应关系也比较隐晦, 需要经过仔细研究才能确定, 但是一定有它们的相同之点和对应关系。我们可以按照这些不同的关系把各种语言归入不同的语系、语族和语支, 例如把英语归入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 法语归入印欧语系罗曼语族, 俄语归入印欧语系斯拉夫语族, 维吾尔语归入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西匈语支, 满洲语归入阿尔泰语系通古斯-满洲语族满洲语支, 蒙古语归入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等等。世界上有些语言, 比如东方的日语和朝鲜语、西欧的巴斯克语等, 究竟属于哪个语系、哪个语族和语支, 直到现在还没有研究清楚。但是不管怎么说, 一种语言属于哪个语系、哪个语族、哪个语支, 都是按照它们的亲疏远近的亲属关系来决定的。

语言的亲属关系, 一般地说, 都是指的由一种共同基础语

派出来的各种语言或方言间的相互关系，但是在漫无边际的历史长河中，或者由于集体移民，或者由于一个民族征服了另一个民族，各种不同系属的语言发生融合是历史上常有的事。融合的结果会使一种语言成为胜利者，继续按照它的发展内部规律发展下去，另一种语言成为失败者，逐渐为胜利的语言所同化，改变了它原有的系属。比方在现在法国的国土上，古高卢语为民间拉丁语所同化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古高卢语本属印欧语系克勒特语族语言，自为民间拉丁语所同化后，里面虽还或多或少保存着克勒特语的一些发音上的特点和少量的词儿作为底层，但是整个来说已属于罗曼族语言而不是克勒特语言了。这种语言系属的转变，语言学上就把它叫做“类型上的亲属关系”，而不是原来“出生的亲属关系”。

语言亲属关系及其历史发展的研究是语言学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同时对于人类学特别是人种学也有很重大的关系。采用历史比较法把同系属语言或方言在各方面的对应关系和对应规律研究清楚，对各该语言或方言的对比教育也可以有很大帮助，例如西方各语族语言历史比较研究的成果，在各该语言的语文教育上就可以发挥一种举一反三的作用。

（岑麒祥）

5

什么是应用语言学?

应用语言学，是语言学知识在各个领域中各种不同应用的总称，它研究语言如何能够得到最佳利用的问题。

应用语言学是语言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不同于理论语言学，它着重解决现实当中的实际问题，一般不接触语言的历史状态；而理论语言学则着重在探索理论问题，在总结规律时常涉及语言的历史状态。当然，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理论要以应用（实践）为基础，应用又以理论为指导。语言学理论可以说是应用语言学的基本武器，而应用语言学则是鉴定各种理论的实验场。

最初，语言研究的应用方面和理论方面没有划分开来，这是由于当时语言学不够发达，还没有多少必要来作这种区分。十九世纪初，理论方面的研究和应用方面的研究开始分化，例如，作为应用语言学一个分支的语言教学同当时着重探讨历史问题的语言学分了手。十九世纪末叶，博杜恩·德·库尔特内就提出了“应用语言学”这个概念，但没有得到广泛的注意。二十世纪以来，语言科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近二三十年，各方面向语言科学提出了一系列与科学技术、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密切关系的新任务，应用就得到了空前的扩

大，这才使得语言应用方面的研究和理论方面的研究明确地区别开来，“应用语言学”这个名词开始广泛运用。

另外，语言学由于应用范围的扩大，同其他学科的联系也增加了。过去谈到语言学同其他学科的联系时，只能说，它同文学、人类学、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心理学、哲学和文化史等有联系。而今这样说，就远远不够了。除了这些之外，还得说，同数学、信息论、控制论、物理学、电子学、医学、符号学、情报学、计算技术、通讯技术、自动化技术等方面都有联系。语言学领域如此扩展，无疑地带来了新的分工和一些部门的分化。有的人进行历史比较，有的人钻研理论，有的人去解决实际问题，还有一些人则去研究一些最新的、对国民经济有重大作用，而且与尖端学科相联系的边缘问题。所有这一切，也就促成了应用语言学与理论语言学的分化。

应用语言学是一个较大的概念，与语言学应用有关的问题可以说都属于应用语言学的研究范围。它的研究范围由实践的需要而决定。新的课题层出不穷，不足为怪。但是根据近年来的发展趋势看，有必要区分一般应用语言学和机器应用语言学。前者处理语言应用的一些老问题，例如，语言教学，文字的创制和改革，翻译研究和标音、转写问题研究，人名地名研究，科技语言研究和术语问题研究，正音正字研究，言语矫正学和舞台语言研究，国际辅助语的建立，速记系统的制定，聋哑盲教育学，语言规划，等等。后者处理语言应用的一些新问题，而主要是跟机器打交道的一些新问题，例如，所有工程语言学、机器语言学、计算语言学等名下的语言学问题均可归属于此类。目前已经进行的课题有：机器翻译、情报检索、语音识别、言语合成、汉字信息处理、语言统计、语言分析

自动化、自然语言理解等。

最后，应该指出：“应用语言学”这个术语，在国内外语言学界大体上有两种用法：1)狭义的用法，主要指语言教学(包括聋哑人教学)和言语矫正学；2)广义的用法，除语言教学和言语矫正学外，还包括上面提到过的那些内容。我们采用的是后一种。

(刘涌泉)

6

什么是社会语言学？

据说有一次人们给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纪元前469—399)引来了一个人，希望他发表对这个人的看法。苏格拉底说只要这人说话，我就可以发表对他的看法。因为每个人的性格、脾气、职业、年龄等等是往往可以从言语中看得出来的。英国广播电台举行了一次试验，让4000个听众根据九个不同职业的人在电台说话的声音判断他们的职业、年龄。这九个人中演员、律师和传教士被多数人猜中，因为他们的职业使他们在发音、说话方式等方面都各有其特点^①。

前一个故事所涉及的人的性格、脾气等是心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心理语言学研究的问题很广，从语言看人的心理活动也是其中的一个研究课题。前一个故事所涉及的人的职业、年龄和后一个故事所涉及的全部问题则是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社会语言学研究的问题也很广，从语言看人的社会地位、职业、年龄等也是其中研究的一个课题。

语言虽然没有阶级性，但社会的各方面在语言中留下的痕迹却是十分广泛而深刻的。在文化不普及的旧社会里语言的阶级差异特别明显。例如，拉法格在《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

^① 科尔尚斯基：《伴随语言现象学》，第34、35页，莫斯科，1974年。

(1936)中指出：法国“贵族阶级感觉到有争取平民和利用平民来作为打倒资产阶级的撞击器的必要。为了把平民抢到手，贵族阶级放弃……宫廷语言而采用菜市上的大娘们的语言”^①。而资产阶级革命一旦失败以后，他们就“致力于在语言……中消灭革命的任何痕迹”。可见阶级斗争在语言中的反映是非常明显的。又例如契诃夫在短篇小说《新别墅》(1899)中描写了俄国一个贵族工程师库切诺夫到农村修筑桥梁，他同俄国的农民尽管说的都是俄语，却彼此经常互不理解，发生了许多误会。如有一次他生气地对农民说：Мы будем презирать вас(我们将鄙视你们)。但是由于презирать是个书面语词，农民从来没有听说过，竟误会成Мы будем призирать вас(我们将救济你们)屠格涅夫在《父与子》中描写了当时的俄国贵族受法语的影响，将принципы(原则)这个词，读作принсипы，但是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虚无主义者却读作прынципы。普希金的诗体长篇小说《欧根·奥涅金》(写于1823—1831)被别林斯基赞誉为“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这在语言方面也有多方面的反映。例如十九世纪上半叶俄国贵族经常用法语进行交际，以显示他们的教养和高贵。长诗的主人公奥涅金，一个由法国家庭教师教育大的贵族青年，

“能用法语对答如流，

就是下笔也畅达无阻”。

女主人公达吉亚娜的母亲是一位贵族夫人，他

“说俄文带着法文的鼻音，

把俄文的H读成法文的N”。

^① 这里的“语言”，严格说来，应该叫做“言语”。在通俗读物中，也可以不加区别一律叫做“语言”。

但是达吉亚娜的乳妈说的话却带有明显的民间口语色彩，跟奥涅金和达吉亚娜的语言有明显的差别。

语言的生命力是很强的。古罗马帝国早在公元五世纪就已崩溃，但古罗马帝国的语言——拉丁语直到十八世纪才最后从欧洲许多国家的文学语言阵地上撤退下来。在《欧根·奥涅金》长诗中这一语言历史过程也留下了痕迹：

“拉丁文现在已经不时髦，
说老实话，奥涅金的拉丁文
刚够应付卷首的题词和石碑的铭文”。

政党差别在语言中的反映的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法国共产党内不分年龄一律以 TU（你）相称呼，以表示同志间的平等和亲近的关系（在法语中通常年幼的对年长的是必须称 VOUS〔您〕的）。

性别差异的反映在日语中比较明显。如代词 きみ〔君〕（你）只是上对下或亲友之间的男子用语。终助词ぞ表示强调自己的主张、判断，促使对方注意，如ぼくの番だぞ（是该我啦！），语气较粗暴，也仅限于男人使用。推量形だろう（吧）也仅男人用，女人得用でしょう。俄语中见面打招呼的话здорово（你好）也仅男人用。美洲某些印第安语中男人女人用语的差别尤其明显^①。

在许多语言中都能找到年龄差别在语言中的反映。如在我国普通话中，儿童语言和大人同儿童说话时的语言中所用的“阿姨”和“叔叔”有其特殊的用法。又如北京中小學生使用一些成年人从来不说的特殊词儿，如：“份儿”（好），“份儿大”

^① 参看 D. 海姆斯主编的《文化和社会中的语言》第 228—233 页，纽约，1964 年。

(厉害),“拔份儿”(冒尖),“关的”(准行)等等。而且这些学生切口很不固定,常常发生变化,如表示“好”的词还有“盖”、“盖了帽了”等。这些词在北京某些学生嘴中取代了“帅”、“棒”等词。学生喜欢使用一些特殊词汇,特别是常用一些特殊词表示“好”,这似乎是许多语言都共有的一种现象。如俄罗斯学生喜欢用 железно(字面意义是“铁的”)代替规范语言中的 хорошо(好)。本世纪七十年代的苏联学生还喜欢用一些半英半俄的外语词,如 герла(姑娘,来自英语 girl), френд(朋友,英语 friend)等。据学者推测,这种现象,同青年人好奇、喜欢标新立异有关^①。

在曹禺的剧本《日出》中可以看出人的身份、职业不同,所使用的语言也各带有不同的特点。如留学生张乔治满嘴英语,影响到经常接触外国人、买办和张乔治一类人物的旅馆侍役王福升也学到了“点煤油的副路”(damned fool[该死的笨蛋]的音译)这类不洋不中的词汇。穷家出身的三等妓院的妓女翠喜的语言中则充满了方言、土话和行话,如“火棒”(热闹)、“格涩”(与人不同)、“白货”(夸口)、“红唱手”(妓女)等等。许多作家都擅长表现他们作品中主人公的语言的社会特征。曹禺在这方面也作到了刻画细致,入木三分。连这些主人公的名字(如张乔治、王福升和没有姓的翠喜)也反映了他们的职业和社会地位的特点。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人们交际时所使用的语言往往因说话人的阶级、性别、年龄、职业、说话的时间和场合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这种种就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新诞生的“社会语言学”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其实,在传统的语言地理学中也

^① 克雷辛:《现代社会中的语言》,第33—41页,莫斯科,1977年。

研究不同社会阶层所使用的不同的语言变体，但自从美国语言学家柯里 (H. C. Currie) 1952 年提出了 Sociolinguistics (社会语言学) 这个术语以后，这种研究就都划归到社会语言学的领域了。关于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美国语言学家菲什曼作了一个精辟的概括：“谁在什么时候用什么语言对谁说话”，他的一篇著名的社会语言学论文就是以此为题的。

(伍铁平)

社会语言学 (sociolinguistics) 这一术语，最早出现于 1952 年，是美国语言学 H. 丘里在其论文《社会语言学的设计：语言和社会阶层的关系》里首先创用的。社会语言学的思想发端于索绪尔。法国社会学派（其奠基人之一是索绪尔的学生梅耶）和布拉格学派对社会语言学的产生和发展也作出了贡献。但社会语言学作为新兴的学科，却是六十年代初兴起于美国的，其标志是，在美国首次召开了社会语言学讨论会，以及会后由 W. 布赖特所主编的会议论文集《社会语言学》的出版 (1966)。

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语言的社会本质和差异。

语言社会本质的研究有下列几个方面：语言社会本质的特点和规律，语言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的相互关系和作用，语言、意识、社会在起源上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民族语言和民族形成的关系，民族共同语的形成和社会发展的关系，语言演变和社会演变的关系等等。

语言差异方面的研究有：同一社会的标准语和为社会制约的不同变体（包括地域方言、社会方言——各阶层的习惯

语、各行各业的行话等)之间的差异;同一语言在不同社会、不同国家、不同地区所产生的变异,例如英语在英国、美国以及在亚非拉讲英语的国家(如新加坡)和地区(如香港),或因社会或因国度(区域)等社会环境制约而产生的变异;同一社会或国家里通行几种语言(如在比利时通行的法语和德语)因社会接触引起的变异;交际者(说者、听者、作者、读者)因其社会属性、社会经历、社会地位、职业职务、文化修养、宗教信仰、情趣爱好,以及年龄、性别、风俗、习惯、地域等不同在语言运用上的差异;交际环境如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外交礼仪场合或娱乐游艺场所、在大庭广众中或在家庭里等不同所形成的语言差异。总之,社会语言学研究的重点就是语言差异和造成差异的社会因素。因此,W.布赖特指出:社会语言学的任务是,揭示语言结构变异和社会结构变异之间的系统对应关系,也许是揭示一方面对另一方面的因果关系。

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调查研究法,数学分析法、对比研究法和实验分析法。

调查研究法是指对各地区、各阶层、各行业、各种人的语言运用进行实地考察,调查人带上问题单和录音机询问被调查人,并录下他们的话语进行研究。

数学分析法是对口语材料和文献资料进行数学统计和数理分析的方法。

对比研究法是分析社会因素、研究语言差异的重要方法。例如 the man 在美国俚语用法中,不同阶层、不同行业、不同场合使用时含义是有差异的,通过对比就一目了然了:在黑人的社会方言中指“白人”或“老板”,在音乐家的行话中指“爵士乐队的领队”,在吸毒者的黑话里指“麻醉剂贩卖者”,在一般

情况下,通常指“警察”。

实验分析法指用语音或心理实验仪器(包括电子计算机)对语言差异进行实验分析,这样能对差异作定量和定性描写。

以上四种研究方法既可单独运用,也可综合运用。

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可以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标准语的选择或规范、文字的制定或规范、语言政策的制定或修订、语言计划的拟定或实施、语言教学的开展或研究、国家官方语言(国语)的选择、民族地区双语制政策的制定、社会政治和科学技术术语的统一或规范等提供语言事实和语言理论的依据和指导。

社会语言学作为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心理学等的综合性研究学科,它的研究和发展对这些相关学科的研究和发展,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积极影响。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在揭示语言的本质、语言的起源、语言的演变、语言的未来等方面也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改变了人们的观言观。美国社会语言学家W.拉波夫指出:过去习惯上把语言看成是某个社会全体成员所共有的常数,现在新的观点认为必须把语言看作一种变数,它经常发生系统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反映了语言自身长期的演变,而且也反映了语言之外的社会发展的影响。社会语言学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并促进了语言学本身的发展,以致苏联语言学家H.切莫丹诺夫提出,语言学可以因此而划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研究语言结构的语言结构学和研究语言社会本质的社会语言学。

社会语言学是一个新的学科,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它的发展异常迅猛,并产生了好几个分支学科,如一般社会语言

学、具体社会语言学、历史社会语言学、透视社会语言学、比较社会语言学和语际语言学等。

(蔡富有)

7

什么是语言工程？

1955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实现了历史上所没有过的高度的统一，并且正在掀起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热潮，因此在占人口90%以上的汉民族中间，大力推广普通话，促进文字改革和语言规范化，已经成为我国当前的迫切任务。”推广普通话、文字改革和汉语规范化这三项任务，都属于语言工程的范围。语言工程，也叫做语言计划。

世界各国的语言情况不同，语言工程的内容也就不同。

有些新近独立的国家，面临着选择何种语言做为标准语的问题。印度尼西亚1950年独立时，就从十几个民族语言中挑出印尼语做为通用语，并进行巨大的规范工作，使之标准化，获得了成功。有些非洲国家，它们根据用途的不同，采用不同的语言，例如坦桑尼亚，官方用英语，商业用语是斯瓦希里语。在这样的国家内，似乎还没有一种语言兼做官方语言和商业用语的；在一些多民族国家里，没有一个民族的语言充分普及、达到全国大多数人接受、从而成为通用语的程度。在这些国家内，语言工程在这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还有一种情况：一国之内存在着两种标准语，但各有各的用途。例如拉丁美洲的巴拉圭，有两种标准语：西班牙语和瓜拉尼语。大体上说来，西班牙语用于正式场合，通行于城市地区；瓜拉尼语用于进行非正式的交谈，通行于农村地区。又如挪威，也有两种标准语：新挪威语和书本语。新挪威语是地方报纸的语言，诗歌和文学作品也用这种语言创作，主要通行于西部；书本语是全国性报纸的语言，教育用语，主要通行于东部。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两个国家中哪一种语言都取代不了另一种语言，只好让它们并存。那么，这两个国家中的语言工程的工作主要就是在两种语言内部进行规范而已。

语言工程，有些是在国家的领导下，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的，有些则是由民族主义团体、或民族自治单位发起的。后者出于民族感，甚至企图恢复处于劣势的民族语言，提高其地位，这样的语言有威尔士语、加泰隆语、普罗旺斯语、弗里西亚语和布列塔尼语，但是提高上述语言的地位的一切努力均告失败。

现在我们来谈谈语言内部的语言工程，这包括语音、词汇、文字和语法四方面的工作。

世界上的语言，差不多都有正音的工作，只有是自觉地进行和不自觉地进行的差别而已。现在，广播、电视等宣传工具大规模的应用，使得正音的工作更顺利地地进行，影响既广而深。例如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发音，就影响着千百万人的发音。各国通用语的发音，一般都以首都地区的语音为准。

词汇这一平面上的规范工作，在许多情况下都是语言工程关注的中心问题，这方面的工作量也最大。在这里除了编纂词典、写小册子、说明词的用法、进行规范工作以外，还要处

理好以下两种关系:

1. 词汇纯洁化和允许外来词存在的关系。有些人提出排斥外来词使词汇纯洁化的主张, 法国科学院就是持这种主张的代表。他们主张对进入法语的英语词加以改造, 使它在形式上法语化, 或是按法语发音规则来发英语词, 或者干脆排斥英语词, 用法语词取而代之。西班牙、讲西班牙语的美洲国家, 都存在着这种倾向。

但是, 各语言间词汇互相渗透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 人力要控制也控制不了。力主词汇纯洁化的法国科学院, 最近也不得不允许一些外来词进入法语。事实上, 随着各民族的经济、文化往来日益频繁, 这种互相渗透只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而绝没有减少的可能。所以二十世纪初以来, 已经没有多少人醉心于词汇纯洁化了。

2. 保留古老的词汇和词汇现代化的关系。词汇现代化包括三方面的工作: 从别种语言中引进新词新语、给予原有旧词以新的含义、创造新词。通过这三方面的工作, 满足表达现代技术、现代思想和现代知识的需要。现在世界上多数语言都在不同程度上采用这三种方法。但有些语言, 例如冰岛语, 则基本上不是这样, 它是一种古老的语言, 保留着大量的古语词, 不易接受外来词语, 比方说汽车、电话、电视等词, 明明有现成的外语词, 冰岛语也不接受, 却用一种变通的说法, 例如把“汽车”说成某种“骑着的器械”, 等等。对此我们局外人觉得那未免有点别扭、费事, 但冰岛人习惯了, 也就不觉得有什么不方便了。所以, 引进不引进外来词、引进哪些、引进时要不要做些修改、什么时候引进, 都是语言工程学者研究的任务。

文字改革包括整个文字系统的改革和一种文字系统内部的个别改良。前者如我国的汉字改革。这一工作要稳步而慎重地进行,不能急躁;后者如英语拼写法的某些改良,例如把 through 写成 throu, 等等。英国文豪肖伯纳曾鼓吹对英语拼写法进行改革,并嘱把遗产做为改革的基金,但这一改革收效甚微。

语法相对来说是语言中最稳定的部分,所以语言工程在这方面的的工作也较少,但也还是有一些,如编写语法书,指出词语的语法功能、哪些是规范形式、哪些不是规范形式等等。

语言工程还有一个的内容,即编制人工语言。

(林书武)

8

什么是心理语言学？

心理语言学(Psycholinguistics)这一术语,早在三十年代就已经问世。1936年,美国心理学家坎特在其著作《语法的客观心理学》中就使用了这一术语。但是,心理语言学作为语言学的新兴分支,崭露头角,登上了科学的舞台,那是在五十年代初。其标志是:1953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举办的“心理语言学”讨论会,以及作为讨论会的结果,由心理学家奥斯特古德和语言学家西比奥克编辑出版的《心理语言学》(1954年)一书。

心理语言学从心理过程与语言结构的对应关系方面来研究人类语言机制的构造和功能。换句话说,心理语言学研究对象是语言活动和语言行为。它属于实验语言学。它运用心理学的观点和方法,通过观察和实验,从感知、认知、联想、记忆以及智能和动机等方面对语言现象、语言活动、语言行为进行科学的解释。例如,人们是如何学习和运用语言的,是如何运用语言进行思维和表达思想的,究竟什么是人的语言机制、语言能力等等。这些都是心理语言学正在探索的问题。

心理语言学随着所运用的心理学观点和方法的更替,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从五十年代初产生到五十年代末为其

发展的第一阶段。这一时期的理论基础是当时盛行的行为主义心理学。行为主义心理学是建立在由刺激和反应所能观察到的事实基础上的心理学。它是对上个世纪以来的心灵主义心理学即建立在对意识的内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的心理学的否定。行为主义心理学也是结构语言学的理论基础。或许可以说,心理语言学的产生和结构语言学的影响不无关系。当时,无论结构语言学也好,心理语言学也好,都把语言习得和语言活动解释为刺激、反应和强化的过程,并认为小孩学习话语就是不断对环境刺激作出反应,通过机械模仿,反复强化,形成了语言习惯,塑造了语言行为的。因此,在语言(包括外语)教学中,只强调语法结构而忽视语义变化,只强调句型练习而忽视语言活用。

这一时期的心理语言学不仅对语言行为进行狭义的编码和译码的研究,而且扩大了理论的研究范围,包括对语言与意义、人格、文化等方面问题,以及对失语症和精神分裂症的语言病理和临床研究。

1959年,美国著名语言学家乔姆斯基著文批判心理语言学家斯金纳的《言语行为》时指出,虽然通过实验能够有效地证实对动物的行为进行刺激、反应和强化的解释,但人类语言本身是很复杂的,对人的语言行为来说,难以确定应该刺激什么和使什么发生反应,因此行为主义心理学关于言语行为的解释是含糊不清、说明不了问题的。

从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后期,这是心理语言学发展的第二阶段。1957年,乔姆斯基发表了著名的《句法结构》(Syntactic Structures)一书,向行为主义心理学提出了全面挑战。乔氏这本书的理论核心是“生成语法”理论,理论基础

是心灵主义心理学。乔氏认为,语言的一大特点是“生成性”,即有限的词汇和语法规则能生成无限的句子;不应当把语法理论看成是一套方式,而是一套假定,即能产生句子的假定;因此,语法理论里有些符号就象数学符号一样,能无限地利用来产生无限的句子。他还提出了“语言机制”和“语言能力”等重要概念,认为小孩学习语言并不是什么刺激、反应、模仿和强化的过程,而是在运用天生的“语言习得机制”掌握有限的规则,然后就能自动生成话语。乔氏的理论对心理学、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的影响颇大。从此,心理语言学对“人类运用语言时的心理过程”开展了热烈的讨论。研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语言运用的模式,(2)语言结构和语义的储存与记忆,(3)人脑对各类句子的处理等等。另外,心理语言学在六十年代进行了检验乔氏所规定的语法规则是否适用于心理学及实证语言学中心理实际的研究和实验。这种研究和实验一直继续到七十年代初。多数心理语言学家的结论是:语言结构和使用它的人的心理实际结构之间存在某种对应关系,但未必是一对一的对应关系。

这一时期的心理语言学虽然取得较大进展,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它的理论观点,即乔氏观点的纯唯理主义和先验论弱点,以及只注意语言形式而抛弃语义的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因此,这一理论不仅遭到了同行的批评,也受到其他学科专家们的非议。对乔氏理论的全盘否定是不公道的,但他们的某些意见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例如著名语言学家、心理语言学家列昂捷夫就指出:苏联心理语言学的基本原则和美国的心理语言学有极大的不同。苏联心理语言学不是把语言看作一系列的言语反应,而是把它看作能动的、有目的的言语

活动。苏联心理语言学从一开始就力图在其理论体系中反映社会 and 个人的辩证关系，揭示言语活动的社会本质和社会制约性，并将说话和听话的过程作为人类活动的全部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来加以描述。

乔姆斯基 1965 年发表了《句法理论若干问题》(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一书，修改和充实了他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把语义学和句法学放在同等地位。随着乔氏理论观点的变化，心理语言学在研究倾向上也发生了变化。例如，作为心理学上极其重要的概念的语义，又以新的形式成了心理语言学研究重大问题。德国心理语言学家恩格尔坎普就提出，应把语义问题看成是从心理语言学上的词义学向句义学推移的形式，不应象过去那样只是对各个孤立的词进行词义研究，而要把研究的重点转向对句子中词与词的关系上的词义分析。再者，过去追随乔氏的某些心理语言学家已开始修正过去的理论，并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因此，从六十年代后期开始，心理语言学进入了发展的第三阶段。似乎可以说，至今尚未结束的这一时期，是心理语言学更为发展的时期。心理语言学不仅在欧美，而且在苏联和日本都有了较大发展，并且产生了不少新的门类和分支。

心理语言学的研究和发展，对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人类学等都产生了不少影响。心理语言学对探索语言的起源、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语言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对语言(包括本族语和非本族语)教学、对儿童语言的发展、对聋哑人的语言教学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心理语言学还被广泛应用于诊断和治疗各种语言障碍症和精神分裂症等；心理语言学对心理学中的一些分支如航空心理学、宇宙心理学、

工程心理学等都产生了较大影响，甚至成为了它们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心理语言学对司法心理学、犯罪侦察学，以及对于教科书、宣传材料的编写、对舞台和电影表演艺术等都有不可忽视的指导意义。

(蔡富有)

9

什么是话语语言学?

话语语言学(德文Textlinguistik, 英文text linguistics), 作为语言学的一个新分支学科登上科学舞台, 大约有十五年的历史。它正在经历自己的初创和发展时期。

话语语言学是研究话语的语言科学, 那末什么是话语呢? 话语是人们说的一句以上的成段的话(或一段对话)和写的一句以上的成段的文句, 语义上能表达一个相对完整的意思或思想。传统语言学研究的是不超出句子的语言“小单位”(音素、语素、词、词组、句子)和“小句法”(句子句法); 话语语言学研究的是超出句子的语言“大单位”(超句体, 即超句子统一体和“大句法”(话语句法)。

句子间的连接问题, 是话语语言学研究的重点之一。在汉语句子中间的小句间常用的连接手段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就……”(他一来, 我就走。); “……(也)……也……”(我(也)恨他, 他也恨我。); “……既然……何必……”(他们既然不来, 我们何必傻等。)等等。汉语句子间的连接手段也是多种多样的。例如“也是多种多样的”中的“也是”便是句子连接的手段之一。一般常用的还有“一方面, 另一方面”、“此外”、“再者”、“可见”、“再如”等等。

话语语言学着重研究的是超句体及其相互间的联结关系。话语语言学认为超句体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句子构成、意思相对完整的语言单位。它是具有句法上的组织性和交际上的独立性的一段话语，是一种超越句子界限的语义—句法单位，跟词、句子一样，应属于语言的范畴。超句体和词、句子的区别是：词的逻辑基础是概念，句子的逻辑基础是判断，超句体的逻辑基础是逻辑统一体。超句体是一种客观存在，并非是想当然的杜撰。因为心理学、语义学、逻辑学、心理语言学、社会信息学从不同角度对话语语流进行的研究业已证明：一个句子往往不能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更不必说表达一个相当完整的思想了；一个思想通常都不可能放进一个句子的框架里，它总是从一个句子转向另一个句子，构成一个逻辑和句法所能表达完整意思或思想的超句子统一体。

超句体的话语句法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主题不变与述题多变，即话语的主题或其变体连续出现在两个以上的句子中。例如：党给我以智慧，我眼明心亮。党给我以力量，我勇往直前。党给我以信心，我战斗不息。

2. 述题不变与主题多变，即话语述题(或其相关意思)连续出现在两个以上的句子中。例如：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伟大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伟大的。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光荣献身的人也是伟大的。

3. 主题或述题中的某一成分及其变体反复出现在两个以上的句子中。例句同上。

4. 主题和述题都变换，但意念统一。例如：针不用生锈。水不流发臭。人不学习落后。

5. 超句体不仅在意思是统一的，语调也是统一的。

以上五个方面的特点，也是超句体内句子间连接的主要方式。

6. 超句体之间的停顿，比句子间的停顿要长。

7. 超句体在性质上有别于组成它的各个句子的简单总和。

8. 超句体和段落并不完全相符。大致有三种情形：①超句体等于段落，②超句体大于段落，③超句体小于段落。“大于段落”是指一个超句体包含着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段落，这些段落都为同一题材内容所联结。“小于段落”指一个段落由两个以上的超句体所组成。这种情况比较常见。超句体大于段落的情况，往往是由于同一题材内容的引言或结论、或重要的论点、论证，以及作者特别要强调或提醒读者注意的地方，单独成段，以便突现出来，引人注目。

超句体间连接手段是各式各样的，不管何种连接方式，它必定要使超句体A和超句体B、超句体C……之间很自然地显示出既是话语意念上的过渡，又是话语句法上的过渡。在汉语里两个超句体间的连接方式常用如：“话说”，“我们把话题转到……上来”，“现在该说”，“接下去，要说的是”，“有必要指出的是”，“值得一提(或一说)的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需要补充的是”，“需要说明的是”，“可以想见(象)的是”，“不可想象的是”，“由此可见”等等。两个以上的超句体之间的连接方式，特别是在科技和政论文里常采用的方式有：“首先”、“其次”、“再其次”，“第一”、“第二”、“第三”，“一”、“二”、“三”，“A、B、C”，“甲、乙、丙”，等等。

话语语言学常采用话语线型扩张分析法和句段语义组合法来研究话语结构。这是符合近数十年来科学试图认识人类

组织和理解话语的语言能力的总趋势的。话语语言学还强调话语功能的研究。有的话语语言学家认为，话语语言学的目的是：描述人类交际的前提和条件的本质与组织形式。由于话语语言学以交际为目标，因之和相邻学科发生了关系，并对它们产生了影响。这些学科是现代句法语义学、逻辑学、行动理论、参照理论、心理学、认知心理学、语言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社会语言学、社会信息学等。话语语言学创立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对科学技术和信息时代作出反应。它关于人造代码语言的研究也是工程语言学、人工智能学、机器翻译学、语言信息处理学所必需的。话语语言学的研究在语言教学，尤其是在第二语言教学上被广泛运用。

(蔡富有)

10

什么是数理语言学?

由于运用数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和说明语言，语言学跨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并产生了自己的新分支学科——数理语言学(mathematical linguistics)。

数学和语言学的结合，并非偶然的巧合。一方面它们都是符号系统，正如美国语言学家雅可布逊指出的：数学的诸学科都同人类语言的结构有相关之处。另一方面，语言学的发展，要求对语言用数学方法进行客观的和精确的分析；在系统整理、测定计算和总结概括语言材料时，运用数学的方法结合其他研究手段，能使语言学家更加深入探索语言结构和话语构成的秘密。语言学同相关的科学技术如物理声学、生理学、心理学、神经学、计算机学、控制论、信息学等之间日益广泛的联系和综合性研究，有时必须在运用数学语言的情况下才能实现。由于在人工智能、机器翻译、语言信息处理、人机对话管理系统和情报自动检索系统里，自然语言的一切信息必须转换成计算机的数学语言，这就要求语言学必须数学化。数理语言学正是为语言学数学化而诞生的。

数理语言学就其运用的数学方法而言，可分为组合语言学和定量语言学。前者主要运用数学中的非数值学科如集

论、数理逻辑、算法理论等的原理和方法，因此又叫非数值语言学或质量语言学；后者主要运用数学中的数值学科如数理统计学、概率论、信息论、数理分析等的原理和方法，因而又叫数值语言学或数量语言学。数理语言学按不同的研究领域和目的又分为：统计语言学、代数语言学和模糊语言学。

统计语言学既是数理语言学发展的第一阶段，也是数理语言学中仍然活跃的分支学科。统计语言研究的领域是相当广的，既可以作语言的统计研究，又可以作语言行为的概率模式研究。语言的统计研究包括语言结构与语言单位、语言变化与语言差异等方面的统计研究。

统计语言学的研究不仅对理论有意义，在实际应用方面也有现实作用。例如，对字母、字、词的频率统计，使语言信息处理、通讯等方面能进行更有效、更经济、更简便的编码设计，对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和教学以及扫盲等也很有用处，对辞书编纂方面版字(词)检字的原则的制定以及编写各类频率词典等都很有用。统计语言学还用于对作家语言的研究，能对某作家的一部、某一类或全部作品一共用了多少不同的字、词及其出现频率、常用的修辞手法、语言风格等都能作出较准确的测定和研究。

代数语言学又叫形式语言学，主要研究如何对语言的形式结构进行严格的数学描写，并以创立形式化的普遍语法或叫普遍语言理论为目的。代数语言学的产生比统计语言学晚，一般称它为数理语言学发展的第二阶段。它的产生恰好同传统语言学中对普遍语法(相对于具体语法而言)兴趣的回升相吻合。传统语言学中的普遍语法学派研究普遍语法是从经验材料入手的，代数语言学研究普遍语法是从形式化的数学研

究入手的。它们都认为语言拥有一种递归机制 (recursive mechanism) 和生成功能, 即有限的语言单位和规则可以生成无限的句子。所不同的是: 一个试图用归纳法把这种机制条理化, 以适用于普遍的语言; 一个是试图用演绎法把这种机制公式化, 以创建普遍语法的数学模型。代数语言学主要致力于语言的生成模型和分析模型的研究。所谓分析模型指的是假定语言的全部句子是已知的, 为证明这一点, 要寻求出一组语法(形象说法是语言的数学公式), 可以用来对语言进行严格的描写。所谓生成模型是假定语法是已知的, 有如数学符号和公式一样, 可以用来无限地生成无穷的句子。

一提起代数语言学, 自然联想到美国著名语言学乔姆斯基创立的“生成语法”。什么叫生成语法? 乔氏自己说: 对语言递归机制和生成功能的研究就称之为生成语法。事实上这个定义所指和代数语言的研究对象是完全一致的。生成语法又叫生成语言学, 实质也就是代数语言学。一种语言的生成语法可以理解为一系列规则和加工系统, 它能无限地生成各种句子, 并能赋予每个句子一个结构描写, 以表明它的语音、句法和语义的重要属性, 以及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的转换关系。

代数语言学关于语言结构形式化、模型化的研究和理论, 以及乔姆斯基等的生成语法理论, 既受到不少人的赞同, 也受到不少人的批评。从科学的立场看, 它们对语言学本身(从语音学到句法学)都有贡献, 对计算语言学、机器翻译学、语言信息处理学, 计算机科学等都有所贡献。但作为对语言结构、语言系统、语言本质的研究, 如果以为代数语言学或生成语言学能得到理想的结果, 却又未免不够现实。语言毕竟不是代数

系统。语言是几十万年演变来的活的社会交际系统、社会信息系统，而且语言的演变还在继续进行。语言系统比代数系统、逻辑系统要复杂得多，用纯粹的数学方法研究语言，不可能全面而正确地揭示语言的秘密。至于用纯数学方法描写普遍语法或普遍语法的数学模型，要真正适用于所有的语言，未必行得通，至少现时的语言学还无法实现。当代语言学的发展迫切需要同现代科学(包括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结合起来进行多学科的综合性的研究。

模糊语言学是伴随着数学中的一个崭新分支学科——模糊数学的产生而问世的。数理语言学将随着模糊语言学的产生而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模糊数学研究的对象是模糊概念、模糊逻辑、模糊语言、模糊信息、模糊现象、模糊集合等。利用模糊数学的方法和原理来研究语言的科学叫模糊语言学。

(蔡富有)



什么是统计语言学？

统计语言学是统计各种语言现象的一门学科，早在十八世纪就已诞生。当时人们曾企图用统计学解释为什么一些语言现象保存下来，另一些却消失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青年语法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也曾采用过统计方法。1918年苏联有个学者曾统计过普希金的短诗《纪念碑》中元音和辅音的比例是1:1.33，而布留索夫的同名短诗的比例却是1:1.44。他想用这种方法找出这两位大诗人诗作之间的区别^①。这种形式主义的作法虽然失败，但并没有因而影响统计语言学的发展。尤其是二十世纪发明了电子计算机以后，统计语言学有了长足的进展。例如，用电子计算机为许多语言或某个作家乃至某部作品的语言编纂了词或语法形式出现的频率词典。如普希金的名著《上尉的女儿》中，代词Я(我)出现的频率是每25个词一次。前置词В(“在……之中，在……时候”等义)出现的频率是每40个词一次。全部虚词在作家的叙述中所占比重是35.3%，在小说对话中占的比重是45.9%。

对英语词的统计表明，736个最常用词占全部所调查的文献所用词的75%，这就是说只要掌握了736个常用词，就

^① 见《苏联科学院通报，文学与语言集刊》，1977年，第3期，第210页。

可以读懂文献的 3/4。掌握一千个常用词就可以读懂文学作品的 80%，听懂口语 90%。

然而，这当然不是说文学作品用的词为数有限。加上不常用的词，英国大诗人密尔顿(1608—1674)的全部诗作共用了约 8000 个词；意大利诗人但丁(1265—1321)的《神曲》用了 5860 个词，古希腊的荷马的史诗用了 9000 个词，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1564—1616)的作品中共用 15000 个词。俄国诗人普希金(1799—1837)的著作用了 21000 个词。

统计还用来确定一种语言中借词的比重：阿尔巴尼亚语中借词与本族语词的比例是 4710:430；朝鲜语中汉语借词占 75%，现代英语中 55—75% 的词借自法语、拉丁语或其他罗曼语^①。

最后让我们比较一下汉语和俄语中 20 个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或词素)，从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统计语言学是很有价值的，特别是对语言教学。表见下页(从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往下递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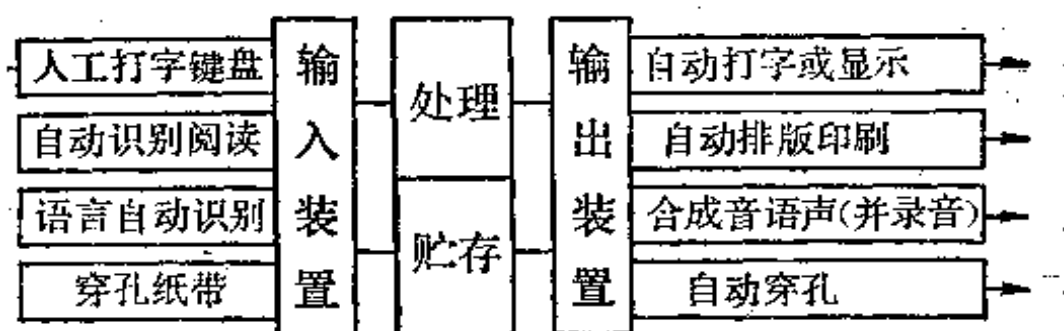
(伍铁平)

① 转引自 A. 康德拉托夫：《语言和符号》，第 83—90 页。莫斯科，1966 年。

12

什么是语言信息处理学？

所谓语言信息处理学就是研究如何用电子计算机处理语言文字信息，实现语言文字工作的机械化、自动化和现代化。语言信息处理包括语言文字的输入、处理、储存和输出四个组成部分。可以用简单示意图表示如下：



语言信息处理主要用于下列领域：

1. 企业、事业、行政、服务等方面的报表名册、统计资料、各类档案的贮存、检索、综合、分析，以及对生产、工作的指挥调度等的自动化管理；
2. 新闻出版方面的撰稿、编辑、排版、印刷、出版、发行等文字工作的自动化；
3. 科学技术的实验研究和情报管理方面，例如人工智能、机器翻译、机器编纂辞典、信息库和情报网的建立、图书资

料和情报文献的自动检索等;

4. 通讯工程和军事部门等。

我国语言信息处理的研究工作,目前的重点是研制汉字信息处理系统。汉字信息处理系统的研制最关键的问题是汉字编码方案的设计和计算机技术的实现。我国汉字编码的研究近年来异常活跃,已提出的汉字编码设计方案多达一百几十种。从汉字信息处理系统本身的要求来看,汉字编码方案的设计和计算机技术的实现应以符合下列几项标准为好:

1. 处理的汉字越多越好,重码字越少越好,完全避免更好;
2. 输入时选键快、击键少、处理时速度快,质量好;
3. 具有编辑、校对、排版、印刷或者查询、检索、复印等功能;
4. 具有智能终端,能进入情报系统或管理系统的信息网。

要作到高效率地输入和处理汉字信息,还必须研制汉字自动识别阅读输入装置。还应进一步研制能输入、输出和处理汉语语音的汉语信息处理系统。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汉字信息处理系统的研制已成为当前科技部门最紧迫的任务。

语言信息处理学是一个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学科,需要语言学、信息学、数学、计算机科学、自动化技术科学等的共同研究,才能研制出语言信息处理系统。因为处理的是语言文字信息,所以语言学及其分支计算语言学和数理语言学的研究是很关键的。

语言信息处理学的研究必将促进语言学和文字学的发展。汉语信息处理学的研究也必将促进我国现代汉语规范化、

文字改革和汉语拼音化研究工作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要求这三项研究工作除了必须遵循汉语、汉字本身的规律外,规范、简化,拼音也要考虑到有利于汉字和汉语信息处理。这是现代社会发展,也是科学技术发展进程对语言规范、文字改革和拼音提出的新课题,还是语言文字在当代发展中必然出现的新现象、新趋势。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我们的语言学家、文字学家注意的。

现代化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语言信息处理的效能。语言信息处理的发达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生产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有许多科学家预言,在当代科学技术革命的进程中,将继“电子化革命”(即电子计算机时代)之后出现“信息化革命”(即信息化社会)。也许到二十一世纪,全球信息网业已建成,人类社会文字记载的全部文献,甚至近代录音记载的历史资料,都将贮存在语言信息处理系统中。那时,人们不仅可以在地球上安装有终端设备的任何地方,也可以在星球(如月球)和星际站的终端机旁,随时随地,实时实地地查阅人类社会上下几千年的各种文献资料和录音材料。显然,在信息化时代,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必将高效率地发展,整个人类的文明将发生根本性的改观。

(蔡富有)

13

什么是宇宙语言学？

宇宙语言学(Cosmic Linguistics)是一门崭新的学科。它总共才有十来年历史。

宇宙语言学研究的是什么呢？如同世界语言研究的是世界语一样，宇宙语言学研究的是宇宙语言(Cosmic Language或 Lincos)。什么是宇宙语言？指的是为了进行宇宙交际而设计的人造语言，也叫宇际语言；也指从宇宙太空其他星系上宇宙人发来的宇宙语言信息，也就是科学家常谈论的从外太空发射来的奇怪的、莫明其妙的电讯号。

宇宙空间存在不存在真实的而不是人造的宇宙语言？科学家长期研究和近年来宇宙飞船的实地考察，已经证实了在太阳系里除地球之外的其他星球不存在智能动物。但科学家推断，在太阳系之外的无限外太空间却存在各种各样的、难以数计的星球人社会，而且是高度文明的社会；仅就地球所在的银河系而言，就有上百万个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既然宇宙太空存在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社会，那就存在各种各样的语言。我们把所有星系上的各种星球人统称为宇宙人，把他们的各种语言统称为宇宙语言。地球上的人类语言，一般认为有 2500 多种，但经过语言学家研究和描写过的语言只

有几百种。宇宙语言有多少种,这是无法数清的天文数字。对地球上的语言尚且未能逐一研究,对宇宙语言要逐一研究那是根本办不到的。因为宇宙语言的种数就象宇宙空间一样是无限的,更何况我们地球人现时对任何一种宇宙语言都是一无所知的,也许在一个长时期内仍将一无所知。另一方面,宇宙人对地球上的自然语言也是一无所知的。我们地球人对宇宙人设计的宇宙交际语言或发来的联络讯号信息,还无法辨识和解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科学家才试图设计易于为宇宙人识读的人造宇宙语言,以使用以和他们联系,交流信息,进而达到相互了解和交际。

用什么方法来研究和设计人造宇宙语言呢?据科学家推测,宇宙人比地球人的历史悠久、智能高超、文化昌盛;宇宙人是最发达、最先进的超级智能动物。宇宙人的语言也非常发达。自然,他们研究语言的科学也非常发达。马克思曾说过,只有引进了数学的科学才能算得上真正的科学。任何真正发达的科学,必然是数学武装起来的科学或数学化了的科学。可以设想,宇宙人的语言学也高度数学化了。尽管我们地球上的语言千差万别,不经翻译互不相通,但有一种共同的语言,即数学语言。因此,用数学的语言,把语言用数学方法表达出来,用数学化了的语言信息和宇宙人联系、交际的科学思想,便成了人造宇宙语言研究和设计的方法论。

为了稍微具体一点,我们不妨简单介绍一下荷兰学者弗勒登塞尔的宇宙语言研究和设计。他多年来一直在从事这项工作。继1960年发表《宇宙语言:宇宙交际语言的设计》,1974年又发表了《宇宙语言》。弗勒登塞尔设计的宇宙语言是以数学符号为基础的人造语言。它有一整套规则和代码,而且是

用数学方法来讲解一般句法的。为了把他的宇宙语言用于同宇宙人的无线电联系,他还专门设计了一套通讯的方法,利用数学的二进位制的两个基本数字 0 与 1 作为信号。为了易于为宇宙人解读,规则、代码运算都要简单明了。弗勒登塞尔的宇宙语言的基本信息运算是比较简明的。例如:

$$\begin{aligned} & \dots > \dots \\ & \dots < \dots \\ & \dots = \dots \\ & \dots + \dots = \dots \\ & \dots - \dots = \dots \end{aligned}$$

宇宙语言学是涉及到语言学、数学、天文学、符号学、逻辑学、心理学等的综合性新兴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既有自然的宇宙语言,也有人造的宇宙语言。从某种意义上说,宇宙语言学是一门近乎玄而又玄的、一时又无法证实、不能立竿见影的科学,需要成千上万年后才能看到它的效用和意义的科学。即使外太空发来的自然的或人造的宇宙语言被我们地球人识读出来,或者我们地球人的人造宇宙语言成功地设计出来,再将其用于无线电同宇宙人通讯联系,需要时间之长是十分惊人的。比方说,我们今天把无线电信号拍发给武仙星座的宇宙人,电信号以每秒 30 万公里的速度飞传,要花 2400 年才能到达目的地;又假设经过 2400 年后的武仙星座的宇宙人收到我们发的电信号并释读出来,即刻向地球人回电,那将又要经过 2400 年,我们的子孙才能收到。说起来这一无线电联系的往返时间 4800 年还算是比较短的,同更遥远的星座联系所需要的时间可能数以万年、百万年、千万年计。如果有谁学会了宇宙语言,想乘坐宇宙飞船去拜访外太空宇宙人,那即使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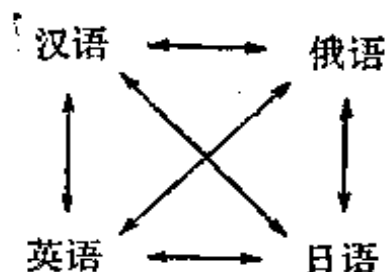
到离地球最近的恒星系,也需要八万年的时间呀!可见,宇宙语言的研究成果不仅在一个短时期内不能得到证实,而且要运用于和宇宙人的交际、交往,恐怕在一个相当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也是不能实现的。

尽管如此,宇宙语言学的研究如同探索宇宙及宇宙人秘密的其他科学一样,是人类长久的、光荣的、神圣的科学使命和历史使命,有着伟大的科学意义和历史意义。

(蔡富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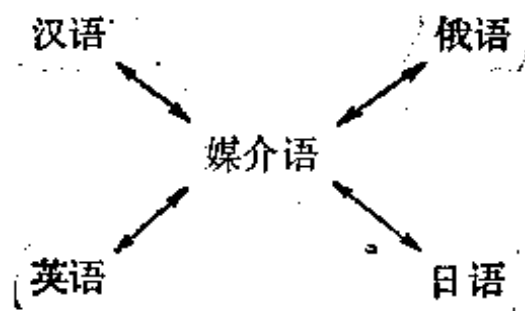
14 什么是媒介语?

语言学家根据不同语言的特点和语言形式化的要求,设计每种语言的程序,制定语言间的对应规律,以满足机器翻译的需要。但是,世界上的语言多达二、三千种,国际比较常用的语言也有几十种。为了便于国际活动和各国的情报交流,现在的机器翻译正向多语种发展。如果每两种语言之间要制定对应规则系统(算法),那么,四种语言互译就要制定十二种算法:



五种语言互译就要 20 种算法,二十种语言互译就要 380 种算法。

这不仅使语言学家耗费巨大的劳动,而且使电子工程学家要为设计大信息量的计算机而费力不少。为了省时省力,提高效果,有必要创制一种媒介语。各语言只要制定与媒介语的对应规则系统即可。这样,四种语言互译只要八种算法:



五种语言互译只要 10 种算法。每增加一种语言只要增加两种算法，20 种语言互译只需 40 种算法。

那末，用什么语言充当媒介语呢？

有的语言学家主张用一种自然语言，如汉、英语充当媒介语。但是，每种语言都有其特殊规则和特别例外，这给制定对应规则造成困难。

如果用汉语为媒介语，那末所有语言的对应规则都得考虑量词和声调的问题。汉语的量词极为丰富，一本书、一块黑板、一盏电灯、一张纸、一杯茶、一支烟；同样是烟，香烟要一支，冒出来的烟要一缕；同样是动物，马要一匹，牛要一头，羊要一只，狗要一条，鱼要一尾。

再看声调，汉语一个音节分阴阳上去，分“妈麻马骂，麦埋买卖，汤糖淌烫”。象“妈妈买了一捆麻，卖了一匹马，挨了一顿骂”，“汤里放点糖，汤淌了，别烫了”这样的话，外国人学起来很费劲，让机器天天同它打交道谈何容易。

如果用英语作媒介语，那末在汉译俄时，还得考虑冠词，虽然汉、俄语都没有冠词。让机器区别定冠词和不定冠词也不容易。

所以，由于自然语言复杂而多义，不适于充当媒介语。

人工国际语的语法规则虽然简单而无例外，但因过多地

仿效自然语言(如世界语也有冠词),也不适于充当媒介语。

理想的媒介语是什么样子呢?

首先,媒介语也应具有词汇和语法,它们应建立在各自然语言的词汇和语法的基础上,但只包括最典型、最常用的语法规则和词。语法和词为大多数自然语言所共有,并对各语言产生一种“中和作用”。

媒介语的每一个词都表示单值而精确的意义,句子是表示确定意义的词的综合。通常用数字体系充当词的符号。它是各语言词语的等值对应。

如:表示“两点之间距离大”的词

汉语	长(的)
俄语	длинный
英语	long
法语	long
德语	lang
西语	largo
日语	長い

媒介语也将选一个与之对应的词,这个词的物质体现就是号码,如 21。这个号码就是作为现实语言词的对应系列而存在的。目前阶段的媒介语还不考虑词的修辞色彩,只要义素对等的同义词,都只用一个符号代码来记载。例如“符号”这个词本身,英语中的同义词有 symbol, sign, note, mark, notation, index; 俄语中的同义词有 символ, знак- обозначение 等,但在媒介语中只用一个符号。又如表示老年女人的词,汉语中有“老太太”、“老太”、“老太婆”、“老大娘”、“老妇”、“老妪”、“老妖婆”等; 尽管它们的修辞色彩不同,但都包

含“人”、“女性”、“年老”三个义素，媒介语根据义素分析，把它们形式化为一个符号。

媒介语的语法同自然语言不同的是，一般只有句法，没有词法。

那末，词法怎么办？性、数、格、时、式、态、人称等词法范畴怎么对应？例如，俄语名词有性、数、格的语法范畴，汉语却没有，只有表示人的名词可加“们”表示复数。怎么建立语法对应呢？

现在一般处理的方法是：自然语言的词法范畴不作为媒介语的语法范畴，在媒介语语法中反映；而作为它的词汇事实，在词汇中反映。如俄语的 *книга* 一词同媒介语中的四个词相对应：“书”，“阴性”，“单数”，“第一格”，而汉语的“书”就相当于一个媒介语词，用一个代码表示。

媒介语的句法就是连符成句的规则；句子是表示确定意义的符号综合。

这样的媒介语才能满足普遍性的要求。它包括自然语言的词汇和句法，可表达自然语言所表达的意义。

（王德春）

一般都认为，欧美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派大致可以分为三派：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和美国描写语言学派。

首先请注意，不要以为美国的语言学家都属于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在美国的语言学家里也还有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和派别。所谓“美国描写语言学派”是人们对美国一部分持有共同学术观点的语言学家给予的一个称号。它并没有什么专门的组织形式。

那末，究竟哪些人算是这个学派的？他们的基本观点是什么？

在本世纪初，美国的语言学家跟欧洲的语言学家在学术观点上很多是一致的。以后，一些人类语言学家在调查美洲印地安语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自己的理论和方法。1911年出版了美国学者集体编写的《美洲印地安语手册》(Handbook of American Indian Languages)的第一卷。鲍阿斯(Franz Boas, 1858—1942)为这部书写了一篇序言。这篇序在美国语言学的历史进程中起了号角的作用，它号召人们摆脱传统语言学的概念和方法，强调对语言事实要作客观的描写。鲍阿斯是第一个为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开辟道路的人。

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的首先是鲍阿斯的学生萨丕尔 (Edward Sapir, 1884—1939)。他主张把口语记录下来作为素材, 然后对它的结构作客观的描写和归纳的研究。1921 年出版了他写的《语言论》, 在这本书里, 他是站在心灵主义的立场上解释语言现象的。

1924 年在鲍阿斯、萨丕尔、布龙菲尔德 (Leonard Bloomfield, 1887—1949)、斯图特范 (Edgar H. Sturtevant, 1875—1952) 等二十九个人的发起下, 美国的一部分语言学家组织了一个“美国语言学会” (Linguistic Society of America), 当时只有二百六十四名会员。从学术观点来看, 这些人主要可以分成新语法学派和人类语言学两大派。前者继承了辉特尼 (William D. Whitney, 1827—1894) 的传统, 后者接受了萨丕尔的学说。今日的美国描写语言学派正是以这两派人中的某些人为核心逐步发展起来的。从 1911—1933 年可以说是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摇篮时期。

1933 年出版了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这本著作在理论上正式宣告了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诞生, 它在以后的三十多年中成了这个学派的理论指南。布龙菲尔德早期是历史比较语言学家, 他站在新语法学派的立场上, 否认语音规律有例外。以后, 他接受了鲍阿斯和萨丕尔的分析理论和方法, 对美洲的印地安语作过专门的研究 (尤其对阿尔冈昆语的研究很有影响)。在《语言论》里, 他从行为主义的立场出发, 把语言看成是一系列刺激和反应的行为。他主张通过形式特征来描写语言结构, 反对用非语言学的标准 (特别是心理因素) 来分析语言。在共时的分析中应当排除历时的因素。这些理论都成了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门徒所信奉的教条。由于布龙菲尔

德的理论对这个学派有巨大的影响,有人也管这个学派叫“布龙菲尔德学派”。

在四十年代追随布龙菲尔德学说的主要人物有:海里斯(Z. S. Harris)、派克(K. L. Pike)、奈达(E. Nida)、威尔斯(R. Wells)、布洛克(B. Bloch)、特雷格(G. L. Trager)、弗里斯(C. C. Fries)、霍凯特(C. F. Hockett)、特瓦德尔(W. F. Twadell)等人。这些人可以说是这个学派的基本成员。从1933—1950年可以说是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成熟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队伍已基本形成,语言理论完全建立在行为主义的基础上,反对前一时期的心灵主义,初步提出了一些结构分析的技术和方法。

到1951年,海里斯的《结构语言学的方法》(Methods in Structural Linguistics)出版了。这本书实际上是海里斯把他从1942到1950年间发表过的论文加以系统化的产物。他认为,语言结构分析的任务就是把话语里一个个的单位给找出来,然后对这些单位之间的关系作出说明。在语言结构分析中,他规定了两道基本的分析手续:(1)切分,(2)归类。在分析中主要的依据是“分布”(distribution)。他要求在分析中,单位的总数越少越好,每一个单位能概括的成员越多越好,对各个单位的配列的说明越简单越好。这实际是数理逻辑所要求的:全面性,简单性和一致性。他把语言结构里的各种单位看成是逻辑符号,然后用数理逻辑的方法进行操作。海里斯在这本著作里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语言结构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学派的某些特点。继布龙菲尔德之后,他被认为是“美国新语言学的发言人”,也可以说是“后布龙菲尔德时期”的主要代表人。

从这个学派发展的历史看来，它是逐步形成的。这个学派的理论和结构分析的方法在不同的时期都有所变化和发展。从这个学派的主要成员的学术观点来看，他们也不是完全一致的。但总的说来，他们还是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例如：

(1) 反对心灵主义(mentalism)，主张机械主义(即行为主义)；

(2) 注重共时的描写和分析方法的研究；

(3) 着重形式的分析，运用分布和替代法，从话语中切分出音素、语素或语素序列，然后加以归类；

(4) 注意口语的研究。

在美国具有类似这样一些学术观点的人自然地形成了一个被人称为“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派别。他们突破了十九世纪只注重历史比较的传统的束缚，向共时描写的方向前进了一步。他们提出了一些语言结构分析和描写的理论和方法。由于这些方法是在调查和研究没有文字和历史文献的印地安语的基础上创立和发展起来的，它有一定的局限性。无论在理论上和方法上，这个学派也还有不少缺陷和问题。在美国，到五十年代的后期终于爆发了一场“乔姆斯基的革命”，他向当时占有统治地位的美国描写语言学派进行了全面的挑战。这一斗争促使美国的语言学继续向前发展。

(赵世开)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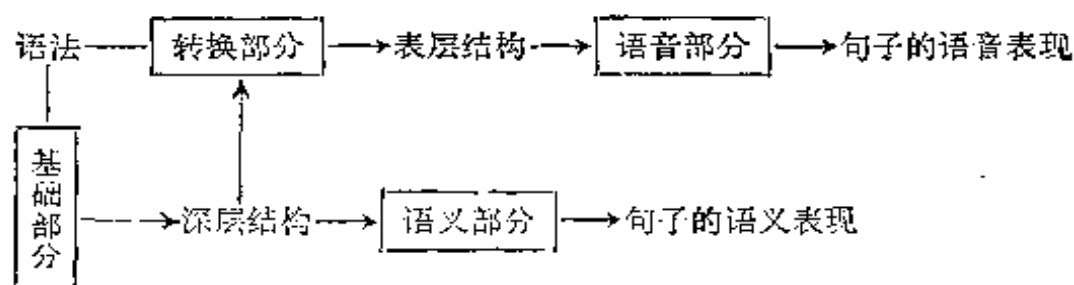
什么是“转换-生成语法”？

“转换-生成语法”是从英语 Transformational-generative grammar(简称 TG)翻译过来的。它的创建人是美国的语言学家乔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 1928—)。

乔姆斯基在 1955 年写了《语言理论的逻辑结构》(The Logical Structure of Linguistic Theory, 1975 年出版), 1957 年写了《语法结构》(Syntactic Structures, 请注意, 他的 Syntax 不是传统语法中讲的“句法”, 所以此处译作“语法”)^①, 这本书的出版可以说是标志了转换-生成语法的诞生。1965 年, 他又写出了《语法理论要略》(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乔姆斯基把这两本书称作转换-生成语法的“标准理论”。以后他又对“标准理论”作了某些修正, 成了所谓的“扩展的标准理论”。可见, 转换-生成语法从开始到现在有一个逐步形成和完善的过程。下面介绍的是转换-生成语法的标准理论。

为了有一个概貌的认识, 我们不妨先画一个转换-生成语法的理论框图:

^① 此书已由邢公畹、庞秉均、黄长著、林书武翻译, 名《句法结构》, 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 1979 年出版。——编者注



乔姆斯基认为语言学家就是要制定上图中带有框框的四部分规则。语法主要包括基础部分和转换部分。基础部分生成深层结构，深层结构通过转换部分得出表层结构。语义部分属深层结构，它给深层结构作出语义解释。语音部分属表层结构，它给表层结构作出语音解释。这就是转换生成语法的全部内容。

基础部分的基本规则是“重写规则”(rewriting rules)。它的格式是： $A \rightarrow Z/X-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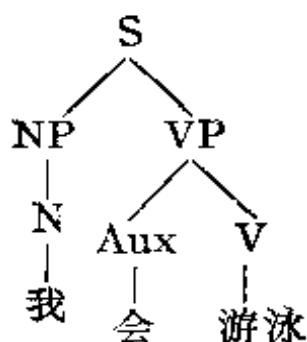
它的意思是 A 可以重写成出现在 X—Y 语境里边的 Z (空档“—”表示 Z 出现的位置)。基础部分的重写规则也就是“短语结构规则”(PS-rule)，例如：

$$S \rightarrow NP \widehat{VP} \quad (\text{我/会游泳})$$

$$VP \rightarrow Aux \widehat{V} \quad (\text{会/游泳})$$

其中的 S, NP, VP, V, Aux 等等是“范畴符号”(Category Symbol)，“我”，“会”，“游泳”是“词汇成分”(Lexical item)。词汇成分和“语法成分”(Grammatical item，如英语第三人称单数的-S)统称“成素”(formative)。

重写规则可以生成“短语标记”(phrase-markers)，它可以用“树形图”(Tree diagram)来表示：



可见短语标记是由成素和范畴符号组成。在这一系列短语标记里,第一级 $NP \widehat{VP}$ 是“开首语符列”(Initial string),最末端的“我会游泳”是“终端语符列”(Terminal string)。在我们的例子里,终端语符列恰好是一个句子。一般情况下(尤其是复合句),它不一定是一个句子。只有通过转换才能得出真正的句子(表层结构)。整个的短语标记 (generalized phrase-markers) 就叫做“深层结构”。所以说,基础部分生成“深层结构”。

基础部分还包括“分支规则”(branching rule)和“次范畴化规则”(subcategorization rule),它们主要是用来确定语法关系和语法特征。

深层结构通过不同的转换可以得出不同的表层结构,比如,主动和被动,陈述和疑问,并列关系,主从关系等。转换规则主要包括替换(substitution)、省略(deletion)、添加(addition, adjunction)和换位(permutation)。例如英语的 John saw Mary(约翰看见了玛丽)→Mary was seen by John(玛丽被约翰看见了)的转换如下:

$$NP_1-Aux-V-NP_2 \Rightarrow NP_2-Aux-be-en-V-by-NP_1$$

其中包括 NP_1 和 NP_2 的换位,添加了 be, -en, 和 by。

语义规则和语音规则都是解释性的。它们都是按特征(如语义要素和语音特征)分类,再制定规则。语义规则可以限制句子内成分间的同现,一种是词汇上的限制(即“选择性规则”),另一种是语法上的限制(即“严格的次范畴化规则”)。语音规则包括“词级规则”和“非词级规则”,还有“重新调整规则”(Readjustment rule)等。

从以上介绍的转换-生成语法的理论框架可以看出它是高度形式化的。它要求有很强的说明力,即能预言哪些成分能出现在一种语言结构里,而且哪些结构在一种语言里是可能的。

(赵世开)

乔姆斯基的学说以后又有了新的发展,即“修正的扩展的标准理论”,最新的是关于“支配和制约”(government and binding)的理论。(赵世开,1983年6月)

17

乔姆斯基提出了一些什么新的观点？

自从布龙菲尔德(L. Bloomfield)的《语言论》(Language)在 1933 年出版以后，以行为主义和经验主义为基础的结构主义的语言观和结构分析方法支配了美国的语言学。它的主要特点是在语言结构的分析中不太考虑历时的因素，回避意义问题，以分布和替代的原则和方法对语言结构进行切分和分类。这种“分类主义”(taxonomism)的方法虽然对语言结构的表面现象作了一定的分析(如分出了“直接成分”)，但是对语言结构的很多现象(特别是“同形异构”即 homotaxis 或 ambiguity)解释不了。这就促使乔姆斯基和其它一些语言学家企图另找路子。他们希望能准确地全面地说明语言现象。乔姆斯基提出了一套从根本上不同于布龙菲尔德的理论和方法，他的学说叫做“转换-生成语法”。它在六十年代的美国和世界各地引起了震动和强烈的反响。

首先乔姆斯基认为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先天的机制。他假设人都有一种“语言习得机制”(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这正是人类具有语言能力的物质基础。

乔姆斯基认为我们不仅应当研究语言行为 (Linguistic performance)，而且应当研究语言能力 (Linguistic compet-

ence)。转换—生成语法就是关于语言能力的理论。他认为布龙菲尔德等人根据语言素材进行分析和描写，只是研究语言行为，不能说明语言能力。语言理论应当解释人类天生的语言能力，要能说明作为语言行为基础的心理现实。语言学家应当在直觉的基础上工作，所以他的学说是理性主义的。他认为布龙菲尔德等人是经验主义的。

布龙菲尔德等人在描写和分析语言结构时采用的是归纳法，乔姆斯基运用演绎法。他认为语言产生的过程是由基础部分生成深层结构，然后通过转换才得出表层结构。

乔姆斯基认为布龙菲尔德等人在语言结构分析中只是按分布和用替代法切分出单位，然后给各个单位贴上标签，这只能算得上是“分类主义”。他认为任何科学研究都应当通过观察并且把观察到的现象联系起来，用一般的规则加以概括并能预言和解释新出现的现象。换句话说，他不满足于单纯的描写，他要求语法有解释力。

转换—生成语法要求以有限的规则生成无限的句子。乔姆斯基认为他的语法具有强大的生成能力，因为他除了应用短语结构规则外还应用了转换规则。在这一点上他跟布龙菲尔德等人的学说和方法有很大的不同。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乔姆斯基强调研究语言的普遍现象(Linguistic universals)。也就是说，他注意共性的研究，例如共同的深层结构，抽象的规则系统，等等。布龙菲尔德等人偏重个性的研究，即找出各个单位和结构的不同。

转换—生成语法主要要回答：“说话的人怎么会说出并了解新的句子？”这就必然涉及内在的语言能力问题。乔姆斯基学说的最大特点是注重语言现象内在的研究，比如探索语言

的先天机制,生成语言的过程,语言的深层结构,等等。乔姆斯基企图通过对语言能力和语言结构的研究找到语言的普遍现象。

(赵世开)

18

什么是“直接成分”？

我国著名的文学家钱钟书先生在他写的《围城》中说“老科学家”指的可能是“老科学”的专家，因此含有贬义。1979年钱先生访美归来以后香港有位名叫水晶的记者写了一篇访问记，提起这段往事，故意管钱先生叫“文学老家”，免得别人误会钱先生是“老文学”的专家。这段文学轶事中所包含的道理，用现代语言学术语来说，就是“老文学家”这个短语的直接成分既可能是“老|文学家”（即年老的文学家），也可能是“老文学|家”（即古老的，陈旧的文学的专家）。当然，这段轶事是故意说俏皮话；其实，在汉语中由于节奏、音节的关系，“老文学家”的直接成分应是“老”和“文学家”，因为“家”这个后缀不能单说，所以在“家”字前面不可能有“音渡”（短暂的停顿），因此它的直接成分不可能是“老文学”和“家”。

直接成分 (immediate constituent, 简称 IC) 这个概念和术语是布龙菲尔德最先在其名著《语言论》(1933) 中提出来的。他认为任何复杂的语言形式都是由语素组成的，例如 Poor John ran away (可怜的约翰跑开了) 是由 Poor, John, ran, a- (由于这个语素不能独立出现，只能附着在别的语素之上，布龙菲尔德叫做粘附形式 [bound form])，way 五个语

素组成的。他把这种分析到最后的语素叫“最终成分”(ultimate constituent)。但是,这种分析方法不能揭示话语组成的层次,因此他接着说道:“任何操英语的人……都必定会告诉我们, Poor John ran away 的直接成分是 Poor John 和 ran away……ran away (跑开) 的直接成分是 ran(跑) 和 away(离开)”(布龙菲尔德:《语言论》英文版,第 161 页)

这种区分构成话语层次的方法对区别某些歧义是有很大的好处的,著名的例子有“咬死|(猎人的)狗”(咬死了狗);“咬死猎人|的狗”(咬死了猎人);教|小王的老师;教小王|的老师;年老的|男人和女人;年老的男人|和女人;The king | of England's isle(英岛的国王),The king of England's isle(英国国王的岛屿)。又如英语的 ungraceful (不雅致的)和 disgraceful (丢脸的)都是同样包含三个语素(一个前缀,同一个词根,同一个后缀),但是两者的直接成分不同,意义也完全不同。前者是 un-[(grace)ful], 是从 graceful (雅致的)加前缀 un-构成,因为没有 ungrace 这样一个词,所以它的直接成分不可能是(ungrace)-ful。但是 disgraceful(丢脸的)的直接成分却是 dis-grace | ful, 因为它是从 disgrace(丢脸)加后缀 ful 构成,而不是由 graceful加前缀 dis 构成。因为 graceful 的意义是“雅致的”,跟 disgraful(丢脸的)的意义无关^①。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不论对句子、词组或词都可以进行直接成分切分。切分时所依据的是语义关系、类比、语音特征(包括音渡等)等多方面的因素。但是,由于布龙菲尔德在《语言论》中并没有详细论证将一段话语切分成直接成分的根本

^① D. Bolinger: *Aspects of Language* (语言的面面观), 第 2 版 (1975), 第 139 页。

据,因此,尽管后来威尔斯^①、派克等语法学家写了专文论述直接成分切分的原则,还是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所以派克承认有时切分只能根据描写方便,直觉和常识^②,也就是说有很大的主观成分。下面举一些例子:

(1) “主语+及物动词+宾语”的结构究竟怎样切分为直接成分,即切分的界限应在主语后面,还是在动词后面,并没有一定的理论根据。因此,虽然多数语法学家根据直觉和传统(因为传统语法就是将双部句切分为主语部分和谓语部分),主张切在动词后面,但也有些语法学家主张三切为“主语|及物动词|宾语”,即认为有三个直接成分^③。

(2) 时间状语和处所状语究竟划进一个句子的哪个层次?有人根据传统语法的直觉将它划进谓语部分,充当句子的第二层次是直接成分,但是莱昂斯却认为它们是跟主语谓语同时进入句子的,即应将 My friend | came home late | last night(我朋友|昨晚|回家很晚)切分成三个直接成分^④。

(3) 并列结构中的连词跟左右双方都有联系,因此把它切在哪一方都有片面性。现在已有三种切法: men | and | women(男人和女人)(三切,见上引威尔斯《直接成分》文), men | and || women(E. Nida^⑤), men | and | women (Ch.

① R. Wells: «Immediate constituents»(直接成分),刊美国«Language»(语言)杂志第23卷(1947)第81—117页。

② K. L. Pike: «Taxemes and Immediate Constituents»(语法元素和直接成分),«Language»第19卷(1943)第2期。

③ L. Lyons主编: «New Horizons in Linguistics»(语言学中的新视野),1972,第118页。

④ 同上,第116页。

⑤ E. Nida: «Morphology», 1949, p. 92, 又见 D. Pittman: «Practical Linguistics» p. 94. Ohio, 1948。双杠表示第二次切分为两个直接成分: and 和 women。下面的第三杠代表第三次切分为两个直接成份,余类推。

Hockett^①，即将 and 看作标志，不算直接成分）。

(4) 接连有几个定语修饰同一个名词时，其直接成分有时也不好确定。例如：“我的{一件[呢子的(新|制服)]}”的切分所根据的恐怕只不过是顺切的直觉，并没有多少理论作为依据，因为我们也可以说“新的呢子制服”，于是“新的”层次又高于“呢子”了。而且这个词组译成外语(如英、俄语)时，“新的”得放在“呢子的”前面，也就是说，“新的”的层次高于“呢子”。

最后，直接成分理论还有以下三个致命的弱点：

(1) 乔姆斯基对直接成分模式的批评主要是说它没有考虑语言的生成过程，因此有时不同来源(底层结构不同)的短语的直接成分却完全一样，人们无法根据直接成分分析区别其歧义。例如：The || shooting | of || the ||| hunter |||s 的涵义既可能是“猎人们的射击”(从核心句[或者叫底层结构] The hunters shoot“猎人们射击”转换而来)，也可能是“朝着猎人们射击”(从 They shoot the hunters.“他们朝着猎人射击”转换而来)。不论哪个意义，其直接成分都是相同的。

(2) 直接成分切分忽略了句子的不同交际作用会产生不同的切分。例如：“我要欢呼”这句话可以根据不同的上下文，不同的交际功能切分为“我|要欢呼”(回答“你怎么啦?”)或“我要|欢呼”(回答“你要干吗?”)(这种切分被布拉格学派叫做“交际切分”)，而不一定象有的同志所主张的那样切分为“我|要欢呼”^②。

(3) 美国语言学家博林杰指出，“关于(语言)单位的本质

① Ch. Hockett: «A Course in Modern Linguistics» 1958, p. 153.

② 这种主张见《中国语文》1963年第2期，第149页。

以及这些单位是以怎样一种方式发生关系的，直接成分分析未能为我们提供任何信息”。例如 *behind | the || house* (在房屋后面) 和 *only | a || few* (仅仅几个) 这样两个短语虽然性质迥异，其直接成分分析却完全相同^①。吕叔湘先生也指出直接成分分析法光能揭示单位之间的层次，却不能说明单位之间的结构关系，如“一 || 朵 | 大 || 红 ||| 花”跟“小 || 李 | 上 || 夜 ||| 班”就是结构关系不同的“迥不相同的两个片段”^②。

(伍铁平)

① D. Bolinger: *Aspects of Language*, 第2版, 1975, pp. 139—140.

② 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1979，第58页。

19 什么是深层结构? 什么是表层结构?

“深层结构”(deep structure)和“表层结构”(surface structure)是“转换-生成语法”里的术语。

大家知道,转换-生成语法最大的特点在于转换。所谓“转换”(transformation)就是把深层结构变换成表层结构。转换-生成语法学者认为有一些歧义句实际上只是表层结构相同,它们的深层结构并不相同。举例来说,汉语的“鸡不吃了”,如果用结构主义的直接成分(IC)分析法来表示只能是“鸡/不吃了”。但是这个句子里的“鸡”既可以是施事,也可以是受事;换句话说,这个句子可以表达两种意思,一是“鸡不吃(东西)了”,二是“(某人)不吃鸡了”。为什么同一个结构会有两种不同的意义呢?转换-生成语法学者认为“鸡不吃了”这是“表层结构”,它是由两个不同的“深层结构”转换来的,其中一个深层结构中的“鸡”是施事,另一个深层结构中的“鸡”是受事。

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除了可以说明歧义句外,它还可以把表面上不同的两种结构联系起来。比方说,英语里的主动句和被动句,象 John saw Mary(约翰看见了玛丽)和 Mary was seen by John(玛丽被约翰看见了)表面上结构是不同

的。实际上，它们是由一种深层结构通过转换得出另一种表层结构。象刚才举的那两个句子用转换规则来表示大致是：

$$NP_1 - Aux - V - NP_2 \longrightarrow NP_2 - Aux - be - en - V - by - NP_1$$

其中 NP_1 代表 John, NP_2 代表 Mary, Aux-V 代表 saw, Aux-be-en-V 代表 seen。至于具体的转换手续这儿就不细谈了。

还有一种情况即所谓的“同形异构”，两个结构表面上相同实际不同，比如“买的书”和“来的人”表面上都是“的”字结构，实际上“书”是受事而“人”是施事。转换-生成语法学者认为这也是由于二者的深层结构不同。

这样看起来，“深层结构”似乎很管用。转换-生成语法的主要贡献之一恐怕也在于此。正如大家知道的，转换-生成语法学者批评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是“分类主义”正是因为后者只注意了表层结构。这是从分析方法来说的。从理论上讲，转换-生成语法学者区分了“语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和“语言行为”(linguistic performance)。他们认为表层结构属于语言行为，深层结构属于语言能力。语言学家的任务主要还在于说明语言能力。所以重点应该放在研究深层结构上。

那么，怎么给深层结构下个定义呢？这很不容易。大家会发现，现在人们对深层结构有各种不同的理解。实际上，转换-生成语法学者本人（如乔姆斯基）也在不断修正深层结构的概念。我想，姑且拿乔姆斯基在 1970 年《深层结构，表层结构和语义解释》一文中对深层结构规定的基本概念为例，他认为深层结构具有以下三个性能：(1)它决定语义表达，(2)它映现在表层结构上，(3)基础部分决定深层结构的形式(所谓“形

式”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由范畴决定的语法功能成分的次序，二是语境特征决定词汇成分如何进入结构)。可是 1970 年以后，乔姆斯基又认为深层结构不完全决定语义表达，逐渐把语义解释放到了表层结构。这种变化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赵世开)

20

什么是音韵学？

音韵学向来被称为“绝学”。“绝”字有好些个义项，这里指的是“失传的学问”。其实，音韵学是我国一门传统的学问，历代都有人去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只不过有些音韵学专著，名词术语纷繁，概念不够明确，方法上也有不精到的地方，初学的人往往感到玄妙莫测，因而视为畏途。但是只要我们有钻劲，有毅力，掌握起来也并不难。

音韵学最初是属于传统语文学的一个部门。传统语文学是在古代“言语难晓，训释方通”的情况下产生的，为了读懂古代典籍，就必须对于古籍的字、词进行分析训解。它把一个字分析成形、音、义三个方面，比如“绝”字，“从刀系”指形，jué（今音）指音，“断丝、无、奇、远、最、穷尽、走不通、没出路……”指义。关于字形的研究叫文字学，关于字音的研究叫音韵学，关于字义的研究叫训诂学。不过，这只是大致上的区分，实则三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不能截然分开。后来，传统语文学经过发展，由分析一字一词的形、音、义，进到分析汉语的语音、语法、词汇的系统及其发展规律，成为汉语语言学。音韵学就是汉语语言学的一个分支。

“音韵”就是声音，“声成文，谓之音”。汉朝以前没有“韵”

这个字，“韵”当时写作“均”，清朝仿古学者有时还把“韵”写作“均”，例如“六书音均表”、“成均图”之类。“音韵”指语言的声音，即一般所说的语音。汉语语音的基本单位是音节，音节可以分析成声、韵、调三个组成部分，音韵学就是研究汉语的声、韵、调的发音原理和类别，并探讨它们的古今演变规律的学问。

汉语有着悠久的历史，汉语的语音是经常变化和发展的。古今语音不同，南北方音有异，而且从上古以来，就存在着共同语和方言的差别，这些都是音韵学研究的课题。清代学者把音韵学分为三科：古音学——研究先秦时期的上古语音；今音学——研究《切韵》所代表的中古语音；等韵学——用图表的方式分析语音的发音原理和类别。现代学者对音韵学的分类是研究各个历史时期的语音，叫做断代音韵学，研究语音的发展叫做历代音韵学，总称汉语音韵史。断代的研究是根据不同的历史时期划分成若干个语音平面，如上古语音、中古语音、近代语音（或近古语音），这是首要的任务。历代的研究是通过各个平面的比较，探讨语音由古迄今的演变规律。这是音韵学的主要内容。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用各民族文字写下的文献是文化宝库中最精粹的一个部分。汉语的典籍为数最多，这给音韵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但是由于汉字不是拼音文字，能够反映古代语音的文献资料还是有一定的范围的，而且有不少是不能直接用来做为依据，还需要采取一定的手段去进行钩稽、整理，才能发生效用。

音韵学研究的资料大致有：

1. 韵文。我国古典文学中诗词歌赋这类韵文作品丰富

多采，它充分体现语言的形式美。我们可以从归纳韵脚中了解当时的韵母情况。方法是编制各种类型的韵谱，如诗经韵谱、楚辞韵谱、隋韵谱、唐诗韵谱、宋词韵谱、元曲韵谱等。

2. 反切、韵书、韵图。反切是用汉字注汉字的一种注音方法，用两个字注一个字的音，前一个字表声、后一个字表韵和调。整理出各个时期的反切，也可以用来研究语音。韵书是按韵类和调类(有的还按声类)编成的，又是反切的总汇，所以是研究古代语音的重要依据。

3. 现代汉语方言。现代汉语方言是由古代汉语发展来的，根据语音发展的规律性，可以从现代汉语的方言推求古代汉语语音。

4. 对音。对音分两大类，一类是用汉字对译别种语言的词汇材料，包括汉语里吸收别种语言的借词。一类是用别种语言的书写形式对译的汉语字、词的材料，包括别种语言吸收汉语的借词。这也是研究古代汉语语音的资料。

此外，还有汉字本身的材料，如谐声字、通假字、训读等，也能吐露出一些古代汉语语音的消息。

1.2. 两项资料只能反映出古代汉语语音声、韵、调的类别，以及类与类之间的某种关系，还不能直截了当地告诉你这些类究竟是怎样的音值。3.4. 两项可以进行调查、描写和借助别种语言的拼音文字了解具体的音值，用来跟 1.2. 两项的类别相参证，对于古代汉语语音的构拟才有了可能。所以这几种资料都需要结合起来运用，才能得出可靠的结论。

音韵学的用途首先在于帮助阅读古代汉语文献。古代汉语文献是用古代汉语写的，古代汉语经过长期的发展，跟现代汉语差别越来越大，如果对古代汉语不加训释，就很难读懂或

得到透彻的了解，音韵学是训释文献的一种手段，所以它对于我们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化遗产是很有用的。

其次，汉语史包括语音史、语法史、词汇史，音韵学的主要任务是建立语音史，这是汉语史不可缺少的内容。

再次，音韵学可以帮助与之相关的科学，如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文学史、民族学、敦煌学、中亚学等学科的研究，为这些相关的科学提供可靠的资料。对于汉语语言学、现代汉语、词典学、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字等的研究，它的用途就更不用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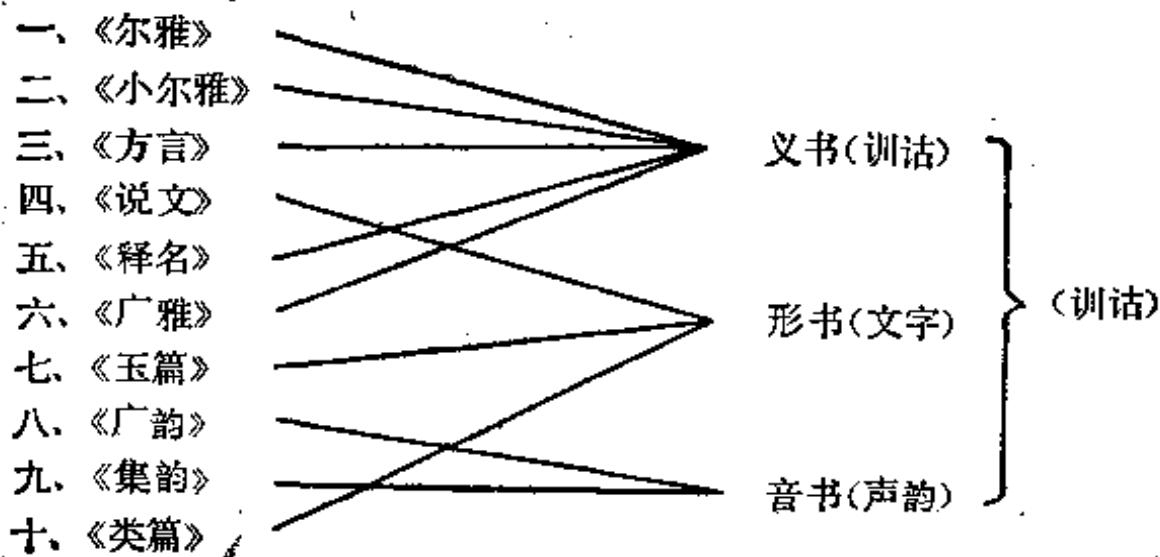
(杨耐思)

21

什么是训诂学？

训诂学是中国一门很古老的学问。是中国传统语文学——前人称之为“小学”——中的一个重要的部门。

训诂学有广狭两种含义。林尹在《训诂学概要》中列举“训诂学的根柢书籍”如下：



中国传统语文学，即小学，通常分为三个部分：训诂、音韵、文字。这和音韵、文字相对的训诂学，是狭义的训诂学。但训诂又离不开音韵、文字，便又把音韵、文字也包括在训诂之中，这就是广义的训诂学。

广义的训诂学，是传统语文学中的一个部门。它从语言角度研究古代文献，也兼及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因素。它的目的是帮助人们阅读古典文献，解决他们所遇到的各种实际困难，提高他们的阅读能力。

狭义的训诂学，是我国传统的研究词义的学科。它又偏重于研究我国古代文献中的词义，特别是以研究汉魏以前的古书中的词义为主。它虽以研究词义为主，也兼及语音、语法、修辞等语言现象。

训诂学又有新旧之分。早在1947年，王力在《新训诂学》一文中，就提出，对旧训诂学来一个总清算，创建新训诂学。他说：“必须打破小学为经学附庸的旧观念，然后新训诂学才真正成为语史学的一个部门。”今天的训诂学者说：“训诂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词义和词义系统，它的首要任务就是研究语义发展演变的规律。”（周大璞：《训诂学要略》15页）他们指的正是新训诂学，和古代人所理解的训诂学是有一些差别的。

训诂，又叫“训故”、“故训”、“古训”、“解故”、“解诂”等。“训诂”两字连用，始于周末鲁国人毛亨，他把自己注释《诗经》的书叫做《诗故训传》。这里的“故”、“训”、“传”三个字是并列关系，是注解古书的三种方法。“训诂”合而为一，成为一个名词，开始于汉代的典籍。什么叫“训”？就是指用通俗的话来解释深僻的词义。什么叫“诂”？就是指用当代的话来解释古代词义。

训诂学，萌芽于先秦，形成于两汉。隋唐是它的保守时期，宋代是它的革新时期。元明是训诂学的衰微、停滞时期，而清代则是训诂学大发展、取得光辉成就的时期。当前是新训诂学发展的时期，即用现代语言学的观点，总结旧训诂学的

成就，在此基础上创建可以作为现代语言学的一个部门的新训诂学。

传统的训诂学，主要有两种体式：一是随文释义的注疏，一是通释语义的专著。前者如：汉人贾逵《左氏传解诂》、马融《论语注》、郑玄《周易注》、服虔《左氏传解谊》，清人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陈奂《毛诗传疏》、焦循《孟子正义》、郭庆藩《庄子集释》等。后者如：《尔雅》、《小尔雅》、《广雅》、《方言》、《说文解字》等。

传统的训诂学有两大缺点。一是未能彻底摆脱把训诂当作经学附庸的观念，不作系统的理论上的概括。二是厚古薄今，重文轻语，轻视唐以后新词俗语的研究。新训诂学努力纠正这两个倾向。一方面重视了唐以后的词义的研究，重视了口语方言的研究；另一方面重视了系统的理论上的概括。训诂学概论一类著作的出现，就说明了这一点。训诂概论方面的书现有：周大璞《训诂学要略》（湖北人民出版社）、洪诚《训诂学》（南京大学中文系油印本）、林尹《训诂学概要》（台湾省台北市正中书局印行）。

（王希杰）

22

《尔雅》是一部什么书？

《尔雅》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分分类解释词义的专书，是古代的词典。

《尔雅》的作者，说法不一。一般说，它是公元前 770 年春秋时代以后的经学家解释古籍经传中词语的记录，代代相传，各有增益；到西汉初年被学者整理加工而成。班固(32—92)《汉书·艺文志》记载了它，唐代(618—907)将它列入“经部”，以后，《尔雅》便成了儒家经典之一，是“十三经”的第十二种。它是阅读古籍经传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古代词典。

现在见到的《尔雅》内分十九篇。这个数目，与《汉书·艺文志》所载“三卷二十篇”不同，与魏张揖《进广雅表》所说“三篇”也不一致，主要是因分篇大小不同，清宋翔凤《郝氏尔雅义疏·序》说原有“序”一篇失落，也有可能。

十九篇的名称是：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尔雅》的雅字是正、合乎规范的意思，十九篇是把词语分类解释。释诂，是解释古词；释言，是解释动词和一部分形容词；释训，是解释叠音联绵词和词组，也是形容词，还有副词。这头三篇都是用今释古，用通俗释殊方。例如：

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权舆，始也。（释诂）

殷、齐，中也。（释言）

明明、斤斤，察也。（释训）

都是把被释词放在前面，把意义相同相近的词归作一条，后面用一个当时规范的词去解释。上例用“始”解释“初……”等，这条内容，我们今天生活中也会遇到，如某某建筑落成典礼，这个“落”字，就是“始”的意思。不过，古人由于时代局限，对词的分类，诂、言、训三篇界限并不十分清楚，解释也较为笼统。以下十六篇都是分类词汇。解释时是用今俗释古雅，用通名释别名。第四篇是解释有关亲属的称呼，亲族包括父母、兄弟、夫妇等各种关系。例如：

父为考，母为妣。

男子先生为兄，后生为弟。

第五篇至七篇，是解释有关宫室建筑、日常用具及饮食衣服、各种乐器的名称。例如：

宫谓之室，室谓之宫。

正门谓之应门。（以上释宫）

木豆谓之豆，竹豆谓之筴，瓦豆谓之登。

衣梳谓之祝。（以上释器）

大琴谓之离。

大磬谓之鼗。（以上释乐）

第八篇至十二篇，是解释有关天文气象、时节礼祭、地域区划、丘陵高地、大小山岳、河川的一些名称。例如：

穹苍，苍天也。春为苍天，夏为昊天，秋为旻天，冬为上天。（释天）

两河间曰冀州。河南曰豫州。(释地)

丘一成为敦丘,再成为陶丘,再成锐上为融丘,三成为昆仑丘。(释丘)(成是重叠的意思)

河南、华,河西、嶽,河东、岱,河北、恒,江南、衡。(释山)

泉一见、一否,为灋。(释水)

第十三篇至十九篇,是解释植物、动物方面的分类词汇,即草、木、虫、鱼、鸟、兽、畜。但是,其中也有不科学的地方,如“鼯鼠”因能飞,鼯鼠因与鸟同穴,都放在释鸟篇,又如“畜”指家养动物,“兽”指野生动物,豕、牛、羊等既在释兽又在释畜篇内,界限混淆。现将释草篇以下择举数例:

茨,蒺藜。(释草)

有足谓之虫,无足谓之豸。(释虫)

鱣是鳣。(释鱼)

马八尺为馵。狗四尺为獒。(释兽)

由上可知,《尔雅》是一部词义的训诂书,是后代考证古代词语、名物的重要资料。但是,一方面因为它本身的解释简略笼统,一方面因它所涉及的古今方言知识不易被人理解,所以,后来有不少人为它作注释,如汉代有郭舍人、刘歆、樊光、李巡,魏代孙炎,梁沈旋,唐裴瑜等。这些注释大多散佚,清马国翰有《尔雅古注》(辑本)。现在留传的只有晋郭璞的《尔雅注》,宋邢昺的《尔雅疏》,陆佃的《尔雅新义》,郑樵的《尔雅注》等。

清代研究《尔雅》的人很多,较为详密的有邵晋涵(1742—1796)的《尔雅正义》和郝懿行(1757—1825)的《尔雅义疏》。邵氏掌握“因声求义,音近义通”的训诂方法,解释词义,探求词

源,成绩很大。

后代仿《尔雅》写的书很多,可以名之为“群雅”。其中重要的,如:《小尔雅》(旧题汉孔鲋著)、《埤雅》(宋陆佃撰)、《尔雅翼》(宋罗愿撰)、《骈雅》(明朱谋玮撰)、《通雅》(明方以智撰)、《别雅》(清吴玉搢撰)、《拾雅》(夏味堂撰)、《比雅》(洪亮吉撰)、《叠雅》(史梦兰撰)和《西域尔雅》(王初桐撰)等。这些书与《尔雅》及其注疏一样,都是研究汉语历代词汇词义的珍贵材料。

(徐家姆)

23

《说文解字》为什么重要？

字典是我们学习中不可缺少的工具。那么，汉字有几千万，是谁最早想到把它们按部首归类，编出一部字典呢？发明者是我国东汉时的许慎。许慎编著的《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按部首排列的分析字形和考究字源的字典。这部字典从公元100年（和帝永元十二年）开始编写，121年（安帝建光元年）完成，距现在有一千八百多年了。在人类文化尚不很发达的时候，我国就有这样完整系统的字典，这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罕见的。

许慎（约58年——约147年），汝南郡召陵（现河南鄆城县）人，字叔重，当过太尉府祭酒。他曾就学于经学大师贾逵，后来成为第一流的古文经学家，当时有“五经无双许叔重”的赞语。许慎认识到文字的重大作用：“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为了训释古代经书的需要，为了进行语文教育的需要，他着力于汉字规律的研究，分析了近万个汉字，摸索到汉字字形和意义之间的关系，归纳出了汉字的540个部首，编排成了一部查检比较方便的字典，帮助人们更好地掌握和运用文字，提高识字的效率。

书名为什么叫做《说文解字》呢？按许慎的说法是：“仓颉

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寢多也。”通俗地说，文是独体的象形表意字，字是合体的表意字和形声字。“文字”后来成为一个双音词了。《说文解字》又常简称为《说文》。

《说文解字》共十五卷，本书十四卷，第十五卷是叙目。共收 9353 字，重文 1163 字，解说 133441 字。许慎认为，汉字的造字法有六种，就是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叫作“六书”。六书中，最多的是形声字，据清朝说文学家王筠统计，形声字共 7697 个（占 82%），指事字 129 个，象形字 264 个，会意字 1260 个（这三种占 17%），转注、假借很少（不及 1%）。

《说文解字》的说解体例是很清楚的，许慎说“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就是先列一个小篆，如果古文、籀文与小篆不同，便列在小篆解释的后面。在小篆下，先讲这个字的本义，再讲字形与字义或字音之间的关系。比如：

上，高也。此古文上，指事也。凡上之属皆从上。

𠂔，篆文上。

鳥，长尾禽总名也。象形。鸟之足似匕，从匕。凡鸟之属皆从鳥。

驕，马高六尺为骄，从马乔声。诗曰：“我马唯骄。”一曰野马。

男，丈夫也。从田，从力。言男用力于田也。凡男之属皆从男。

《说文解字》中的 540 部首又是依怎样的次序排列的呢？许慎说，“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主要的是按形体相似而排在一起，有的也依意义相近而相连。这个排列的功夫也颇不容易。比如：

儿、兄、兂、兂、兂、兂、兂、兂、兂、兂
止、址、步、此、正、是、走、彳、又、延、行

等两组，就是因为形体各有相似之处而排下来。“牙”和“齿”，“鸟”和“隹”，“五、六、七、九”，“甲、乙、丙、丁、戊、己”等，则从意义上看同属一类而连在一起。

每一部之内的字，偏旁都相同，部首下一定说“凡某之属皆从某”。在同一部里，意义相近的字多列在一起，如心部中的“慢、怠、懈、惰”，火部中的“熠、煜、耀、輝、煌、焜、炯”，日部中的“晚、昏、晡、瞢、暗、晦”等。

许慎通晓古文经，又着力于文字构造的研究，他力图解说字的本义，有时引经传文说明字义、字音，有时引用另外两部字典《尔雅》和《方言》或其他经传训释，他十分注意吸取前人和同时代人的研究成果，作到了“博采通人”，这使得《说文解字》成为内容十分丰富的一部典籍。如果没有《说文解字》，我们现在要想读懂秦汉以前的古籍，要想认识商代的甲骨文和商周两代的青铜器文字等古文字，那就象过河没有舟楫桥梁一样，该是多么困难呵！当然，许慎的“说解”是不可能全部正确的，从甲骨文等古文字的发现研究中，也可以纠正许书中的一些错误解释。他的解释有的过于主观，有的还掺杂着迷信成分（如说“一贯三为王”），等等。我们用《说文》时要注意去

粗取精。

《说文解字》在中国字典编纂史上有很高的价值。清朝说文学家段玉裁说：“此前古未有之书，许君之所独创。”这部字典开后代以部首检字的字典的先河，后世的许多字典，有的在540部首的基础上加以增删合并；有的则加以改革，为了检字便利，以笔画多少排列部首，这也应算是沿袭了《说文》的体例。《说文》历经一千八百多年，各代的语言学家都给予很高的评价，今天我们也应把它归入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之列。

由于《说文解字》在语言学史上的价值很大，历代都有研究《说文》的学者。特别是到了清朝，《说文》之学兴盛，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玉筠的《说文句读》，从不同角度研究《说文》，都很有价值，他们四人被称为说文四大家。清人研究《说文》的书共一百多种，1928年丁福保汇编成为《说文解字诂林》。

（田小琳）

24

《方言》是一部什么书？

《方言》是我国第一部记录方言词汇的专书，它的全名是《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

《方言》的作者，传本皆题扬雄。扬雄（公元前 53—公元 18）西汉时人，是文学家，又是哲学家。他的语言学著作，除了《方言》，还有字书《训纂篇》，惜已不传。《汉书》本传称扬雄“博览无所不见”，又多识古文奇字。他四十几岁时，奏献《羽猎赋》，被荐举为郎，至王莽时，为大夫，在天禄阁校书。原来周秦之世，常在每年八月，派遣“輶轩之使”（乘坐轻车的行者），到各地搜集方言，回来记录整理，藏于秘室。这些材料虽因秦末之乱，散失得差不多了，但蜀人严君平录有一千多字，林闾翁孺（林闾是复姓）也知道一个大概。严是扬雄的老师，林闾是扬雄的亲戚，他们的材料，扬雄都曾见到。扬雄对方言非常感兴趣，自己又动手进行搜集，他趁各地孝廉和调防的士兵到京城的机会，“常把三寸弱翰，赍油素四尺，以问其异语”，进行广泛调查，加以整理说明，经过二十七年，才成为一本九千字的书（今本近一万二千字，恐有后人所增）。对扬雄这样的工作，罗常培曾评价说：“这简直是现代语言工作者在田野调查时记录卡片和立刻排比整理的功夫。”也难怪当时就有人惊叹

《方言》为“悬诸日月不刊之书”了。

扬雄写这本书，利用了一部分前人的材料，这些材料有些反映出汉语的历史变化，或古代方言的情况，因此这本书不只是平面的描写，还包含着一些古今语的说明，这就是书名中所谓的“绝代语释”。“绝代，犹远代也。”（《尔雅序·疏》）书中一些只有一条解释的条目，如：“吴，大也”“抽，读也”（均见卷十三）和一些注明“古今语”“古雅之别语”的，都是这类情况。当然这本书主要的部分是记录汉代各地区方言的差别，也就是书名中所谓的“别国方言”。别国的国，实指某一地域，周代有诸侯国，汉代亦有诸侯国，故用国标记大的区域。《方言》从地域方面来说明的词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四类：

1. 通语（亦称“通名”、“凡语”、“凡通语”）——指当时没有地域限制的共通语。

2. 某某之间通语（或“某地通语”、“四方异语而通者”）——指通行地域较广的方言。

3. 某某之间语（或“某地语”）——通行地域较窄的方言。

4. 转语（或称“代语”、“语之转”）——因时代或地域关系，由同一个词分化成的声韵有了差异的词。

作者记录方言的方式，是先提出一个词或列举出一些同义词，作为标题性的东西，然后分别说明各个词的使用地域，这样成为一条。全书十三卷，每个词条按其义类归入各卷，不是完全杂乱无章，义类的划分虽无标目，看得出是略依《尔雅》。如卷八，先后列有关兽、鸟、虫各类，卷九，先列有关车的词条，后列有关船的词条，均有条而不紊。全书共收词条 669 条。举例如下：

怵，掩，怜，牟，爱也。韩郑曰怵，晋卫曰掩，汝颍之间

曰怜，宋鲁之间曰牟，或曰怜。怜，通语也。（卷一）

嫁、逝、徂、适，往也。自家而出谓之嫁，由女而出为嫁也。逝，秦晋语也。徂，齐语也。适，宋鲁语也。往，凡语也。（卷一）

《方言》是一本极其有价值的书，它在中国语言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给我们提供了研究汉语发展史、汉语方言史、汉语词汇史、汉语音韵史等等的丰富资料。通过它，我们具体地了解到汉以前汉民族共通语存在的情况以及复杂的汉语方言分歧；研究《方言》的记录，我们可以大致了解汉以前汉语方言分布的大致情况，从而有助于对当时社会现实的研究；以《方言》为基点，比较其前后的汉语材料，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汉语词汇发展的种种情况，一些方言词如何消失或上升为共通语词，一些共通语词如何消失或演变为方言词，由此又可以进一步考察社会发展对汉语发展的影响。《方言》一书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它的编纂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是一种创举，收集材料以至编纂的方法在当时已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在它的影响之下，后世的许多语文学家都重视方言的研究，成果散见于各种著作，还出现了一批续补《方言》以及研究某一地域方言的专书。可惜后世的研究，多停留在书面材料的收集考证，极少象扬雄那样肯下实地调查的工夫，其价值自然也低得多。这种情况直到近代才有所改变。由此，我们就更觉扬雄两千年前工作的意义了。

（许惟贤）

25

《中原音韵》是一部什么书？

十三世纪中叶到十四世纪末，北曲（杂剧和散曲）文学飞跃地发展，形成我国古代戏曲文学的“黄金时代”。

随着北曲文学的高度发展，又出现了一部特别重要的曲韵著作——周德清（1277—1365）的《中原音韵》（1324）。

周德清出生于江西高安锦江北岸鳌香岭下的暇堂村（今江西省高安县杨圩公社周家大队老屋村）。他是一位散曲作家，但作品流传下来的不多。他对于北曲的创作方法和演唱规律都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他感到当时的一般戏曲作者和演员都不大讲究格律，艺坛上存在着不少混乱现象，比如“平仄不一，句法亦粗”，“逢双不对，衬字尤多”，“合用阴而阳，阳而阴”，“歌其字，音非其字”之类。他认为要使北曲发挥更高的艺术效果，就必须使它的体制、声律、语言都具有明确的规范，尤其是语言的规范更为重要。于是他就根据自己的体验，总结出一套北曲的创作方法和演唱规律，写成了这部著作。

《中原音韵》的内容分为两部分。头一部分是曲韵韵谱，是把当时的曲子里常用作韵脚的 5866 个单字按着“中原之音”的系统编制而成的。共分十九个韵部，每一个韵部再分平声阴、平声阳、上声、去声等类，入声字按着当时曲子里的行腔念

法，分别派入平声阳、上声、去声。每一类里面以“每空是一音”的方式列出同音字组，即小韵，一共有 1627 个小韵。后一部分称做《正语作词起例》，详细说明了韵谱的编制体例、审音原则以及北曲的体制、声律、语言的规范和创作方法等方面的问题，并举出实际的例子加以论证。

这部著作的最大特点，是有关理论、方法的论据都是从当时北曲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实际材料归纳出来的。他的韵谱取材于当时的曲词，而按曲韵的规律进行归纳，同时按“中原之音”来审定每个小韵的读音。他归纳曲韵并非简单地机械地从事，而是善于区别一般和特殊。比如他以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马（致远）等著名的艺术大师的作品为用韵的典范，认为他们的作品“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成为他进行归纳的主要依据，可是又能做到扬弃这些作品中用韵不规范的现象。如果我们拿关、郑、白、马的全部用韵来覆按，立即就能发现跟周德清的韵谱有不少的出入，其他的元曲作品的情况就更不用说了。

周德清提出北曲语言的规范应以“中原之音”为正。他说：“欲作乐府，必正言语，欲正言语，必宗中原之音”。所谓“中原之音”，据我们看来，就是当时北方广大地区通行的，应用于广泛的交际场合的一种共同语音，这一观点无疑是很正确的。只有拿这种共同语音当作北曲语言的审音标准，才能赋予北曲艺术以广泛流传的基础，使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正由于他能以正确的审音观点来审定北曲字音，所以他的韵谱就不仅是当时北曲作家和演员正音的工具。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活生生的共同语音。

《中原音韵》是最早的一部曲韵和曲论的专著。它不仅对

于指导当时和以后的北曲实践起过很好的作用，而且以后出现的曲韵和曲论著作，莫不以它为样板，或继承它的理论加以诠释，或沿袭它的体例加以改编，即使当北曲逐渐衰亡，南曲勃兴取代了北曲的时期，也莫不如此，所以它的影响是深远的。我们研究戏曲史，可以说，《中原音韵》称得上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文献资料。

对于研究汉语史来说，《中原音韵》有更为重要的价值。因为如上面所说，它的韵谱反映了当时活生生的共同语音，所以成为我们研究和构拟近代语音系统的主要依据。同时这部著作充分体现出敢于突破传统韵书的旧框框而根据实际语音审音定韵的革新精神，也给了以后的韵书编制以很好的影响。

《中原音韵》所反映的语音系统，可以根据韵谱的分类和小韵的划分，参照同期的音韵资料，如《古今韵会举要》、《蒙古字韵》、《中州乐府音韵类编》等，先编制出一个“等韵图”式的音节表，然后构拟出各个小韵的音值。

《中原音韵》的语音系统：

(一) 声母 21 个：崩 烹 明 风 亡 东 通 农
龙 宗 匆 嵩 钟 充 双 戎 公 空 仰 红 雍

(二) 韵母 46 个：翁 邕 盎 鸯 汪 支 衣 贼
威 乌 迂 哀 挨 歪 恩 因 温 氤 安 殷 弯
荆 烟 渊 麀 坳 邀 阿 岳 窝 巴 雅 蛙 爷
月 亨 英 泓 荣 讴 忧 簪 音 菴 咸 淹

(三) 声调 5 个：平声阴 平声阳 上声 去声 入声
入声在韵谱里本来是分做三类的，一类作平声阳，一类作上声，一类作去声，就是所谓“入派三声”。研究《中原音韵》的绝大多数学者都以为“入派三声”就是“入变三声”，当时的入

声已经消失了。只有陆志韦先生认为当时的入声并没有失去。周德清自己曾经解释“入派三声”，大意是，入声字在曲子里行腔吐字时可以唱成平上去三声，以便押韵，但是在实际语音里，入声还是入声。据我们看来，周德清反映的“中原之音”（不是他自己的方言）的入声，跟中古时期的入声很不相同，已经消失“塞而不裂”的辅音韵尾，同时似乎也不是一个明显的短调，只能保持一个独立的调位了，但能跟平、上、去严格地区别开来。正有点象现在河北省西南部的赞皇、元氏一带的入声。

这个语音系统既然代表十四世纪时的语音面貌，那就给汉语语音史建立了近代语音的一个平面。以它为起点，可以跟七世纪时《切韵》所代表的中古语音系统联接起来，加以分析比较，可以考察由中古到近代的语音发展情况；又以它为起点，可以跟现代普通话语音联接起来，加以分析比较，可以考察由近代到现代普通话的语音发展情况，也可以据此考察现代北方话各个次方言的语音发展情况。所以我们说《中原音韵》是一部很重要的书。

（杨耐思）

26

清代有哪些重要的语言学家？有哪些成就？

中国传统语言学到了清代，进入了隆盛的时期，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诸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清代有一大批成绩卓著的语言学家，可说是“群星灿烂”。下面我们重点介绍几位。

一、顾炎武(1613—1682)，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曾参加抗清斗争，后致力于学术著述。晚年治经侧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他考订古音，离析《唐韵》，分古韵为十部，在音韵学上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主要著作有《日知录》、《音学五书》、《韵补正》等。《日知录》系读书札记，按经义、吏治、财赋、史地、兵事、艺文等分类编入，书以“明道”“救世”为宗旨，反映了作者的政治思想和学术观点，能切中时弊；材料丰富，用力极勤，为其一生精力所注。《音学五书》中包括《音论》、《诗本音》、《易音》、《唐韵正》、《古音表》五种著作。他的音韵学成果奠定了清代古音学的基础。《韵补正》是为订正宋人吴棫的《韵补》而作。

二、戴震(1723—1777)，字东原，安徽休宁人。是著名的经学家、音韵学家江永的弟子。戴震博闻强记，对经学、天文、数学、历史、地理均有深刻研究。乾隆间修《四库全书》，特召

为纂修官。又精通古音，立韵类正转旁转之例。从分析《广韵》系统入手，创立古音九类二十五部之说及阴阳入对转的理论。又善名物训诂，从训诂探讨古书义理。他还培养了一批学生，其中段玉裁、孔广森、王念孙等都是杰出的语言学家。戴震的重要语言学著作有《孟子字义疏证》、《声韵考》、《声类表》、《方言疏证》等。

三、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徵，号辛楣，又号竹汀，江苏嘉定人。治学方面甚广，又精于音韵训诂之学，颇多创见。从陈第、顾炎武到江永、戴震，一般只注重研究古韵，没有讨论到古声母，而首先注意到古声母的，要数钱大昕。钱大昕在语言学上的成就，主要是在声母方面，他证明了古无轻唇、重唇和舌头、舌上的分别(即一般所谓的“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这是音韵学上两项重大的发现。他没有专门的音韵学方面的著作，他的音韵学主张散见于《潜研堂文集》和《十驾斋养新录》中。他又著有《恒言录》，搜集常言俗语八百余条，分为十九类，一一考证其源流，对汉语词汇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四、段玉裁(1735—1815)，字若膺，号懋堂，江苏金坛人。他花了三十年时间著成《说文解字注》，首先根据《说文》体例和宋以前群书所引《说文》辞句，以校正其讹脱，再用古书上所用字义，以阐明《说文》的解说和一字多义的由来。创通条例，联系音韵和训诂，对汉字研究有重大贡献。此书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研究文字训诂学的重要参考书。王念孙曾赞誉该书为“千七百年来，无此作矣。”(见《说文解字注·序》)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的书后，附有《六书音均表》，分古韵为六类十七部，“支”“脂”“之”三部分立是他的创见。他还著有《古文

尚书撰异》、《毛诗故训传定本》、《诗经小学》、《周礼汉读考》、《仪礼汉读考》、《经韵楼集》等。

五、王念孙(1744—1832),字怀祖,号石臞,江苏高邮人。精于探求古书文义。曾花了十年时间,“殚精极虑”,写成《广雅疏证》,搜集汉魏以前古训,详加考证,以形、音、义互相推求,“就古音以求古义,引伸触类,不限形体。”(见《广雅疏证·自序》)。他能从声音以通训诂,为训诂学开拓了新天地。又撰《读书杂志》,校正文字,阐明古义,颇多创见。还著有《古韵谱》,对古韵分部亦有发明。据他《与李方伯书》说:“某尝留心古韵,特以顾氏五书已得其十之六七;所未备者,江(永)氏《古韵标准》、段(玉裁)氏《六书音均表》皆已补正之,唯入声与某所考者小异,故不复更有撰述。”(见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三十一)因此,后来他把精力主要用于训诂学方面。王念孙学识深厚,学风严谨,他和段玉裁是清代“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

六、王引之(1766—1834),字伯申,号曼卿,江苏高邮人。继承其父王念孙的音韵训诂之学,世称高邮王氏父子。他们父子治学,能不受字形束缚,直接从声音方面去研究词义,很有创见和特色。王引之主要著作有《经传释词》、《经义述闻》等。《经传释词》搜集周秦两汉古书中虚字一百六十个,对各字先说用法,后引例证,追溯其原始,再明其演变,论断多正确,对后来的语法研究也有启发。《经义述闻》是审定先秦典籍的句读、讹字、衍文、脱简,其中训释大都记述其父念孙之说,故书名《述闻》。

七、俞樾(1821—1907),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曾任翰林院编修、河南学政。晚年讲学于杭州诂经精舍。章炳麟是他的弟子。他治经、子、小学,宗法高邮王氏父子,重视正

句读,审字义,通古文假借,并注意分析特殊的语文现象。著有《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等。《古书疑义举例》是训诂学的重要著作,后人评价甚高,刘师培曾说:“幼读德清俞氏书,至《古书疑义举例》,叹为绝作,以为载籍之中,奥言隐词,解者纷歧,惟约举其例,以治群书,庶疑文冰释,盖发古今未有之奇也。”(见《古书疑义举例补·前言》)马叙伦也说:“德清先生《古书疑义举例》,发蒙百代,梯梁来学,固悬之日月而不刊者也。”(见《古书疑义举例校录·前言》)

八、马建忠(1845—1900),字眉叔,江苏丹徒人。曾赴法留学,任驻法使馆翻译。所著《马氏文通》是中国第一部较全面系统的语法著作。分正名、实字、虚字、句读四部分。例句选自经、史、子、集,参考拉丁语法研究古代汉语的结构规律,虽有以拉丁语强解汉语之处,但仍有很高学术价值,开创了后来中国语法研究的新道路,语法研究不再是训释儒家经典的附带工具,而成为一门独立的语言学科,可以认为,《马氏文通》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它的出现标志中国语言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九、孙诒让(1848—1908),字仲容,号籀廬,浙江瑞安人。所著《契文举例》是考释甲骨文的第一部著作。该书分月日、贞卜、卜事、鬼神、卜人、官氏、方国、典礼、文字、杂例十类。因为当时甲骨文发现不久,所据只是《铁云藏龟》一书(《铁云藏龟》为刘鹗所编,系就其所藏五千余片中选印一〇五八片,为著录甲骨文字的第一部书。)因而论断不尽精确,但对甲骨文的研究有首创之功。他还著有《名原》、《墨子闲诂》、《周礼正义》、《尚书骈枝》等书。

除了上面提到的九位之外,清代还有许多有成就的语言

学者。例如音韵学家中，江永(戴震的老师)精通音理，曾著《古韵标准》，定古韵为十三部；又著《音学辨微》、《四声切韵表》，论述等韵学及韵书中分韵的原理。孔广森著《诗声类》，分古韵为十八部，明确提出阴阳对转之说，主张东、冬分部。在文字学家中，桂馥著有《说文解字义证》，王筠著有《说文释例》、《说文解字句读》、《文字蒙求》，朱骏声著有《说文通训定声》。段、桂、王、朱被称为“说文四大家”。其中段玉裁、朱骏声的成绩更为突出，而王筠最注意文字学的普及工作。在训诂学家中，郝懿行著有《尔雅义疏》，取材广博，注释详尽，补郭璞《尔雅注》之所未备。阮元主编《经籍纂诂》，校刻《十三经注疏》。《经籍纂诂》将唐以前古籍正文和注解中的训诂搜集在一起，集训诂学之大成，是研究古汉语的重要工具书。此外，还有一些处于清代末年、民国初年的语言学家，如劳乃宣、刘师培，王国维、章炳麟、黄侃、钱玄同等，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严 修)

27

《马氏文通》在汉语语言学史上有什么地位？

马建忠(1845—1900)是汉语语法学的创始人，他所著的《马氏文通》(1898)是关于汉语的第一部系统的语法著作。

《文通》问世以前，从先秦直到清代，我国虽也有些关于词序的分析和虚词的论述，但那都只是些零碎片断的东西，并且还是因训诂、校讎和注释经传、古书的需要而产生的，只是文字学、训诂学的附庸，完全谈不上系统。晚清的时候，虽也有些西洋传教士为了传教的方便，依照西洋语法的体系编写了一些汉语语法的手册，但由于他们对中国语文没有什么研究，再加上手册的条理不够完整，文字比较低劣，所以大都只在教会里传习使用，未曾普遍流行，在当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而马建忠却本着揭示汉语规律，从而提高语文教学质量、缩短学习年限、让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去从事实学的研究的目的，参照着拉丁语法的体系，同时继承我国旧有关于虚字的某些说法，搜集、研究了大量的古文献资料，“为之字栢句比，繁称博引，比例而同之，触类而长之”“积十余年之勤求探讨”（《文通·序》），终于创建成功了我国第一个语法体系——《文通》。由于《文通》体系完整，分析精到，资料丰富，因而得以风行一时，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文通》的诞生，使汉

语的语法研究彻底摆脱了为训释儒家经典服务的附庸地位，从此成了一门独立的科学。《文通》开始建立了我国的语法学，在汉语语言学中是有崇高地位的。我们完全可以这么说，《文通》开辟了我国语言学的新纪元，是我国语法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不朽的科学名著。

《文通》结构谨严，体系严密。它共分十卷，第一卷首先正名，通过二十三个“界说”，就字类、“句”“读”两部分简要地论述了自己的见解，等于是本书的语法大纲；然后第二卷到第九卷详细论述各类字的功能和作用，实字部分着重论述充当什么句子成分，虚字部分着重论述怎样配合实字造句，所作的分析都是围绕着“句”“读”必备的起词（主语）、语词（谓语）来进行的；最后第十卷把前文所述“起、语两词之成为句、成为读”（《文通·论句读》）的内容加以总结，集中而又概括地专论句读，做到了纲举目张，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现在检阅起来，汉语语法的基本问题，《文通》差不多都谈到了。比如它采用西洋语法习用的术语再加上“华文所独”（《文通·虚字卷之九》）的助字，分汉语的词类为九：名、代、动、静（形）、状（副）（以上为实词）、介、连、助、叹（以上为虚词）；比照西洋语法名、代变格使用情况给汉语名、代按了六个位次：主次、宾次、正次、偏次、前次、同次；又把句子成分定为如下七种：起词（主语）、止词（及物动词的宾语）、语词（谓语）、表词（形容词谓语及名、代做谓语）、转词（自动词转及的宾语，外动词后由介词转及的类似宾语的成分）、司词（介词的宾语）、加词（介宾结构充当状语或补语，同位语）；分句法结构为“句”、“读”（主谓词组，即句子形式，与“句”相对）、“顿”（非主谓词组，与“读”相对）三种，“句”又分为“与读相连之句”（单句或复句）和“舍读独立之句”

(复句)两类,后者再分成四种型式:排句(“意无轩轾者”)、迭句(“意别深浅者”)、两商之句、反正之句。

《文通》出版后,接着出现了不少语法著作,但不管是研究古代汉语语法的《中等国文典》(章士钊)、《国文法草创》(陈承泽)、《高等国文法》(杨树达),还是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的《新著国语文法》(黎锦熙)等,大都是因袭《文通》的体系,只不过根据英语语法作了一些或大或小的改动而已。拿当时最流行的《新著国语文法》来说,就同《文通》“面貌非常相似”(陈望道语),例如《国语文法》也分词为名、代、动、形、副、介、连、助、叹九类,动词也有同动、散动等说法,也给名、代按了位次(主位、宾位、足位、领位、副位、同位、呼位),等等。即使后来出版的力主革新、另创体系的两本语言学名著《中国文法要略》(吕叔湘)、《中国现代语法》(王力)中,也多多少少可以看到一些《文通》的影子。由此可见,汉语语法著作对《文通》差不多都有所借鉴,有所参考,《文通》的历史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当然,《文通》出版已经八十多年了,这期间汉语语法的研究无论在研究方法还是在研究内容上,都有了巨大的发展。现在看来,《文通》的缺点是不不少的。首先,它机械模仿拉丁语法体系,对汉语自身的特点注意不够,因而难免产生“凿孔钻胡须”(刘半农语)的毛病;其次,它单凭意义来区分字类及分析句、读结构,往往得出不符合汉语实际的结论,有时还会产生不好的效果,比方《文通》所说“字无定义,故无定类。而欲知其类,当先知上下之文义何如耳”,就对后世产生了不好的影响,引导人们走上“词无定类”的歧途;再次,它的一些说法也是值得商榷的,如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的“皆”是约指代字,它重指全句的起词(主语)“人”,与“人”同在主次,说“尔为尔,

我为我”的“为”是介字，“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的“今”是连字，等等。正因为如此，后来的语法学者就很少有对《文通》表示完全满意的，纷纷起来给以纠正、补充，当时专为订正《文通》错误的著作就有杨树达的《马氏文通刊误》、陶奎的《文通质疑》，其他如刘半农的《中国文法通论》、陈承泽的《国文法草创》、何容的《中国文法论》等，也都对它的错误有所订正。但是，《文通》作为我国语法学的奠基之作，不仅搜集、分析的古文献资料十分丰富，而且突出阐明了能反映古汉语面貌的“读”和“助字”，总结出了否定句、疑问句中代词宾语前置，泛论、对话、命戒之句起词（主语）可省及排行句读、比拟句读语词（谓语）可省等语法规律，所以至今仍有很大的实践价值。在今天，不管是立志学习语法的青年同志、专门从事语法研究的专家同志，还是一般语文工作者、大中学校的语文教师，要想加强文化修养，提高学术水平，都还有认真一读《文通》的必要。

（龚千炎）

一九五四年初，中央决定在全国中学实行汉语、文学分科教学，责成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力量编写《汉语》和《文学》教科书。这是我国语文教学史上一次重要的改革试验。经过两年多的准备，于一九五六年秋季开学时在全国中学全面实行了分科教学。

在准备《汉语》教科书的过程中，面对的第一个困难是当时语法学界的语法体系过分分歧的问题。所谓语法体系分歧，简单地说就是：不同的语法学者、语法著作，持有不同的说法观点，因而对于同一个语言现象做出很不一样的解释，使用不同的术语。若干语法著作所使用的名称术语，有同有异，既有名同实异，也有名异实同，纷纭错综，情况十分复杂。

汉语语法体系分歧的问题，存在几十年了。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注意语法问题的人少，分歧只存在于很狭小的语法学界之内，在社会上并不突出。解放以后，由于党和国家的关心和倡导，在五十年代，汉语语法学出现了空前的蓬勃发展的局面。学习语法，在语言运用中讲究语法，成为广大群众共同关心的事情。这样一来，学术研究上的分歧同群众的需要之间有了矛盾，语法体系分歧的问题突出了。

许多语法学习者要求有一本统一的语法书。语文课分科后的《汉语》教科书将在全国的中学里使用，既不是在局部地区、少数学校，又不是在高等学校，因此，它所采用的语法体系必须是能够为绝大多数教师和语法工作者所接受的，不能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之言。很明显，要建立这样一个体系，工作是异常艰巨的。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全国语法学界和广大语文教师共同努力，团结合作，花了两年半左右的时间，经过规模大小不等的若干次集体讨论、争辩，两次把初步方案印发全国各地征求意见，在北京、天津两次试教，中间反复多次地修改，最后经有关领导批准，终于产生了一个绝大多数有关同志点头认可，认为可以暂时在教学中一致使用的语法体系，这就是“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这个名称包含着这样三层意思：它是“暂拟”的，意思是说，它不是固定不移的，而是有待改进的；它只是适用于学校的“汉语教学”的，语法研究不受此限；它只是一个“系统”，就是教学中用的这么“一套”讲法，还谈不上是个严密的、完善的“体系”。这个“暂拟系统”被写成为一个纲要，由二十一位语法学者分头撰文就它的内容各部分做了阐述，合编为一本书《语法和语法教学》。以此为依据，编成《汉语》教科书的语法部分，即第三、四、五册。

全国中学的汉语教学既然一致采用了这个系统，大多数高等学校特别是高等师范院校的中文系现代汉语课的语法部分也基本上采用了它，以便于那些日后到中学任教的毕业生可以把所学和所用衔接起来；社会上出版的若干一般语法著作，也采用了它。一九五八年，中学取消了“汉语”、“文学”分科教学的办法，恢复了“语文”课，《汉语》《文学》两种教科书停

止使用。但是，“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继续沿用了下来。在中学，凡教语法的，还是使用这个系统；在高等学校，有的继续使用或者基本上使用，有些则进行了程度不同的修改。

在拟定“暂拟系统”的时候，目的既在于为在全国范围内试行汉语教学寻求一个能够一致采用的讲法，就必须把前此的主要语法学者及其著作的研究成果吸取进来，求同存异，力避偏执一端。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不能没有一定的原则，比如，要考虑哪种讲法比较地符合汉语的实际，对于语义和形式的关系处理得比较好，比较地便于教学；也不能不力求在采择综合之中保持本身的系统性，至少不自相矛盾；还不能不采取某些折中的办法，包括在互相矛盾、互不相下的几种说法之外寻求一种言之成理、能为诸家所接受的新的说法。“暂拟系统”大致就是基于这样几种考虑的一个产物。如果它有可取之处，是从这里来的；它的某些缺点，可能也是从这里来的。

举几个例子来说。关于词的定义和单句、复句的界限，主要采取吕叔湘先生的讲法。关于兼语，主要采取王力先生的讲法。关于动词、形容词的名物化用法，是稍有变通地采用了黎锦熙先生的讲法。关于单部句、独词句，主要采取高名凯先生的讲法。关于词的重叠，主要采取陆宗达、俞敏先生的讲法。凡动词的后置成分一般归入宾语，主要采取丁声树先生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的讲法。又比如，“甲是乙”这种句子，当时有三种讲法：同动词、补足语说，系词、表语说，动词、宾语说。这些都是很有力量的讲法，国内治语法者可以说从此便从彼，互不相下。“暂拟系统”三说都不取（因为取了任何一说都不能为各方面一致接受），把“是”归入动词的附类，叫“判断词”，后面的“乙”和判断词合在一起称“合成谓语”。对于“台

上坐着主席团”这个典型例句怎样分析，当时也是争论不休的。“暂拟系统”说，这是“无主句”，“台上”是状语，表示地点，“坐着”表示存在的方式。把“能、会、肯、敢、必须、可能”这一路词称为“能愿动词”，和它后面的东西也构成一种合成谓语，这也是因为对这类词和这类构造有不同的意见，这样处理在当时容易解决问题。那时大家认为，这个系统是应教学急需“暂拟”的，许多问题还要进一步讨论研究，从根本上加以解决，以期尽早把“暂拟”两个字取消。由于大家知道的原因，六十年代往后，语法研究冷落下来了，甚至停滞了，以致到今天还没能把这两个字去掉，还没有产生出一种能为大家一致采用的新的体系，这实在是始料所未及。我们相信，在语言科学的研究重新活跃起来的情况下，经过大家的努力，当年这个愿望在不久的将来终将实现。

这里只是简单地说明一下“暂拟系统”的产生经过，至于对“暂拟系统”的内容做全面的分析、介绍和评价，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之内。

（张志公）

29 什么叫新洪堡特学说，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

洪堡特 (W. Humboldt, 1767—1835) 是十九世纪德国语言学家，柏林大学的创办者。他说过：“每一个人，不管操什么语言，都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特殊世界观的承担者。世界观本身的形成要通过语言这一手段才能实现……每种语言中都会有各自的世界观。”^① 现代的新洪堡特主义者继承并发展了洪堡特的观点。他们可以分为两支，一支以欧洲当代语言学家魏斯格贝尔 (Leo Weisgerber) 为代表，魏氏认为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之中隔着一层“中间世界” (Zwischen Welt)，这就是语言。语言不同，“语言世界图象” (Weltbild der Sprache) 也不同。这一学派的一个语言学家瓦尔特布尔格 (W. Von Wartburg) 说：“我们说掌握语言，但是，实际上是人被语言所掌握。”^② 另一个语言学家易卜生 (G. Ipsen) 说：“语言其实不是语言，而是世界”^③。因此魏氏竟认为语言学的主要任务不是揭示语言本身的特征，而是“通过语言分析和揭示每个语言

① 见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区别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转引自兹维金采夫编《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语言学史文选》，1956，莫斯科，第81页。

② 《语言学的问题和方法引论》，柏林，1945，第185页。

③ 转引自叶尔莫拉耶娃：《现代资产阶级语言学中的新洪堡特派》，载《普通语言学与具体语言学问题》，莫斯科，1960年。

的世界观。”^① 魏斯格贝尔常举星座为例，说明语言左右着人的认识。他说：小熊星座、大熊星座、天蝎座等星座的名称完全是人为的，而并非客观存在的反映，因为实际上这些星座中的星星彼此之间相距几百到几千光年，各有不同的运行轨道，相互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并不组成任何星座。只是人从地球上看见天空，它们仿佛接近，人们才将它们归入相应的星座，人为地赋予各种名称。如果从另一星座看这些星星，情景将会是完全另一个样子，就不会有这些星座及其名称了。同理，他认为“莠草”也只是人从种庄稼角度着眼给的命名。从植物分类着眼，莠草实际上包括科属完全不同的许多植物。魏氏阐述这一理论的代表作是《论德语的世界图象》（1950年杜塞多夫出版）。

另一支新洪堡特派以美国人种语言学家萨丕尔（E. Sapir）和沃尔夫（B. L. Whorf）为代表。他们的观点同洪堡特、魏斯格贝尔相近。他们在这一方面的观点被人称作“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萨丕尔说：“真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知不觉地建立在该族人的语言习惯之上的……语言是认识社会现实的指南……使用不同语言的各社会成员所生活的世界是多种多样的许多个世界，而不是具有不同标志的一个同样的世界。”^② 萨丕尔的学生沃尔夫常以不同语言具有不同的语法范畴为例，说明操不同语言的人对世界的认识是不同的。沃尔夫研究过美洲的一种印第安语言：河皮语，他认为河皮人的时空观念不同于欧洲人，因为他们的语言结构不同；河皮语比

^① 转引自古赫曼：《魏斯格贝尔的语言学理论》，载《外国语言学中的语言理论问题》，莫斯科，1961年。

^② E. Sapir: «Conceptual Categories in Primitive Languages» (原始语言中的概念范畴)，刊《Science》，Vol. 74 (1931)，第 578 页。

欧洲语(他称作欧洲一般标准语: Standard Average European, 简称 SAE)更符合现代物理学的观念。他喜欢引用弗里茨·毛特内尔(Fritz Mauthner) 1902 年说的一句话:“亚里士多德如果说的是汉语或达科他(Dakota)语, 他的逻辑和范畴必会是另一个样子。”^① 沃尔夫也说:“牛顿如果不是说英语, 就会造出迥然不同的逻辑”。

沃尔夫说明语言的威力时常举的一个例子是: 当人们看见汽油桶上的“汽油桶”的标签时, 往往比较警惕, 但是看见“空汽油桶”的标签时, 却往往比较大意, 随便在旁边抽烟、扔烟头。殊不知空汽油桶中因含有容易爆炸的蒸气, 比实汽油桶更容易爆炸。沃尔夫将这种现象解释为语言的暴虐或语言的威力。他认为, 语言决定一切, 主宰一切^②; 因此, 沃尔夫的观点同语义哲学的观点是相通的。美国的语义哲学家切斯(M. Chase)为沃尔夫的上引著作《语言、思想和现实》写了序言, 其中声称:“用不同语言讲话的人对宇宙的看法是不同的”。

总之, 这两派人共同的观点是将语言与思维等同起来, 认为语言决定思维, 语言不同的人, 思维也是不同的。他们正确地发现了不同语言语义体系之间的差别, 但过分夸大了这种差别对人的认识的影响。语言对人的认识起一定作用, 这当然是毋庸置疑的。例如祖尼语(美国新墨西哥州的一种印第

① F. Mauthner: «Zur Grammatik und Logic» (论语法和逻辑), 刊《Beiträge zu einer Kritik der Sprache》(语言批判文集), B. 3. 柏林, 1913。转引自 D. 博林杰:《Aspects of Language》(语言的面面观)第 2 版, 第 241 页, 纽约, 1975 年。

② B. Whorf: «Language, thought and reality, Selected Writings» (语言、思想和现实, 文选), 第 135 页, 纽约, 1956。这本书汇编了沃尔夫的代表作。

安语言)中不分橙色和黄色,因此祖尼人区别这两种颜色往往有一定困难^①,但是过分夸大这种作用却是不恰当的。他们由于这种夸大而被人称作语言拜物教者。不同语言对客观现实的“切分”不同,并不能说明操不同语言的人对客观现实有不同的看法。他们不理解语言只是交际与思维的工具;人的思想所反映的不是什么语言世界,而是客观现实。不同语言的语义系统之间的差别并不影响操不同语言的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俄语不分粗、厚、胖,都叫 толстый;不分细、薄、瘦,都叫 тонкий,但不能说俄罗斯人分不清粗、厚、胖的概念。法语没有“浅”一词,只能用 peu(或 pas)profond(不深)表示,并不等于他们没有浅的概念。词义在不同语言中的不同分割界限绝不会影响客观本身,只不过是同一客观现实在不同语言中有不同的反映罢了。例如,汉语用不同的词表达叔、伯、舅;欧洲许多语言却不加区分,用同一个词表达。但这并不等于欧洲人区别不清这些不同的亲属关系,因为他们可以用描述的方法,用词组表达这些关系(如“舅舅”一词在英语中可用 maternal uncle 表达,在俄语中可用 дядя по матери 表达)。又如英、法、德语把“手”分为两段,手腕以上叫“臂”(arm, bras, Arm),手腕以下叫手(hand, main, Hand),但是俄语、汉语却不严格区分。如“手牵手”、“握手”、“手挽手”、“抱在手上”在汉语、俄语中都是用的同一个词;但是在英、德、

^① 见博林杰(D. Bolinger):《Aspects of Language》(语言的面面观)。第2版,第295页。但也有人对这一点持怀疑态度。他们的实验表明,儿童在没有学会语言以前就已经会辨别颜色,可见辨别颜色的能力并不取决于语言。见《苏联科学院通报,文学与语言集刊》1977年第2期第173页。美国心理学家伊莱斯特伯格(W. G. Eliasberg)还指出过一个奇怪现象:丧失颜色名称的失语症者反倒能辨别更多的颜色(见《Acta Psychologica》, Vol. 10, 1959, N. 1—2, 第104页)。

法语中,前两个例子中要用 hand, Hand, main, 后两个例子中却只能用 arm, Arm, bras。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汉语与俄语的人不能从生理上区别开手与臂^①。汉语分“手指”和“脚趾”,英语也分: fingers, toes, 俄语却不分,都叫 пальцы,但这并不等于说俄罗斯人因而区别不开手指和脚趾。不同语言有不同的“切分”方法跟不同民族有不同的度量衡类似。我们不能说采用不同度量衡的民族具有不同的空间和重量观念。同理,法语表达90的方法是“4×20+10”(quatre-vingt-dix),俄语是“100 差 10”(девяносто),汉语是 9 个 10,但我们不能因此说这三种民族对 90 这个概念的认识有任何差异。

前面关于空汽油桶的例子中,沃尔夫显然也错误地过分强调了语言的作用。其实人们看到“空汽油桶”之所以缺乏警觉,绝不是因为“空”这个词起了作用,而是因为人们对空汽油桶具有更大的爆炸力这一客观事实没有了解,可见起决定作用的刚好是客观事实,而不是词,不是语言。一旦了解到这个事实,尽管看见的仍然是空汽油桶,人们便会警觉起来。可见“空”这个词并不能起任何决定性作用,它本身无论如何不能决定人们的行为。

马克思、恩格斯说过:唯心主义哲学家“将思维孤立出来变成一个独立的力量,他们也一定要把语言孤立出来,变成某种独立的、特殊的王国”^②。语言拜物教的错误看来正在于此。

最后,还要指出一点,西方也有不少人不同意新洪堡特学说或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例如,美国语言学家格林伯格(J.

① 汉语中“脚”和“腿”却分得很清楚,这跟英、德、法语是一致的。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5页,人民出版社。

Greenberg)说,如果把两个说不同语言的人送到月球上,他们返回地面后所作的报告绝不会因语言不同而有所不同。可见语言不能决定世界观和人的认识^①。乔姆斯基认为沃尔夫过分夸大了语言表层结构的差别,没有看到这些语言在深层结构中的普遍特征,即一致的地方。美国心理语言学家斯洛宾(D. Slobin)还提出一个疑问,如果思维完全受制于语言的话,聋哑人为什么能思维呢?语言学家又为什么能不受语言限制,描写出许多语言的普遍现象呢?^②国外心理学家还指出,儿童在说话以前已经认识客观世界,对它进行了切分。儿童先认识事物,然后才知道它的名称,可见不是语言决定儿童的认识。

(伍铁平)

① 转引自 A. Кондратов:《Зауки и знаки》,莫斯科,1966,第70页。

② 见 D. Slobin:《Psycholinguistics》(1971)中的最后一节:“语言相对论和决定论”。

语言是什么？

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纪元前，古代印度人就开始探讨这个问题了。婆罗门教人把语言看作神，而且是一个极其伟大的神。在纪元前一千五百年用梵文写成的《吠陀》(Veda)中，说语言是母牛，呼吸是公牛，由语言和呼吸而产生了人心。在婆罗门教人眼中，牛就是神的象征。又说语言是一个名叫伐克(Vak)的女神，她曾经这样描述过她的威力：

我说这话时，神人皆喜欢；“我心爱的人，我使他强大，我使他成为婆罗门弟子，伟大的先知，我使他聪慧，我为鲁德拉(雷神)弯弓，射死仇恨婆罗门教的敌人。我为人民作战，我渗透天地。我把父亲背上世界的顶峰；我的出处是在海水里；我从那里出来，混在众生中，身躯触及苍穹，我呼吸如风，比天还高，比地还大，我是这样伟大的。”

这个问题也是语言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它伴随着语言学的产生而被提到科学的位置上来；它伴随着语言学的发展而不断出现新的内容；直到今天，它依然是现代语言学中的一个中心的课题。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

ussure)在其名著《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结尾处说过这样的话:

语言学的真正的和唯一的对象就是在其自身而且以它为目的而被研究的语言。

今天如果我们说,语言学的目的就是要回答“语言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是不会有什人反对的。

由于世界观和研究方法的不同,人们对“语言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多种多样的。有代表性的说法就有几十种。苏联兹维金采夫在《普通语言学概要》(莫斯科大学出版,1962年)中曾经一口气举出二十余种说法。前人的种种说法,有比较科学的,也有错了的,也有偏到一点上但多少有点道理的。对于偏到一点上但多少有点道理的说法,我们不宜全盘否定,严厉批判,而应吸取其合理的部分。

语言是什么?这可以从多方面来认识。

首先,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人类所特有的,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一个标志,动物是没有语言的。“蛱蝶飞来黄莺语”(杜甫),“莺语落花中”(张籍),那只是诗人的一种比拟的说法。动物也有传递信息的手段,——欧美不少科学家正在研究这些手段,——但这些手段和人类的语言是有着质的区别的。语言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也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在人类社会之外是没有语言的。人类社会也离不开语言,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一旦失去了语言,就有崩溃的危险。语言和社会是相互依存的;语言具有一切社会现象——包括基础和上层建筑在内——都具有的特点,即为社会服务,所以它是一种社会现象。

社会现象通常分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部分。但是语言既不是经济基础,也不是上层建筑,因此它是一种特殊的

社会现象。语言区别于其他社会现象的专门的特点是：

(1) 它是作为人们交际的工具，作为人们交流思想的工具来为社会服务的。

(2) 它是作为人们的思维工具来为社会服务的。

列宁说过，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而作为交际工具的语言是没有阶级性的，正如斯大林所说：“语言作为交际工具从来就是并且现在还是对社会是统一的，对社会一切成员是共同的。”

就语言自身而言，它是由语音和语义结合而成、由词汇和语法所构成的符号系统。语言这个符号系统区别于其他符号系统——如：红绿灯、旗语、代数符号等——的特点是：(1)社会性，(2)复杂性，(3)生成性。

语言符号和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即不是由客观事物决定的，而是由社会集团“约定俗成”的。例如：

汉 语		匈牙利语	越南语	英 语	德 语		马来语
哥哥	兄弟	bátya	Anh	brother	Bruder	Geschwister	Sudara
弟弟		öcs	Em				
妹妹	姐妹	húg		sister	Schwester		
姐姐		néne	chị				

语言符号由社会“约定俗成”，这就是语言符号的社会性。

语言符号具有高度复杂性。它由人脑所支配，同思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现代的科学技术还不可能完全模拟人脑的语言机能，机器翻译至今还不能完全实现，这就是语言符号高度复杂性的一个明证。

语言的规则是有限的，但是人们却能说出无限多的话语

来。而这些话语却不一定是过去听到过的。这就是语言符号的生成性,这是其他符号系统所无法比拟的。

总之,回答“语言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从它的社会功能来看,一是从它的内部结构来看。

(王希杰)

语言是怎样产生的？这个问题可分为两个问题：1.人类一般语言是怎样产生的，即人是在什么情况下开始说话的？2.具体语言，如汉语、英语、俄语等是怎样产生的？

人类一般语言是怎样产生的呢？简单地说，劳动创造了人，也创造了人类的语言。这可以从两方面来加以说明。

首先，劳动提供了产生语言的社会条件，使语言的产生成为必要。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形成过程，就是人类祖先学会生产劳动，劳动成为社会首要实践的过程。劳动创造了人，创造了人类社会。人类的生产劳动是集体的、社会性的。在集体的生产劳动过程中，形成中的人需要相互协作，互相帮助，需要协调大家的行动，一句话，彼此之间需要交际。正象恩格斯所说的：“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之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因此，人类社会的生产劳动使语言的产生成为必要。

其次，劳动提供了产生语言的生理条件，使语言的产生成为可能。劳动改造了类人猿的器官。类人猿在劳动中直立行走，使肺部和声带的压力减小，可自由加以调节；下腭后缩，与上腭吻合，可构成发音需要的状态；头颅垂直减少对鼻腔的压

力,使之发展为理想的发音共鸣器。在劳动中类人猿的不发达的喉头,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的不断加多,缓慢地然而肯定地得到了改造,而口部的器官也逐渐学会了发出一个个清晰的声音。随着劳动对语言需要的不断增长,言语器官也不断发展。最后,类人猿的发音器官终于改造为人类言语器官,发出音节清晰的声音,表达一定的意义,语言就产生了。

语言是由非语言的声音信号发展而来了,所以语言一产生就是有声语言,就是音义结合的词汇和语法的体系。但原始语言的语法简单,词汇贫乏,所以,手势等手段在交际中起着重要的辅助作用。

现在来谈谈具体语言是怎样产生的。

很早就有人对世界上存在着多种语言的问题,即语言多样性的问题感到兴趣。

不同的人类共同体都有自己的语言。从远古语言产生的时候起,世界上就不止一种语言。后来,语言随着社会的分化而分化,又随着社会的统一而统一。在氏族时代,语言分化过程占优势;阶级和国家出现后,分化过程和统一过程交叉进行;资本主义社会以后语言统一过程占优势。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语言的分化过程和统一过程起作用的结果,形成了多种语言。这就是具体语言的产生。下面举一些例子说明:

拉丁语最初只是罗马城的方言。由于罗马帝国的扩张,它同化了高卢人、伊伯利安人等的民族语言,发展成罗马帝国的通用语言。后来,由于罗马帝国的解体,古拉丁语死亡。从六世纪到九世纪在民间拉丁语的基础上,逐步形成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现代罗曼语言。

原来东斯拉夫人使用统一的东斯拉夫语。十二世纪中叶,

由于基辅罗斯的崩溃，破坏了统一的东斯拉夫语，在不同的方言基础上形成了俄语、乌克兰语和白俄罗斯语。

印度使用印度斯坦语。1947年印巴分治，统一的印度分解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印度主要信佛教，巴基斯坦主要信伊斯兰教。由于印巴分治的国家差别和两国的宗教信仰差别，印度斯坦语有了分化。它有两种标准语：印度的国语印地语和巴基斯坦的国语乌尔都语。印地语采用印度当地的天城体字母，并拥有梵语词汇。乌尔都语采用阿拉伯字母，并吸收很多阿拉伯语词和波斯语词，因为伊斯兰教最早是通过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传入印度的。

世界语言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由于分化和统一过程交叉进行的结果，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就会产生具体的语言。根据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我们知道汉语是从共同汉泰语并进而从共同汉藏语分化而来，英语是从共同日耳曼语并进而从共同印欧语分化而来。

（王德春）

语言和思维之间存在辩证统一的关系。

语言把人们思维活动的结果，认识活动的成果记载下来，巩固下来，使交际和交流思想成为可能。语言离开思维，就成为“空洞的声音”，不再是音义结合的交际工具，因而不是语言。

思维是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的，离开语言的物质形式，就难以进行思维活动。只有用语言材料来概括反映事物及其属性，才能对事物进行分析和综合，进行抽象和概括。概念是概括地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它必须在词和词组的基础上形成。人们在感性认识中反映的事物是个别的，具体的，通过词和词组可以把事物的本质属性加以抽象和概括，而形成概念。例如，我们平时感知的是某个具体的三角形，“三角形”这个概念则是通过词而形成和存在的。

语言可以表达人的思想。个别人的思想通过语言从其个人所有物转化为全社会的精神财富。人也可以用手势、动作、音乐、绘画、色彩、公式等手段来表达思想，但最完善的表达工具是形成思维的语言。人在语言中巩固了自己的思想之后，便可能把思想当作外在的对象加以分析、研究。所以，语言不

仅是理解别人思想的工具,而且也是理解自己思想的工具。人在表达自己思想时,自己便更加明确地了解它。

知识是人类思维活动的成果,因而,语言也是知识存在的物质形式。知识用语言记载,在语言中客观化,通过语言而现实化。另外,通过口语录音或书面语,知识可以传到远方,传之后代,帮助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客观现实和人本身。

列宁说过:“在语言中只有一般的东西……任何词(言语)都已经是在概括……感觉表明实在;思想和词表明一般的东西。”这就是说,人的认识通过语言而实现从知觉到概念的过渡,进而形成概括的思想。没有语言的概括作用,人们就不可能具有认识客观事物无限多样性的能力。

所以,语言和思维之间存在有机的、辩证的联系。

在现代语言学中,有人用人工代码同语言类比。认为代码虽可储存和传递信息,但不一定同思维联系,似乎语言和思维也可以分开了。实际上,任何代码都是封闭而有限的体系,而活的语言是潜力巨大的开放而活动的体系。在代码中一切在语言的基础上事先约定;而在语言中,一切在交际和思维过程中建立。如果把语言当作没有意义的代码,那末语言就会处于认识过程之外,语言和思维就失去深刻的相互作用,语言就不能成为完善的思维工具。语言与代码不同,它不仅是形式表达体系,还反映现实,同认识的历史过程紧密联系,并记载和巩固着丰富的思维成果。

语言和思维尽管相互依存,紧密联系,但二者不是同一个现象。它们的差别是:

首先,功能不同。语言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它的功能是让社会成员能够相互交际,交流思想,达到相互了

解。思维是认识客观世界的积极过程，它使人们能够更深刻地认识和反映客观世界，从而能动地改造世界。

其次，规律不同。思维规律是客观现实规律的反映，为全人类所共有；语言规律具有民族独特性。各族人民判断、推理的逻辑形式是一致的，但各民族语言的体系各不相同。

再次，范畴不同。语言的单位是词和句子；思维的单位是概念、判断和推理。

最后，思维作为现实的反映是精神现象，而语言则是思维的物质形式。

所以，既不能把语言和思维割裂开来，也不能把它们混为一谈。

（王德春）

语言是以符号系统来执行其交际职能的。语言符号与其他符号相比，有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是：

1. 线条性。语言符号是由发音器官发出的一个一个的声音。这一连串的语音在同一说话时间里，始终是而且只能是以一根线的形式伸展开来，即一个声音接着一个声音相继出现，如象一条锁链一环扣一环，而不可能同时发出两个声音。这就是语言符号的线条性。

2. 任意性。一种语言社会集团的人们，最初用什么样的语音去标记客观事物，从而指代该事物获得意义，这是任意性的。比如能制造劳动工具的动物，汉语叫 rén(人)，维吾尔语叫 adəm，英语叫 man，俄语叫 человек。所以马克思说：“物的名称，对于物的性质，全然是外在的。”这就是语言符号的任意性。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是指人们最初用什么样的语音形式去标记客观事物而说的，不是指人们对语义内容的任意解释。语义内容是客观事物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是客观事物本身的特性赋予的，是人们思维活动的结果，认识活动的成果。如果语义内容也是任意性的，没有共同理解的基础，那末人类社会

中的思想交流就成为不可能的事了，语言也就丧失了交际工具的作用。

3. 不变性。人们最初用什么样的语音形式去标记客观事物是任意性的，但一经社会约定俗成，在使用该语言集团的人们中间通行之后，便失去了“自由”，个人不能任意改变它。比如说，使用汉语的社会集团，一经把“人”叫做 rén 之后，个人就不能自由地任意改叫别的什么名称。事实上，语言一经置于社会领域，作为人类社会共时性(Synchrony)的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个人无权改变语言符号。你只能按照社会通行的名称去指称事物，按照社会共同理解的语义去使用，才能达到交际目的。在这一方面，语言不同于人为的、契约性质的符号。语言无法通过多数人的决议，改变某些规则或移植某些规则。人们只能依照现存的母语这样说，这样用。所以说共时的语言符号具有不变性。

4. 可变性。可是，只要我们把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拿来一比较，就会发现它们之间有质的差别。比如现代汉语叫“眼睛”，古代汉语却叫“目”；现代汉语说“下棋”，古代汉语却说“弈”，等等。可见，语言符号又具有可变性一面。

语言符号的不变性和可变性，看起来是一种矛盾现象，其实，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既呈现出相对静止状态，又显现出绝对变化状态，这是矛盾运动的普遍法则。

5. 生成性。人们说出的具体句子是无限量的，而一种语言的句子模式却是有限的。说话人掌握一种句子模式，就可以生成无限量的具体句子，这就是语言符号的生成性。比如刚学会说话的小孩，从他爸爸妈妈那里学到“小明吃糖”这句话，他就可以生成(创造)“妈妈煮饭”、“爸爸喝茶”等许多具体

句子。尽管生成这些句子的语词不同,具体意义不同,但都是同一个句子模式。简单地说,人们说出和理解新句子,因为这些句子与过去听到过的句子相类似,它是通过类化作用生成的。

语言符号的各个特点表现为错综复杂的关系,形成矛盾的统一体。在这个矛盾统一体内,语言符号各个要素,各个方面既互相对立,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互相制约,构成一种关系网络,具有严密的系统。

(徐思益)

34 语言有哪些变体?

语言是社会集团共同的财富，它对一个社会集团的一切成员都是共同的。那么，它存在于何处呢？

现代汉语是现代汉族人的共同的财富，它对一切说现代汉语的人都是共同的。那么，它存在于何处呢？

北京人说的是现代汉语，南京人说的也是现代汉语，上海人说的也是现代汉语，广州人说的也是现代汉语……可是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

大学教授说的是现代汉语，中学生说的也是现代汉语，家庭妇女说的也是现代汉语，老农民、老工人说的也是现代汉语……可也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

口头说的是现代汉语，纸上写的也是现代汉语，但是两者显然有许多不同之处。

诗歌用的是现代汉语，科技论文也是用的现代汉语，公开演说时用的是现代汉语，父子夫妻情侣间谈心用的也是现代汉语，显然也有许多不同之处。

那么，一切说现代汉语的人所共同的现代汉语存在于何处呢？

我们说，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所接触到的这一切，都是现代

汉语,但又都不是。说它们都是,因为在它们之外,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现代汉语了;说它们又都不是,是因为它们同对一切说现代汉语的人都是共同的、统一的现代汉语又有些不一样。我们所接触到的这些,就是现代汉语的变体,它是现代汉语的存在的形式。可见,对整个社会都是共同的、统一的语言是存在于各种各样的变体之中的。

那么,语言有哪些变体呢?

语言的变体主要有:(1)地域变体——方言;(2)社会变体——社会习惯语等;(3)书面变体;(4)风格变体。

语言的地域变体,就是方言。方言是同一种语言的分支,它是按照地域来划分的,而不是按照说话者的年龄、性别、职业、阶级地位、政治态度、文化水平等因素来划分的。它一视同仁地为该方言区的一切成员服务,而不管他们的阶级地位、政治态度如何,是他们共同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同一种语言的各种方言之间,是有异有同的,但又是同大于异的。如果没有异,那就不存在着方言的差异了;如果异大于同,那就是不同的语言,而不是同一种语言的不同方言了。

语言的社会变体,就是社会习惯语,如阶级习惯语、行话、黑话、术语、俚俗语、禁忌语、委婉语等等。社会习惯语同方言不同:首先,它是依据社会上的阶级、阶层、集团、职业、文化教养等因素来划分的,而不是依据地域来划分的;其次,如果说方言有自己的基本词汇和语法构造,有可能发展成为独立的语言,那么,社会习惯语是没有自己的基本词汇和语法构造的,也是不可能发展成为独立的语言的;最后,方言广泛地多方面地为该方言区的人们服务,而社会习惯语只能通行于一个狭小的范围之内,为某个社会集团的某些方面服务,出了这

个集团,他们还得运用共同语或方言。

社会习惯语是社会的阶层等方面的分化而形成的。它也不限于以上几种。如幼儿有自己的习惯语,用“汪汪”代替狗,用“的的”代替汽车;妇女也有自己的习惯语,用“1号”代替“厕所”;每个家庭也都有自己的习惯语,有一篇题为《相亲》的小说中写道:

电报上只有九个字:

“28岁,4分,高中,中教。”

你莫小看这九个字,翻出来可就惊人啦;二十八岁的姑娘,相貌可以评四分(按当前流行的“五分制相貌评定法”),高中毕业,中学教师。(见《边疆文艺》1979年9月号)

这个“4分”就是这个家庭中的习惯语。

口语是语言的最基本的存在形式。书面语是文字产生以后在口语的基础上形成的。书面语同口语相比,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严密性,二是体系性。两者在词语和句法方面都有明显的差异。一般说来,口语中俚俗词、偶发词,有特别含义的词多,而古语词,成语典故少,短句多而长句少,不完全句多而完全句少;书面语中俚俗词、偶发词少,而古语词、成语典故多,短句少而长句多,不完全句少而完全句多。

风格变体,是由于交际的对象、环境、目的不同而形成的。如公文语体、科技语体、文艺语体、政论语体所使用的语言是不一样的,在用词和造句方面都有明显的表现,这就是语言的语体风格变体。藻丽风格、平实风格、明快风格、含蓄风格、繁丰风格、简洁风格,在用词和造句方面也都有显著的区别,这就是语言的表现风格变体。

对语言变体的研究，不仅在理论上有助于探索语言的本质等问题，而且也有实用价值，如对于制定语言政策，提高语言教学的效果、培养语言表达能力等方面也都是有用的。

(王希杰)

35

世界上有多少语言？

世界上究竟有多少语言，并没有准确的数字。有些西方学者估计，世界语言的数目约有四千种至八千种。我们倾向于认为没有那么多。另有一个材料说世界语言有两千种左右。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比较稳妥。

两千种左右，这仍然是个很大的数字。但是，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讲的语言，却不到一百种。从使用的人数来说，讲汉语的，约有十亿人，约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讲英语的，约有三亿人，此外还有不少人在不同程度上懂得英语，把它作为交际工具。从地区上来说，西班牙语除是西班牙的通用语言外，还通行于中美洲以及南美洲绝大多数国家；南美洲的巴西通行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同属拉丁语族，所以中、南美洲也叫做拉丁美洲。印度的北部、中部通行印地语。苏联的俄罗斯部分通行俄语。日本通行日语。从阿拉伯半岛起直到北非大西洋海岸的广大地区，通行阿拉伯语。孟加拉国通行孟加拉语。法语除通行于法国外，还通行于许多前法属殖民地、现在已独立的国家，如象牙海岸、几内亚，等等。德语通行于德国。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主要语言就是这些。

世界语言中有一个独特的现象是许多小语种逐渐消亡，大语种取而代之。例如：白人在美洲殖民以前，当地曾有过许多印第安语，有人估计有千种左右。这许多种印第安语，使用的人数很少，通行的范围也很窄，仅限于在印第安人中交际使用。

鉴于世界上的语言很多，语言上的隔阂妨碍了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所以有人想创制世界语，以便于人们的交际，这就是人工语言出现的原因。人工语言有好几种：世界语(Esperanto)、奥克西登塔尔(Occidental)、交际语(Interlingual)，等等。其中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是世界语，它是波兰人柴门霍夫于1887年创制的。

世界上的语言如此繁多，它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十九世纪的比较学派研究了各种语言，发现有些语言的某些语音、词汇、语法规则之间有对应关系，有些相似之处，他们便把这些语言归为一类，称为同族语言，由于有的族与族之间又有些对应关系，又归在一起，称为同系语言，这就是所谓语言间的谱系关系。

现在世界上主要的语系有：

1. 印欧语系。这是最大的语系，下分印度、伊朗、日耳曼、拉丁、斯拉夫、波罗的海等语族。印度语族包括梵语、印地语、巴利语等。伊朗语族包括波斯语、阿富汗语等。日耳曼语族包括英语、德语、荷兰语、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各主要语言。拉丁语族包括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罗马尼亚语。斯拉夫语族有俄语、保加利亚语、波兰语等。波罗的海语族包括拉脱维亚语和立陶宛语。

2. 汉藏语系。下分汉语和藏缅、壮侗、苗瑶等语族，包括

汉语、藏语、缅甸语、克伦语、壮语、苗语、瑶语等。

3. 阿尔泰语系。下分西阿尔泰语族、东阿尔泰语族。前者包括突厥诸语言以及苏联境内的楚瓦什语，后者包括蒙古语以及苏联境内的埃文基语。

4. 闪含语系，又称亚非语系。下分闪语族和含语族。前者包括希伯来语、阿拉伯语等，后者包括古埃及语，豪萨语等。

5. 德拉维达语系，又称达罗毗荼语系。印度南部的语言都属于这一语系，包括比哈尔语、泰卢固语、泰米尔语、马拉雅兰语等。

6. 高加索语系。这一语系的语言分布在高加索一带，主要的语言有格鲁吉亚语、车臣语等。

7. 乌拉尔语系。下分芬兰语族和乌戈尔语族。前者包括芬兰语、爱沙尼亚语等，后者包括匈牙利语、曼西语等。

此外还有一些语系，如非洲的尼日尔—刚果语系、沙里—尼罗语系、科依散语系，美洲的爱斯基摩—阿留申语系以及一些印第安语系，大洋洲的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和密克罗尼西亚语系。

世界上有些语言，从谱系上看，不属于任何语系，例如欧洲法国—西班牙边境处的巴斯克族讲的巴斯克语，克什米尔地区通行的一种语言布鲁沙斯基语，还有日语、朝鲜语，就是独立的语言。

世界各地区，某一地区的语言的数目各不相同。例如中国有七八十种语言，而新几内亚的语言就很多。印度的语言也很多，据估计有一百五十多种。

(林书武)

36

我国有多少种语言文字？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在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美丽富饶的国家里，居住着五十多个民族。我国有这么多民族，那么语言、文字有多少种呢？有的说有五六十种，有的说有七八十种。由于对民族语文的调查研究不够，同时对确定语言的标准认识不一，现在还说不清我国语言的确切种数，只能说出一个大概。

语言是民族的特征之一。要知道我国的语言，需要先了解一下我国的民族。在我国，除占全国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几的汉族以外，还有蒙古、回、藏、维吾尔、苗、彝、壮、布依、朝鲜、满、侗、瑶、白、土家、哈尼、哈萨克、傣、黎、傈僳、佤、畲、高山、拉祜、水、东乡、纳西、基诺、景颇、柯尔克孜、土、达斡尔、仫佬、羌、布朗、撒拉、毛难、仡佬、锡伯、阿昌、普米、塔吉克、怒、乌孜别克、俄罗斯、鄂温克、崩龙、保安、裕固、京、塔塔尔、独龙、鄂伦春、赫哲、门巴、珞巴等兄弟民族。这些兄弟民族的总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六左右。

说到语言，我国的语言呈现出一幅绚丽、纷繁的图景；如果画出语言地图，人们看了一定会赞叹不已。具体说来，除个别民族外，绝大多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由于各民族的长

期合作，互相交往，在语言方面相互影响是很大的，甚至产生了某些语言融合的现象。有的民族同其他民族共同使用一种语言，如回、满、畲等民族都通用汉语；有的民族使用着本民族的语言，同时还兼通汉语，如壮、黎、羌、京、白、土、赫哲、拉祜、东乡、土家、布依、毛难等民族；其他一些民族，也有相当多的人兼通汉语。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各民族的团结越来越紧密，民族之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汉语的影响和作用也越来越大，实际上，汉语已经成为各民族之间共同使用的一种交际工具。在少数民族地区居住和工作的汉族人，大多都兼通少数民族语言。

据了解，我国各民族的语言有六七十种之多。从语言系属来说，它们分别属于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印欧语系和南亚语系。有的学者认为还有分属南岛语系的。在这些语系下面，可以分成若干个语族，各个语族下面还可以分成若干个语支。

属于汉藏语系的语言最多，分布的地区最广，东起东海沿岸，西至西藏高原，南起海南岛，北至东北三省及长城一带。属汉藏语系的语言有：汉语；壮语、布依语、侬语、沙语、傣语、掸语、侗语、仫佬语、水语、毛难语、黎语；藏语、门巴语、珞巴语、羌语、俅语、怒语、彝语、哈尼语、傈僳语、拉祜语、阿昌语、民家语、纳西语、基诺语、白语、土家语、景颇语；苗语、瑶语等。有人把京语、普米语、独龙语和仫佬语也归入汉藏语系。

其次是阿尔泰语系，主要分布在东北、西北、内蒙古、新疆等地。属阿尔泰语系的语言有：蒙古语、东乡语、土语、保安语、达斡尔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撒拉语、乌孜别克语、塔塔尔语、柯尔克孜语、裕固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满语、锡伯

语、赫哲语等。

其他很少的几种语言，分别属于另外两个语系。属印欧语系的语言有：俄罗斯语、塔吉克语。属南亚语系的语言有：佤语、崩龙语、布朗语；高山语（有的学者认为，高山族不只一种语言，而是有十几种语言）。朝鲜语的系属还没有确定。

我国古代还有其他一些语言，如白狼语、女真语、契丹语、突厥语、吐火罗语、和阗语、粟特语、西夏语、鲜卑语、匈奴语等，这些语言现在已经消亡了。

各个语系的语言都有各自的一些特点。汉藏语系语言的主要特点是：1. 每个音节上有区分意义的声调。声调一般从三个到八个，也有多到十个的。2. 声母的清浊往往影响到声调的高低。3. 大多数词以单音节的词根为基础，多音节词往往在这些单音节词的基础上构成。4. 形态变化比较简单。词序比较固定，词序的不同充分显示出语法作用。5. 有比较丰富的量词。

阿尔泰语系语言的主要特点是：1. 没有声调，不以声调区别意义。2. 多音节的词根比汉藏语系语言的多。3. 附加成分很丰富，这些附加成分都有语法作用。4. 多数没有量词，如“两本书”说“两书”。5. 词序也比较固定，但词序与汉藏语系不大相同，次序是：主词——宾词——动词。词序的作用没有汉藏语系的重要。

印欧语系语言的主要特点是：1. 没有声调。2. 多音节的词根比较多。3. 附加成分比较丰富，这些附加成分有重要的语法作用。4. 词序比较自由。

南亚语系语言的主要特点是：1. 没有声调，只有语调。2. 大部分词以单音节词根为基础。3. 附加成分不多，形态变化

比较简单。4. 词序不太固定。

就文字而论，种数比语言要少好些，现在大致有二十多种；有的民族没有文字，一些民族通用汉字或其他文字，有的民族使用几种文字（如傣族）。

通用汉字的民族有：回、满、东乡、土、撒拉、保安、裕固、达斡尔、赫哲、锡伯、畚、京、白、羌、仡佬、仡佬、土家、普米、阿昌等，以及瑶、布朗、崩龙、哈尼等的一部分，其他民族也有许多人兼用汉字的。门巴族通用藏文，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和塔塔尔族通用维吾尔文，鄂温克族牧区通用蒙古文，农业区通用汉字，柯尔克孜族除使用本族文字外，还分别使用维吾尔文、哈萨克文、蒙古文和汉字。

已有的二十多种文字，按其结构，可以分为拼音文字和音节文字两大类（解放前还有象形文字，如纳西族的东巴文和水族的水书）。属拼音文字一类的有：藏文、蒙古文、朝鲜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锡伯文、景颇文、哈尼文、布依文、拉祜文、傈僳文、纳西文、苗文、彝文、傣文、佤文、壮文、侗文、黎文、俄文等。现在，这些文字多数采用拉丁字母形式，并且在字母的读音和用法上尽量跟汉语拼音方案取得一致，这有利于兄弟民族之间的语文学习和文化交流。属音节文字一类的只有汉字和纳西族曾经使用过的哥巴文、老傈僳文等。

历史上一些民族曾经使用过的回鹘文、西夏文、突厥文、契丹文、八思巴字、女真文、吐火罗文、满文等，现在一般不用了。

总之，我国的语言大致有六七十种，文字有二十几种。

（陈章太）

37

什么是语言的类型分类？

语言的类型分类，又叫做语言的形态分类，它根据句子和词的构造，以及句子中间各个词素的相互关系，来对世界的语言进行分类。

根据语言的类型分类，通常把世界的语言分为四种类型：孤立语、粘着语、屈折语、多式综合语。

孤立语，又叫词根语，它的主要特点是词和词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他语法作用，不是用词的内部形态的变化来表示，而是依靠虚词和词序来表达。汉语、彝语、壮语、苗语、越南语等，都是孤立语。

粘着语和屈折语区别于孤立语的地方是，它们都有词的形态变化，词和词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他语法作用都靠词的形态变化来表示。

粘着语不同于屈折语的地方是，它没有内部屈折，它的每一个构形形态只表示一种语法意义，每一种语法意义总用同一个构形形态来表示。一个词如果要表示三种语法意义，就得用三个构形形态。词根和构形形态的结合也并不紧密，两者都有很大的独立性，构形形态仿佛是粘附到词根上去似的。例如在土耳其语中：

sev-	动词词根。表示词汇意义“爱”。
-dir	构形形态。表示第三人称。
-ler	构形形态。表示复数。
-miş	构形形态。表示过去时。
-erek	构形形态。表示将来时。

于是便可以构成这样一些形式:

sev-erek-dir	“他将要爱”。
sev-miş-dir	“他从前爱”。
sev-erek-dir-ler	“他们将要爱”。
sev-miş-dir-ler	“他们从前爱”。

土耳其语、维吾尔语、芬兰语、匈牙利语、日本语、朝鲜语等,都是粘着语。

屈折语有内部屈折,一个构形形态可以同时表示几种语法意义,每一种语法意义又可以同时用几种不同的构形形态来表示。如俄语的“книга”(书)中的“а”,同时表示名词的“阴性”、“单数”、“主格”三种语法意义;俄语名词的“主格复数”,又可以分别用“-и”、“-ы”、“-а”、“-я”这些构形形态来表示。屈折语的词根和构词形态结合得很紧密,构形形态脱离词根就不能独立,反之词根也不能离开构形形态。所以屈折语中词根和构形形态的结合处,往往要发生语音变化,使得两者界限不明确,很难区分。而粘着语中,词根和构形形态的结合处通常不发生语音变化,因此两者界限明确,容易区分。

印欧语系的诸语言,如俄语、德语,闪—含语系的诸语言,如阿拉伯语,都是屈折语。

多式综合语,又叫编插语,它的特点是:动词谓语的宾语、状语等,不以独立的句子成分的形式出现,而是作为构形形态

包含在动词谓语之中。这种语言中，一个以动词为中心的词的形式，就相当于其他语言中的一个句子，因为有时这种词形中还能包括别的语言中的主语。如在北美的契努克语中：

i—n—i—a—l—u—d—am“我来是为了把这个交给她”。

其中：

- d- 动词词根。表示词汇意义“给”。
- i- (第一个) 构形形态。表示过去时。
- n- 构形形态。表示第一人称单数。
- i- (第二个) 构形形态。相当于代词宾语“这个”。
- a- 构形形态。相当于代词宾语“她”。
- l- 构形形态。表示它前面的代词宾语是一个间接宾语。
- u- 构形形态。表示动词的动作是离开说话人的，即是他交给某人什么东西，不是某人给他什么东西。
- am- 构形形态。表示动作(“来”)是有目的的。

美洲各种印第安语都属于多式综合语。

语言的类型分类，还可以根据语言的句法特点，把世界的语言分为分析语和综合语两种。分析语的特点是主要靠词序和虚词来表示各种句法关系。综合语的特点是各种句法关系主要靠构形形态来表示。汉语、英语、法语、保加利亚语等属于分析语。俄语、德语、印地语等属于综合语。

(王希杰)

38

印欧语系有哪些语言？
有些什么特点？

印欧语系是世界上最大的语系之一，包括印度、伊朗、意大利、拉丁、日耳曼、凯尔特、斯拉夫、波罗的等语族和希腊语、阿尔巴尼亚语、阿尔明尼亚语与吐火罗语。每一个语族又都包括几个语支，而每一语支又各包括几个语言。例如日耳曼语族包括东、西、北三个语支，东日耳曼语支的语言有峨特语等，今已消亡；西日耳曼语支有荷兰语、德语、英语等，北日耳曼语支有瑞典语、丹麦语、挪威语、冰岛语等。斯拉夫语族也可以分为东、南、西三个语支。东斯拉夫语支的语言有俄语、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南斯拉夫语支的语言有保加利亚语、马其顿语、塞尔维亚-霍尔瓦特语、斯洛文语，西斯拉夫语支的语言有波兰语、捷克语、斯洛伐克语等。拉丁语族又称罗曼语族，包括三个语支和一些语言：伊伯利亚-拉丁语支：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高卢-拉丁语支：法语、普洛凡斯语；东部语支：罗马尼亚语、莫尔达维亚语等。此外还有意大利语、撒丁语等。这三个语族在印欧语系中有重要的地位，使用人口也最多。其中英、法、西、俄等语言都是世界上通行最广泛的语言。我们的邻居印度的印地语、乌尔都语、孟加拉语、茨冈（吉卜赛）语属于印度语族。古代的梵语也属于印度语族。

吐火罗语在我国新疆一带，早已消亡。

印欧语系的语言原来都是屈折语。原始印欧语的名词有三个性、三个数和八个格的变化。由于语言的发展，有些语言还保留着屈折语的特点，例如俄语，名词、形容词都有性、数、格的变化，形容词还另有级的变化，动词有时、体、态、式的变化；一个构形成分可以同时表示好几种语法意义，如“книга”的词尾“-а”可以同时表示阴性、单数、主格的意义，这与粘着语的一个构形成分只能表示一个语法意义的情形不同；词根和词尾的结合很紧，脱离词尾，词根就不能独立存在，如俄语的“перо”（笔尖），把词尾“-о”去掉，“пер-”就不能单独存在。另外有一些语言，例如英语，由于形态的简化，已向分析语转化。现在英语的名词、形容词已没有性的变化；名词还有单复数的变化，有生命的事物的名词还可以有一个属格的形式，其他格的形式，都已消失；动词表时，体等范畴的变化比其他词类的变化稍为复杂一点，但上述这些形态变化都比原始印欧语、现代俄语的形态变化简单。由于形态简化，英语的词序相对地说就比俄语重要。在语音方面，印欧语系各语言有词的重音，没有象汉语那种由音高变化表现出来的声调。这是印欧语系各语言中的一个共同特点。

印欧语系的语言主要分布在欧洲、美洲和亚洲的印度，拉丁美洲除巴西用葡萄牙语外大多用西班牙语。

印欧语系中的梵语和吐火罗语在历史上曾和汉语有过密切的关系。东汉以后随着佛教传入我国，翻译了大量经书，由于人名、地名、专名等的翻译需要尽可能准确的对音，因而从佛经的梵语原文中可以看到对译的汉字的古代读音。例如“佛陀”是“Buddha”的翻译，我们就可以知道“佛陀”两字在古代

的读音一定和“Buddha”差不多。这是研究汉语史的一份宝贵资料。大体说来,隋唐以前,佛经的翻译经过吐火罗等语言的中介,从隋开始,多直接译自梵语。

(徐通锵)

39 阿尔泰语系有哪些语言？有些什么特点？

阿尔泰语系包括突厥、蒙古、通古斯—满三大语族，五六十种语言。

一、突厥语族，包括：

1. 阿塞拜疆语 苏联阿塞拜疆共和国和伊朗西北部。
2. 嘎嘎乌孜语 苏联乌克兰共和国、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
3. 撒拉语 我国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
4. 卡拉恰—巴尔卡尔语 苏联北高加索。
5. 土库曼语 苏联土库曼共和国，土耳其。
6. 土耳其语 土耳其、保加利亚。
7. 土鲁赫曼语 苏联北高加索一带。
8. 阿尔泰语 苏联郭尔诺阿尔泰自治省。
9. 巴什基尔语 苏联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
10. 哈萨克语 苏联哈萨克共和国及我国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11. 柯尔克孜语（又称吉尔吉斯语） 苏联吉尔吉斯共和国及我国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12. 卡拉卡勒帕克语 苏联卡拉卡勒帕克自治共和国。
13. 卡拉依姆语 苏联克里米亚、立陶宛共和国及波兰。
14. 库墨克语 苏联达格斯坦卡巴尔金自治省。
15. 诺盖语 苏联达格斯坦车臣自治省。
16. 塔塔尔语(又称鞑靼语) 苏联鞑靼自治共和国、西伯利亚西部及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7. 楚瓦什语 苏联楚瓦什自治共和国。
18. 维吾尔语 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苏联哈萨克斯坦、乌孜别克斯坦。
19. 乌孜别克语 苏联乌孜别克共和国、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阿富汗。
20. 哈卡斯语 苏联哈卡斯自治省。
21. 哈尔嘎斯语(又叫图法拉尔语) 苏联克拉斯诺雅尔边区。
22. 绍尔斯语 苏联郭尔诺阿尔泰边区。
23. 图瓦语 苏联图瓦自治省。
24. 裕固语 我国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
25. 雅库特语 苏联雅库特自治共和国。

古代语言有：塞尔柱—奥托曼语、波罗维茨语(又称库曼语)、布勒加尔语、察哈台语、鄂尔浑碑铭语、回鹘语、哈扎尔语。

二、蒙古语族,包括:

1. 布里亚特语 苏联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
2. 保安语 我国甘肃省。
3. 达斡尔语 我国黑龙江省莫尔达瓦达斡尔自治县及内蒙古、新疆。

4. 东乡语 我国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自治县。
5. 克尔玛克语 苏联克尔玛克自治共和国。
6. 蒙古语 我国内蒙古自治区、东北、西北各省区及蒙古人民共和国。
7. 莫戈勒语 阿富汗。
8. 土族语 我国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

古代语言有契丹语。

三、通古斯—满语族, 包括:

1. 鄂伦春语 我国内蒙古自治区。
2. 鄂温克语 我国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自治旗及苏联东西伯利亚鄂温克民族州。
3. 鄂温语 苏联远东地区。
4. 赫哲语 我国黑龙江省。
5. 纳奈语 苏联远东地区。
6. 乌德语 苏联远东地区。
7. 满语 我国东北、北京。
8. 锡伯语 我国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

古代语言有女真语。

此外, 有人认为朝鲜语属阿尔泰语系, 但归属尚未定论。

阿尔泰语系语言的特点:

1. 大多数语言都是以单元音为主, 辅音的塞音和塞擦音有清浊之分, 元音有比较严整的和谐规律。没有作为语法手段使用的元音变化。

2. 每个词都有固定重音。突厥语族和通古斯—满语族的重音一般在词的最后一个音节, 蒙古语族则在词的第一个音节。

3. 词的形态结构比较复杂。词有词根、词干、词缀之分。词缀又分为构词词缀与构形词缀。一个词缀作为语法手段只表示一个语法意义,要表示几个语法意义,就要同时用几个词缀按照词的变化形式的聚合规则,粘着于词根或词干上来表达。

4. 有格的范畴。阿尔泰语系诸语言一般都具有基本格、领属格、宾格、与格、位格、从格,有的语言还有造格、范围格、共同格等,并且,各格的形态词缀多寡不一。例如:哈萨克语领属格有六种形式,与格有八种形式,宾格有七种形式,从格有六种形式,位格有六种形式。鄂温克语宾格有两种形式,位格有两种形式。东乡语领属格与宾格相同,有两种形式,位格一种形式,从格一种形式。

5. 存在后置词。

6. 句子的基本成分排列次序是主语在前,谓语在后,宾语置于谓语之前,成为主语——宾语——谓语。

(叶适良)

40

现代英语有什么特点?

各民族的语言都有其独特之处，英语亦是如此。拿现代英语同现代汉语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出英语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都具有一系列的特点。

先从语音方面看。音节是说话时最小的语音片断，现代英语的音节结构通常由一个元音加一个或几个辅音构成。两个以上的辅音连在一起，形成辅音群。辅音群可以出现在元音的前面，如[sprɪŋ]里的[spr]，也可以出现在元音的后面，如[fɪθ]里的[θ]。这和汉语不同。现代汉语普通话中一个音节最多包含两个辅音，而且没有辅音连在一起的拼法。现代英语中单独一个元音也能成为一个音节，如[ə'sli:p]里的[ə]，有些较响亮的辅音，如[l][m][n]，在后面没有元音的情况下也能和前边的辅音构成一个音节，如['lɪtɪ]里的[tɪ]。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辅音一般是不能单独构成音节的。

现代英语的单词按所含音节数目，可以分为单音节词、双音节词和包含三个或更多音节的多音节词。在双音节词和多音节词中，有一个音节读得比较重而强，其余音节相对地读得轻而弱，这就是单词重音，有的英文单词甚至有一个以上的单词重音，如单词['rɪ:kən'strakt]。

再从词汇方面看。现代英语的一个重要构词方式是在词根上加前缀或后缀，又称词头或词尾。例如，agree 加上前缀“dis-”，就成了 disagree，sleep 加上后缀“-y”就成了 sleepy。现代英语中象“dis-”和“-y”这样的缀词有两百个左右，这些缀词通常不能作为单词独立地使用，但却是构成新词的一个很重要的成分。

现代英语词汇的另一个特点是大量地吸收外来词。据统计，最完整的一部现代英语词典包含五十万左右单词，这五十万单词中，有一大部分是在过去的一千五百年中，从拉丁语、希腊语、法语、北欧日尔曼语、意大利语、德语、西班牙语、荷兰语和一些其他语言甚至汉语中吸收进去的，例如，现代英语中的 tea, typhoon，就是从汉语茶、台风吸收过去的。

再从语法方面看。现代英语虽然不象其他欧洲语言那样有着复杂的形态变化，但它还是有其独特的语法特点的。例如，现代英语中名词就有其特殊的性、数和格的变化。虽然在语法上英语名词是没有性的区分的，但有一部分名词随着词义的不同可以分阴阳性，表示男人或雄性动物的名词属于阳性，如 prince, host, heir, shepherd, lion, tiger, horse, 等等，表示女人或雌性动物的名词属于阴性，如 princess, hostess, heiress, shepherdess, lioness, tigress, mare, 等等。英语中可数名词都有单数和复数两种形式，例如，a pencil, four pencils，复数形式一般是在单数形式后加后缀“-s”构成。在现代英语中，有些名词还有所有格的形式，所有格的形式是在名词后加后缀“-’s”构成，如 the president’s office。现代英语中有格的变化形式的还有人称代词，人称代词在作主语用时用主格形式，如 I, she, they，在作宾语用时用宾格，如

me, her, them。

英语语法的另一个特点是大多数形容词都有比较级形式和最高级形式，用来表示“比较”和“最”这两种概念。单音节形容词的比较级是在词尾加“-er”、最高级在词尾加“-est”构成，如 smaller, smallest, 多音节形容词的比较级是在前面加 more、最高级加 most 构成，如 more beautiful, most beautiful。有些副词也和形容词一样，有比较级和最高级，大多数都是以加 more 和 most 构成。

现代英语语法的又一特点是动词有时、数、体、式的形式变化。在汉语中，不论表示什么时间发生的动作或存在的状态，动词只有一个形式。在英语中，不同时间发生的动作或存在的状态，要用不同的动词形式表示。绝大多数英语动词都有四种基本形式：现在形式，过去形式，过去分词形式，现在分词形式。英语动词在十六种时态、体态中的所有其他形式，均由这四种形式构成。现在形式亦称动词原形，是词典中所标的形式，多数动词的过去形式和过去分词形式是在动词原形后加后缀“-ed”构成，现在分词形式通常是在动词原形后加后缀“-ing”构成，例如 live, lived, lived, living。在汉语中，不管主语的人称和数如何，动词只有一种形式。在英语中，动词要与主语在人称和数上一致，主语是第三人称单数时，动词后面要加后缀“-s”或“-es”。英语动词还有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两种形式，表示主语是做某一动作的人或物还是承受这一动作的人或物。

(梁小平)

41

什么是语言内部的发展规律？

“万物皆流，万物皆变”。世界上没有固定不变的事物，语言也是这样，它无时无刻不在变化，只是变化的速度缓慢，不易被人们感觉到罢了。但是，时间久了，细微的变化日积月累，就会反映出语言在不同时代的明显差异。如果我们进一步对这些差异加以分析，就会发现语言的发展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遵循着一定的规律起变化，这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语言内部的发展规律。

语言内部的发展规律是由语言系统内部的各种组成要素的相互作用引起的。语言是符号系统，它内部的各种因素处于对立统一的关系之中，相互间呈现一种平衡的状态。如果其中某一种因素为了满足新的表达要求，受到其他语言的影响，或者其他什么原因而发生变化，破坏了原有的平衡，那么系统内的有关部分就会重新调整相互间的关系，达到新的平衡。例如，语言符号是音和义的结合，符号和符号之间必须保持有效的区别。符号的区别性是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一个基本要求。如果语言符号的区别性受到干扰、破坏，也就是原来处于平衡状态中的音与义的关系受到干扰，就必然会引起音与义之间的矛盾运动，重新调整相互之间的关系。古汉语是

单音节词占优势的语言。那时候的语音系统比较复杂，音位与音位的组合方式比较多样，因而单音节的词互有区别。后来由于浊音清化，辅音韵尾的消失等的变化，语音系统趋向简化，语言中的同音词大量增加，而新词又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产生，这就使语言符号的区别性逐渐模糊，给交际带来困难，需要有新的方式来解决由语音简化所带来的矛盾。于是加长词的长度，用双音节词的格局代替古代的单音节词的格局，借此作为语言符号之间的一种有效的区别手段。现代汉语已经不再是单音节词占优势的语言了，原来的单音节词好多都已变成了构词词素，由词素组合而成的双音节词在现代汉语中占主导地位。语言的发展变化是一环扣一环的。随着双音节词的产生，一个词内部的两个成分之间的关系又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在语音上、语义上产生轻重主次的区别，出现轻音、儿化、变调，某些实词的词缀化（如初、第、老、子、儿、头、性、化……）和派生词构词规则等等，从而使汉语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语音简化而引起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就是汉语内部发展规律的一种表现。

在语言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之中，语音的发展规律最为

声母	组 合 韵 母	开	齐	合	撮
		+		+	
k		+		+	
ts		+		+	
tɕ			+		+

严整，规律性最强。汉语普通话的[k][ts][tɕ]三组声母和韵母的配合关系见上页表。[k][ts]只能跟开、合二呼的韵母相配，[tɕ]只能跟齐、撮二呼的韵母相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整齐的局面呢？原来普通话的[tɕ]组声母（[tɕ tɕ' ɕ]）是从古代[k]组和[ts]组变来的，变化的条件相当于现在所说的齐齿呼和撮口呼；凡是[k]组和[ts]组声母在齐、撮二呼之前的，全都顎化成为[tɕ]组，无一例外，因而形成上述那样的声韵母的配合关系，这就清楚表现出[k][ts]两组声母的发展规律。

语音变化的规律性有三个明显的特点：第一，变化有一定条件的限制，比方[k]组和[ts]组顎化为[tɕ]组，条件就是在齐、撮二呼的前面，凡符合这一条件的一律都变，没有例外。如果出现例外，那也可以找出产生这种例外的原因。比方宁波话，古代的[k]在相当于上述齐、撮二呼的条件下和普通话一样也顎化而成[tɕ]（如“基”“溪”等），所以在语音系统中应该不再有象[kɪ][k'ɪ]这样的音位组合。但是，我们在实际的语言中却发现[kɪ]（甘，干，敢），[k'ɪ]（看，“让我看看看”中的头两个“看”）等的音位组合。这些音为什么没有在同样的条件下如同“基”“溪”那样也顎化成[tɕ][tɕ']呢？这就涉及到语音演变规律的第二个特点：时间性。语音演变规律起作用的时间有一定的限制，它只在某一段时期中起作用，过了这一时期，即使处于同样的条件下也不会遵循原来的规律发生语音变化。现代宁波方言的[kɪ][k'ɪ]中的[ɪ]是低元音[a]经过[a—ɛ—e—ie—i]阶段高化的结果。这是在顎化规律起作用的时期以后产生的语音现象，所以不受这一规律的支配。语音演变规律的第三个特点是地区性。语言的演变是象波浪般地从— 154 —

变只在一定的地域中进行。上述 [k][ts] 在齐、撮二呼前变 [tɕ] 的规律在北方话系统中是普遍起作用的,而在闽、粤等地并没有发生类似的现象。语音演变的规律性及其所具有的特点,为我们研究语音发展的历史提供了可靠的基础。

(徐通锵)

42

社会发展是怎样推动语言发展的？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它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社会发展对语言发展的影响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 社会的分化和统一推动语言的发展。社会发展过程中常常出现分化和统一的现象。分化的结果是形成若干半独立的区域或若干完全独立的社会，这时原来统一的语言在不同的地区上就会出现一些差别，形成虽未分裂但却各有特点的语言分支——方言，甚至分化成各自独立的语言。例如十三世纪初蒙古的语言是统一的，后来蒙古帝国连年征战，大批的蒙古人分散在横跨欧亚两洲的大片国土上，由于各地交往很少，便逐渐形成了各种方言，并进一步分化成独立的语言。

社会的统一也使原来的方言或语言间的分歧逐步走向统一，形成一个在新的社会内为这个社会的全体成员所使用的共同语。例如古法语原来是不统一的，不同的地区使用不同的方言，十二、十三世纪以后，随着法兰西政治上的逐渐统一，才逐渐出现了在法西岛方言（以巴黎为中心）的基础上形成的法兰西共同语。

2. 社会的进步推动了语言的发展。斯大林曾指出：“工业

和农业的不断发展,商业和运输业的不断发展,技术和科学的不断发展,就要求语言用工作需要的新的词和新的语来充实它的词汇。语言也就直接反映这种需要,用新的词充实自己的词汇,并改进自己的语法结构。”

语言词汇的发展受社会发展的影响最大。上古时期社会生活很简单,词汇也极贫乏。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词汇也逐渐完备丰富起来了。例如汉语中“铁”这个词是到春秋时期发明了冶铁术之后才有的。“桌”“椅”是到宋代才有的。由于社会的高度发展,现代词汇的数目越来越丰富。

一般说来,社会发展比较缓慢时(如我国封建时代),语言发展也缓慢。社会急剧变动时,语言的发展就迅速。例如在法国革命、苏联十月革命、我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都出现了大批新词,同时也有一些旧词改变了意义或消亡。

3. 社会间的接触交流推动了语言的发展。随着各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日益发达,社会间的接触交流不仅使本国的科学文化、政治、经济受到一定影响,而且也影响了语言的发展。各种语言在接触过程中都互相吸收一些语言成分。例如汉语就给日语、朝鲜语、越南语等语言以很大的影响。而汉语也受到其他语言的一些影响,如“吉普”、“巧克力”、“坦克”、“俱乐部”等词就是借自英语的。“苏维埃”、“布尔什维克”等词则是借自俄语的。世界上各种语言都同样受外来语的影响,吸收大量的外来词和其他成份。苏联1954年出版的俄语《外来语词典》就约有两万个词,而且还不完全。

(刘 晓)

43

现代汉语是怎样形成的？

丰富、优美的现代汉语是在近代汉语的基础上形成的，它经历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的发展过程。在近代汉语的历史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明显的趋势：一方面是宋元以来反映北方口语的书面语“白话文学”的产生和发展，这是现代汉语书面形式的主要源头；一方面是元明以来北京口语“官话”的逐渐渗入各个方言区域，这是现代汉语口头形式“普通话”的前身。

白话文学的历史是悠久的。早在唐朝的时候，由于文言远离了口语，也由于那时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成长，一种以北方话为基础的新的书面语言就在民间出现了，这可以拿讲唱文学——“变文”做代表。这种新的书面语言后来人们叫做“白话”。不过变文虽然在广大城镇的佛寺流转讲唱，听的人很多，但是艺术水平并不很高，语言也不够典范，因此对书面语言的影响是不大的。

唐朝以后，白话文学在宋、元、明、清这样漫长的岁月中继续向前发展，影响越来越大。宋代有从民间艺人手里创造、发展起来的话本小说，反映的社会生活面是广阔的，人情物态的描绘是生动的，白话文体的运用是纯熟的。元代的杂剧戏曲

在以大都为中心的北方地区兴起，是当代最流行的一种新文学。它的思想内容比以前的白话作品更加充实了，艺术技巧与表现能力更加提高了，白话语言也更加形象生动了，并且拥有《窦娥冤》《西厢记》这样的伟大作品，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到了明清时代，白话文学达到了它的成熟阶段，诞生了《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这些不朽的文学巨著，正式奠定了白话文体在文艺创作中的地位。当然，由于统治者的歧视，这时的白话还只是在比较狭窄的范围内使用，还没有在书面语中占据统治的地位，当时的公文、函件、科举考试、论文著作甚至某些小说、戏剧还是用文言文来写的。

官话的历史比白话文学的历史短一些。由于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北方话在汉语中一直占着优势，1234年蒙古人定都大都（北京）以后，北京话尤其显得重要。当时虽然明文规定蒙古话是国语，但实际上蒙古的老百姓和王公贵族都学会了大都话，喜欢讲大都话，于是大都话作为战胜者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元代的杂剧戏曲大多用大都话写成，艺人们到处为市民说唱演出，形成为一代的风气；周德清在《中原音韵》（1324年编成）一书中所说的“混一日久，四海同音，上自搢绅讲论治道及国语翻译，国学教授言语，下至讼庭理民，莫非中原之音”，指的也正是大都话。

明朝的时候，北京话作为共同口语的雏形看得更清楚了，“官话”的名称也出现了。明朝初年的时候，曾经编写了两本朝鲜人学习汉语的会话书（《朴通事》、《老乞大》），那里边用的正是当时的北京口语，可见北京话的标准口语的地位，连外国人也是承认的。再是由于明朝的生产逐渐发达起来，手工业

一天天地集中，商业一天天地繁荣，各地之间的联系一天天地密切，这就更加需要共同的口语，于是，当时就通过全国各地来到北京的官吏、商人和赴考的举子，把“官话”（北京话）慢慢地传播到全国各个地方去了。

为了推广“官话”，1728年清朝政府曾经在方音最重的广东、福建两个省份设立“正音书馆”，教授官话，并且规定“举人生员贡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1853年，莎彝尊著的推广官话的教科书——《正音咀华》也出版了。在那个时候，说官话已经初步形成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李伯元《官场现形记》中所说的“上文说的一位代笔师爷……他是杭州人，说起话来‘姐的姐的’全是土音，有点上不得台盘；所以东家更觉犯他的恶意，思想辞他馆”，就正是这种风气的具体反映。不过，官话的扩展还是落在白话文的后面，那时很多非北方话地区的人通过文学作品学会了“看”甚至“写”白话，但是“说”是不成的。

到了本世纪初年，特别是到了五四时代，随着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高涨，社会改革家提出了“言文一致”的主张，白话文学和官话这两股潮流就汇合到了一起，力量更加壮大了，大大地加速了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过程。一方面，当时展开的“白话文运动”打退了文言复古派的多次反扑，从根本上动摇了文言文的统治地位，使文言只应用在政府法令、公文以及某些新闻稿的比较狭窄的范围内，使一向只用在通俗文学领域的早期白话取得了使用于一切场合的文学语言的地位，并且拥有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郭沫若的《女神》等白话文学作品作为自己的典范；另一方面，当时由“官话”发展而来的“国语运动”进展很快，电影、话剧、广播都采用了“国语”，以北

京话为标准音的国语更加深入到了各个地区,于是,“国语”这个名称又逐渐被“普通话”这个含义更明确的名称所代替,这就意味着北京话已经明确地获得了民族共同语的地位了。这两者结合起来,我们就获得了在书面形式和口语形式两方面都有了相当规范的统一的文学语言。这样,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语,终于在五四时代最后地形成了。

(龚千炎)

44

现代英语是怎样形成的?

现代英语是从古代英语发展而来的。从古代英语到现代英语,其发展过程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古英语、中古英语和近代英语,各个时期有着各个时期不同的发展特点和趋势。

一、古英语

古英语时期自公元 450 年起,至 1150 年止,经历了 700 年的时间。这个时期的英语和现代英语相比,不仅在读音、拼写和词汇上大不相同,语法上的区别就更为突出。古英语的语法和现代德语的语法比较接近,有着复杂的形态变化。

古英语的名词有数和格的区分,数分单数和复数,格分主格、所有格、与格和宾格。因此,一个名词,有单数的主、所有、与和宾格四种形式,又有复数的主、所有、与和宾格四种形式,共八种形式。古英语的名词还有阴性、阳性和中性的区分。这三种性的区分并不是根据性别决定的,比如说,有些没有性别的物体并不是以中性来表达的,石头成了阳性的,月亮也成了阳性的,而太阳则成了阴性的。古英语名词的性的区分有时甚至还是不合逻辑的,例如,女孩、妻子、孩子这些按理应该是阳性或阴性的词事实上却是中性的,而妇女则成了阳性的。

古英语形容词的形态变化有强和弱两种，用来修饰前面没有定冠词或指示和物主代词的名词时，起强变化，用来修饰前面有定冠词或指示和物主代词时，起弱变化。强、弱变化的不同表现在形容词的词尾上。除此之外，古英语形容词也象名词一样，有着单、复两数，主、所有、与和宾四格和阴、阳、中三性的形态变化。

除名词和形容词之外，古英语的定冠词和人身代词也有着复杂的数、格和性的形态变化。人称代词的数变化除了单数和复数外，还有双数的变化形式，表示两个人或物。

古英语的动词只有两种时态变化形式，现在式和过去式。此外，古英语动词还有单、复两数，第一、二、三人称和陈述、虚拟、祈使三种语气的变化形式。古英语的动词被划分为两大组，一组为强动词，即不规则动词，另一组为弱动词，即规则动词。强、弱动词比较，弱动词占多数，强动词占少数，大约有三百个左右。

二、中古英语

中古英语时期自 1150 年起，至 1500 年止，经历了 350 年的时间。这时期的英语，不论在读音和拼写，还是在词汇和语法方面都较古英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后两者的变化尤为显著。语法方面的变化使英语从一门具有极其复杂的形态变化的语言转换成为一门分析语言。词汇方面的变化淘汰了一大部分古英语的用词，另外吸收了很多法语和拉丁语的用词。

语法方面的变化可以归纳为形态变化形式的简化。中古英语的名词逐步失去了格和性的区分，数的区分也由古英语时期的四种单数变化形式和四种复数变化形式简化为单、复数各一种形式，复数形式以词尾-s 来表示。形容词不仅逐步

失去了数、格、性的区分，还逐步失去了强、弱两种变化的区分，至中古英语末期，形容词已发展成为没有任何形态变化的词类。中古英语的指示代词亦由原来的许多形式固定为 the, this, that, these 和 those。人称代词的变化不很大，仍然保持着数、格、性的变化形式，只是表示双数的变化形式很快消失，由复数形式取代。当然，在读音和拼写上，人称代词还是有其一定的变化的。中古英语的动词在强和弱两种形式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强动词很快消失，或转化为弱动词。此外，几乎所有的从名词和形容词转化过来的动词，或从其他语言中吸收过来的动词都采纳了弱动词的变化形式，因此，弱动词的队伍越来越壮大。所有这些语法方面的变化，使得英语由古英语时期对性、格和数的依赖逐步转变至中古英语时期对词的位置的重视。句子中词和词之间的关系不再由性、格和数的变化形式来传达，而是由词在句子中的位置来表示。

词汇方面的变化也是中古英语发展过程中一个显著的特点。由于法国人在 1066 年征服了英国, 法语也随之在不列颠岛上使用起来, 英语词汇和法语词汇之间的互相吸收由此而开始。在中古英语时期的 350 年中, 英语从法语中吸收的词汇有好几千之多, 内容涉及政治、宗教、法律、军事、时装、食品、社交、艺术、医学等许多方面。另外, 中古英语还从拉丁语、佛兰芒语、荷兰语和低地德语中吸收了部分词汇。与此同时, 大量的古英语词汇由于不再使用而被逐步淘汰。

中古英语由古英语时期的三种方言发展为五种方言。至中古英语末期，出现了一种书面语言。这种书面语言不久便

三、近代英语

近代英语时期自 1500 年起, 直至现在, 已有了 480 多年的历史。这个时期的英语除了读音和拼写方面的一些变化外, 语法方面的变化不象中古英语时期那么急剧, 而词汇方面的发展却是前所未有的。

语法方面, 形容词的比较级和最高级形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规范, 单音节的形容词以加词尾-er 表示比较级, 加-est 表示最高级, 两个音节以上的形容词一般以在前面加 more 表示比较级, 加 most 表示最高级。人称代词亦由原来中古英语时期的第二人称单数 thou, thy, thee 和复数 ye, your, you 发展为 you, your, you, 既用于单数, 也用于复数。物主代词 its 和关系代词 who 也相继出现。动词的进行时形式被广泛使用, 进行式被动语态形式也于十八世纪后期首次出现。由一个动词加一个副词组成的动词组, 如 set out, gather up, put off 等大量涌现, 并日益得到广泛使用。句子的双重否定, 如 I didn't do nothing 中的 didn't 和 nothing, 逐步被淘汰。

词汇方面, 由于社会的迅速前进, 特别是科学的飞快发展, 大量的新词汇在英语中出现, 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从其他语言中吸收过来的。与此同时, 不少老的英语词汇被赋予新意义, 以适应新的发展的需要。

(梁小平)

45

汉语有多少种方言？

汉语一直存在着许多方言。这些方言和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有着明显的差异，方言与方言之间也有很大的不同；有些地方过了一江一河或翻过一座大山，两边的人互相交际就发生困难，甚至完全不能通话。

一般说来，汉语方言是比较复杂的，特别是京广路以东、陇海路以南的东南地区，方言更为复杂。

说汉语方言复杂，到底怎么个复杂法，有多少种方言？过去有人认为汉语有五大方言，也有人认为有七大方言，还有人认为有九大方言，众说纷纭。通行的说法是八大方言，即北方话、吴语、湘语、赣语、粤语、闽南话、闽北话、客家话。由于对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还不够全面、深入，所以要确切地说出它有多少种一时还有困难。现在只能根据已经看到的方言材料，大致做一些分类。我们认为，汉语大体上可以分为六大方言，即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粤方言、闽方言、客赣方言。

1. 北方方言。北方方言一般人称为北方话，以北京话为代表，是汉语最大的一种方言。它主要分布在我国北部、中部、西北部和西南部汉族居住的广大地区。南方也有个别地方使用北方方言的，如浙江杭州市的“杭白”，福建南平市的“土官

话”和长乐县洋埕的“京都话”，海南岛的“军话”等。使用的人口约六亿四千多万，占汉族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北方方言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它内部的一致性较大，除山西一部分地区和安徽南部徽州一带的方言比较复杂外，绝大部分地区彼此大致都可以通话。

北方方言的语音特点是：(1)古浊音声母今都读为清音。如“败、洞、舅”是古浊音，“拜、冻、救”是古清音，现在北方方言“败、拜”同音，“洞、冻”同音，“舅、救”同音。(2)声调一般分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少数地区有五个，个别地方有六个。入声一般消失，分别归入舒声各调。少数地区保留入声，韵尾大多收喉塞音[-ʔ]。(3)鼻音韵尾只有[-n]、[-ŋ]两个。(4)多数地区不分尖团。如“精、秋、酒”是尖音字，“经、丘、九”是团音字，现在北方方言“精、经”同音，“秋、丘”同音，“酒、九”同音。(5)许多地区有[tɕ-]、[tɕʰ-]、[ɕ-]声母。(6)多数地区有儿化韵。

北方方言的词汇是普通话词汇的基础，多数词汇进入了普通话，这是其他方言所不及的。

2. 吴方言。吴方言一般人称为江浙话，以上海话为代表。它主要分布在江苏南部、浙江的大部分地区和上海市。使用人口约七千七百万，占汉族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八点四左右。吴方言内部的一致性也较大，各地区都能通话。

吴方言的语音特点是：(1)保存古浊音，有成套的浊声母，古清浊声母分别十分清楚。如“拜、败”、“冻、洞”、“救、舅”不同音。这是吴方言最大的特点。(2)多数地区没有[tɕ-]、[tɕʰ-]、[ɕ-]声母，只有[ts-]、[tsʰ-]、[s-]声母。(3)韵母中单元音丰富，复元音较少。(4)辅音韵尾一般有鼻音[-ŋ]、喉塞音[-ʔ]。

有些地区鼻韵尾[-m]、[-n]消失,而留有鼻化韵。(5)声调一般七个,上声不分阴阳。有的地区有八个调。入声韵尾一般是喉塞音[-ʔ]。

吴方言的词汇受北方方言影响很大,基本词汇和普通话大致相近,只是读音上的不同而已。它也有一批特有的词汇。如“亮月”(月亮)、“家生”(家具)、“浜”(河沟)、“绢头”(手绢)、“弄堂”(胡同)、“汰”(洗)、“白相”(玩)、“讲张”(闲谈)、“适意”(舒服)等。吴方言的语法基本和普通话相同,没有太特殊的地方。

3. 湘方言。湘方言一般人称为湖南话,以长沙话和双峰话为代表。它分布在湖南的多数地区。使用人口约四千六百万,占汉族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五左右。湘方言又分新湘语和老湘语两种。新湘语通行在长沙及湘北地区,受北方方言的影响很大。老湘语分布在衡阳、双峰一带,与新湘语有某些差别。总的来看,湘方言和北方方言的次方言西南话比较接近,它们有许多共同之处,彼此通话没有太大的困难,所以有人主张将湘方言划入北方方言。

湘方言的语音特点是:(1)部分地区保存了一套古浊音声母。(2)[-n]、[-l]在开口韵、合口韵前不分,如“南、蓝”同音;在齐齿韵、撮口韵前有[-n-][-ɲ-]的区别,如“林”读[-n-],“宁”读[-ɲ-]。(3)[-f-]、[-xu-]不分。如“飞、灰”同音。(4)鼻音韵尾[-n]、[-ŋ]与鼻化韵并存。(5)声调一般六个或七个,有的地方有八个。多数地区入声自成一类,声调短促,但没有塞音韵尾。

湘方言的词汇大部分和北方方言差不多,基本词汇同普通话的差别更小。它也有一些特殊的词汇。如“堂客”(妻子)、

“郎”(女婿)、“伢子”(男孩儿)、“老虫”(老虎)、“里手”(内行)等。湘方言的语法同北方方言比较没有很突出的特点。

4. 粤方言。粤方言一般人称为广东话,以广州话为代表。它分布在广东中部、西南部和广西东南部,以及海外某些华侨居住的地区(主要在美国和南美),港澳地区主要也说粤方言。使用人口约四千七百万,占汉族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五左右。粤方言内部有一定分歧,但一般能够通话。

粤方言的语音特点是:(1)塞擦音和擦音一般只有[tʃ-]、[tʃʰ-]、[ʃ-]一套。(2)古见系字读[k-]声母。如“今、停”声母[k-]。(3)[f-]、[xu-]不分。如“夫、呼”同音。(4)韵母比较复杂,一般没有介音。(5)辅音韵尾有[-m]、[-n]、[-ŋ]和[-p]、[-t]、[-k]。(6)声调一般九个,有些地方有十个。入声一般分三个,有的分四个。(7)有些地方(广东阳江、台山等地和广西南部一些地区)有边擦音[d-]声母。如“心、三”声母[d-]。

粤方言词汇有自己的一些特点,主要是:(1)单音词比普通话多。(2)一些复音词的词素次序与普通话颠倒。如“挤拥”(拥挤)、“齐整”(整齐)等。(3)保存古汉语词较多。如“颈”(脖子)、“翼”(翅膀)、“着”(穿)、“睇”(看)、“衫裤”(衣服)等。(4)外来词比其他方言多。如“波”(球,英语 ball)、“唛”(牌子、商标,英语 mark)、“巴士”(公共汽车,英语 bus)、“士的”(手杖,英语 stick)、“恤衫”(衬衣,英语 shirt)等。(6)有一批独特的词汇。如“咁”(东西)、“靚”(漂亮)、“嘢”(这样)、“雪柜”(冰箱)、“猪红”(猪血)等。粤方言的语法和普通话有所不同,如“我大过你”(我比你大)、“你食先,唔使客气”(你先吃,不要客气)、“佢畀一本书我”(他给我一本书)、“朵花儿靚”(那朵花

多漂亮)等。

5. 闽方言。闽方言一般人称为福建话，以福州话、厦门话为代表。它分布在福建、台湾的大部分地区，广东的潮汕、海南岛地区，浙江南部，以及海外某些华侨居住(主要在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的地区。使用人口近三千万，占汉族人口总数的三点二左右。闽方言内部分歧较大，不少地方互相不能通话。但从总的方面看，闽方言的一致性还是主要的。

闽方言的语音特点是：(1)一般只有十五个声母(所谓十五音)。(2)声母没有[tɕ-]、[tɕ'-]、[ɕ-]，有[ts-]、[ts'-]、[s-]，古“知、彻、澄”读如“端、透、定”。如“猪、抽、宅”读[t-]、[t'-]声母。(3)古浊塞音声母多数变不送气清音。如“平、同”读[p-]、[t-]声母。(4)没有唇齿音声母[f-]，古“非、敷、奉”三母今一般读舌根音[x-]，一部分读双唇音[p-]、[p'-]。(5)声调一般七个，上声一般多数不分阴阳。有的地方有六个调或八个调。(6)入声一般都有韵尾，厦门话[-m]、[-n]、[-ŋ]和[-p]、[-t]、[-k]、[-ʔ]齐全，福州话只有[-k]、[-ʔ]，有的人只有[-ʔ]。(7)莆田话声母有边擦音[d-]。(8)海南话送气声母一般消失，如“去”声母[h-]，“参”声母[s-]；上声字一律带上喉塞音[-ʔ]，如“感”kamʔ、“仰”ŋiaŋʔ等。(9)连读变调，变音严重，一般都有规律。(10)有文白异读，文白读往往自成语音系统。

闽方言的词汇有不少特色，主要是：(1)单音节词比较多。(2)保存古汉语词汇比较多。如“厝”(房屋)、“箸”(筷子)、“惊”(害怕)、“拍”(打)等。(3)有些词素次序与普通话颠倒。如“康健”(健康)、“鞋拖”(拖鞋)、“风台”(台风)、“菜蔬”(蔬菜)等。

(4)有一些外来词,厦门话外来词更多一些。外来词主要借自马来语、印尼语和英语。如“洞葛”(手杖,马来语 tongkat)、“巴刹”(市场,印尼语 pasar)、“雪文”(肥皂,印尼语 saboen)、“滥斧”(大盏洋灯,英语 lampu)等。(5)有一批比较特殊的词。如“靛”(冷)、“菜头”(萝卜)、“公亲”(调停者)、“细腻”(小心、客气)、“知影”(知道、了解)、“目珠”(眼睛)、“手腕”(袖子)、“淡薄”(少量)等。闽方言语法也有一些特别的地方,以厦门话为例,如“大扇门”(一扇大的门)、“即粒卵真大粒”(这个蛋很大)、“我有看”(我看过了)、“伊无读”(他没有读过)、“伊较悬我”(他比我高)、“书将它收收起来”(把书收起来)、“我来去读册”(我上学去)、“你有看戏阿无?”(你有没有看戏?)等。

6. 客赣方言。客赣方言一般人称为客家话和江西话,以梅县话和南昌话为代表。它分布在江西的大部分地区,广东东部、北部,福建西部、北部,以及湖北、广西、台湾、湖南、四川的一些地区,海外华侨也有说客赣方言的。使用人口近六千万,占汉族人口总数百分之六点四左右。客赣方言内部的分歧比闽方言小一些,有些地方客赣彼此勉强可以通话。

客赣方言的语音特点是:(1)古浊音声母今读送气清音。如“平、病”读[pʰ-]声母,“大、道”读[tʰ-]声母。这是最主要的特点。(2)没有[tɕ-]、[tɕʰ-]、[ɕ-]声母。(3)韵尾有的保留[-p]、[-t]、[-k],有的[-m]、[-n]、[-ŋ]和[-p]、[-t]、[-k]齐全,有的有[-n]、[-ŋ],[-t]、[-k],有的只有[-ŋ]、[-ʔ],有的连[-ʔ]也没有了。(4)声调一般六个,也有五个或七个的。

客赣方言的基本词汇多数和普通话相同或相近,只是读音上的不同。客赣方言内部有不少彼此相同或相近的词汇,如“上昼”(上午)、“当昼”(中午)、“断夜、断暗”(傍晚)、“禾”

(稻子)、“番薯”(甘薯)、“佢”(他)、“佢个”(他的)、“几多”(多少)、“几久”(多久)等。客家话词汇受闽、粤方言影响较大。江西话词汇受吴方言和湘方言影响较大。在语法方面，江西话和普通话的差别很小，比较特殊的如“坐到话事”(坐着谈话)、“拿一本书到我”(拿一本书给我)、“好好子走”(好好地走)等。客家话与普通话的语法差别稍大一些，如“食多点”(多吃一点儿)、“讲少两句话”(少说两句话)、“佢分一块钱厝”，(他给我一块钱)、“你比佢过肥”(你比他胖)等。

按照方言层次的分析，汉语六大方言各自都可以分成若干次方言。比如北方方言可以分成北方话、西北话、西南话、下江话。有的人把皖南徽州话划作北方方言的一种独立的次方言，也有人把徽州话看成是与吴方言有密切关系的次方言。闽方言可以分成闽南话、闽东话、闽北话、闽中话和莆仙话。客赣方言可以分成客家话和江西话。

次方言下面还可以分成若干土语。比如闽南话又可以分成厦门话(包括泉州、漳州、台湾等地的闽南话)、潮汕话、海南话和浙南话等。闽东话又可以分成福州话、福安话、福鼎话等。

(陈章太)

46 什么是方言间的语音对应规律?

方言是同一语言在不同地域由于演变分化而形成的变体。比方我们的现代汉语方言,如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闽方言、粤方言和客家方言等,都是从古代汉语发展演变而逐渐形成的,因而它们都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地方变体或地域分支。许多方音由于都是从同一种语言发展而来,它们之间总有一定的关系,这种关系叫语音对应。研究语音对应得出的规律就叫语音对应规律。

在汉语里,普通话和方言、方言和方言之间的语音对应规律表现在声、韵、调等各方面。下面先举例说明声母的对应规律:

	杯	北	拼	品	盘	排	伴	败	白
普通话	ɕpei	ɕpei	ɕp'in	ɕp'in	ɕp'an	ɕp'ai	pan ²	pai ²	ɕpai
汉口话	ɕpei	ɕpɿ	ɕp'in	ɕp'in	ɕp'an	ɕp'ai	pan ²	pai ²	ɕpɿ
上海话	ɕpE	poʔ ₂	ɕp'ij	p'ij ²	bɤ ²	ba ²	bɤ ²	ba ²	baʔ ₂
温州话	ɕpai	pai ₂	ɕp'en	ɕpen	ɕbɤ	ɕba	ɕbɤ	ba ²	ba ₂

从上列例字的读音可以看出:普通话和汉口话里双唇清塞音声母只有[p]、[p']两个,而上海话和温州话里除有[p]、[p']外,还有一个双唇浊塞音声母[b]。换言之,上海话和温

州话里的[b]声母，在普通话和汉口话里不是[p]就是[p']。语音对应的条件是：上海话和温州话里念平声的[b]声母字，在普通话和汉口话里都念成[p']，其他声调的[b]声母字，在普通话和汉口话里都念[p]。这就是普通话、汉口话和上海话、温州话在声母方面的一条对应规律。上列例字的标调，有一点要说明：上海话（指市区，下同）的调类已趋简化，阴上和阴去不分，阳平、阳上、阳去不分，由于汉语方言里去声这个调类比较最稳定，就把上海话里来源于阴上的字的调号标在阴去的位置上，把来源于阳平和阳上的字的调号标在阳去的位置上。

底下举例说明韵母的对应规律：

	斤	侵	心	巾	亲	新	精	清	星
普通话	ɕtɕin	ɕtɕ'in	ɕɕin	ɕtɕin	ɕtɕ'in	ɕɕin	ɕtɕin	ɕtɕ'in	ɕɕin
扬州话	ɕtɕi	ɕtɕ'i	ɕɕi	ɕtɕi	ɕtɕ'i	ɕɕi	ɕtɕi	ɕtɕ'i	ɕɕi
苏州话	ɕtɕin	ɕts'in	ɕsin	ɕtɕin	ɕts'in	ɕsin	ɕtsin	ɕts'in	ɕsin
广州话	ɕkan	ɕts'am	ɕfam	ɕkan	ɕtɕ'an	ɕfan	ɕtɕin	ɕtɕ'in	ɕin

从上面的例字可以看出：普通话[in]、[iŋ]二韵，扬州话里为一个鼻化韵，苏州话里合并为in韵，广州话里则为[am]、[an]、[iŋ]三韵；就韵尾看，普通话[in]、[iŋ]二韵有[n]、[ŋ]两个鼻音韵尾，这两个韵尾在扬州话的i韵里已经弱化、不独立存在了，在苏州话里合并为一个前鼻音韵尾[n]，在广州话里则为[m]、[n]、[ŋ]三个鼻音韵尾，还保存着中古时代汉语鼻音韵尾的面貌。普通话[in]、[iŋ]二韵及其韵尾[n]、[ŋ]，和扬州话、苏州话、广州话相比，其间的分合异合是很清楚的。

再从几个例字说明声调的对应规律：

	诗	时	史	是	试	事	湿	十
普通话	ˊsɿ	ˊsɿ	ˊsɿ	sɿ˥	sɿ˥	sɿ˥	sɿ˥	ˊsɿ
上海话	ˊsɿ	zɿ˥	sɿ˥	zɿ˥	sɿ˥	zɿ˥	sə˥?	zə˥?
梅县话	ˊsɿ	ˊsɿ	ˊsɿ	ˊsɿ	sɿ˥	sɿ˥	səp˥	səp˥
苏州话	ˊsu	ˊzu	ˊsɿ	zɿ˥	su˥	zɿ˥	sɿ˥?	zɿ˥?
温州话	ˊsɿ	ˊzɿ	ˊsɿ	ˊzɿ	sɿ˥	zɿ˥	sai˥	zai˥

上面八个字的调类，普通话是四个，上海话、梅县话、苏州话和温州话分别是五个、六个、七个和八个。有没有规律呢？有。古代的平上去入四声，在现代各地方言里按照声母的清浊分化演变。温州话四声各分阴阳，很是整齐，为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阳入八个调类。苏州话阳上和阳去已经合并，其他调类仍各分阴阳，所以是阴平、阳平、阴上、阴去、阳去、阴入、阳入七个调类。梅县话平、入各分阴阳，上、去不分阴阳，所以是阴平、阳平、上声、去声、阴入、阳入六个调类。上海话阳平、阳上、阳去不分，阴上和阴去也不分，入声仍分阴阳，所以是平声、阴去、阳去、阴入、阳入五个调类。普通话平分阴阳，上、去不分，入声消失，所以是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调类。还有少数方言（如河北滦县）调类有少到平、上、去三个的，那就是因为平、上、去三声不分阴阳、入声又消失了的缘故。只要弄清楚本方言的调类，和其他方言进行平面的比较，对应规律也是很清楚的。比如比较苏州话、温州话和普通话的平声，这三处方言的平声都各分阴阳，对应关系很清楚，苏州话和温州话的阴平、阳平彼此相当，是一一对一的关系。苏州话和温州话的阴平、阳平，在普通话里也都是阴平、阳平，但不能说是一一对一的关系，因为普通话的阴平、阳平，不全是古平声字，有一部分字来自古入声。不过苏州话和温州

话都保存入声，读法与平声迥然有别，只要剔除普通话阴平、阳平中的古入声字，剩下的阴平字和阳平字就彼此相当了。

上面所举声、韵、调对应规律的例子，可以帮助我们具体地了解语音对应规律到底是怎么回事，说明现代汉语的方言和普通话一样，因为都是从古代汉语演变下来，所以彼此之间关系很密切，存在着对应关系，比较它们的异同，就能得出语音对应规律来。了解了方言间的语音对应规律，对于进一步了解汉语语音的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对于文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和汉语规范化，无疑都是有帮助的。

（许宝华）

47

方言研究有什么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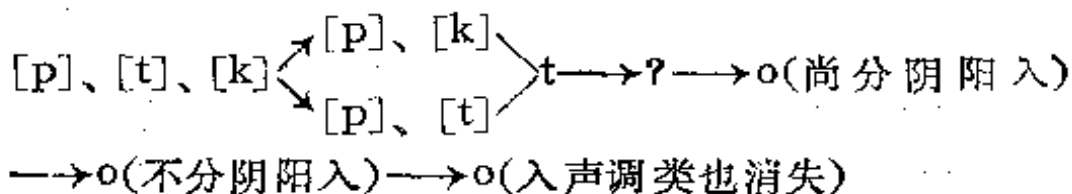
方言研究有什么用？

首先，方言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古代汉语的历史面貌和演变过程。比如古代汉语有入声，现代汉语普通话里没有入声，研究现代方言里入声的情况就可以了解入声逐步发展以至消失的过程。看下列古入声字在现代方言里的读音：

	拾	实	识	立	栗	力	急	吉	极
广州话	ʃap ₂	ʃat ₂	ʃɪk ₂	lap ₂	lœt ₂	lɪk ₂	kap ₂	kat ₂	kɪk ₂
潮州话	sip ₂	sik ₂	sek ₂	lip ₂	lak ₂	lak ₂	kip ₂	kik ₂	kek ₂
梅县话	səp ₂	sət ₂	sət ₂	lip ₂	lit ₂	lit ₂	kip ₂	kit ₂	k'it ₂
南昌话	sət ₂	sət ₂	sət ₂	lit ₂	lit ₂	lit ₂	tɕit ₂	tɕit ₂	tɕ'it ₂
上海话	zəʔ ₂	zəʔ ₂	səʔ ₂	liʔ ₂	liʔ ₂	liʔ ₂	tɕiʔ ₂	tɕiʔ ₂	dʒiʔ ₂
温州话	zai ₂	zai ₂	sei ₂	li ₂	li ₂	lei ₂	tɕiai ₂	tɕiai ₂	dʒiai ₂
长沙话	ʃɿ ₂	ʃɿ ₂	ʃɿ ₂	ni ₂	ni ₂	ni ₂	tɕɿ ₂	tɕɿ ₂	tɕɿ ₂
西安话	ɕʃɿ ₂	ɕʃɿ ₂	ɕʃɿ ₂	ɕli ₂	ɕli ₂	ɕli ₂	ɕtɕɿ ₂	ɕtɕɿ ₂	ɕtɕɿ ₂
汉口话	ɕʃɿ ₂	ɕʃɿ ₂	ɕʃɿ ₂	ɕni ₂	ɕni ₂	ɕni ₂	ɕtɕɿ ₂	ɕtɕɿ ₂	ɕtɕɿ ₂

从上列例字的读音，可以看出广州话不但有入声，而且完整地保留了古代[p]、[t]、[k]三个辅音韵尾；潮州话和梅县话

都保留了两个入声韵尾，但前者是[p]、[k]，后者是[p]、[t]；南昌话进一步简化，古入声三个辅音韵尾合并为一个[t]了；上海话入声已没有[p]、[t]、[k]，但还有表示紧喉作用的喉塞音[ʔ]；温州话的入声已没有辅音韵尾，但保留了阴阳入的区别；长沙话连阴阳入的区别也没有了；西安话和汉口话入声已经消失，只是西安话基本上还按声母的清浊分归阴阳平，而汉口话则不论清浊都把入声字读为阳平了。古入声字在现代方言里的演变还有其他种种情形，但只就上列九个例字在九个方言里的读音，就可以看到下面这样的古代入声及其韵尾逐步简化以至消失的演变过程：



诸如此类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说明方言研究对于研究古汉语和汉语史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其次，方言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构成及其特点。比如普通话在词汇方面有双音节词占极大多数这个特点，我们研究现代方言，并与古代文献相参证，就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普通话词汇的这个特点。古代文献的语言表明古汉语里双音词比较少，在一些保留古汉语词汇比较多的方言里，双音节词也明显地比普通话少。比如普通话的“兔子”、“鸭子”、“蹄子”、“翅膀”、“尾巴”、“米汤”、“相片”、“儿子”、“倒霉”、“模糊”这些词，在广州、阳江、厦门、潮州、福州等方言里分别为“兔”、“鸭”、“蹄”、“翼”、“尾”、“饮”、“相”、“仔”、“衰”、“濛”或“雾”。至于普通话反映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大量新词几乎都是双音节和三音节以

上的复音词,并且在方言区被广泛地使用(只是语音形式不尽相同)这一点,更清楚地表明双音节化是现代汉语普通话词汇发展的一种基本趋势。方言和共同语都是从古汉语发展下来的,二者的研究是密切关联、互相促进的。

第三,方言研究有助于贯彻党的文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和汉语规范化等语文政策。以推广普通话来说,要是能结合方言特点来学习和教学普通话,就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上海话里 in 和 ing 不分, z、c、s 和 zh、ch、sh 也不分,这是上海人学习普通话的两个难点。要是能针对这两个难点进行教学,效果就会好得多。推广普通话重点在语音,但词汇和语法也不能不加以注意。比如扬州话里“把”和“被”往往分不清楚,会把“解放前工人被资本家剥削”说成“解放前工人把资本家剥削”,造成表达上明显的错误。文字改革和汉语规范化问题也处处和方言区人的语文实践密切联系,只有深入调查研究方言区人使用语言文字的情况,才能从实际出发,科学地提出并解决问题。

第四,方言研究对于文献学、考古学、民俗学、民族史、文化史等学科的研究也能提供一定的帮助。比如梅县等地的客家话不同于它周围的方言,研究其方言特点,有助于研究客家人的历史和人文情况。又如古文字学和方言研究二者似乎无甚关系,但事实上方言研究有助于古文字的考释^①。

从上面所说的并不完备的道理,我们可以看出方言研究很有价值,方言学是一门不可缺少的学科,学习和研究它都是很有必要的。

(许宝华)

① 参看朱德熙:《鬻簠屈簠解》,载《方言》季刊一九七九年第四期。

48

什么是文白异读？

文白异读是指汉语方言中一些字有文白两种读音的现象。文读，又叫“读书音”、“文言音”或“字音”，是读书识字时用的语音。白读，又叫“说话音”、“白话音”或“话音”，是平时说话时用的语音。

从历史上看，文白异读是北方话逐渐渗入南方方言的结果。与普通话相近的北方方言的文白异读比较少，与普通话差别较大的南方各方言的文白异读比较多。例如厦门方言里，文白异读的差别比较大。罗常培先生说：“厦门的字音跟话音几乎各成一个系统，所以本地人发音时特别要声明‘孔子白’怎么读，‘解说’怎么读。”^①

汉语方言中的文白异读有一个共同点：文读一般比较接近普通话，白读与普通话差别较大。例如上海话：（表见下页）

又如福建仙游方言，“马、帽、买、磨”等字，文读声母为 m，白读声母为 b；“带、赖、盖”等字，文读韵母为 ai，白读韵母为 uo。这些都说明，文读是普通话对方言发生影响的结果。

文白异读与词汇来源也有一些关系。文读一般用于比较接近文言的词汇中，例如潮州话“知县”一词中的“知”就一定

^① 罗常培《厦门音系》，科学出版社，第 41 页。

例 字	文 读	白 读
蚊	vəŋ ²	məŋ ²
人	zəŋ ²	n.ɿŋ ²
花	ɕhua	ɕho
虾	ɕɕia	ɕho
骂	ma ³	mo ³
生	ɕsəŋ	ɕsā

是文读，而在比较接近口语的“知道”一词中“知”就一定是白读。上海话“大衣”的“大”念[da]（文读），“大人”（家中长者）的“大”念[du]（白读）；“国家”的“家”念[tɕia]（文读），“张家、李家”的“家”念[ka]（白读），念乱了不行。同一个字，在新词中用文读，在老词中用白读，例如仙游话中的“堂”字，在“礼堂”、“课堂”、“食堂”中用文读，读为[ɕtɕŋ]；在“祠堂”“小堂”（丈夫之弟）中用白读，读为[ɕtŋ]。从普通话里吸收来的词用文读，原来的方言土语用白读，例如仙游话的“青年”用文读，“后生仔”用白读；“年纪”用文读，“岁头”用白读。各地方言对科学术语、专有名词，对四字格成语、格言等固定词组，一般用文读。

文白异读有时也因人而异，读书音的使用频率在不同的人群中情况不一样，一般地说，青年人比老年人更多地使用读书音，文化高的人比文化低的人更多地使用读书音，会说普通话的人比不会说普通话的人更多地使用读书音。

另外，文白异读与语言环境也有关系，一般说，在人多的严肃场合，如讲课、作报告或朗读时，多用读书音；在家庭中、在日常生活交际中，多用白话音。

与普通话接近的北方方言中也有文白异读的现象，不过

远没有南方各方言中的文白异读现象那么多。例如在北京话中,也有少量的字有文白异读。例如:

例 字	文 读	白 读
耕、更	ɕkəŋ	ɕtɕiŋ
乱	luan ^o	lan ^o
谁	ɕʂuei	ɕsei

对北京话中有文白异读的字,在进行语音规范化时,一般选择文读作为普通话的标准读音。

文白异读专指同一个字有文白两种不同读音,不是指那些来历不同、意义不同一字两读或数读的字。例如,“传”,在“传记”、“自传”中读 zhuàn,在“宣传”、“传达”中读 chuán;“调”,在“调整”、“调和”中读 tiáo,在“调查”、“调动”中读 diào;数,在“数目”、“数量”中读 shù,在“数不清”“数数目”中当动词用时读 shǔ;在“频数”、“数脉”中作“屡次”、“频繁”之意解时,读 shuò;作“密”(“疏”的反义词)解时,读为 cù。这种一字两读或多读的现象,并不属于文白异读的范围。

(严 修)

口语和书面语是语言的两种不同的存在形式。口语是人们平常讲话所运用的语言，是说的语言和听的语言；书面语是人们做文章所运用的语言，是写的语言和看的语言。

口语和书面语相比，口语的历史要悠久得多，应用也广泛得多。它与人类社会的产生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阶层。书面语是在口语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在文字产生以后才出现的。没有书面语的民族至今还很多，但是没有口语的民族却是不存在的。就是有书面语的民族，它的应用范围也只限于识字阶层。所以说，口语是第一性的，书面语是第二性的。

口语是靠声音来传播的，它势必要受到时间上和空间上的限制。在科学不发达的时代，这种限制是无法克服的；就是在科学高度发展的今天，这种限制也还不能完全消除。书面语可以克服口语的不足，把人们的思想记录下来，“传于异地，留于异时”。这样一来，人们的知识和经验便能够更好地保存下来，传播开去。这对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的发展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口语和书面语虽然是同一种语言的两种存在形式，但是

由于两者交际环境不同，物质条件有别，它们的表现方式必然是各有特色，表达效果也必然是各有千秋。

在口语交际中，说话人和听说人处于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当中，说话人可以随时根据对方的反应来调整自己的语言，听话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对方作出必要的解释。讲话时往往没有多少思考的余地，常常是想到哪里讲到哪里，这就使得口语在表现形式上具有这样的一些特点：长句少短句多，整句少散句多，完全句少不完全句多，连贯性小罗唆重复多。总的说来是起伏大，变化多。

在书面语交际中，交际的双方不再处于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当中，他们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了，交际活动往往由一方在一时一地单独进行，再由另一方在异时异地继续下去。这就要求笔者把事情交代得完整些，把话讲得更清楚些。在写的过程中，笔者有足够的时间来反复推敲，可以也必须把文章写得更精炼些。这样，书面语在表现形式上往往是短句少长句多，省略句少完全句多，偶发词少连贯性强。

口语和书面语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一方面，书面语必须以口语为源泉，不断吸收口语中新鲜的成分；另一方面，书面语又可以影响口语，促进口语的规范化。我们应当注意口语和书面语的这种联系，既不要把书面语和口语割裂开来，也不要把它们等同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强调书面语和口语的联系，决不意味着降低书面语的标准。恰恰相反，书面语水平只有不断提高，才能满足现代社会飞速发展的需要。因此，我们在提倡加强口语训练的同时，仍要进一步加强书面语的训练。不仅脱离口语的书面语、与口语相对立的书面语是没有前途的，而且，与口

语完全等同的书面语也是不好的,不利于民族文化的发展的。就我国目前的语文水平来看,提高书面语表达能力仍然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还需要广大语文工作者和全体人民继续努力。

(王希杰)

文学语言也叫做标准语，指的是规范的共同语。

文学语言这个名称是由俄语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язык, 英语 literary language, 法语 langue littere 翻译过来的。它指的是加过工的书面语。因此，各种文学作品，电影、话剧、广播、科学、教育、政府机关所用的语言都属于文学语言。

文学语言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民族形成之前，文学语言主要是指在书写文牋、文学作品、宗教文件和科学论著中使用的书面语言，也包括人民群众诗歌创作的语言；民族形成之后，文学语言即为民族共同语的加工形式，在口头上和书面上都为民族文化生活和社会活动一切方面服务。

文学语言根据语言发展的规律，对全民的语言材料进行一番选择，吸取其中最合乎语言发展规律的而又有发展前途的成分，并且用文字加以巩固。因此，文学语言具有精炼的特点。

我国古代的书面语是“文言”。经过规范的“文言”就是古代汉语的文学语言。它是古代在一种方言基础上形成的书面语言和人民大众诗歌创作的语言。在汉代前是以黄河流域的语言作为基础的。“五四”运动时期，汉民族现代共同语也已

形成了。现代汉语的文学语言是以普通话为语言规范的书面语。它的语音、词汇、语法都必须符合普通话的语言规范。它继承了有用的文言成分，吸取了一些有用的方言成分和外来成分。文学语言以口语为基础，不断地以口语作为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源泉，同时给口语以极大的影响，使口语更加完善地发展。

文学语言还可以借用。在历史上某个时期没有自己的文字的民族，可以借用他民族的文学语言。

(彭嘉强)

51

什么是元音?什么是辅音?

元音也叫母音,辅音也叫子音,它们是人类语言最小的单位——音素的分类。

划分元音和辅音主要是根据它们以下三方面的区别:

1. 发元音时,气流由肺中呼出,通过声门冲击声带,使它发出均衡的震动,然后震音气流自由地通过口腔、鼻腔,不受任何发音器官的阻碍,而仅仅是受到发音器官,如舌、唇等调节而发出不同的元音来。例如舌头后缩,舌尖下垂,舌后部隆起,口微开,嘴唇收拢,略呈圆型,软腭上升关闭鼻腔通道,就会发出元音素“O”来;舌头前伸,舌的前部隆起,口腔开度很小,嘴唇成扁形,软腭上升关闭鼻腔通道,就会发出元音素“i”来。发元音时声带震动,叫做浊音。元音都是浊音。

发辅音时,气流由肺中呼出后,不是自由地通过口腔、鼻腔,总是程度不同地受到发音器官,如唇、齿、舌、咽喉的阻碍,而发出不同的辅音来。例如,口微开,舌尖抵住上齿龈,阻住气流,然后突然放开,气流爆发而出,但冲出的气流较弱,就发出辅音素“d”来。发这个音时声带不震动是清辅音;声带震动是浊辅音。跟发“d”音大体上一样,只是阻碍开放后,声带不震动,冲出一股较强的气流,就发出清辅音素“t”来。发清辅音

“d”和“t”，气流受阻的部位相同，但程度不同。舌头靠近上齿背，构成窄缝，气流摩擦（受阻）而出，声带不震动，就发出辅音素“s”来。发清辅音素“t”和“s”，气流受阻的部位不同，程度也不同。

2. 发元音时，除声带外，发音器官的各个部位保持均衡的紧张状态，如发元音“u”。发辅音时，只有形成阻碍的那一部分发音器官特别紧张，如发辅音“w”时，由于口型比发“u”时小，造成阻碍而略微震动，只有嘴唇特别紧张。

3. 发元音时，呼出口腔外的气流一般不如发辅音时那么急促。因为发元音时声带震动，因而减低了气流呼出时的速度。发辅音时不管声带是否震动都比较轻微，而且受阻后呼出的气流象受阻后奔泻的河水一样比原来更加急促。

人类所有的声音不外乎元音（也有半元音）和辅音两类。弄清什么是元音，什么是辅音，并且正确地掌握它们发音的部位和方法，在语言学研究上和外语学习上，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刘建设）

52 什么是音位?

人类的发音器官非常灵巧,能发出数以百千计的音素。但是即便在一种语言中,也并不是所有的音素都有辨别意义的作用,用来辨义的音素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比如 *n* 和 *l* 这两个辅音音素,在北京话里有辨义作用,分别很清楚,女客≠旅客,男制服≠蓝制服;而在南京话里,*n*、*l* 不分,“女客”和“旅客”、“男制服”和“蓝制服”,听起来一样,都念成了 *l* 声母。重庆话也 *n*、*l* 不分,但情形又跟南京话不同,把该念 *l* 声母的字都念成了 *n* 声母。又如 *[p]*、*[p']*、*[b]* 三个音素,在现代汉语普通话跟在现代俄语中的辨义作用并不相同。普通话中“霸”*[pa]* 这个词里的 *[p]*,决不可念成送气音 *[p']*,因为要是那样念,就成了另外一个词“怕”*[p'a]* 了,但是我们把它念成浊音 *[b]*,把“霸”念成 *[ba]*,虽然不那么标准,却不至于引起词义上的误解。而在现代俄语中却正相反,*[p]* 可以念成 *[p']*,但决不可以念成 *[b]*,例如不能把“棍儿”*палка* *[palka]* 中的 *[p]* 念成 *[b]*,因为要是那样念,就成了另外一个词“洼地”*балка* *[balka]* 了,但是把 *палка* 中的 *[p]* 念成 *[p']* 却不会引起词义上的误解。

类似上面的例子不胜枚举,说明我们研究语音,光是根据

物理学和生理学的观点，不能说明相同的音素何以在不同的语言(或方言，下同)中具有不同的作用。语音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所表示的意义是社会赋予的，不同语言的语音现象不会完全相同。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某个民族的语言的语音，把那些能够跟别的声音在区别意义上有所不同的声音单位归纳出来，就得到了音位。国际语音学协会曾经给音位下的定义是：“某个语言里不加分别的一族相关的声音叫一个音位。”我们把某个语言中能够区别词汇意义或语法意义的一组有关的声音的最简单的语音单位称做这个语言的音位。通俗些说，音位就是能够区别意义的最小的语音单位。比方普通话里“大”[ta]、“地”[ti]、“度”[tu]这三个词开头的辅音一样，意义的不同靠元音[a]、[i]、[u]来区别；[a]、[i]、[u]就是普通话里三个不同的音位。某些音在一种语言里是区别意义的两个音位，在另一种语言里可能只是一个音位。比如前面谈到的n、l，在普通话里是两个音位，在南昌话、重庆话里是一个音位；[p]和[p']在汉语里是两个音位，在俄语、英语里只是一个音位。

语音中的一个音位，由于它在词里所处的位置不同，或与前后音位的组合关系不同，发音时会出现一些不尽相同的音，这种不同的音称为某一音位的音品。一个音位可以有几个以至十几个、几十个音品，所以一个音位实际上是一个包含多个音素的语音类型。比如普通话里的[a]音位，在“掰”[pai]这个词里，发音时舌位偏前，是个[a]；在“搭”[ta]这个词里，发音时舌位偏央，是个[A]；在“高”[kau]这个词里，发音时舌位偏后，是个[u]；在“颠”[dian]、“天”[t'ian]等词里，发音时舌位偏前偏高，是个[æ]或[e]；这样，[a]音位就有[a]、[A]、

[a]、[æ]、[e]、等音品。

归纳音位的方法，最主要的看它是否“对立”：对立的，是两个音位；不对立的，则是一个音位。比如上面所说普通话里“大”、“地”、“度”等词里的[a]、[i]、[u]是三个音位，就是因为它们“对立”；“掰”、“搭”、“高”、“颠”、“天”等词里的[a]所以说是一个音位，就是因为它们“不对立”。但归纳音位的这个“对立原则”并不是万能的。比如普通话的两个辅音[m]和[n]，一个只出现在音节的开头，一个只出现在音节的末尾，二者决不“对立”，然而我们不能把它们归纳为一个音位。我们不能离开具体语言的具体语音及其历史发展，来谈一种语言里的音位成分。

我国传统音韵学中虽然没有“音位”这样的名称，但朴素的音位观念可以说是古已有之的。比如十五世纪初明朝兰茂编撰的《韵略易通》，就用《早梅诗》二十字来表示当时北方话的声母系统。《早梅诗》二十字及其所代表的声母的音值是：

东 风 破 早 梅	向 暖 一 枝 开
[t] [f] [p'] [ts] [m]	[x] [n] [O] [tʃ] [k']
冰 雪 无 人 见	春 从 天 上 来
[p] [s] [v] [r] [k]	[tʃ'] [ts'] [t'] [ʃ] [l]

显然，能够从数以千计的音节和几万个汉字中归纳出当时北方话语音中能够区别意义的二十个声母，并且选用《早梅诗》中的二十个字来表示，这不能不说是音位观念的一种具体运用。语音学是不断发展的，今天我们对于音位的理解要比古人明晰、深刻得多，因此就有条件把任何一种语言的语音研究得更深入细致。

（许宝华）

53 什么是音节?

音节，也叫音缀或音段。它是由语音的最小单位——音素构成的，是我们听感到的语音的自然片断，也可以说是语音的自然单位。一个音节可以由一个音素构成，也可以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音素结合而成。例如，现代汉语里的“a”(啊)是一个音素独立成音节；“ya”(呀)是由两个音素结合而成一个音节；“yao”(腰)包含有三个音素；“jiao”(交)却由四个音素构成一个音节。

什么是音节？学者们的意见也并不一致。这里，简要地介绍几个有代表性的学说。

1. 元音说

这是古代希腊人最早提出来的。他们最早给音节下的定义是：“音节是由一个元音或一个元音和几个辅音联合构成的语音单位。”古代印度学者说：“有多少个元音就有多少个音节。”在他们看来，音节主要是由元音构成的。但是实际语言中，有的音节根本没有元音。例如，汉语上海方言的“玉”[ŋ]、“姆妈”[mma]中的[m]等都没有元音，却都是一个音节。还有些语言里词的音节数目和元音的数目也不一致。如英语“film”(胶卷)，只有一个元音，却是两个音节；汉语普通话里

“jiao”(交、教、叫)包含三个元音，却是一个音节。可见，单凭元音的有无或多少来定音节是不够精确的。

2. 呼气说

十九世纪奥地利语音学家斯托尔姆(J. Storm)主张呼气说。他说：“音节是一组用一次呼气发出来的声音，所以我们说话的时候用多少次呼气就有多少个音节。呼气力最弱的地方就是音节的分界线。”^①认为用一次呼气发出来的语音单位，就是一个音节。例如[papa]，其中[a]的呼气力最强，是音节的中心，[p]呼气力最弱，是音节的分界线。在我们的实际语言里，由于客观表达的需要，有的音节可由一次呼气发出来的。如汉语“a”(啊)、“i”(衣)呼气中间有停顿，是两个音节；若呼气中间没有停顿，读作“ai”(唉)就是一个音节。可是我们平常讲话，在一般情况下谁也不会发一个音就呼出一口气，常常是一口气连续发出一连串的几个音节或一口气说出一句话、一段话才停息。因此，呼气说同样不能科学地反映音节的性质特征。

3. 响度说

这是丹麦语音学家叶斯柏逊等提出来的。他按声音的响度把所有的音素分为八级，其中响度最高的就是音节的中心，响度最低的就是音节的分界线。这种主张划分音节着眼于音响特征，有它一定的科学根据。一般地说，元音都是振动声带形成的乐音化的，比之辅音发音响度大，而元音当中开口度大的低元音又比高元音响亮。如[papa]，其中[a]响度大，两个[a]是两个响度高峰，所以是两个音节。但实际上，各种语言语音结合规律、特点不同，有时几个音素结合在一起，

^① 《英语语文学》，第9页。

只有一个响峰,却不一定就是一个音节,可能是几个音节。如汉语普通话里的[uaɪ]三个音素,只有[a]响度大,它可以是一个音节“歪”,也可能是两个音节“五爱”。又如:阿姨[ai],两个音素,只有一个响峰,却是两个音节。同样,单凭响度大小,也不能作为确定音节的唯一标准。

4. 紧张度说

这是法国语音学家格拉蒙(M. Grammot)和苏联的谢尔巴(Л. В. Щерба)提出来的。他们根据发音时肌肉紧张程度的变化来划分音节,每次肌肉紧张程度由增而减就构成一个音节。认为紧张度最强的是音节的中心,音节的分界线在肌肉强度减弱的地方。从发音的生理特征观察,一般发音都可以有三个阶段:发音器官肌肉紧张的开始(成阻)→紧张的持续(持阻)→肌肉舒缓(除阻)。在这三个阶段发音器官的活动力不是始终一样的,肌肉紧张的程度和部位也不完全相同。一般发辅音时发音器官的局部肌肉紧张,而发元音时发音器官各部分都均匀地紧张,响度也大。

根据发音时口腔各部分肌肉紧张度的增强或减弱来划定音节的界线,一般比较切实可行。

(杨知文)

54

什么叫语流音变？

我们说话总是一连串的声音组合起来表达一定的意义内容的。人们在连续发音中，为了适应发音器官的活动，邻近音常常因为互相影响而使得某个音发生一些变化。语音学上把这种语音变化现象叫作语流音变或叫联音音变。

语流音变的原因和情况都比较复杂。它跟前后音的性质特征，相互影响和声音形式在词中的地位，轻重音以及说话的速度等都有关系。在各个不同语言里，反映出的形式、特点都不尽相同。一般常见的语流音变有：同化、异化、增音、弱化、脱落、换位等。

1. 同化

同化现象是指两个本来不相同或不相近的音，由于连读互相影响、相互适应，变得相同或者相近似了。例如，现代汉语普通话里“nán mén”（南门）在实际语流中读作 nán mén，前面音节的鼻尾音“n”，受后一音节声母辅音“m”的影响，为了协调发音器官的动作，变得前后一致了。

语流同化是一般语言中最常见的音变现象。

2. 异化

和同化相反，异化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音，本来是相同

或相近似的,但由于发音拗口,发音器官反复动作不方便,为避免重复而变成不相同或不相近似了。

汉语普通话里,最为突出的异化现象,表现在声调异化上。当两个上声音节连读时,第一个上声音节发生异化读为近于阳平。例如“粉笔”fěnbǐ,第一个上声音节的 fěn 变读为近乎阳平的 fén。“领导”lǐngdǎo 变读为 língdǎo。

3. 增音

增音是在一连串音素结合中,由于音素的相互影响或其他原因而增加了某些音素的现象。

俄语硬辅音 бв、м、п 等和软辅音结合时,经常增加一个软辅音 л,如“爱”Любимь→Люблю。

现代汉语里的语气词“啊”a 由于受前边音节韵尾的影响而增加音素,可变读为 ya、wa、na、ŋa 等。

4. 弱化

指某些音节在语流中音量的减弱。本来某些音节音量较强,在语流中产生了弱化的现象。如汉语普通话中,某些音节读轻音,常常使得其中某元音弱化以致变得模糊不清了。如:“miánhua”(棉花)弱化读为[mianxuə];“mùtou”(木头)弱化读作[mut'ə],韵母部分原为二合元音弱化变为模糊的单元音了。

5. 脱落

和增音现象正相反,它是指音素组合在语流中,为发音省力,速度快而丢掉了某一音素。例如,汉语普通话里把“buzhidaó”(不知道)念成[pu—tʂ—tau],辅音[tʂ]脱落了。又如“wǒmen”(我们)常说成[womn]把[mən]中的元音[ə]脱落掉了,“dòufu”(豆腐)说成[touf]丢掉了[u];再如汉语普通

话里因儿化音变也常常有脱落某一音素的现象。如：小孩儿“xiǎoháir”读作“xiǎo—hár”，脱落了“i”。一点儿“yidiǎnr”读作“yī—tiǎr”脱落了“n”。汉语普通话中儿化音变都是有规律的，由于音变而脱落音素的现象也是十分清楚的。

6. 换位

在语流中，有时因习惯不同而变换了两个音素的前后位置。北京方言里，常有人把“言语”[jeny]说成[yeni]，[i]和[y]调换了位置，这种音变现象叫换位。

（杨知文）

汉语是有声调的语言。声调是什么？语音在物理学上分析为音高、音强、音长、音色等特征，刘复通过实验，了解到声调由音高的变化形成，可以称为音高曲线，声调主要跟音高有关，但跟音长、音色也有关系，王力先生《从元音的性质说到中国语的声调》已经谈到了，不过音高是主导方面而已。

我国历史上对声调的认识，大约起于五世纪，相传沈约作《四声谱》（“声”就是声调），还相传王斌作《四声论》，说明那时候已经有了声调的概念。至于汉语里有声调这个事实，至少从上古时期就可以肯定下来。上古时期的汉语声调情况，直到现在还没有弄得很清楚。明清以来的音韵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说“古无四声”，“四声可以并用”，有的说只“有平上入而无去”，有的说“古无上去，惟有平入”。不过，现代的音韵学者差不多都认为上古也是四声，不过上古的四声跟后代的四声不是一对一的关系罢了。到了中古时期，汉语分平声、上声、去声、入声四个声调，那是确定无疑的。当时出现的韵书，就是按音系编排的字典，如《切韵》以四声分卷，第一二卷平声字，第三卷上声字，第四卷去声字，第五卷入声字，而且从当时的韵文跟反切上也表现出来。从此，这种四声的

格局以及何字属于何声就固定了下来。各种韵书、韵表、音韵资料都记载得明明白白。

汉语语音是经常变化和发展的,声调也不例外,但不管怎么变化,原来的四声分类是不变的。这也是关于声调研究的有利条件。我们就可以把四声作为出发点,来看四声在中古以后和汉语方言里是怎样变化的。比如中古的上声字,后来有一部分变同去声,这一部分恰好是属于“全浊”声母的,于是我们就得出“浊上变去”一条规律。又比如中古入声字在现代北方话的一些方言里,变同平声、上声、去声了,于是我们就得出一条“入变三声”或“入声消失”的规律。

中古的四声分类一直保持沿用下来,由中古到近代,也出现过各种分类法,如周德清的五声(平声分二类),范善溱、王鹄分六声(平去声分二类),周昂分七声(平上去声分阴阳),但始终未脱四声的窠臼。

在现代汉语方言里,声调表现出多种多样的类型,河北滦南是三声,北京是四声,扬州是五声,长沙是六声,苏州是七声,温州是八声,广州是九声,博白是十声。这是就调类来说,调值也是千差万别的。我们作方言声调的调查研究,还是以四声的分类作为出发点,或作为一种媒介物,以便于历史比较的研究。

四声中的入声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声调。过去对入声的概念,从文献上和现代某些方言的情形看,它有两方面的特征,一是入声音节的元音是个短的,调值是短的,一是入声音节带有一个“塞而不裂”的辅音韵尾。中古语音就是这样的,现代的广州方言、吴方言、闽方言、客方言也是这种情形。后来通过大规模的方言的普查,发现了北方话区域不少地方的方言

的入声又有新的类型，一种是不带“塞而不裂”的辅音韵尾，只是调值短一些，一种是不仅不带“塞而不裂”的辅音韵尾，而且音节的元音延长，不是短调，只是保持一个独立的调位。这种声调还应该算作入声。于是，我们对汉语入声的认识，又比从前进一步了。这种情况对于音韵学和方言学的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比如关于北方话入声的消失，一向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多数学者认为北方话入声消失，起于元代，周德清《中原音韵》“入派三声”可以证明。少数人却意见不同。认为《中原音韵》“入派三声”是曲韵的需要，所以是“派”，不是“同”。而且同期的《蒙古字韵》及其他的语音资料都反映了语言里有入声。陆志韦先生曾说，直到十七世纪初年，北京话的入声才跟现代语音大同小异，但清入声好象还没有消失。到十七世纪下半叶，《弘觉恣禅师北游录》里说：“北京说话独遗入声韵，盖凡遇入声字眼，皆翻作平上去声耳”，清入声才消失掉，跟平上去没有分别了。这时候，沈德符（1578—1642）《万历野获编》也说：“京师人呼妇人所带冠为‘提地’，盖髻髻二字俱入声，北音无入声，遂讹至此。又呼促织为趋趋，亦入声之讹。”髻字音无考，髻、促、织都是清入声字，也可证当时北音清入声也已消失。王骥德（？—1623）《曲律》也说：“北则入无正音，故派入平上去之三声，且各有所属，不得假借……”也是一个旁证。可是再往上推，就难以找到关于北方话清入声消失的记录了。

（杨耐思）

56 什么是声母? 什么是韵母?

所谓声母,就是音节开头的辅音。所谓韵母,就是除声母以外的部分。例如“现代化”(xian dai hua)三个音节的声母分别是 x、d、h,韵母分别是 ian、ai、ua。

普通话里的声母有二十一个,都是由辅音充当的。它们是:

发音方法 发音部位	塞 音		塞 擦 音		擦 音		鼻音	边音
	清 音		清 音		清音	浊音	浊音	浊音
	不送气	送气	不送气	送气				
双唇音	b[p]	p[p']					m[m]	
唇齿音					f[f]			
舌尖中音	d[t]	t[t']					n[n]	l[l]
舌尖音			z[ts]	c[ts']	s[s]			
舌尖后音			zh[tʂ]	ch[tʂ']	sh[ʂ]	r[ʐ]		
舌面音			j[tɕ]	q[tɕ']	x[ɕ]			
舌根音	g[k]	k[k']			h[x]			

普通话里也有一些音节的开头不是辅音而是元音。例如“安”(an)、“医”(i)等。这就是说,这些音节的声母是“零”,所以称做零声母。

普通话里的韵母有三十九个。由一个元音构成,称单元音韵母;由两个或三个元音构成,称复元音韵母;由一个或两个元音后面带上鼻辅音构成,称带鼻音韵母。三十九个韵母是:

单元音韵母		i[i]	u[u]	ü[y]
	a[a]	ia[ia]	ua[ua]	
	o[o]		uo[uo]	
	e[ɤ]			
	ê[ɛ]	ie[iɛ]		üe[yɛ]
	-i[ɿ]-i[ɪ]			
	er[ɐ]			
复元音韵母	ai[ai]		uai[uai]	
	ei[ei]		uei[uei]	
	ao[au]	iao[iau]		
	ou[ou]	iou[iou]		
带鼻音韵母	an[an]	ian[ian]	uan[uan]	üan[yan]
	en[ən]	in[in]	uen[uən]	ün[yn]
	ang[aŋ]	iang[iaŋ]	uang[uaŋ]	
	eng[əŋ]	ing[iŋ]	ueng[uəŋ]	
	ong[uŋ]	iong[yŋ]		

韵母以元音为主体,没有元音就没有韵母。

韵母只有一个元音或一个元音带一个鼻辅音,这个元音就是韵母的主要成分,称韵腹。所带的鼻辅音称韵尾。韵母是两个元音的合成韵母,则以开口度较大的那个元音为韵腹,韵腹前面的元音称韵头,如 ia, uo, üe 中的 i、u、ü; 韵腹后面的是韵尾,如 ao、ai、ei 的 o、i。韵母是三个元音,或两个元音带一个鼻辅音,则一定是中间一个元音是韵腹,头一个元音 i、u、ü 是韵头,韵腹后面的元音或鼻音是韵尾。

韵头比较简单,只有高元音 i、u、ü 可以充当,而韵尾则复杂些,既可以是元音,也可以是鼻辅音。过去有人把作韵头的 i、u、ü 称做介母,因为它们经常是介乎声母和韵腹之间的。中国过去的语音学家根据韵头把韵母分为四类,称四呼。用今天的观点来说就是:凡不是单元音 i、u、ü,也不带 i、u、ü 韵头的韵母叫开口呼;凡是单元音 i 和以 i 作韵头的韵母都叫齐齿呼;凡是单元音 u 和以 u 为韵头的韵母都叫合口呼;凡是单元音 ü 和以 ü 为韵头的韵母,都叫撮口呼。汉语拼音方案的韵母表,就是按这四呼来排列的。

一些初学语音的人,常常会把声母、韵母和辅音、元音混淆起来。其实,二者并不是同一概念,它们的主要区别是:

1. 角度不同:辅音、元音是就音素本身的性质来说的,声母、韵母是就汉语语音结构的特点来说的。

2. 范围不同:声母是由辅音充当的,但不能说辅音就是声母,因为一部分辅音还可以作韵尾,韵母的主要组成成分是元音,但韵母并不等于元音。韵母中除单元音韵母外,复元音韵母和带鼻音韵母都是几个元音或元音和辅音的组合。可见二者是不同的。

(姚律人)

57

什么是双声、叠韵？

双声、叠韵是汉语音韵学的两个重要术语。所谓双声是指两个字的声母(也叫声纽)相同,这两个字一般都组合成双音词。例如:“仿佛”(fǎngfú),两个字的声母都是“f”。“颠倒”(diān dǎo),两个字的声母都是“d”。所谓叠韵是指两个字的韵部相同,这两个字一般也都组合成双音词。例如:“从容”(cóng róng),两个字同属“ong”韵。“披靡”(pī mǐ),两个字同属“i”韵。这里所说的韵部相同是指韵腹、韵尾相同,韵头不一定相同。例如“荒唐”(huāng táng)是叠韵,两个字的韵腹、韵尾相同,但“荒”字有韵头“u”,“唐”字没有。

双声、叠韵和古汉语的构词法有密切关系。古汉语的双音单纯词大部分是联绵词(也叫联绵字,指由两个音节联缀成义而不能拆开解释的词),而联绵词又大多是用双声、叠韵的方式构成的。例如:

双声的: 蜘蛛 流离(泉鸟) 踌躇 留连 慷慨
参差 含糊 玲珑 坎坷 熠熠

叠韵的: 螳螂 葫芦 昆仑 盘桓 绸缪 因循
逍遥 徘徊 缠绵 蹉跎

双声兼叠韵的: 辗转 辘轳

古汉语中，还有一些经常用在一起的同义词或反义词也往往用双声、叠韵的方式构成。例如：

双声的：亲戚 妻妾 男女 饥馑 踊跃 洒扫
加减 灭明 文武 褒贬 消息
叠韵的：经营 贪婪 寒暖 刚强 旦晚 聪聵
双声兼迭韵的：夫妇 闷懣

双声、叠韵和反切的关系也很密切。反切是传统的一种注音方法，它采取双声、叠韵的方式用两个字拼合成另一个字的音。反切的规律是上字取声，下字取韵和声调。例如“田”字的注音是“徒年切”，就是“徒”和“年”相拼，取“徒”字的声母 *t* 和“年”字的韵母、声调 *án* 而拼成 *tián*“田”的音。可见，反切上字与所切的字声母相同，形成双声，如“徒”和“田”的声母都是 *t*；反切下字与所切的字韵母相同，形成叠韵，如“年”和“田”的韵母都是 *ian*。下边的例子也都是这样：

东，德红切	唐，徒郎切
都，当孤切	送，苏弄切
困，苦闷切	却，去约切

双声、叠韵和训诂也大有关系。训诂就是从字(词)的声音、意义或形体等方面来解释古书中词句的意义的。训诂中取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解释字(词)义的所谓音训，跟双声、叠韵的关系最为密切。音训中有双声为训的。例如：

复，返也。(《尔雅》)
改，更也。更，改也。(《说文解字》)
火，化也。(《释名》)

有叠韵为训的。例如：

坎，陷也。(《易经》)

谷，禄也。（《尔雅》）

天，颠也。（《说文解字》）

双声、叠韵词的表现力很强。诗歌中用上双声叠韵词既可描绘事物的声色形状，还可使节律和谐，增加诗歌的表现力和音乐美。例如《诗经·周南·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这首诗用了“参差”“窈窕”“辗转”等双声、叠韵词。“参差”描绘荇菜的长短不齐，“窈窕”形容“淑女”的美好，给人以生动形象的感受。而且“参差”在诗中出现了三次，“窈窕”出现了四次，从而取得了回环反复的效果，增强了节奏感，充分发挥了语言的声韵节律之美。

（陈天福）

实验语音学，是借助实验仪器研究人从说话到听话的整个过程的科学。

实验语音学是一个新兴的学科，尤其在我国，大约只有二三十年的历史，尚少为人注意；也是一门边缘科学，研究的内容除了涉及语言学理论以外，还涉及生理学、物理声学、心理学、电子学、数学、医学以及新兴的计算机科学等方面的理论和技术。内容越来越丰富，大大越出了传统语音学的范畴。同时，由于实验语音学理论在广播、通讯工程、语音自动控制等方面的应用日益广泛，与各自然学科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于是，久而久之，人们几乎忘了实验语音学的娘家了。实际上，实验语音学是语音学的一个分支，它是从语音的实验研究发展而来的。

最初的语音实验，以人的发音生理为主要研究对象。这方面的实验，多半借助于生理和医疗方面的一些器械，如胸压计、喉头镜、X光机等，测量人发音时声门的气流、声带的动作、声腔的形状和舌头的部位，等等。

到了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实验语音学逐渐发展到以声学实验为主，主要使用物理声学方面常用的示波器、频率分析

计、声级记录仪等仪器，来测量分析语音的波形和频谱，研究语音的物理特性。尤其是动态声谱仪被引进语音分析领域以后，大大促进了实验语音学的发展。因为过去的各类仪器往往只限于个别语音的静态分析，而声谱仪不但可以分析静态的语音，还可以对连续变化着的话语进行动态分析和纪录。这种声谱仪纪录的语图，包含了代表语音四要素信息的所有声学特性——频率、幅度和时间延续。这种图型生动直观，不仅可供定性研究，而且可作定量分析，这就更加提高了语音研究的科学性。

六十年代末以来，电子计算机技术逐渐应用于语音的分析—合成研究。起初，它是作为言语声音的模拟工具，后来，逐渐向发音器官的模拟方面进展，使得成段话语的大量快速分析—合成成为可能。这样一来，就可望解决人的发音和听音机能方面的许多难题。人在发音和听音时的控制和感知机能是生理心理实验的对象，这方面的研究属于心理语言学或神经语言学的范畴。目前，国内外已有越来越多的人涉猎这个领域。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实验语音学的研究领域是相当广阔的，它包括了生理语音学、声学语音学和心理语音学三个主要方面，它们各有自己侧重的研究对象，同时又是彼此密切相关的，实验语音学就是在这几方面研究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过程中向前发展的。

实验语音学与一般的语言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实验语音学的研究应该具备语言学的理论基础，这是不言而喻的；另一方面，实验语音学的进展，又必将促进语音学乃至整个语言学理论的发展。

实验语音学对于语言学的贡献，可以从它的研究对象谈起。作为传统语音学研究和描写对象的语音，一般是指已经发出来的语音；而实验语音学的研究对象，是存在于从说话到听话这整个过程中的言语形式，也就是研究语音在发生、传播一直到被感知过程中的各种形式。这样，就使语音的描写，无论是从发音方面来看，还是从听音方面来看，都有了更加广阔的背景。从这个意义上讲，它进一步开阔了语音学研究的视野。

传统语音学一向被称为“口耳之学”，训练有素的口耳是语音学者的主要武器，而各种实验仪器的使用，又大大延长和加强了口耳的功能，为普通语音学的理论研究提供了现代化的武器。

传统语音学对于一个个的语音进行定性的描写，相当精细。但是，口耳之功毕竟有限，有时有些声韵现象，一时很难用口耳来辨证。譬如对于一些方言的调值、变调和音色的描写常常有争议。要是借助仪器分析，根据实际的生理物理特性，就可以比较容易地作出解释。

语音的实验研究，可以从语音的外部现象看出它们的内在联系，象普通话四声变调规律以及同化、异化作用等复杂的音变现象，通过发音生理和感知心理来解释，不仅可以知其然，而且可以知其所以然。这样，既使传统的研究结论更加“信而有征”，又可以丰富普通语音学理论。

借助仪器分析，我们对语音四要素就可以作出更加精密的定性和定量的描写，对于发音器官的动作和形状的描写也可以更加细致、生动、直观，这对描写语音学和语言教学来说无疑是十分有益的。在国外，利用语图显示器（声谱仪的一种）

对聋人进行发音教学，已成为一种很重要的教学手段。显示器显示的图形称为可见语言，通过一定的装置，可以把教师和学生发的音同时显示出来，以便于比较。因此，这也同样适用于一般语言教学和语音的比较研究。

现代语音实验仪器的迅速发展，不但使语音的静态描写更臻完善，而且可以对连续语言作动态描写。这样，就使语音描写摆脱了单个音素分立描写的局限，使之更加接近于千变万化的语音实际。所以，有了这些仪器，就使复杂的语调研究、语音的历时比较研究和共时比较研究等更加方便。当前，方音和普通话语音的比较研究，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或外语的比较研究，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可以预见，这些课题的解决，必将对普通语言学理论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实验语音学服务的面是非常广泛的。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许多学科对语音研究提出了更加迫切的任务。譬如，通讯系统的高效、保密以及破密技术，特殊条件（高压、低压、高噪声）下通讯的可靠性，都迫切要求我们对语音的特性作出科学的分析。以保密技术为例吧，现代国防通讯往往不是把成段的话语按正常次序通过电话传送，因为这样很容易被窃听而失密；而是把话语拆分成无数个远比音素细小得多的单位，随意打乱次序，然后传送出去，等到了接收端再加以复原，这样，即使在中途被敌方窃听，他们所得的是一堆杂乱无章的东西，无法很快了解通话的内容，这就不致被窃取机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语音的客观特性作出科学的分析，归纳出各要素的基本模式，提出各要素的基本数据，同时还要综合出各种模式组合的基本规律，否则就不能在接收端把杂乱无章的信号复原。相反，咱们的情报部门要侦破敌方的机密，首先也要

把对方的语言作深入的分析研究，摸清该种语音的基本模式及其组合规律，掌握特征数据，然后将截获的资料用仪器来分析，再按其语音及语法的规律，把分析所得的零乱的模式还原成原来的话语。由此可见，无论是保密还是破密，都需要快速而又科学的语音分析。另一方面，现代生产力和科学文化的发展，又迫切需要实行语音自动控制和机器的口语自动翻译，这就要求我们在语音自动识别方面迅速突破。机器的口语自动翻译，还要求机器会说人话。这就是说，要造出既会听话又会说话的、象人一样有头脑、能思维的机器来。要达到这个目的，一个大前提就是要深入了解人是怎样说出话来又是怎样听懂说话的，也就是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人说话和听话的生理和心理机能，这就是实验语音学已经面临的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如今，这方面的研究已为国内外的广大学者所注意。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数字和模拟手段的结合，已经为这类研究提供了可喜的条件，只是还有待于更大的突破。

（龔劍芬）

实验语音学是借助仪器对语音进行分析研究的科学，有人也把它叫做仪器语音学。

语音的生理分析主要研究语音发生的问题，例如肺部的气流怎样出来，声带怎样振动，声腔怎样调节，等等。使用的仪器大致可分三类：

1. 测量肺部气流的压力和流量的仪器：肺部出来的气流是语音发生的动力。过去常用气袋测量胸腹扩张时肺气流的流量，或者用特制的口罩接收来自口鼻的气流进行测量；现在常常采用生理学方面为研究呼吸功能所使用的仪器，如加热线流速计、热敏风速计及各种气压换能器等。

2. 观察和测量声带振动的仪器：声带振动是人发音的最重要的声源，只有声带振动，人们才能发出元音和浊辅音。声带的质量和它的振动方式，不仅是语音音高变化的根据，而且也是构成音色特点的重要因素。要观察声带外形，可使用医学上的喉头镜或牙科镜；如果要仔细观察声带振动动作，就要采用电影照相技术，最好是用高速电影摄影机来拍摄声带动作，然后以慢速放映来观察。近来，还有用肌电仪测量声带肌肉电流活动，来研究声带活动特性的。

3. 测量和分析声腔共鸣和调节作用的装置: 语音之所以有 a、u、i 或 b、d、g 等各种不同的音色, 主要是由于发音时声腔的形状和舌头的位置变化而造成的。这也是传统语音学研究中向来十分注意的。一般采用 X 光照相的方法, 拍摄稳态元音发音时的舌位和口腔、咽腔的形状, 或拍摄辅音发音时舌与齿背或腭接触的部位, 这种 X 光照片也可用来研究鼻音或鼻化的程度, 等等。但是, 实际的语音是连续变化的音流, 人们说话时, 舌头的高低前后和声腔的形状在不断地快速变化, 必须采用 X 光电影照相的方法, 才能研究这种动态过程。

以上两种照相都是从侧面观察舌位和声腔的形状。如果要从正面观察, 早期采用假腭, 现在常用腭位照相的方法, 作出上腭仰视图, 就可从正面观察辅音或某些高元音发音时舌和腭接触的位置和面积的不同。但是, 这种方法也只适用于静态语音分析, 对于动态语音, 国外流行一种电子假腭, 可取得发音时腭位的连续动态变化资料。

语音的物理分析主要研究语音各要素的声学特性, 给出音色、音高、音长、音强的特征参数, 分析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关系, 等等。使用的仪器可分两大类: (1) 用于波形分析的, 有音鼓浪纹计、电磁音笔浪纹计、阴极射线示波器、喷液示波器等; (2) 用于频谱分析的, 有频率分析计、语图仪和音高显示器以及声级记录仪等。在这些仪器中, 浪纹计和生理分析方面所用的假腭一样, 早已为人们所熟悉。人们常用浪纹计画出的语音波形来研究语音的清浊, 分辨口音、鼻音或鼻化的有无, 也用来计算音高等。但由于它不够灵敏, 已逐渐为阴极射线示波器等仪器所代替; 频谱分析方面, 一般使用频率分析计来作二维频谱, 研究元音的音色特征; 用音高

显示器来显示和研究音高变化；用声级记录仪来研究音强及音长；而用语图仪作出的语图则可概括表现四要素的特征，更有实用价值。当然，一套高质量的录音系统更是不可缺少的。

语音的心理分析主要研究人说话或听话时的心理活动和神经机制。也就是说，研究人说话时，大脑的有关部分怎样指挥和控制发音器官的动作，从而发出要发的音；听话时，大脑又是通过怎样的神经活动理解耳朵接受到的语音信号，从而听懂别人所说的话的。这方面的分析多半是生理分析和声学分析的仪器配合使用。

上述各类仪器，是根据分析对象的不同来分类的。要是从分析手段来看，又可以分为模拟的和数字的两大类。前面已经提到的各类，都属于模拟分析手段。数字分析手段是在电子计算机技术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基本原理，是将语音进行分段取样，利用数学的方法，借助计算机的高速运算和逻辑判断，对语音进行逐段的快速分析，取得语音的各种特征参数。例如，有一种窄带实时频率分析仪，常用来显示和纪录语音的基频和共振峰频率的变化，可以为音高和音色的研究提供比较精确细致的资料。数字分析的最大优点是可以作快速的、大量的分析合成试验，既能及时对于语音的瞬息变化作出比较详细而可靠的结果，又能验证模拟分析所得的特征参数的准备程度，并能解决计算声腔截面函数等方面的复杂的数学运算，这些都是模拟分析所不及的。但是，数字分析的实验结果同样需用模拟分析的仪器来验证。因此，数字的和模拟的仪器应配合使用，才能很好地解决语音的发生和听感方面的各种难题。

（曹剑芬）

60

语音“四要素”有哪些物理特性？

音色、音长、音高和音强是语音的四要素。音色是指元音 i、u、a……或辅音 p、t、k……的不同；音长是指发音的长短；音高是音调的高低；音强就是语音的强弱。那么，它们的物理特性是怎样的呢？在实验语音学中使用哪些参量来表征它们呢？

通常，用浪纹计或示波器作出语言声波的波形图，这就是语音的可见形式之一。从不同的波形可以分辨它们不同的音色，凡是元音或浊辅音的波形都是周期波形，凡是清辅音的波形都是非周期的；元音的波形又有不同的类型，例如元音 i 和 a 的波形就不一样，如图 1 所示。因此，可以通过不同的波型分辨不同的音色。从语音的波形图上还可计算出音高。音高实际上就是每秒钟里声带振动的次数，在物理上叫作基本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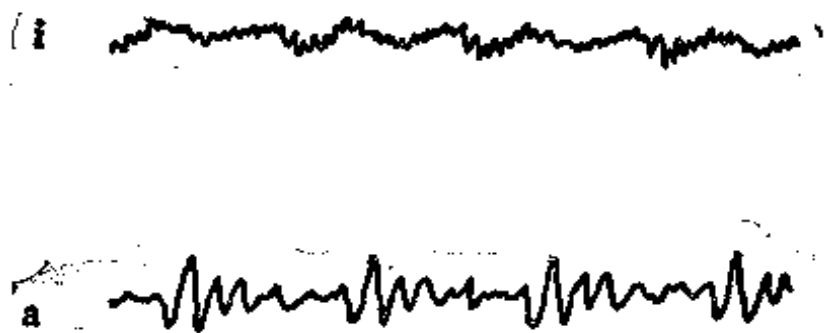


图 1 元音 i 和 a 的波形

率,在语言声波中表现为每秒钟里相同波型出现的次数(重复一次叫做一周,每秒钟重复几周就叫几赫兹,就是这个音的基本频率),计算出这个次数,就得出了该音的音高。从语言声波振动幅度的大小可以得出该音的相对强度。从元音、辅音或整个音节声波持续的时间可以计算出它们的音长。

用波形图测量四要素的物理特性比较麻烦,而且粗糙,所以一般采用语音的另一种可见图型,那就是语图。它是利用一种叫作语图仪的声谱仪,对语音进行频谱分析,把各要素的物理特性综合地表现在一张图上。以图2为例说明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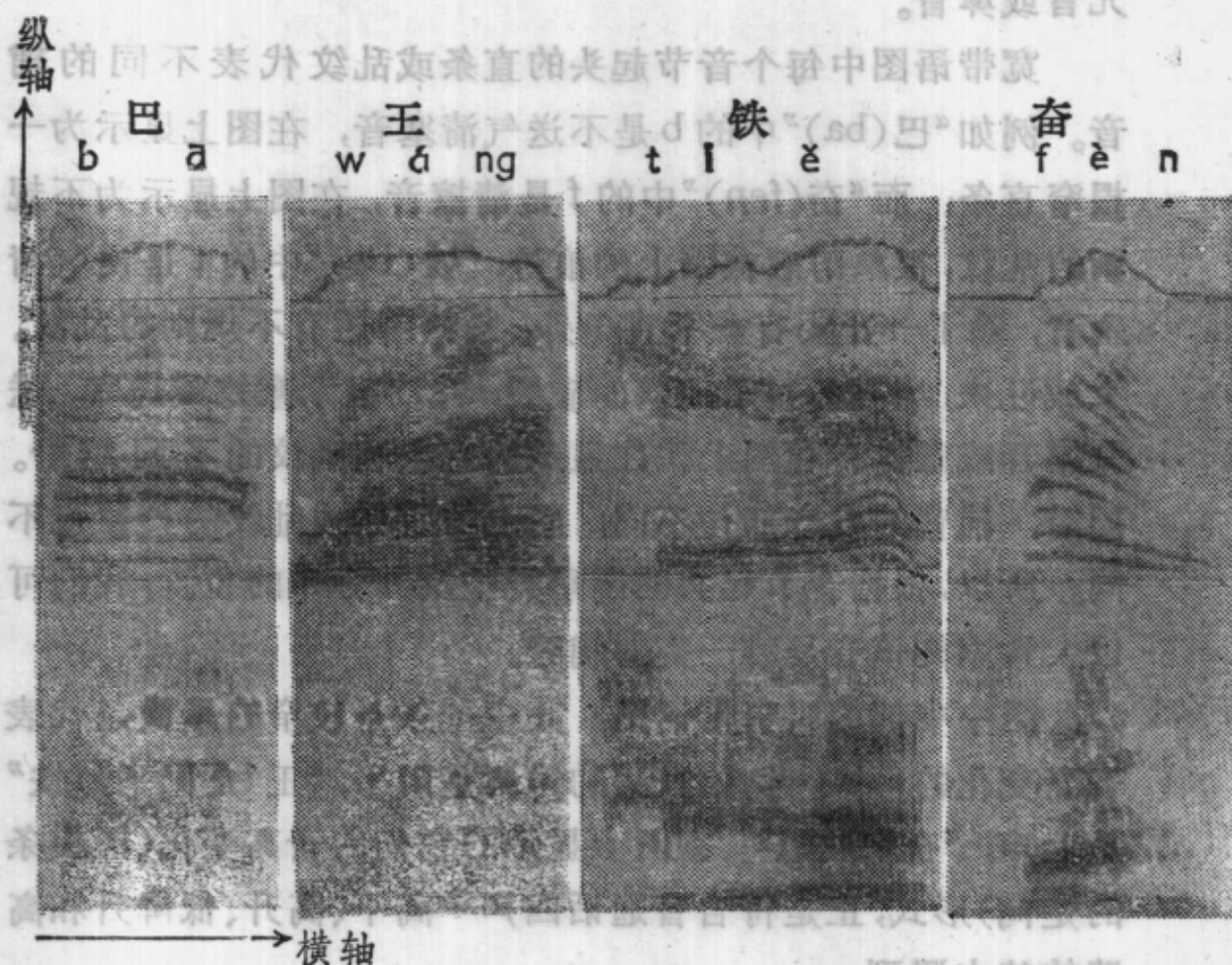


图2 语图举例

图2分别是普通话“巴”、“王”、“铁”、“奋”四个字的语图，纵轴代表频率，横轴代表时间，图的浓淡代表音的强弱。

图中下部的叫宽带语图，其中一条条较宽的黑横杠就是元音或鼻音的共振峰，它的频率位置和结构形式的不同，就代表元音音色的不同，例如“巴(ba)”中的元音a，它的第一、二共振峰几乎重叠，大约在1000赫兹左右；而“铁(tie)”中的元音i的第一、二共振分得很开，频率位置分别在400赫兹和2500赫兹左右，元音e的一、二共振峰又逐渐接近些。因而，根据不同的共振峰频率和结构形式可以大体上辨认出是什么元音或鼻音。

宽带语图中每个音节起头的直条或乱纹代表不同的辅音。例如“巴(ba)”中的b是不送气清塞音，在图上显示为一根窄直条；而“奋(fen)”中的f是清擦音，在图上显示为不规则的乱纹，很象雨洒在墙上的痕迹；“铁(tie)”中的t是送气清塞音，除了一开头有一窄直条外，紧接着还有不规则的乱纹。大致说来，窄直条显示闭塞的破裂，乱纹显示摩擦或送气，送气塞音或塞擦音在图上往往显示为直条和乱纹的不同组合。同时，辅音的发音部位不同，图上的直条或乱纹的位置也不同。所以，根据音节起头的图形类型及其分布的位置，我们可以大致察知该音是哪一类的辅音。

图中中部的叫窄带语图。其中一条条较窄的黑横条代表音高变化的形式。例如“巴”的声调是阴平，“王”是阳平，“铁”是上声，“奋”是去声，在图上显示的它们的音高变化(黑横条的走向)形式，正是符合普通话四声——高平、高升、低降升和高降的基本调型。

图中上部的曲线叫做平均振幅显示曲线，代表这个音节

的相对平均强度,物理上用分贝来计量,分贝数越大,表示这个音越强,在图上就表现为曲线的拱度越大。例如“铁(tie)”中的辅音 t 和元音 i 的部分显得较弱,而元音 e 的部分就显著地强一些。另外,从语图颜色的浓淡上,也可以大致地比较各个音的强弱,显得浓黑的部分就是强些。

图中每个音节在时间横轴上延续的长度就是该音的音长,例如在这里,“铁”比“奋”要相对地长一些。

由此可见,音色的物理特性表现为不同的波型和不同的共振峰结构形式,音高特性表现为不同的基本频率,音长特性表现为不同的时间延续,音强特性表现为不同的振幅。概括地说,语音四要素可以分别用物理上的频率、幅度和时间来表示。

(曹剑芬)

“国际音标”(The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 简称 IPA)是国际语音学协会在 1888 年制定的一种音标。以后它又经过多次修改, 每次修改都登在《语音教师》(Le Maître Phonétique)杂志上。

国际音标的符号是以罗马字母小写的印刷体为主, 再加上其它一些附加的符号。根据国际语音学协会会章的规定, 所有会员可以按照实际的需要来添加新的符号或修改原来的符号。

国际音标公布以后已经被许多国家的语言学家和语言教师所接受, 很多语言学著作、辞典和教科书都采用了这套音标。它已具有广泛的国际性。

国际音标分“宽式标音”(broad transcription)和“严式标音”(narrow transcription)。所谓“宽式标音”是一个音标代表一个“音位”(phoneme)。例如, 英语里 keep, cart, cool 这三个词里的[k]听起来并不一样, 但是都用[k]来标音。这是因为它们都是同一个“音位”。所谓“音位”按照国际语音学协会的定义是: “一族相关的声音在某种语言里按语言学的观点把它们当作是同一个声音, 这样一些音就叫做音位”。这儿

所谓“语言学的观点”就是看某个音在相同的语音条件下有没有区别意义的作用，例如，在英语里[n]和[ŋ]属于不同的音位，因为sin [sin]和sing [siŋ]这两个词里其它的音都一样，只是由于[n]和[ŋ]不同就分别成了表示“罪”和“唱”两个意义完全不同的词。可是[n]和[ŋ]在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捷克语和匈牙利语里却没有这种区别意义的作用（在这几种语言里，[ŋ]只出现在辅音[k]，[g]，[x]的前边，它是[n]在这些位置上的变体），所以在这些语言里[n]和[ŋ]同属一个音位。为了标示实际音值应该用“严式标音”，也就是说，可以在原音标上加上一些附加符号，甚至可以新添音标来标示。

（赵世开）

文字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一种流行的看法是，文字是人类历史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才产生的。象世界上古老的文字古埃及圣书字、亚述里亚楔形文字、汉字等，大都是在人类社会出现阶级以后才形成符号体系的。

一种文字符号系统的形成，是需要有一定的社会条件的。最基本的社会条件，我们可以举出两条：（一）社会事务的繁忙和社会交往的扩大，使人们深深感到语言这种交际工具在时间、空间方面的局限，从而迫切需要一种能够补语言不足的辅助的书面交际工具；（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个劳动者的劳动成果除了养活自己以外，还能养活一个、两个甚或更多的人，因而可以使社会上一部分人从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专门从事文字的整理和书写工作，出现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这两个形成文字符号系统的基本条件，只有在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才开始成熟起来。

就我国的情况而言，大约到了四千多年前的夏代，社会便开始进入奴隶制阶级社会了。大约在商代早期或者中期，汉字便形成了它的符号系统。我们现在见到的出土古文字商代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殷墟甲骨文

字和铜器铭文已经是相当完整、相当成熟的文字符号系统了。这个符号系统初步形成的时间，应该比商代中、晚期更早些。同时，这一符号系统决不是一朝一夕突然从天而降的，也不是某个或少数“圣人”创造的。构成汉字的基本符号，早在夏、商以前的原始氏族和原始部落社会就已经被原始人不断地创造出来，只是那时的那些图形、符号还同语言结合得不紧密，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符号系统。近世陆续出土的五六千年以前的陶器，不论是属于半坡文化层或龙山文化层，它们上面的图形、符号，有不少都和后来古汉字的字形符号一脉相承，十分相近。这决不是偶然的现象。历史上自古相传的仓颉造字说，已经被事实证明是不可信的。但是这个从上古就已产生的传说，如果还有几分真实性和可靠性，即如果在历史上真有仓颉其人，而且此人还真是黄帝的史官，那末他作为“史”而专门做了一些汉字符号的搜集、整理工作，则是完全可能的。这个传说也告诉了我们，大约在五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注意文字符号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了。

关于汉字符号系统形成以前的图形、符号、记号的组合，目前发现的史料还不丰富。仅就已经出土的文物资料来看，也基本上可以说明这类图形、符号、记号组合的存在，并且还可以说明这种组合同汉字符号的源流关系。例如，近世陆续出土的一些属于仰韶文化层和龙山文化层的陶器上的图形、符号、记号，有许多就同后来的甲骨文、金文的字形极其相似，说明它们之间的发展关系是一脉相承的。试对照下表：已经形成符号系统的甲骨文、金文，其字形虽然还有图形、符号、记号组合的遗存，但基本上已走向记词单字，并且业已线条化、符号化、定型化了。只是在钟鼎铭刻中，还夹有明显的图形痕

原始记号、图形			≡	≡≡	X	八	十	八	·	父	𠂔
甲骨文字形	一	二	三	三	五	六	十	八	口	父	𠂔
金文字形	一	二	三	三	五	六	十	八	·	父	𠂔
楷 体 字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丁	癸	旦

迹,如图1中的“鱼”字;同时也有图形、符号、记号组合的遗存,如图2、图3。图1的鱼形字,是夹在其他的业已线条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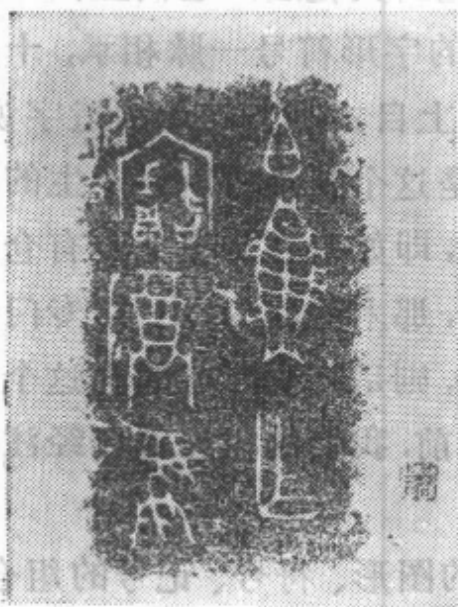


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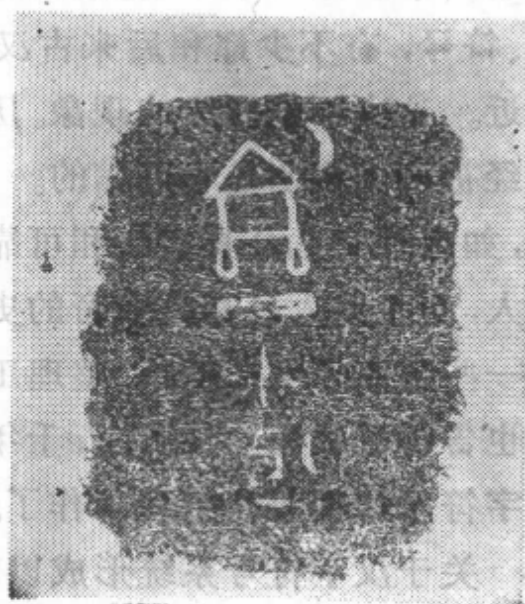


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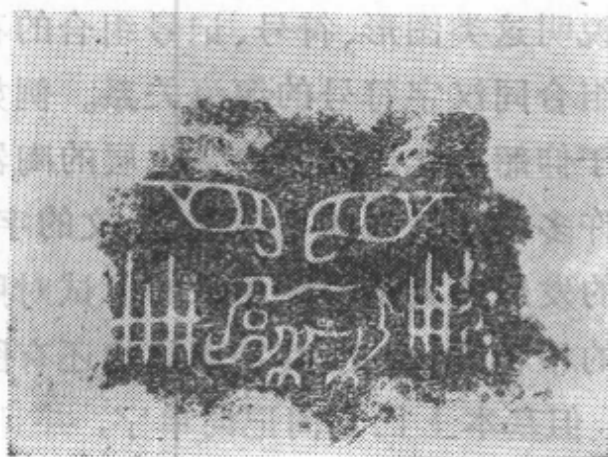


图3

符号化了的字形中间的图形痕迹。图 2、图 3 是原始人用来示意的图形、符号、记号组合的遗存。这两组图形、符号、记号组合所表示的意思，当时当地的人无疑是看得懂的，可是现在的人却看不明白了。遗留在这类组合中的和保存在陶器上的图形、符号、记号，不过是我们祖先创制的图形、符号、记号的极少一部分。可以断定，我们祖先创制的图形、符号、记号，在反复使用中，经过不断与语言单位的结合，便逐渐发展为记录语言成分的文字符号。这些文字符号后来经过专人（如巫、史）的搜集、整理，形成系统，能完整地记录某种语言，最后完成了由原始的图形、符号、记号及其组合向文字的过渡。汉字产生和形成的大略情况是这样，世界上其他古老文字产生和形成的情况也是如此。

（王伯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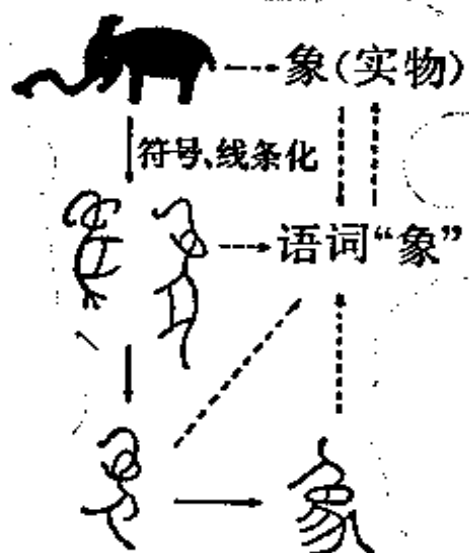
63

什么是象形文字？

所谓象形文字，是指符号形体象语词概念所代表的客观事物具体形态的文字。例如汉字象形字 ，其符号形体所象的就是“面”、“草”这两个词语概念所代表的客观事物的具体形状。

一般说来，象形是产生得最早的一种用文字记录语言的方式。象形字是由图画演进来的。图画过渡到为交际、示意而创制的图形之后，又经过不断符号化和不断同语言词汇结合

的过程，逐渐演化为专门记录语词的符号——文字，即象形文字。如汉字的“象”字，在篆文及其以前就是一个象形字，其由图画、图形演化而来的过程如图示。图中且年鼎的铭识“象”属于图形或图案画一类的东西，与图画极相近。人们看到它时首先联想的是实物，它还不是



汉字象形字“象”的形成、演进过程示意图

语词“象”的记录符号，因此，就很难说它是个象形文字。只有当它进一步符号化和进一步同语词结合了以后，只有当人们看到它首先联想起的是语词“象”而不是首先联想起实物的时候，它才真正演进成了象形文字。

世界上的一些古老文字，其符号系统大都是以象形符号为基础形成的。例如汉字的符号系统，由殷代的甲骨文、殷周金文直到秦代的小篆，其符号系统的形成基本上是以象形符号为基础的。汉字中，无论是会意字、假借字或形声字，其形

体结构大都是一些象形符号的组合。例如会意字  (𩇛)，

就是由象形符号  (象甑形)、 (象捧甑的双手形)、 (

象灶口形)、 (象柴薪之形)、 (象推柴薪入灶的双

手之形)、 (象火焰之形)组合而成的。又如形声字  (短)

(短)，从矢，豆声，其组成符号也是象形符号。 象箭形，

 象古代一样祭祀用的器皿之形。所以，秦小篆及其以前的古汉字，都可称为象形文字。

我国传统小学对象形字的理解是比较狭窄的。历来的小学家把象形字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内。他们认为，象形字第一必须是独体符号(独体文)，而不能是符号组合(合体字)；第二必须是象有形可象的具体事物之形的符号，而不可能象不具体的无形的事物概念。这种认识源自古代的“六书”以及东汉文字学家许慎对“六书”的解释。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

“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屈，‘日’‘月’是也。”他把象有形的具体事物之形的独体符号称为象形字，而把合体的符号组合称为会意、形声字。他写道：“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

例如，  象的是太阳、月亮之形，是不能再分析的独体符号，所以是象形字；而   等字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象形符号组合成的，可以再分析，所以是合体的会意字、形声字，而不是象形字。对象形字的这种理解，可称为狭义象形字的定义。

其实，是否独体文不应成为鉴别象形字的一种标准。因为象形字既可象具体物形，也可象具体事形，甚至还可以用象某些具体事物之形来象征、表示某种已经概括、抽象了的概念；而在象事形、象意形的符号中，就有许多符号在表面上看去似乎是可再分析的符号组合，而实际上它们不是符号组合(合体字)，乃是一个象某事、象某意的不可分割的符号整体(独体文)。

传统文字学即使是对狭义象形字的解释，也似乎把象形字的范围规定得太窄了。就是按照许慎的定义来考察，许多在过去被认为是指事、会意的字，其实也应该属于象形字。例如，  (上)，  (下)，显然是象一物体在另一物体

的上面、下面之形，表示上面、下面的意思。 (莫，即暮字)，

也明显地是象夕阳落在草木丛中之形的，表示傍晚。

(东),象旭日从树林中升起之形,表示东方。这些字符所象的形象是一个整体,应该是象形字。给“六书”下定义的许慎本人,在具体讲解某些所谓“指事字”和“会意字”时,也说是“象某形”。他在《说文解字》中解释 𠂔 (牟)字时说:“象其(牛的)声气从口出”,表示牛叫声。同样,他在解释 𠂔 (亦)字时说:“象两亦(腋)之形”。在解释 𠂔 (刃)字时说:“象刀有刃之形”。在解释 𠂔 字时说:“象怀子形。一曰:象乳子也”。在解释 𠂔 (登)字时说:“象登车形”。(按:据甲骨文、金文,“登”字的字形象人的双手捧祭器豆祭祀之形。)许氏用“从某,象某某形”或“从某某,象某某形”的格式来解说某些指事字、会意字,结果是在独体文与合体字,象形与指事、会意之间徘徊、折衷,弄得有些非驴非马了。所以,后来有人对“六书”提出许多变体的补充说法。与其把“六书”变为“八书”、“九书”,倒不如把许多“变体”径直归为象形来得科学一些。

历史上一些古老的文字体系,大都经历过象形文字的发展阶段。各种古老文字所记录的语言虽然不同,但由于所象客观事物的形状或形态是相同的,所以有些象形符号也大同小异。例如,“目”字。古汉字象形字作 , 古埃及象形字作 , 闪语象形字作 。又如“山”字,古汉字象形字作 , 古埃及象形字作 。“手”字,古汉字

象形字作 𠄎、𠄏，古巴比伦象形字作 𐎶。

总之，象形文字是人类文字发展最初阶段的一种字体。这种文字脱胎于图画、记号。在现代社会中，除了少数后进的民族还使用象形文字以外，这种文字就只是一种历史遗迹了。

（王伯熙）

64 什么叫“六书”？

“六书”是前人研究汉字的造字方法所归纳出来的六种条例，就是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1. 象形。就是象实物之形，也就是用线条符号把客观事物的具体形状描摹出来。用这种方法造的字就是象形字。象形字有的描出事物的整体。例如：

☉（也写作𠄎𠄏𠄐）——日。象太阳的形状，“○”象它的轮廓，“·”“~”象黑影，“𠄎”象它的光芒。

☾（也写作𠄑𠄒）——月。象月亮的形状。圆时少，缺时多，所以用半圆形表示。

有的只描出事物具有的特征部分。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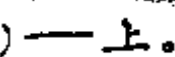
𠂔——牛。象牛头，上象两角向上弯曲，下象两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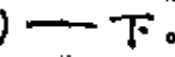
𠂔——羊。象羊头，上象两角下曲，下象两耳。

象形字是从图画文字发展来的，跟图画文字不同的是图画性质逐渐减弱，符号性质逐渐增强了。象形是一种原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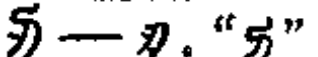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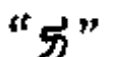
造字法, 局限性很大, 不便书写, 而且有些事物还画不出来。这就使得象形字的发展受到很大阻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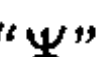
2. 指事。也叫“象事”、“处事”。就是利用象征性的符号来表示意义。比较抽象的概念用象形的方法不好画, 就采用简明的符号把所指的概念标示出来。用这种方法造出来的字就是指事字。指事字可分两类, 一类是纯粹符号性质的指事字。例如:

 (也作 ) —— 上。“·”“—”都是纯粹的符号。横线或弧线表示位置的界限, 线上用点或短横指出“在上”的处所。

 (也作 ) —— 下。线下用点或短横指出“在下”的处所。

另一类是在象形字的基础上添加指事符号的指事字。例如:

 —— 刃。“”是刀的象形, “·”是指事符号, 表示刀口之所在。

 (也写作 ) —— 本。“”是树的象形, “·”或“—”是指事符号, 表示树之“根本”所在。

因为指事要用象征性符号来表示意义, 所以这种造字方法局限性很大, 字数也比较少。

3. 会意。也叫“象意”。就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体字组合起来, 表示一个新的抽象的意义。由这种方法造出来字就是会意字。例如:

 一从。一人在前，一人在后，表示两人相随。

 一休。人靠着树，表示休息。

会意这种方法虽然大大提高了象形字的使用效率，但它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客观事物是复杂的，要想用一个字来表示一种复杂的意义是很困难的，有时即使把字造出来了，也会使人感到它表示的意义模棱两可，非常费解。

4. 形声。也叫“象声”“谐声”。就是半形半声的意思。它是由两个偏旁组成的：一个是形旁（或称义符）；一个是声旁（或称声符）。形旁表示事物的类属或意义，声旁表示事物的读音。例如“泳、材、扶、吐、忠、岭”都是形声字，其中“氵（水）、木、扌（手）、口、心、山”是形旁，“永、才、夫、土、中、令”是声旁，形声字形旁和声旁的组合主要有六种方式：

① 左形右声：江、姑、唱、蚊、级。

② 右形左声：期、功、剡、雅、颊。

③ 上形下声：花、简、霜、崇、空。

④ 下形上声：熟、基、婆、案、盒。

⑤ 内形外声：闷、闻、问、辨、辩、辩。

⑥ 外形内声：固、阁、衷、府、近。

其中以左形右声最为普遍，内形外声最为少见。形声字是在象形、指事、会意的基础上产生的，它的形旁和声旁都是来源于这三者。如“棋”的形旁和声旁都是象形字，“抹”的形旁是象形字，声旁是指事字；“湘”的形旁是象形字，声旁是会意字。

形声字的产生是汉字发展的转折点。它用半意半音的方

法造字，比单纯的表意字进步得多。形声字的能产性也很高，后来成为汉字发展的主流，现行汉字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形声字。但形声字也存在严重的缺点。由于字义和字音的演变，不少形声字，形旁已不能准确地表示事物的类属或意义，声旁已不能准确地表示字的读音。例如“法”“活”“权”“错”“辈”等字就是这样。

5. 转注。指部首相同、意义相同的字，可以转相注释。例如：“顶”和“颠”部首相同，都是“页”，意义相同，都是“头顶”的意思。“顶”和“颠”就组成转注字。“焜”和“燬”部首相同，都是“火”，意义相同，都是“焚毁”的意思。“焜”和“燬”就组成转注字。“妹”和“媚”，部首相同，都是“女”，意义相同，都是“称呼比自己年纪小的女性”。“妹”和“媚”也就组成转注字。

由于根据转注的原则并不能造出新字来，所以转注实际并不是一种造字法，而是一种用字法。

6. 假借。就是同音代替。口语里有这个词，但字汇里没有这个字，于是就依照它的声音从字汇里找出一个同音字来表示它的意义。例如：

自(𠂔)，本是“鼻”的象形字，后来借为“自己”的“自”。

来(來)，本是“麦”的象形字，后来借为“来往”的“来”。

其(其)，本是“簸箕”的象形字，后来借为代词“其”。

北(𠂔)，本是两个人背对背，表示相反的意思，原是会意字。后来借为方位词“北”。

假借字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汉字造字法的局限

性,扩大了汉字的使用范围,加强了汉字从表意向表音方向发展的趋势。但假借只是借用已有的字来代替要造的字,没有增加新字,所以也不是一种造字法,而是一种用字法。

“六书”是前人研究汉字所归纳出来的六种造字条例,并不是先有“六书”,后有文字。

虽然“六书”的理论还不够精密、完善,六种造字条例本身也还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但它是前人研究汉字的成果,对于我们进一步研究汉字的结构体系和发展规律,“六书”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陈天福)

汉字有多少？没有一个精确的数字。一般人都说有六万左右。这个数字是怎样得出来的呢？这就得介绍介绍记载和说明汉字的工具书了。第一次对汉字进行统计的是《说文解字》。《说文解字》是汉朝人许慎在公元一百年（汉和帝永元十二年）时编写的，是我国第一部最有系统、最完整的字典。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它一共收了九千三百五十三个字。

《说文解字》以后，收字较多的是南朝梁陈之间顾野王撰写的《玉篇》。据记载原本收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七个。现在我们看到的《大广益会玉篇》是经过孙强增字，宋朝陈彭年等重修的。《大广益会玉篇》所收字数大大超过原本。刘师培在《中国文字学》里说是二万二千七百二十六个字。

《玉篇》以后，收字较多的是《类篇》。《类篇》是宋朝王洙、司马光等奉诏纂修的。据近人胡朴安在《中国文字学》里统计，《类篇》收字三万一千三百一十九字。

《类篇》以后，收字较多的是宋朝丁度等奉诏修订的韵书《集韵》。《集韵》虽是部韵书，但由于它注重文字形体和训诂，所以也是研究文字和训诂的重要工具书。《集韵》收字五万三

千五百二十五个，是迄今为止收字最多的一部书。在宋朝还有一部书值得提一提，那就是南宋郑樵编的《通志》。我们知道，《通志》是一部综合历代史料而成的通史，分本纪、年谱、略、世家、列传，略这部分有一节是专谈“六书”的。它把所收的二万四千二百三十五个字按“六书”分别作了统计和说明，其中象形字六百零八个，指事字一百零七个，会意字七百四十个，谐声字（即形声字）二万一千八百一十个，假借字五百九十八个，转注字三百七十二个。

明朝有两本记载和说明汉字的工具书值得一提，这就是梅膺祚撰的《字汇》和张自烈编的《正字通》。《字汇》收字三万三千一百七十九个。《正字通》收字三万三千多个。

记载和说明汉字的工具书中影响最大的要算清朝张玉书等奉诏编写的《康熙字典》了。“字典”一词就是从这本书开始使用的。《康熙字典》是在《字汇》和《正字通》的基础上编成的。收字四万七千零三十五个。这部书可算得是古代字书中集大成之作。

现代编的字典中收字最多的是《中华大字典》。这是欧阳溥存等在《康熙字典》的基础上编成的大型字典，一九一五年十二月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大字典》收字四万八千多个。

《辞源》、《辞海》都是百科性词典。所收词条较多，都在十万条左右。但收的单字不多，象一九七九年出版的《辞海》只收了一万四千八百七十二个。

还有两部书需要提一下。一部是日本诸桥辙次主编的、有二十五万八千三百四十七人参加编写的《大汉和词典》（一九五五年—一九六〇年由日本大修馆书店出版）。这部书正文收单字四万八千九百零二个，另有附录一千零六十二个。另

一部是一九六八年八月由台湾省中国文化学院出版部出版的《中文大字典》。这部书收单字四万九千九百零五个，词目三十七万一千二百三十一条。

上面所举这些字书，所收之字互有参照，但也各有不同的。如“𩇛”见于《集韵》，“𩇛”见于《玉篇》。有些字还

见于其他字书。如“𩇛”见于《五音篇海》。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随着社会的发展，新事物的不断涌现，产生了不少新字。

例如“氘”(dāo)、“氚”(chuān)、“氙”(piē)

这三个字都是氢的同位素之一。这类字都是《康熙字典》以前字书所不收的。《集韵》已超过五万三千字，再加上其他字典收而《集韵》所不收的，特别是《集韵》以来近一千年所大量产生的新字，汉字总数为六万左右这个数字是有一定根据的。

(姚律人)

66

字母是从哪里来的？
怎样演变的？

字母就是拼音文字的书写符号。按一定的顺序把字母排列起来，就是字母表。现在世界上各种拼音文字的字母，尽管外形上多种多样，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来源，那就是北方闪美特人的字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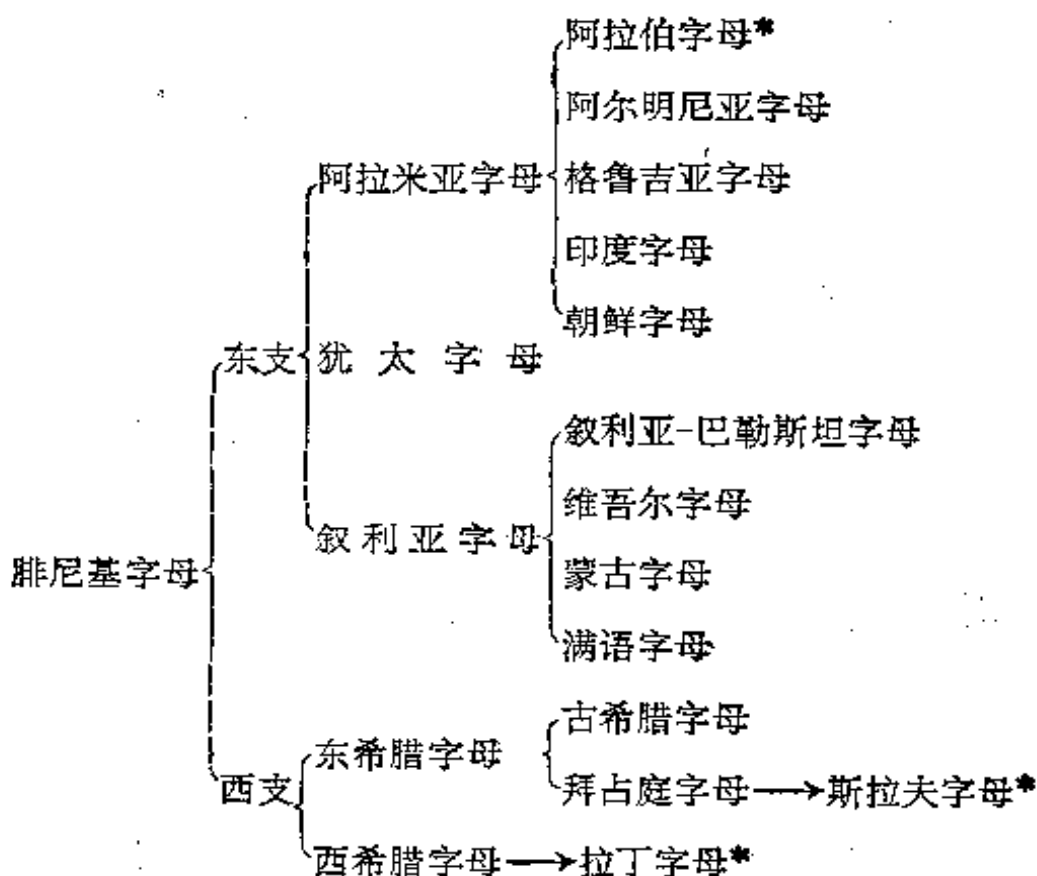
闪美特字母是在古埃及的象形文字的基础上演化来的。古埃及的圣书字由三种符号构成：意符、类符、声符。声符是从象形文字简化出来的符号，它表示词的读音。声符共有 24

符号	声音	符号	声音	符号	声音	符号	声音
	g		f		b		k
	j		m		h		q
	o		n		s		t
	w		r		š		i
	b		h		š		d
	p		h		k		d

个,如:

公元前一千多年,居住在叙利亚、巴勒斯坦一带的闪美特人,在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基础上创造了人类最早的拼音文字。在闪美特字母中,又以腓尼基字母最为古老。腓尼基字母是辅音字母,由二十二个辅音字母组成,可以单独表示辅音,也可以表示含有这些辅音的整个音节。

随着宗教的传播和商业的发展,在腓尼基字母的基础上便演变、发展出许多现代字母。这一演变发展的情况可以列表如下:



在现代的字母中,最重要的是拉丁字母、斯拉夫字母和阿拉伯字母。

拉丁字母又称罗马字母,是公元七世纪拉丁族在希腊字

母的基础上创制出来的。最初有二十个字母：

A B C D E F H I K L M
N O P Q R S T U X

后来又增加了三个：

G Y Z

十一世纪又从 I 分化出 J，从 U 分化出 V，又从 V 分化出 W，这样就形成了有二十六个字母的现代拉丁字母表。

拉丁字母随着基督教的传播而传播。由于它简明、易认，便于阅读和书写，便为许多民族所采用。整个欧洲、整个美洲、澳洲、非洲（除了埃塞俄比亚和埃及之外）的语言，东欧的波兰语、捷克语、霍尔瓦特语、斯洛文语，以及亚洲的越南语，都采用拉丁字母。拉丁字母是世界上最通行的字母，是国际文化交流的主要工具。

我国早在明万历三十三年（公元 1605 年）就出现了第一个采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的方案。1958 年 2 月 11 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汉语拼音方案的草案。目前，我国为国内各民族创制文字也是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

斯拉夫字母是九世纪希腊正教传教士基立尔在希腊字母的基础上创制的，又名基立尔字母。它随着正教（基督教的一个教派）的传播而传播。东欧信奉正教的各斯拉夫民族都使用这种字母，苏联境内的文字大多数使用这一字母，蒙古、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语和马其顿语、保加利亚也使用这一字母。现代俄语用的俄文字母就是一种斯拉夫字母，共三十三个字母。

阿拉伯字母属于阿拉米字母系统。有二十八个表示辅音的字母，元音有的用附加符号，有的用一定字母加附加符

号来表示。只有词典、小学教科书、《古兰经》上的文字加元音符号，而一般书报都不加元音符号。

阿拉伯字母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而传播。现在埃及、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沙特阿拉伯、也门、约旦、阿尔及利亚、阿富汗、伊朗等许多国家都采用阿拉伯字母。我国维吾尔族也采用阿拉伯字母。苏联的一些少数民族十月革命前也采用阿拉伯字母。目前使用这种字母的有两亿人。

(王希杰)

67 《汉语拼音方案》 是怎样产生的？

周恩来同志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中指出，现在的汉语拼音方案“是在过去的直音、反切以及各种拼音方案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从采用拉丁字母来说，它的历史渊源远则可以一直追溯到三百五十多年以前，近则可以说是总结了六十年来我国人民创制汉语拼音方案的经验。”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知道人们按一定的体系编制拉丁字母拼写汉语的方案，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例如大家所熟悉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的《西字奇迹》就是1605年(明万历三十三年)在北京出版的。假如以没有严格的体系用拉丁字母拼写中国的专名，例如《马哥波罗游记》等文献算起，那就更久了。这些都是外国人为了便于传教和学习汉语而创制的。

我国的有识之士自觉地为了进行文字改革而采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的尝试，从现在算起就有近八十年的历史了。最初的出版物是1906年朱文熊的《江苏新字母》和1908年刘孟扬的《中国音标字书》。当然影响较大被人们所熟悉的是1926年的“国语罗马字”和1931年的“拉丁化中国字”。

以上就是人们多年来进行的拉丁化汉字拼音方案创制，并做了不少实践活动的概况。所有这些都为后来我国制定《汉

语拼音方案》提供了丰富的有益的经验。也就是说现在的《汉语拼音方案》是在历史上各种方案 and 前人实践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

人民迫切要求学习文化,要求有方便的文字工具,便于学习。1949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压在身上的三座大山,得到了解放。人民政治上翻了身,也迫切要求文化上得到翻身,并且要求以原来在白区和解放区推行过的“新文字”(北拉)为基础,迅速进行文字改革,以利于扫除文盲,于是吴玉章同志在1949年建国前夕写信给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反映群众的这一要求。毛主席将信批转给郭沫若、茅盾和马叙伦诸同志进行研究。经过多方商讨,于1949年10月就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开展文字改革研究工作,其中一项就是研究拼音方案。此后,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和1954年10月改组为国务院直属机构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都不断在研究拼音方案,而且党中央和毛主席、周恩来总理以及朱德、徐特立、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等老一辈革命领导人都一直关心文字改革工作和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这段时间可以说是全国群众性的设计汉语拼音方案的高潮时期。其间共收到群众寄来自己创造的拼音方案就有1600多个。从它们的多样化的形式和内容来看,可以说是我国拼音方案的百花园。从字母形式上看,有(A)汉字笔画式的,在这种类型里包括偏旁部首式和汉字笔形式的;(B)拉丁字母式的;(C)斯拉夫字母式的;在B和C两种类型里还包括有两种字母或几种字母混合型的。(D)速记式的;(E)图案式的;此外还有数字等其他形式的。从音节结构上看,有音素化的,有双拼的,也有三拼的。我们现在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时,

总是为那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盛况所激动。

从以上各种各样方案中我们可以发现，要制定一个较好的方案必须首先确定几个原则，那就是：

(一)语音标准：制定汉语拼音方案，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以什么语音作为标准音的问题，这个问题由于历史上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和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的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所以就比较顺利地解决了。

(二)音节结构：采用两拼、三拼还是音素化的音节结构呢？这是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汉字一个字代表一个音节，而拼音则是音节的分析和拼合，因而只有采用音素制才是符合“分析和拼合”的科学原则，所以经过认真地讨论，大家确认汉语拼音方案采用音素制的音节结构是科学的、合理的、明智的。

(三)字母形式：这个问题也是一个争论较多的问题，它涉及民族性与国际性的统一问题，因此，关于采用什么字母形式这个问题，到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时(1955年10月)还没有定下来。这时拼音方案委员会向出席会议的代表们提出了六种方案草稿，其中有汉字笔画式的、斯拉夫字母和拉丁字母式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以后，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和中央的指示，最后决定采用国际通用的罗马字母(拉丁字母)作为汉语拼音方案的字母。这就为我国以后的国际交流和科学技术工作带来了方便。

当然，除上述问题以外，还有一些问题是值得讨论的，如二十六个字母不够用时，是创造新字母还是采取加符号字母或是双字母？字母要不要名称？如果要名称，给它们起什么

名字？怎样称呼它们？调号怎样处理？隔音符号怎样解决？等等。所有这些问题经过认真热烈地讨论，都得到了妥善的解决。总之，《汉语拼音方案》是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各部门，各行业千百万人以不同形式进行广泛讨论的基础上（而且还收到全国各方人士及海外侨胞的四千三百多件意见书），经由国务院组织各方面专家组成专门机构——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进行认真讨论，经国务院通过后，提请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一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和批准的。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说：“自从一九五六年二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了第一个草案以后，曾经经过全国政协和各地政协委员会所组织的各方面人士的广泛讨论，又经国务院成立的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反复审议和多次修订，去年十月间复经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才于十一月一日由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六十次会议通过，并决定登报公布，准备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讨论和批准。人们从这里不难看出，政府对这个问题是采取了负责的和慎重的态度的。”

（乔 风）

语义学，又叫做词义学，来源于希腊文 *semantikos*。它是以词（包括语）的内容为研究对象的学科。语义学是广义词汇学中的一个重要部门。它的任务是研究词义的性质，词义的发展、演变以及词与词意义之间的种种关系，并揭示词义的一般规律。

词义是客观事物、现象在人们意识中的概括反映。语言是社会现象，词义是社会人民群众在运用语言交际过程中确定下来的，具有社会性。词义是对客观事物、现象的抽象归纳，所以它又具有概括性。

词义与概念有密切的关系。它们都是客观事物或现象在人们的意识上的反映，但两者不是同一现象。概念属于思维范畴，词义属于语言范畴。词义是处在某一语言词汇系统中，它的形式、意义、色彩都为该语言词汇系统所制约，具有民族性。而概念却是全人类所共同有的。

词是语音形式和意义内容相互联系的统一体，但是某一语音形式代表某一意义是任意的，假定的，它们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因而声、义之间既是统一的，又是矛盾的。由于存在着这种矛盾性，词在反映大千世界的错综复杂客观事物、现象

中，其意义内容与声音形式就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关系。其中有用同一语音形式表达意义间有一定联系又有差别的一词多义现象。一词多义是用同一语音形式表达多个有联系而又不同的意义，它是语义丰富的表现。

词义是历史范畴。它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运用而逐渐在演变。一方面是不不断充实提高、深化(如，今天的“工人”的意义比几十年前要深刻多了)；另一方面是词义的变迁，它包括词义的扩大、缩小和转移。这几种演变方式有时是在同一词义的内部体现出来，如由扩大发展为转移，或由转移再到缩小等等。演变的方式是多种多样，但总的趋向是为不断满足人们的交际交流思想的需要而日益丰富、多彩。

当然，词义就一定历史阶段的横断面来看，是相对稳定的，所以词义的发展、演变并不影响交际的正常进行，反而使语言日臻完善，更好地服务于现实的交际。

一种语言的语义系统是一个整体。词与词意义之间的多种联系是语义学研究的另一重要的内容。它们之间有的是意义相同、相近，彼此构成同义关系(如“诞辰”和“生日”、“误解”和“曲解”)，有的是意义相对、相反，彼此构成反义关系(如“黑”与“白”，“胜利”与“失败”)，有的是语音形式相同意义毫无联系的，彼此构成同音异义的关系(如“攻势”与“工事”、“对”与“队”)。词与词这些意义上的关系表现了词义的精确、严密。语义学的重要任务就在于揭示它们的各自特性，指出其间的细微差别。

语义学的内容是丰富的。研究它很有实际意义。从运用语言交际方面来说，有利于准确地表情达意。事实上，人们表达思想在语言上出现的错误大都是在语义方面。从积极方面

说,语义的研究可使语言的运用生动、活泼,富于变化。

词典的任务主要是解释词义,因此语义的研究与词典学的理论与实践有密切关系。对词义构成的全面揭示(词素义间的结合,词义的多项内部联系,词义的历史发展等)、词义类型的划分、词义的不同风格、色彩的确定,词与固定词组(包括成语、谚语、惯用语等)的联系与区别等等都与语义学相关联。

语文教学与语义学的关系也极为密切。如何辨析、掌握同义词,怎样释词,怎样通过语义深入挖掘课文的主题思想,使学生全面准确地掌握课文等等都要有语义学的知识作为指导。

(王 勤)

词是独立用于造句的最小语言单位。词音和词义，是构成词的两个相互矛盾，而又相互依存的对立方面。词义是人们对词所称谓的事物、现象、关系的概括认识。

词义的语言功能，在于确定词和它称谓的对象间的联系。

语言的社会功能，决定了词义的社会性，决定了词义的内容和词义的概括范围，都是社会语言集体共同确定、共同理解的。个人只有按照社会公认的规范去掌握词义、理解词义，去运用语词，才能达到交际、交流思想的目的。人们年龄、经历、文化水平的不同，对词义理解的深度，往往不一，但对词义概括的对象、范围的认识，总是一致的。如对“人”这个词义的理解，成年人就比小孩儿深得多，社会科学家就比一般人深一些。对词义内涵理解深浅有别的人们，使用同一语词，能够达到相互交际的目的，就因为这种差异没有突破词义的社会公约数，没有改变社会公认的词义的概括对象或范围。

词义是客观事物在人们主观意识中的反映。因而，词义又有客观性。词义的客观性为词义的社会性，提供了客观存在的基础。词义概括的事物、现象、关系等对人们主观意识的

制约性,使人们对词义的共同理解,有了统一的客观标准。例如,我们用“鸟”这个词称谓“有羽毛、会飞、两足、卵生”这样的动物,这类动物的这些特点,就决定了“鸟”这个词的词义的内容。只要是思维能力正常的人,当他把“鸟”这个词,和客观存在的鸟类联系起来的时候,就会在不同程度上从“鸟类”本身,了解到“鸟”这个词的意思,不会把它和“兽”这个词的意思混同起来。

词义是人们思维活动的成果,不是词所指称的客观事物本身。所以,词义的另一属性,就是主观性。词义的主观性,主要表现为词义的抽象概括上。不论是表达一类事物或集体事物的词,也不论是表达特定对象的词,不论实义词或虚义词,意义都是抽象概括了的。如“树”这个词,是指称一类事物的名词,它把杨树、榆树、柳树、槐树等具体树木的各自特点加以舍弃,只概括“树”和其它植物足以区别的特征。“北京”这类属于特定事物专有名词的词义,也是从北京许多特征中,把“新中国的首都”、“位于河北省的北部”等有别于其它城市的特点抽象出来,概括而成的。正如列宁说的,“任何词(言语)都已经是在概括。”

词义也有历史性,有它的历史继承性,和历史的发展演变性。在已有语言的基础上,后代人总是从前代人那里学习掌握历史上形成的既存的语法和词汇,按照传统的词义概括范围,来理解词义,运用词语。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异代人之间的交际生活不致中断,使得前人创造的文化成果,得以流传下来。我们现代汉语里许多来自古代汉语的基本词,如“火”、“水”、“风”、“雨”、“洗”、“教”、“学”、“买”、“卖”等,它们的基本意义,都和古汉语是一脉相承的。但是,词义也不是静止不变的。随

着人们思维能力的发展,随着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对词所称谓的客观事物认识的不断加深,以及事物本身的变化引起人们认识的变化等等,都能促成词义在质和量的方面发生变化。如“人”的意义,中国的古人认为是“圆颅方趾皆人类”;古希腊人认为是“没有羽毛的两腿动物”,进而认为是“能思维、有理性的动物”;再后,美国的富兰克林提出“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直到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人们对“人”的词义,才作出全面的科学的理解:“人是有语言、能思维、会制造和使用生产工具的社会动物”。词义的历史演变性,是绝对的,词义在现实交际生活的具体运用中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是相对的,两者是矛盾统一的。

(武占坤)

70 什么是词的本义、转义、引申义、比喻义？

翻开《现代汉语词典》，我们查查“纲”这个词，第一个解释是“提网的总绳（多用于比喻）”，如“纲目”“提纲挈领”“纲举目张”。第二个解释是“比喻事物最主要的部分（多指文件或言论）”，如“纲领”“大纲”“提纲”。

再查查“兵”这个词，第一个解释是“兵器”，如“短兵相接”。第二个解释是“军人，军队”，如“工农兵”、“兵种”、“骑兵”。第三个解释是“军队中的最基层的成员”。第四个解释是“关于军事或战争的”，如“兵法”、“纸上谈兵”。

上面所说的第一个解释，就是“纲”和“兵”这两个词的本来的意义。一般地说，词的本义就是它最初表示的意义，是对某一类客观对象的概括反映。在语言交际中，由于各类客观对象之间有各种各样的联系，人们就可能用称呼这一类对象的词，去称呼与这一类对象的特征有某种联系的其它对象，这样就产生了一词多义的现象。

一个词有几个不同的意义，而这几个意义又是互相有联系的，这个词就是多义词。“纲”和“兵”都是多义词。“纲”的第二个解释和“兵”的第二三四个解释都是由本义派生出来的意义，都和本义有联系，因而叫作“转义”。

转义一般包括比喻义和引申义两种。比喻义是通过打比方产生的意义,“纲”最初表示“提网的总绳”,后来就比喻事物最主要的部分,形成了比喻义。引申义则是由本义推演而形成的,象“兵”的第二三四的解释,都是由“兵器”的意义推演引申出来的,由“兵器”联系到掌握兵器的军人和军队也可以称为“兵”;军队里的战士也可以称作“兵”;有关军事或战争的法则可以叫“兵法”。

多义词在语言里是大量存在的,这是词汇丰富的一种现象。比如,“标兵”这个词的本义是阅兵场上用来标志界线的兵士,我们平时说的“树标兵”,“标兵”用来比喻可以作为榜样的人。“编辑”本来是指对资料或现成作品进行整理或加工,如“人民文学编辑部”,又可以引申为作编辑工作的人,如“他是《人民文学》杂志的编辑”。“冷”这个词本义是“温度低”,又可以转为“使冷”(水太烫,冷一冷再喝),“不热情、不温和”(态度很冷),“寂静、不热闹”(冷清清、冷寂),“生僻、少见”(冷僻),“不受欢迎、没人过问”(冷门、冷货)等多种引申义和比喻义。

那么,运用多义词,会不会在交际中产生歧义、引起麻烦呢?不会的。因为在一种具体语言环境里,多义词表示的意义是单一的。说“这小孩喜欢吃铁蚕豆”,没有人会理解成这蚕豆是铁做的,“铁”在这里表示蚕豆坚硬。不过,我们也要把多义词的每一个意义了解清楚,以便能准确地遣词造句。

“春天来了,花开了”和“花钱太多”两句中的“花”是不是多义词呢?不是。这两句中的“花”形同音同,但表示的意义毫不相干,它们是同音词,不是多义词。

另外要注意的是,词的比喻义和修辞上的比喻手法可是

两回事。词的比喻义是这个词在长期使用中已经固定下来的一个意义，“他是总工程师，担子很重”，“担子”比喻担负的工作责任。“工程搁浅了”，“搁浅”本义是船只进入水浅的地方，不能行驶，这里比喻事情遭到阻碍，不能进行。这不同于词的临时的比喻用法，我们比喻孩子们的可爱，说“孩子们象春天的花朵”，象“花朵”是打比方，“花朵”的意义并没有发生改变。

（田小琳）

71 什么是语义演变的 绵延式和放射式？

语义的演变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绵延式，一种是放射式。

所谓绵延式，指的是从第一个意义产生第二个意义，然后丢开第一个意义不顾，直接从第二个意义产生第三个意义，并以此类推。

绵延式的例子，如：

“朝”，最初的意义是“早晨”(A)，《说文解字》说：“朝，旦也。”后来引申为“朝见”(B)。再由“朝见”引申为“朝庭”(C)。再由“朝庭”引申为“朝代”(D)。

“习”，最初的意义是“鸟数飞”(A)，《说文解字》说：“数飞也”。后来引申为“温习”(B)，因为温习是多次反复的行为。后来引申为“习惯”(C)，因为习惯是多次反复的行为所形成的。

法语中有一个词叫“toilette”，最初指“一小块布”(A)。后来专指“盥洗后擦脸的毛巾”(B)。再后指“备有这种毛巾以及其他梳洗用品的桌子”，即“梳妆台”(C)。再后指“梳妆的动作”，特别是“穿衣服”(D)。后来指“女人的服装”(E)。

绵延式可以用下式来表示：

A→B→C→D→E……

放射式,指的是以一个意义为中心而演变的,派生出的各个意义之间的关系是平行的,彼此独立的。

放射式的例子,如:

“赤”,最初的意义指“火的显著盛大”(A)。在这个基本意义上,分别产生了下列意义:

(B) 红色。因为火的颜色是红色的。

(C) 诛灭。因为火的颜色与血相同。

(D) 空尽无物。因为火具有虚空的特性。

(E) 纯真。因为火具有光明纯洁的特性。

“头”,最初的意义是指“人与动物的最上部”(A)。在这个意义的基础上,分别产生了下列意义:

(B) 物体的顶端或两端。

(C) 事物的起点或端绪。

(D) 头领、头目。

(E) 量词。

“莽”,最初的意义是“犬伏在草莽中”(A)。由这个基本意义分别产生了下面两个意义:

(B) 勇莽、鲁莽、莽撞。

(C) 草木丛生,草木深邃和茂盛。

“才”,最初的意义是“草木始生之祖”(A),《说文解字》说:“才,草木之初也。”由这个意义分别产生了下面的意义:

(B) 开始、刚才、方才。

(C) 才能。

放射式可以用下页的图 1 来表示。

语义的演变是很复杂的,并不都按照单一的方式进行。在通常的情况下,语义的演变常结合着这两种方式来进行,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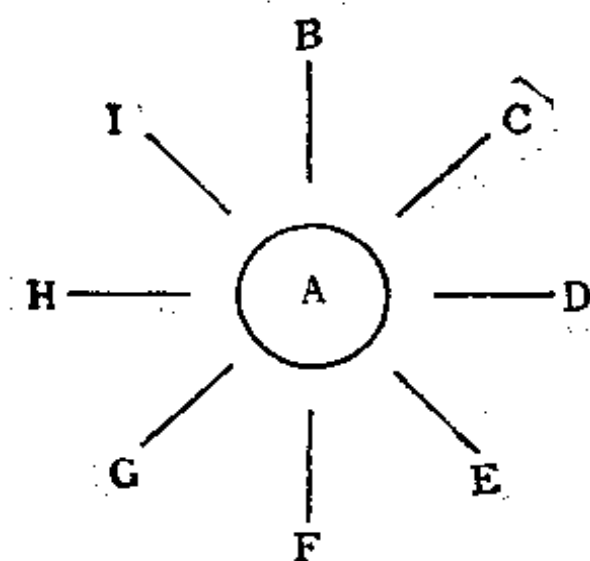


图 1

“赤”，主要是按放射式演变的，但也兼有绵延式。如从“空尽无物”(D)这个意义又产生了“光着、裸露”(E)的意义。

“甲”，最初的含义是“种子的萌发”(A)。种子的萌发是植物生长的最初阶段，因而引申为“第一”(B)，如“甲乙丙丁”的“甲”。又引申为“占第一”(C)，如“桂林山水甲天下”的“甲”。但是“甲壳”(D)的意义又是直接从(A)产生的，因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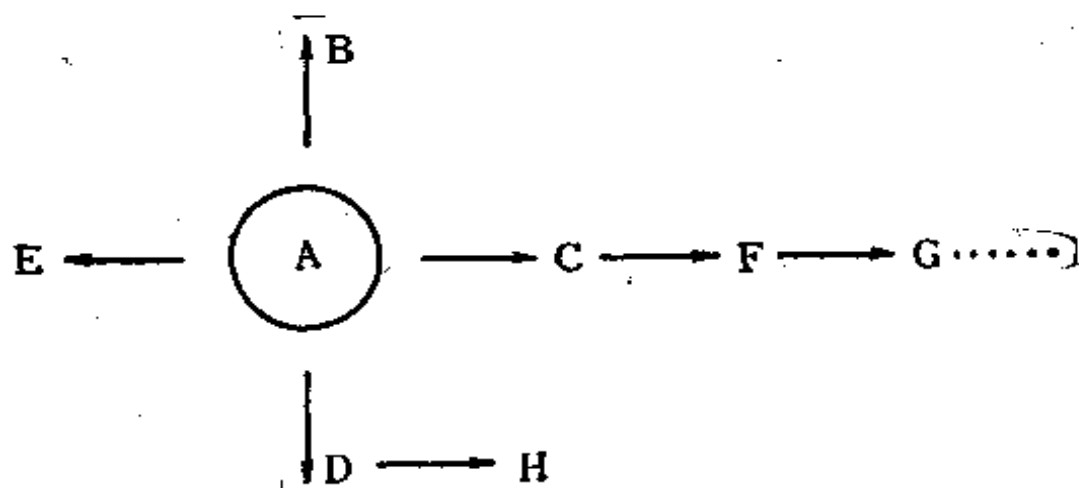


图 2

种子萌发时，其外壳是相当坚硬的，这与(C)(B)没有直接关系。

这种语义的演变称之为综合式，它可以用上页的图 2 来表示。

汉语中的“道”、“头”、“理”这些词，都是按综合式演变的。

(王希杰)

72 什么是词义的扩大、缩小和转移？

词的意义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客观事物的变化以及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而不断演变。如“革命”一词，在古代，“王者易姓曰革命”。在近代，被压迫阶级用暴力夺取政权，摧毁旧的腐朽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进步的社会制度称为“革命”。词义的扩大、缩小和转移是词义演变过程中的三种常见的方式。

演变后的词义所表示的概念外延比原来的词义所表示的大，叫做词义的扩大。如“哭”，古义指“悲痛出声”，“大声曰哭，细声有涕曰泣”，大声而无泪的叫“嚎”。现在，“哭”则包括“泣”和“嚎”。又如“雌”和“雄”，“雌”古义指“鸟母也”；“雄”，“鸟父也”，专用来区分鸟类的阴阳性。如《诗·小雅》说：“谁知鸟之雌雄。”现在，“雌”、“雄”用来区别一切生物的阴阳性了，包括花、鸟、虫、鱼、兽。它们所表示的概念外延都扩大了。再如英语的“bird”和“dog”，原指一种特定的鸟和狗，现在则泛指一切鸟和狗了，它们所表示的概念外延都扩大了。一般来说，词义的扩大总是从具体的、个别的意义演变到抽象的、一般的意义。

演变后的词义所表示的概念外延比原来的词义所表示的小，叫做词义的缩小。如“瓦”，古义是“土器已烧之总名”。如

《礼记·檀弓》说“有虞氏瓦棺”。现在，“瓦”则专指盖在屋顶上的那种已烧过的土器了。它所表示的概念外延缩小了。又如“丈人”，古义指“老人之通称”，因为“丈，借为扶行之杖；老人持杖，故曰丈人”。如《论语·微子》说“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蓑”。唐朝以后俗称岳父叫“丈人”，它所表示的概念外延缩小了。再如英语的“meat”，原来是指一般的食物。在英国斯图亚特王朝詹姆士一世（1603—1625）时出版的《圣经·创世纪》译本中有这样一段话：“上帝说，看哪，我已把所有结籽的草给了你们，这草就生长在大地上；还给了你们所有的树，树上结的籽就是果子。这些草籽和树果将是你们的食物（meat）。”现在，“meat”只指“肉食”，它所表示的概念外延缩小了。一般来说，词义的缩小总是从抽象的、一般的意义演变到具体的、个别的意义。

演变后的词义所表示的概念内涵与原来的词义所表示的不同，叫做词义的转移。如：“闻”，古义是“听而得其声也”。如《礼记·大学》说“听而不闻”。此外还有“耳闻不如目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等等，“闻”都是“听”的意思。现在，“闻”是指用鼻子嗅，它的词义内涵发生了变化。又如“兵”，古义是“械也”。如《世本》说“蚩尤以金作兵”。古人还说“坚甲利兵”、“短兵相接”，“兵”都是指的兵器。现在，“兵”指人，如“侦察兵”、“我是一个兵”，它是词义内涵发生了变化。再如英语的“book”，原指山毛榉，是一种树木的名称。这种树木在古代曾作为书写的材料。现在“book”用来表示写成的书了。它的词义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一般说来，词义的转移总是从表示某种意义演变到表示另外一种意义。

（王希杰 刘建设）

73

分析词义有哪些方法？

社会交际需要人们运用丰富多采的词汇表达思想感情。要把思想感情表达得精确、无误、鲜明、生动，准确掌握词义是十分重要的。然而浩瀚的语汇中，有数以万计的不同的词，词与词意义上又有联系、对立、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认真分析词与词意义上的细微区别，进而准确地掌握词义就成为学习词汇的重要内容了。

怎样分析词义呢？

“……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所以，掌握词义，分析出词与词意义之间的细微差别，最重要的途径，是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通过切身的体验，对词义才能有更深刻更透彻的理解。譬如，参与同志们在工作中为了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而群策群力、互相帮助结合起来的实践活动，对“团结”一词的意义认识，必定更深刻更透彻更准确。

可是人们的精力、条件是有限的，不可能事事都直接参加实践活动，更主要的是吸收间接的经验，总结广大群众在运用词语长期实践中所积累的经验。从中辨析出词与词意义方面细微差别，进而寻求出规律。词义的细微差别大致有以下两

个方面。

1. 在意义方面。有(1)范围的大小不同:有些词代表同一对象,但其意义范围有大有小。如“粮食”和“食粮”都是指“谷物”,可是“粮食”泛指一切谷物,“食粮”专指作为“食用”的谷物。前者范围大,后者范围小。此外象“局面”与“场面”,“战争”与“战役”,“时期”与“时间”都是范围大小上的区别。(2)个体与集体不同:有些词义代表了同类事物,可是有的代表个体的,有的代表集体的。“马”指个别的一匹一匹的马,而“马匹”则指“许多的马”。其它如“信”与“信件”,“船”与“船只”,“纸”与“纸张”等都是个体义与集体义的差别。(3)语意的轻重不同:词的意义基本相同,语意的轻重却不同。同是说“好”,说“优良”和说“优异”不同,前者语意轻,后者语意重。诸如“缺点”与“错误”,“轻视”与“鄙视”,“请求”与“恳求”等前者语意轻,后者语意重。(4)语意的色彩不同:词与词语意色彩的差异有二,①情态色彩的差异。一种是赞许,褒义,一种是贬斥,贬义,一种是不褒不贬,中性。如“果断”和“武断”同是表示“判断”的意思,而“果断”是准确恰当不犹豫的决断,褒义;“武断”是凭主观不恰当的判断,贬义。表示有本领的意思,说“技能”感情上无好坏的意味,中性,说“技俩”则是指不正当的技能,贬义。类似的“团结”与“勾结”,“成果”与“后果”,“鼓动”与“煽动”等都是褒贬感情色彩的差别。②风格色彩的差异。如“恐吓”和“吓唬”都是以要挟的话或手段威胁人的意思。可是它们的风格色彩不同,“恐吓”较文雅、庄重,“吓唬”较粗俗。再如“散步”和“蹒跚”,“愤慨”和“生气”,“心灵”和“心”都属此类。(5)适用的对象不同:“掩盖”和“掩饰”都有把真相遮蔽起来的意思。可是“掩盖”适用的对象是具体的物体(如,“大雪

把道路都掩盖住了”);“掩饰”适用的对象不是具体的事物(如,“我们绝不能掩饰错误”)。再如“充分”和“充足”,“保护”和“保卫”,“暴露”和“揭露”等都以适用的对象、范围不同区别开来。

2. 在用法方面。词与词在长期相互配合运用过程中,体现了各自的特性。因此,我们从词与词的配合关系中可观察出它们意义上的差别。如“坚决”和“坚定”都表示“确定不移”的意思。“坚决”常和“肃清”“消灭”“取缔”“服从”等词配合;“坚定”常同“信心”“立场”“意志”“主张”等词配合。我们从中可看出“坚决”侧重于态度的果断;“坚定”侧重于立场的稳定。再如“交换”常同“资料”“意见”“礼物”相配合;“交流”常同“经验”“感情”相配合。因此可以看出“交换”适用于具体事物,“交流”只适用于抽象事物或比较概括的具体事物。

词义之间这些细微差别,用什么方法辨析出来的呢?以下几种方法可供参考。

(1) 词素意义异同分析法。意义相近的词,意义上大都是大同小异,同中有异的。词与词,相同的词素往往表示意义相同的部分,不同的词素往往表示意义微小差异的部分。辨析词义便可以从分析词素的异同入手。如,“寂寞”与“寂寥”都有冷静、无聊的意思。词素“寞”是清静、寂静的意思,词素“寥”是空虚、稀疏的意思。所以“寂寞”多指人们心情上的孤单和无聊;“寂寥”多指环境上的空旷、冷落。他如分析“改进”与“改善”,“复杂”与“庞杂”,“华丽”与“富丽”等的区别均可用此法。

(2) 语言环境观察分析法。如“力量”和“力气”两个词都有“劲儿”的意思。可是放在下面两句里却不能互换使用:

A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B 老李劳动的时候很卖力气。

通过上面两句比较可以观察出两词意义上的差别：“力量”是指“集体、个人或某一事物存在的威力”；“力气”是指“人或动物的劲头大小，其意义具体而常用于口语。”

(3) 反义对照分析法。如“软弱”和“虚弱”都有“缺乏力量”的意思，但“软弱”的反义词是“刚强”，“虚弱”的反义词是“健壮”。通过它们与反义词的对照便可看出其间意义的差别。再如，“夸大”和“夸张”都有“言过其实”的意思。“夸大”的反义词是“缩小”，“夸张”却没有和它相应的反义词，也可看出两者意义的差别。

以上几种方法是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的。这里只能为分析词义在方法上提供一点线索。事实上词义的分析工作是十分复杂、繁难的，主要是靠我们在长期的语言实践中仔细体察，反复比较词义之间的不同，不断积累经验，创造出更多更新的好的分析词义的方法。

(王 勤)

74 什么叫义素分析法?

词的每个意义都由更简单、更基本的义素构成,分析义素可以更深刻地了解词义并使语义形式化,对机器翻译十分有用。

例如有八个俄语词:

отец мать сын дочь дядя тётя племянник

父 母 子 女 叔 婶 侄子

племянница

侄女

它们的词义各不相同。但把它们加以对比,发现父、子、叔、侄四词有一个共同涵义——男性,与表示女性的四个词对比有一个义素“性别”。现以A表男性, $\bar{A}$ (非A)表女性。

父、母、子、女四词有直系亲属的涵义,与表示旁系亲属的四个词对比,又有一个义素“亲缘”,现以B表示直系, $\bar{B}$ 表示旁系。

父、母、叔、婶四词与另外四个词对比,又有一个义素“辈份”,现以C表长辈, $\bar{C}$ 表晚辈。

现在这八个词都可用三个义素的组合来表示。如:

отец (父)ABC 男性直系亲属长辈

дочь (女) $\bar{A}BC$ 女性直系亲属晚辈

余类推。

这种分析体现了语言分析的简明原则，八个对象只用三个形式标志，标志组合互不重复。

列表如下：

	отец мать сын дочь дядя тётя племянник племянница						
	父	母	子	女	叔	婶	侄
性别 A	+	-	+	-	+	-	+
亲缘 B	+	+	+	+	-	-	-
辈份 C	+	+	-	-	+	+	-
代码	ABC	$\bar{A}BC$	$AB\bar{C}$	$\bar{A}B\bar{C}$	$A\bar{B}C$	$\bar{A}\bar{B}C$	$A\bar{B}\bar{C}$

这种分析把每个词表现为义素的组合，写成代码，使语义形式化。下面举一个数字代码的例子：

如果义素“好”用 18 表示，“感觉”用 23 表示，“大”用 10 表示，那末，

“坏”就是 $\bar{18}$

“病”就是 $\bar{18} \cdot 23$ (感觉不舒服)

“小”就是 $\bar{10}$

“优异”就是 $10 \cdot 18$ (“大大的好”)

通过义素，机器可把人对话语的理解模式化。机器用义素分析法可达到如下的翻译：

英语 It is not new. (字面：Это не ново) 译成俄语

Это уже было раньше. (这不是新闻)

但是熟语的翻译要有更精密的规则，要按照整个熟语的意义分析出义素。否则，机器会按字面意义译出。如英语谚语

Out of sight, out of mind. (眼不见, 心不想) 相当于俄语的 С глаз долой, из ума вон. 但机器按照字面的义素分析可能翻译为:

$\overline{\text{зрение}} + \overline{\text{ум}} = \text{слепой идиом}$

视觉 + 理智 = 盲痴

具有相同义素的词的集合构成语义场。如具有“人”“亲缘”义素的词构成“亲属关系”的语义场。

义素分析的用处很多, 例如可以限制词的搭配关系。如“讲、想、劳动”等动词要求有义素“人”的名词做主语, 否则就是修辞上的拟人辞格。如童话里的“电灯想呀想呀。”

“喝”这一动词要求有义素“液体”的名词做宾语。“喝西北风”是例外, 这是惯用语, 但不能说“喝东南风”。

义素分析使语义形式化, 机器借助义素了解话语涵义, 译成另一种语言。

义素分析使语义更加精密, 是当前语义学研究的主要课题。

(王德春)

解释词义，是词典编纂中的一项主要工作。一部词典的质量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释义是否确切和简明。那么，怎样才能做到释义确切而简明呢？这除了必须具备丰富的资料和较高的语文修养以及有关各学科的专门知识之外，还必须研究和掌握释义的若干方法和要求。

概念和语词是密切相联系的。词典的任务之一就在于揭示语词所表示的概念。所谓解释词义，实际上就是给语词所表示的概念下定义。因此，正确掌握下定义的方法和要求，对词典工作者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常用的下定义的方法有四种。

1. 设定范围，指出界限，缩小概念的内涵。这种定义的结构，可以用下面的公式来表示：

“种”是“类加种差”。

例如，我们要给“作家”这个概念下个定义，就可以说“作家是在文学创作方面有相当成就的人”。这里，“作家”是种概念，也就是被定义者；“在文学创作方面有相当成就的人”则是“类加种差”，也就是定义者。其中，“人”是被定义者“作家”这个种概念的最相近的“类”，而“在文学创作方面有相当成就”则是“种差”。一个精确的定义，必须指出相近的类和种差，才

能把该概念与其他概念区别开来，揭示出该事物所特有的本质属性，也就是该概念的内涵。这种揭示概念内涵的定义叫做内涵定义，它在词典释义当中是要经常采用的。下内涵定义，必须遵守四条规则，这就是：1. 定义者的外延与被定义者的外延必须相等；2. 定义不能是否定判断；3. 定义不能是一个比喻；4. 定义不能循环。违反了这几条规则，概念就不可能被准确地表述出来，作为词典的释义来说也就失去了科学性。我们在注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科术语的时候，一般适于采用这种内涵定义的方式，因为这种定义能够帮助我们准确地揭示出事物的本质属性，具有较大的概括性。

2. 从外延方面来给概念下定义，这种定义叫做外延定义。这也是在词典的释义中经常使用的。例如，我们可以给“文学”下这样一个外延定义：指诗歌、戏剧、小说和散文。诗歌、戏剧、小说和散文是“文学”这个概念的外延，指出它们，同样能使人明白文学是什么，从而获得一个具体的认识。这种外延定义不是在任何场合都可以采用的。因为它有一个缺点，就是概念的外延所包括的事物，其数量往往是很多的，有时甚至是数不尽的，要把它们一一列举出来，不但很烦琐，而且往往是办不到的。其次，外延定义不能揭示概念的内涵，不能使人认识事物的本质特性。

3. 以内涵定义为主，以外延定义为辅的综合式定义。比如上面提到的“文学”一词，就可以把它定义为“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社会生活斗争的艺术，包括诗歌、戏剧、小说和散文”。前一部分是内涵定义，概括地指明文学的特有性质；后一部分是外延定义，进一步指出文学包括的具体对象。二者结合起来运用，就能使人对文学是什么有了深刻而具体

的认识,从而能更全面地把握住这个概念。所以,词典工作者在许多场合也经常使用这种综合的定义方式,用以加强释义的科学性和知识性。

4. 语词定义。这种定义适于用来说明一般语词、名称的含义。语词定义不是概念的定义,它只是有时候在形式上和概念的定义相符合,但它并不揭示概念的内涵。在语文词典里,对一般语词的解释,大多采用语词定义的方式。比如“公房”,可释为“属于公家的房屋”;“开导”可释为“以道理启发劝导”;“公共”可释为“属于社会的;公有公用的”,“万无一失”可释为“绝对不会出差错”等等。

给语词下语词定义,要注意语词的结构和词性。首先要看它是名词、动词还是其他词类,其次要看它是联合式、偏正式还是其他结构形式。明确了语词的词性和结构,才能把语词定义下得准确。有的时候,同一个语词具有不同的词性,意义上也有所区别,这时就必须分列义项,作不同的处理。例如“宽大”,当形容词是指“面积或体积大”;当动词是指“从宽处理”。又如“限制”当动词是“规定范围,不许超过;约束”的意思,当名词是“规定的范围”的意思。把词性弄错,就必然会影响到释义的准确性。

以上四种下定义的方法,是词典释义中常用的。此外,还有几种定义的代替方法,如:

(1) 指示的方法。指示是我们认识直接感知对象的最简单的方法。利用指示的方法,能够让人获得某个具体事物的表象,进而达到对表示这个事物的语词含义的理解。例如“黄色”,我们可以直接指出它是“象丝瓜花或向日葵花的颜色”;“咕噜”可以指出它是“象声词,水流动或东西滚动的声音”;

“手掌”可以指出它是“手在握拳时指尖触着的一面”等等。

(2) 描述的方法。描述是对个别对象的属性的列举，也可以是对一种过程的描述。例如某种动物或植物具有何种属性；某一社会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及其意义的叙述；某些物理现象或化学反应的具体过程的描写等等。通过具体的描述，同样可以使人明白语词所表示的事物的属性及其有关方面的知识。这种描述的方法，在百科性词典的释义当中是较为常见的，适用的范围也相当广泛。

(3) 特征描写的方法。特征描写，在于指出事物的显著特征，强调事物具有或不具有某种特定的属性。例如“鼎”的特征是三足两耳；“麋鹿”的特征是雄的有角，角象鹿，尾象驴，蹄象牛，颈象骆驼，等等。通过事物特征的描写，语词所表示的事物就更易于为人所认识，从而也就能达到释义的目的。

上述各种下定义的方法，都适用于词典的释义。它们既可以单独运用，也可以综合起来运用。

在词典的释文当中，还经常要运用到括注这种形式。括注的目的，在于交代语词的感情色彩、适用范围、搭配关系、语法特点等等。在语文词典里，括注对于释义的完整性来说更是不可忽略的。例如“大腹便便”，可注为“肚子肥大的样子(含贬义)”；“洪亮”可注为“(声音)大；响亮”；“开解”可注为“开导劝解(忧愁悲痛的人)”；“古板”可注为“(思想、作风)固执守旧；呆板少变化”；“开交”可注为“结束；解决(只用于否定)：忙得不可开交”。以上释文当中的括注，如果取消的话，释义就会显得有所欠缺，影响释义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因此，括注的恰当运用，也是释义当中应当注意研究的一种方式。

(吴崇康)

76 释义的科学性方面有哪些要求？

释义的科学性方面的要求，总的说来，不外是：意义分析要准确，语文表达要精练。现在略举几条原则，并在每条原则之下，各举正反两面的一些例证并加以说明。

（一）释义要精确简要，一字不苟

正面的例证，例如：

〔阿拉伯人〕 亚洲西南部和非洲北部的主要居民。原住阿拉伯半岛，多信伊斯兰教。

这样的释义在意义内容上是准确扼要的，既突出意义的实质，又概括得周到；在表达形式上也是简明精练的，不容增减一字。

反面的例证，例如：

〔效命〕 奋身以赴，贡献出自己的生命。《三国志·魏书·陈思王传》：“窃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发之功，以报所受之恩。”

这个释义累赘冗长，太不精要。只要留下“贡献生命”四个字就够了。“效”是“贡献”，“命”是“生命”。“效命”的含义是义尽于词，很清楚明白的，不必要说什么“奋身以赴”和“自己的”之类的话。即使再多说也无补于释义，恰恰相反，违反

了释义的基本要求。

（二）释义要圆满无缺，不宽不窄

正面的例证，例如：

〔话〕、说出来的能够表达思想的声音，或者把这种声音记录下来的文字。

这样的释义是周延无缺，宽窄相称，妥当贴切，恰如其分的。

反面的例证，例如：

〔烦辱〕 繁杂而又劳苦的事情。《周礼·秋官·司隶》：“邦有祭祀宾客丧纪之事，则役其烦辱之事。”

词目是“烦辱”，而释文却是用例中“烦辱之事”的翻译，也就是给“烦辱之事”这个词组释了义。所以释义中的“的事情”三个字应予删除，因为它不是词目“烦辱”的含义。这是释义太宽的病例。又如：

〔敖弄〕 调笑戏弄。《汉书·东方朔传》：“自公卿在位，朔皆敖弄，无所为屈。”颜师古注：“敖，读曰傲。”

这个释义只解释了词目“敖弄”中的“弄”字，而没有解释“敖”字。“调笑戏弄”是“弄”的含义，只是“敖弄”的含义的一半，而“敖”的含义却一无着落。这是释义太窄的病例。

（三）释义要扣紧词义，毫不含糊

正面的例证，例如：

〔医生〕 掌握医药知识、以治病为业的人。

〔医师〕 受过高等医学教育或具有同等学力、经国家卫生部门审查合格的负主要医疗责任的医务工作者。

这两个释义都扣住词义的本质特点，措辞确切，恰如其分，使我们清晰明白地理解到医生和医师这两个词的词义的

区别。

反面的例证,例如:

〔放怀〕 坦率尽情,不受拘束。温庭筠《春日偶作》诗:“自欲放怀犹未得,不知经世竟如何。”

词目“放怀”是义尽于词的,就是“放开胸怀”或“畅开怀抱。”这个释义揣摩得太深了,描写得太远了,容易游移变动不贴切原意,这不合释义的基本要求。释义要用科学性的言辞紧扣词义,不容许随意用描写性的说法。

(四)释义要区别类型,分别对待

词的数量是很多的,词的意义尤为纷繁。但是一切词及其含义都是可以给以分类的。不同类型的词要采用不同的释义方式。譬如说:简单的词义只要作简单的解释,复杂的词义就要作较繁的解释,诸如此类,等等。这个问题极为复杂,还有待于作进一步研究。

这里仅举两例。“红”是个感觉性的词,“语言学”是一种科学的名称。对它们所采用的释义方式就不可能相同。

试看《现代汉语词典》对它们的释义:

〔红〕 ①象鲜血或石榴花的颜色。

〔语言学〕 研究语言的本质、结构和发展规律的科学。

(五)释义要注意词性,分别处理

这条原则是和上面第四条原则有着连带关系的。由于它具有独特的重要性,而且人们往往会认为词性是语法问题而与释义无关,所以把它另外列作一条原则。

譬如说:名词有名词的释义方式,动词有动词的释义方式,形容词有形容词的释义方式。这是从古以来就是如此,不

是现在才是这样。

例如：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对“口”和“箸”两个词的释义：

〔口〕 人所以言食也。

〔箸〕(聿) 所以书也。

这两个释义用的是古代汉语的合乎逻辑格式的下定义式的判断句，都是用名词性词组给名词所作出的释义。

现代汉语的情况也是一样。试看《现代汉语词典》的下面两个释义：

〔糊〕 样子象粥的食物。

〔护士〕 医疗机构中担任护理工作的人员。

这两个释义用的是现代汉语的下定义式的判断句，也都是用名词性词组给名词所作出的释义。

不注意词性的重要性在释义时也会产生错误。下面举两个有错误的病例。

〔赙〕 旧指以财物助人办丧事。《左传·隐公三年》：

“武氏子来求赙，王未葬也。”

这里的例证中的“赙”是动词“求”的宾语，是名词，而释义却把“赙”错误地解释为动词，这是弄错了词性因而解错了词义的病例。作为名词的“赙”的含义应该解释为“助人办丧事所赠送的财物”。

〔方略〕 策划。《晋书·王濬传》：“濬设方略，悉诛弘（张弘）等。”孔戣《谢赐手诏书》：“乏御侮之筹谋，罕济时之方略。”

这两个用例中的“方略”都是名词，而释义把它们都解释为“策划”，“策划”是动词。“方略”和“策划”二者的词性和词义都不相符合。这也是一个把名词解释为动词的病例。（周钟灵）

77

什么是基本词汇？

打开《孟子》一书，可以看到有一些词我们并不陌生。如表示事物名称的：“人，天，牛，水，火，心，田，地，人民，土地，天下，田野”；表示方位的：“上，下，中，内，外”；表示动作和性状的：“有，来，死，杀，大，小，多”；表示数字的：“一，二，三，六，七”；表示否定、转折意思的虚词：“不，而，然而”等等。这些词语我们大家都熟悉；它们的意义十分明确，也是大家所共同理解的。直到今天，我们日常生活中还必需使用它们。这些词就是我们所说的基本词汇。

斯大林说：“语言的词汇中的主要东西就是基本词汇，其中包括所有的根词，成为基本词汇的核心。基本词汇是比语言的词汇窄小得多的，可是它的生命却长久得多，它在千百年的长时期中生存着并给语言构造新词的基础。”（《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这段话说明了基本词汇的内容范围和性质特点。一种语言所有的词的总汇叫词汇。词汇是由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组成的。基本词汇是语言词汇中的主要部分，它包括那些最原始、最单纯、最基本的词——根词。基本词汇的性质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即全民性、稳固性和能产性。

全民性表现在基本词汇标志的客观事物和现象是与人们

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密切相联系的,这些词的意义最明确,为全社会所共同理解和使用。这些词常常是使用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词。稳固性表现了基本词汇有很强的生命力,这些词代代相传,并不与人们隔膜,它一直是人们用来造句的基本材料。能产性表现了基本词汇有构成新词和词组的能力。比如“人”、“不”这两个词,在《孟子》一书中,出现的频率很高,“人”出现了 469 次,作名词用为 426 次;“不”出现了 1066 次,作副词用为 1065 次。自古至今,这两个词意义并没有改变,表现了很强的构词能力。有人曾以《同音字典》为材料,统计单字在词中出现的频率,其中“人”和“不”在词中出现的频率都在 200 次以上,是统计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素之一,这说明了“人”、“不”有极强的孳生新词的能力。如“人”构成的合成词有:“人民,人才,人称,人道,人工,人家,人间,人杰,人口,人证,人质,人寰,工人,男人,女人,大人,小人,爱人,情人,亲人,客人”等等。基本词常是词汇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常用词,但常用词不一定是基本词。

基本词汇有能产性,但具有构词能力的也不都是基本词。有许多古语词在现代汉语中都已为相应的词所代替,如“口——嘴,目——眼睛,思——想,立——站,足——脚”,而且一般说也不作为独立的词了,但它们的构词能力却是很强的。如“首”,用它构成的合成词就有:“首领,首脑,首长,元首,首相,首先,首要,首都,部首,俯首,斩首”等等。“首”虽在这些词中还保留了原来的意义,但它只是一个构词的成分——词素,它已失去了独立运用的能力,人们不用它来作造句的材料,所以“首”不是基本词。

基本词汇是稳固的,但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发展的

需要,基本词汇在不断地扩充、调整。基本词汇的扩充是以新词为主的。“飞机”曾经是一个新词,后来“飞机”的词义,使“机”产生了新的词素义,于是孳生了“机群”、“客机”、“僚机”、“运输机”、“轰炸机”等词。“飞机”一词的意义是明确的,并已为社会普遍运用,它的词义又固定在“机”的字义中,而且构成了许多新词,因此“飞机”成了基本词。今天,我们习用的许多基本词,如“人家,工作,次序,放心,注意,感动,动摇,亲近,热烈,聪明,强健,始终,非常,渐渐,因此,假使”等等,谁能想象它们至少在唐朝或唐朝以前已被人们共同使用了呢?这些词语都是在语言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陆陆续续地汇集到基本词汇中去的。

全民性、稳固性和能产性这三者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稳固性和能产性体现了全民性,全民性和能产性又使基本词汇获得了稳固性。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基本词都具备全民性、稳固性和能产性的三个特点的。

语言的词汇,除基本词汇外,就是一般词汇。一般词汇包括新造词、外来词、古语词和方言词,以及社会习惯语等。新造词是一般词汇中的生力军。

斯大林还说:“语言,主要是它的词汇,是处在差不多不断改变的状态中。工业和农业的不断发展,商业和运输业的不断发展,技术和科学的不断发展,就要求语言用工作需要的新的词和新的语来充实它的词汇。”(《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一般词汇象语言大脑的感觉神经一样,它首先对外界的变化发生感应,并以产生大量的新词来反映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的变化,同时满足社会交际的需要,处于不断改变的状态之中。

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它们是有机的整体。基本词汇是新词孳生的基础，新词是基本词汇扩充的主要来源。基本词汇是语言的基础，但一般词汇使语言更加丰富多采。

目前对基本词汇的研究是很不够的。如果我们能掌握现代汉语基本词汇系统，那么对提高中小学语文教学的质量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刘云泉）

78 什么是同音词？ 是怎样产生的？

有个小学校进行智力测验，出了这样一道试题：“苹果一斤是多少钱？”不少同学答做“五角”、“四角伍分”、“三角”等等市场上的苹果价目，老师直摇头。有的学生答做“一百钱”，受到了老师赞赏。这个题目所以能引起学生们的不同理解，产生不同的答案，因为它问的“钱”有歧义，它至少有两种毫无关联的意义。如用钱₁和钱₂表示，就是：钱₁，指货币，题目中指苹果价格；钱₂，重量单位，一斤的百分之一。钱₁和钱₂是读音相同而意思截然不同的两个词。

河南东部流行过一个歇后语：“罗锅腰上树——前（钱）紧”。意思是说货币缺少，手头拮据。字面上说的是人的身体前部紧张，实际上却利用同音现象，说的是钱紧。“钱”与“前”也是读音一样而意义毫不相干的两个词。

上面说的，同念一个 qián 音的，就有表示货币的，表示重量单位的以及表示空间方位的三个词。这些读音相同，意义不同的词就叫做同音词。在有文字的语言中，又有一层书写形式上的问题。汉语中一种鸟名叫杜鹃，一种观赏植物名也叫杜鹃，这和前面说的钱₁和钱₂一样，是书写形式相同的同音词。汉语中一种弹拨乐器叫琵琶，一种果树也叫枇杷，这和

钱、前一样是书写形式不同的同音词，为便于称说，有人把前者叫做同形同音词，后者叫做异形同音词。

同音词现象在各种语言中都是存在的，它是通过很多途径形成的。

一种语言，越是历史悠久，表现力丰富，其词汇数量就会越多一些。比如汉语、英语，大型的词典就会收到四、五十万个词或词组。而任何一种语言的语音系统都是由数目有限的音素组成的。由音素构成的元音、辅音及其组合成的音节数目也不是数量很大的。比如汉语普通话有 21 个声母，34 个韵母，组合成四百多个音节，加上声调变化，普通话也不过 1300 多个音节（如不算轻声，理论上可以形成 1600 多个音节）。汉语词汇丰富，如果说通常使用的现代汉语词语有两万个，而其中单音节词占百分之二十，那么单音节词就会有 4000 个。这四千个词用 1300 多音节表达，就有一个较少的音节与较多的词汇之间的矛盾，这就必然利用同音手段加以解决。所以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同音的单音节词就有很多。比如同念 jì 音，就有“既、记、寄、季、计、祭、系、冀、技”等词；同读 zhì 的，也有“至、志、治、质、制、智、痣”等词。即便多音节词，也存在不少同音词，如“正式、正事、正视”，“公式、工事、攻势、公事”等等。同样道理，用较少的字（常用汉字不过三千字）书写较多的词，同形的词就不可避免。汉字中所谓假借字正是用一个字表示同音词的办法形成的，而这正是形成同形同音词的重要途径。

其次，由于语音发展变化，使得一些原来不同音的词读音一样了。比如，明代以前北京一带语音中存在入声和以 -m 收尾的“闭口韵”，尖团音也不相同。经过发展变化，入声消失了，原来的入声字念成其他声调。这样“力”（入声）和“利”（去声）

就同音了，水力——水利、权力——权利也就成同音词了。闭口韵后来变成收-n尾的韵母，于是甘心(二字原收-m尾)——千薪(收-n尾)就同音了。尖团音也没有了区别，先(尖音)——铅(团音)、签(尖音)字——铅字就成了同音词了。

第三，由于词汇发展变化，也造成了一些同音词。有些词原是一词多义，随时间推移意义上联系变得不明显了，就成了同音词。比如量词“副”与形容词正副的“副”，躯干的一部分的“背”与背部对着的动词“背”分别成为同音词。由于借用外来语也产生了一些同音词。如从法语来的长度单位“米”跟吃的“米”同音，从蒙古语借来的车站的“站”与站立的“站”同音。

如开始时举例所说，同音词有时会造成词义混淆，妨碍交际。但在一般说话中引起混淆的情况是很少见的，在具体语言环境里，由于有上下文和手势、声调等各种手段的配合，人们会确定词义的。同音词是语言的特殊现象，人们还利用它有可能产生词义混淆的特点，故意使用它以达到其特殊修辞效果。如双关语，很多是利用同音词造成的。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的《竹枝词》“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情”。其中就用了表示天气变化的“晴”暗谐表示爱情的“情”，含蓄意深，脍炙人口。《天安门诗抄》有一首诗：“纪念碑前洒诗花，诗刊不登报不发。莫道谣文篇篇载，此是人民心底花。”其中“谣文”就利用跟“姚文”同音关系，讽刺姚文元审批发表的黑文章。利用同音词可能引起误会的特点，达到幽默、讽刺的效果，这是相声、笑话中常见的。如相声《动力研究》中将与姓何的恋爱产生的动力叫做“核动力”，利用了“何”、“核”同音。

(韩敬体)

79 什么是谚语?

谚语是通俗浅易、生动活泼的韵语或短句,它以口语的形式、比喻或概括的手法表现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经验或感受,是一种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和使用的“现成话”。

汉语的“现成话”有很多,和谚语相似又相区别的还有成语、歇后语等等。

谚语和成语比较,可以看出有下列一些方面的差别。

第一,谚语主要以口语形式存在,是相当浅近易懂的通俗用语;成语主要以书面语形式存在,许多成语保留有“文言”成分。同一意思,文白之分非常明显:

饮水思源(成语)——吃水不忘打井人(谚语)

见异思迁(成语)——这山望着那山高(谚语)

众擎易举(成语)——众人拾柴火焰高(谚语)

“吃水不忘打井人”“众人拾柴火焰高”比“饮水思源”“众擎易举”要通俗得多,更加口语化。

第二,成语言简意赅,形式上是词化的词组,多数为四个音节;谚语以总结经验为主,多采用短句或对联式的韵语。成语虽有八个音节的,实际上是四个音节的扩大形式,例如“宁为鸡口,勿为牛后”。事实上,八音节的成语有一部分还是从

谚语转化过来的：

《潜夫论》：“谚曰：一犬吠形，百犬吠声；世之疾此固久矣哉！”

《史记·李将军传赞》：“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也。”

第三，成语、谚语都是定型性的现成话，但成语的定型性更强，相对地说，谚语的定型性没有成语强。在一般情况下，成语是“一字不易”，谚语却可以因地而有不同的说法。“愚公移山”“坚贞不屈”不能说成“愚公搬山”“坚贞不服”；“跑了和尚跑不了寺”“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可以说成“跑了和尚跑不了庙”“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一个谚语可以有几种近似的说法，而其整体意义并不受影响，如“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三个臭皮匠，顶上一个诸葛亮”“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三个小皮匠，赛过诸葛亮”并没有整体意义上的区别。

第四，在造句功能上，成语可以独立成句，但多数是充当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等句子成分；谚语可以充当句子成分，但多数独立成句。单说“天长地久”“满城风雨”，听者会觉得意思没完，成了半截儿话，单说“工作没大小，志气有高低”“大家一条心，黄土变成金”听者觉得这句话意思完全了。谚语单独成句，单句、双句的都有：

奶奶笑嘻嘻地说：“你们住城，俺住乡嘛，十里还不同俗呢！这会儿，奶奶不怪罪你们。”（《红旗谱》249页）

“唉，十指尖尖有长短，树木林莽有高低，怎么能一刀斩齐？人上一百，形形色色，难免良莠不一，何况是上千上万！”（《李自成》第一卷上册126页）

第五, 谚语通俗易懂, 口头流传, 因此它和人民群众关系深; 成语, 特别是那些历史悠久的成语, 从古书上大都可以找到它们形成的来源或出处, 因此, 相对说, 它和知识阶层关系更密切些。不过, 和前四点比较, 它已不是主要的了。

歇后语在一般情况下和谚语不发生混淆。只是一些由谚语演变而成的歇后语, 在比喻部分与说明部分连在一起的时候, 有点恢复到原来谚语的样子。例如说“剃头担子——一头热”, 是歇后语; 说“剃头担子一头热”就有点谚语的味道, 但还是歇后语。“浪子回头金不换”“初生牛犊不怕虎”这是谚语, 说成“浪子回头——金不换”“初生牛犊——不怕虎”, 这是歇后语化。

谚语的思想内容, 是谚语存在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多数谚语来说, 它是人类经验和智慧的结晶。高尔基说: “谚语和民歌都是简短的, 可是它们所包含的智慧和感情, 却够写出整本的书来。”谚语这个形式本身没有阶级性, 每个阶级都想用它来表达、传播自己的思想, 因此, 少数谚语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带有明显的剥削阶级的烙印。这是使用谚语时必须加以注意的。

(马国凡)

“歇后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指的语言形式并不相同。

早期的歇后语，指的是社会上通用的成语、成句的省略，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称之为“藏词”。“藏词”有的是省略成语、成句的后半部分，即“歇”掉“后”一部分，有的是省略成语、成句的前半部分，即“歇”掉“前”一部分。前者象用“倚伏”代“祸福”，来自《老子·五十章》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后者象用“友于”代“兄弟”，源于《书经·君陈》的“惟孝友于兄弟”。这类歇后语以典籍中的成语、成句为基础，流行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

起源较晚的后期歇后语，在结构上是“比喻——说明”式的俏皮话。这类歇后语是先做一个比喻，然后再说出本意；只说比喻部分，不说说明部分，说明部分让听者悟出，这也是一种“歇”“后”。例如：

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

排骨烧豆腐——有硬有软

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

纸糊的灯笼——心里明

“泥菩萨过江”“排骨烧豆腐”是一种比喻，“自身难保”“有硬有

软”是前边比喻的说明或揭晓。

歇后语的比喻和说明两个部分有内在的逻辑上的联系，失去了这种逻辑上的联系，比喻与说明之间就不协调，也就缺乏必然性，变得不易理解，因此，任何一个好的、为大家通用的歇后语，其比喻都是与比喻的结果相一致的。

歇后语的比喻部分与人民的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有的反映一般事理，如“竹篮打水——一场空”“水牛掉在井里——有力使不出”；有的反映生活经验，如“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老太太吃柿子——嘬瘪子”；有的反映生产经验，如“钻井出油——全靠压力”“芝麻开花——节节高”；有的反映历史传说，如“徐庶进曹营——一语不发”“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有的反映一种诙谐的虚构，例如：

烟筒里招手——往黑处引

阎王爷贴告示——鬼话连篇

王八吃秤砣——铁了心

武大郎攀杠子——两头够不着

这些都是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但用作歇后语的比喻，却给人以幽默风趣之感。

歇后语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喻义的，它依靠比喻部分说明道理，说明部分是前边比喻的推理结果。例如：

卖人参的听了，“哑叭梦见妈——说不出的苦”，急的暴跳如雷。（《儒林外史》第五十四回）

虎妞：“你可倒好，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呀！姑奶奶来看你，怎么？还得在过道儿上等着，好大的排场呀！”（剧本《骆驼祥子》）

“说不出的苦”是“哑叭梦见妈”比喻的揭晓，是逻辑推断的合

理结论。另一种是谐音的歇后语，它在喻义的基础上加进一层谐音的关系。例如：

瞎子听了半天，听他两人说的都是“堂屋里挂草荐——不是话”，也就不扯劝，慢慢地摸着回去了。（《儒林外史》第五十四回）

冯二爷：“不敢，冯二办事向来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剧本《骆驼祥子》）

“堂屋里挂草荐”喻义的结果应是“不是画”，“画”与“话”同音，“不是画”谐音为“不是话”。“不是画”是比喻的意义结果，而“不是话”是作者用意的真正所在。“小葱拌豆腐”喻义的结果应是“一青二白”，“青”指葱，“白”指豆腐，“青”与“清”同音，“一清二白”才是作者真正要说的。谐音的歇后语，多数用同音代替，少数用近似音，如“猪八戒吃鸡蛋——正对数”，“正对素”是喻义的结果，“正对数”是谐音的结果，“数”与“素”只是近似音。谐音的歇后语，多数只谐一个音节，少数谐两个或更多的音节，如“猪八戒的脊梁——无能之辈”，猪八戒法名“悟能”，“悟”谐“无”，“辈”谐“背”。

歇后语的使用，有的将比喻与说明两部分都说出，有的只说比喻部分，省略了说明部分。前者的长处是清楚明白，便于理解；后者的长处是含蓄曲折，便于玩味。

（马国凡）

81

什么是禁忌语？

在说话时，由于某种原因，不许、不敢或不愿说出某些词语，而用另外的词语来代替的，就叫做禁忌语。

明代陆容所著《菽园杂记》中记载说：“民间俗讳，各处有之，而吴中为甚。如舟行讳住讳翻，以箸为快儿，幡布为抹布；讳离散，以梨为圆果，伞为竖笠；讳狼藉，以榔槌为兴哥；讳烦躁，以谢灶为谢欢喜。”这里的“俗讳”就是禁忌语。

禁忌语产生于迷信观念和封建礼法。

《菽园杂记》中所说的禁忌语就是由于迷信观念产生的。这种迷信观念又出于人们的愚昧无知。这种人往往认为，某些词语与其所指称的事物之间有着一种特定的、神秘的联系，在特定的场合，如果说了这些词语，就要触犯这些词语所指称的事物，就会给人带来灾祸，因而就须要避讳这些词语。如乘船忌说“沉、扣、翻、住”等词语，甚至还不能说与这些词语同音的词语，于是，“包东”代替了“陈”，“快儿”（即“筷子”）代替了“箸”，“抹布”代替了“幡布”，这“包东、快儿、抹布”就成了“陈、箸、幡布”的一种特殊同义语——禁忌语。

这类反映迷信观念的禁忌语各地都有。过去，广州把“猪舌”叫做“猪利”，就是由于“舌”与“蚀”谐音；把“猪肝”叫做“猪

润”，就是因为“肝”与“干”谐音。这“蚀”与“干”意味着赔本和破产，是人们最害怕的事，因此就成了应避讳之词。诸如把“通书”（黄历）叫做“通胜”，把“猪血”叫做“猪红”，把“担竿”（扁担）叫做“担润”，把“伞”叫做“遮”，把“空房”叫做“吉房”，都属于这一类。

这类禁忌语，在外国也有，特别在一些落后的土著民族中存在。比如有些部族和民族相信，在名字和叫这个名字的人之间，存在着特别的有机联系。人一旦说出了自己的名字，就会把本身的一小部分分割出去，如果多次重复自己的名字，他就会消瘦下去了。正因为如此，喀菲尔斯坦的妇女没有当众说出自己丈夫名字的权利，不仅丈夫的名字，就是含有丈夫名字一个音节的那些词，也常常变成避讳的东西，因此，她们就不得不想出一些特别的词语来代替。

从表面上看，这类禁忌语与黑话相似。比如旧时广东的盗贼集团，把糖叫做“甜砖”，把茶叫做“清莲”，把“轿子”叫做“黑马”；云南滇西一带的马帮，把眼睛叫做“灯笼”，把夜间露天宿营叫做“望星星”。《林海雪原》中土匪把“什么人？到哪儿去？”说成“蘑菇，溜哪路？什么价？”黑话与这类禁忌语相似之点是：都把避讳之词换了一个说法，作用都在避讳，都是一种被歪曲了的语言。但二者仍有不同：黑话源于保密，禁忌语源于迷信；黑话只在某一社会集团中通行，而这类禁忌语则在某一地区的全民中通用。

还有一类反映封建礼法的禁忌语。

在封建社会中，由于封建礼法的束缚，有许多现象也属于禁忌之列，明令不许、人们也不敢说它。比如，皇帝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人们不能说他的名字，只能说“皇上”、“陛下”、“万

岁”、“圣上”；臣子谈及君主的死，讳言死字，得说“驾崩”、“晏驾”、“山陵崩”、“万岁千秋之后”一类避讳语。帝王、后妃的名字是须避讳的，人们不许用其中的一个字，只能用同义的字去代替它。比如，为避晋文帝司马昭的讳，晋朝人就称汉代的王昭君为“明君”、“明妃”（昭、明同义）；为避隋炀帝杨广的讳，隋朝人就把三国魏张揖所写的《广雅》叫做《博雅》（广、博同义）。这类禁忌语后人大多改回过来。

禁忌语既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产生，也必定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逐步消失。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科学知识的普及，随着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禁忌语的绝大部分已经消失。

（周家筠）

82

什么是委婉语？

为了减少话语的刺激性，缓和说话的语气，使说话收到较好的效果，不直截了当道出本意，而是委婉曲折地把本意说出，这样的用语就是委婉语。

请看曹禺《日出》中方达生和陈白露的一段对话：

方 竹均，怎么你现在会变成这样——

陈 （口快地）这样什么？

方 （话被她顶回去）呃，呃，这样地好客——这样地爽快。

陈 我原来不是很爽快么？

方 （不肯直接道破）哦，我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你好象比从前大方得——

陈 （来得快）我从前也并不小气呀！哦，得了，别尽捡好听的话跟我说了。我知道你心里是说我有点太随便，太不在乎。你大概有点疑心我很放荡，是不是？

方 嗯——对了。……

在这段对话里，方达生本意要说陈白露现在变得“太随便”、“很放荡”，但他怕这样说有伤对方，不肯一语道破，而说她“好客”、“爽快”、“大方”。这“好客”、“爽快”、“大方”实际上

就是“随便”、“放荡”的特殊同义语——委婉语。这些委婉语的运用，缓和了方达生的语气，婉转地表达了方达生的本意。

委婉语具有一种特殊的修辞功能。由于它是一种“缓和了的词语”，它回避了刺耳的语词，就使语言产生一种特别的效果。因此，它常常在以下场合被运用：在对话中，要顾念对方的感情；在外交场合中，出于礼貌。

这第一种委婉语，在书面和口头都被普遍运用。例如在一个瘸子面前谈到跛子时，就得变个话说“他的脚有点不方便”，这样说才不致伤了对方感情。如果我们不便直截了当地说一篇文章写得很糟糕，就不妨说这篇文章有一些“可商榷的地方”；如果你不是说“应当这样”，而是说“是不是可以这样”等词语，那么，尽管“可商榷的地方”都被你批评得体无完肤，但对方却比较易于接受，不致觉得你的意见是强加于人。再如说“他不大聪明”等于说“他笨”，说“他多喝了几杯”等于说“他醉了”等等。这些委婉语减少了话语的刺激性，使语言产生一种特别的效果，运用得当，确是一种语言艺术。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待人接物，还是思想工作，都是很必需的。

在外交场合中，委婉语的运用又是另外一种情况。在先秦的散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在廷议、书奏中或订盟、战事等外交场合里，出于礼貌，常常运用委婉语。例如：

子反曰：“如天之福，两君相见，无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遗，焉用乐？”（《左传·成公十二年》）

这句话是说，如果老天降福，晋楚两君相见，也不过以一箭相送，哪里用得上音乐？战争是祸事，却说成是老天降福；不说交战，而说两君相见，话说得很委婉，却不能掩饰自己的真正意图，成了一种虚伪的外交辞令。

在现代的外交场合中，委婉语的运用也很常见。例如苏联继在择捉、国后两岛之后，又在色丹岛增建军事基地、增加军事力量，对日本和西太平洋构成新的威胁。对此，日本各党领导人都发表谈话，表示抗议。社会党书记长多贺谷真稔发表谈话说：“如果防卫厅发表的苏联在色丹岛设置军事基地是事实的话，从日苏友好关系和相互信任来说，是极为使人遗憾的。”（《文汇报》1979年10月5日）这“使人遗憾”就是常见的外交辞令，它出于礼貌，委婉地表达了一种不满情绪和抗议。

委婉语和禁忌语有相似之点：二者都要回避某些词语，避讳词语同被避讳词语构成一种特殊的同义关系。但二者又有区别：禁忌语是遇犯忌触讳时用，用词意在代替；委婉语是为增强表达效果而用，用词意在修饰。禁忌语在语言表达上无积极修辞作用，而委婉语则有积极的修辞作用。

（周家筠）

词分为单纯词和合成词两大类。由一个语素构成的词叫单纯词，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素构成的词叫合成词。现代汉语里合成词的构成方式有重迭、附加、复合三类。复合词是合成词里数量最大的一种，它是由两个以上不同的实语素按并列、主从、动宾、动补、主谓等关系复合而成，可以分并列复合词、主从复合词、动宾复合词、动补复合词、主谓复合词以及复杂的复合词等几种。

一、并列复合词。并列复合词大多数是两个语素并列，也有三个语素并列，至于四个语素以上的两两并列以及迭罗汉式的并列，那是短语。互相并列的两个成分一般是同类成分，并列式极容易凭意义决定。

名 词：	人民	粮食	颗粒	大小	长短	买卖	教授
	幸福	情感	工农兵				
形容词：	艰苦	光明	美丽	矛盾	保守		
动 词：	学习	调查	脱离	纪念	节约	投奔	成为
	开始	计划	申请	练习	包括	倡议	招致
	辅导	发现	原谅	召集	告诉	航行	流动
	破灭	降落	生活	亲近	牺牲		

副 词：刚才 全都 反正 略微 早晚 千万 一再
并列复合词在意义上有以下几种情形：

1) 两个语素的意义基本上相同，复合以后相当于其中一个成分(加黑点)的意义：“窗户、眼睛、狐狸、声音、言语、清楚、分散、存在、稍微、坟墓、性命、珍宝、多余、类似、全都、活动”

2) 两个语素复合后意义相加。有的是相对义相加：“山水、骨肉、水土、父母、热闹、琢磨、斟酌”。有的是反义相加：“收发、利害、大小、长短、厚薄、咸淡”。

3) 两个意义相近或相对的语素复合后，产生一种新的意义或比喻义。如“心肝”(指良心或所爱的人)、“斤两”(比喻分量)。类似的有：“人马、脾胃、领袖、手足、蛇蝎、唇齿”。

4) 两个语素复合时，原先是意义相加，后来由于有一个语素的意义逐渐消失，只留下其中一个意义，或偏重其中一个意义(加黑点)。如“国家、忘记、睡觉、兄弟、图书、褒贬”。

二、主从复合词。有一个语素是主要的，另一个语素起修饰、限制或补充的作用。

名 词：a) 前偏后正：油菜 牙膏 驼肉 语法 黑板
甘草 娇气 饼干 肉松 男人 双料 飞机
塞音 燃料 吊灯 门前 五金 口试 夏至
b) 前正后偏：纸张 书本 车辆 桌上 地下
家里

形容词：通红 早熟 肤浅 个别 相同 大胆 积极
封建 民主

动 词：a) 动→动 迁就 代理 死守 葬送 争取
诬告 挽留 分配 促使 补助 跃进 交谈

b)形→动 重视 小看 公布 忠告 白费
伪装 欢迎 怒吼 狂笑 深思

c)名→动 油炸 空投 笔述 春灌 亩产
副词: 阔步 高声 满心 早日 老早 事先 正巧
务必 碰巧 统共

连词: 不料 以致

量词: 英寸 公顷 毫米

三、动宾复合词。前一语素支配后一语素。这类复合词以动词、形容词居多,名词见于病名“便血、伤风、恶心”等。

a) 宾是“名”: 进军 成心 合法 跑街 提议 列席
关心 着眼 上火 夸口 值日 厌世 出版

b) 宾是“动”: 取笑 怀疑 发问 上算 催眠 起哄

c) 宾是“形”: 吃香 好强 认真 乞怜 举重 发麻
怕羞 告老 耐久

以上为凝固的动宾复合词。

动宾复合词可以有有限形式的扩展,主要有两种扩展法:

a) “动”后加“了”。如“入神~入了神”。类似的有“害羞、受惊、认输、磕头、扎根”等。

b) 宾带修饰成分: “注意~注点儿意”, “省事~省许多事”, “留神~留一个神”, “理发~理一个发”, “革命~革敌人的命”, “打架~打一架”, “睡觉~睡一觉”等。

本来不是动宾的复合词,当它是动宾结构。如“提醒~提了一个醒”, “废话~废什么话”, “慷慨~慷国家之慨”。这种情形表明动宾的构词能力很强。

四、动补复合词。后一语素(以“形”为多数)补充说明前一语素。这类复合词只能用作动词,限于不能插入“得、不”的

动补结构。① 如“扩大、改进、说明、扩张、形成、解散、征服、减轻、加深、革新、改善、鼓足、充满、放松、加强、提醒”。

五、主谓复合词。后一语素陈述前一语素。这类复合词以动词、形容词居多，名词只见于疾病、节气、自然现象等名称。

名 词：	便秘	气喘	耳鸣	心悸	腹泻	春分	霜降
	位移	日蚀	海啸	年终	口红		
动 词：	肩负	身患	眼看	例如	理应	貌似	自信
	自理	自愿	目睹	面临	口述	口授	声张
	自杀	意会					
形容词：	胆怯	肉麻	性急	自卑	自大	自负	自豪
	自私	自觉	口吃	口臭	口重	口快	心焦
	心善	技痒	耳生	耳熟	眼熟	面生	神往
	年青	年轻	手松	耳背	理短	胆小	眼花

这类复合词有时候一扩展就变成短语。复合词是引申义，短语是字面上综合的意义。如“天亮”可以是一个复合词（“还没天亮”），也可以是一个短语（“天还没亮”），“手软”可以说“这么手软”（复合词），也可以说“手这么软”（短语）。类似的有“心烦、嘴硬、头疼、眼尖、眼红、碱大、胆小”等。

六、复杂的复合词。以上讨论的复合词都是简单的，即直接成分都是单个的语素。如果直接成分本身不止一个语素，

① 下列一些动补结构宜看作短语：1)能插入“得、不”表示可能与不可能。如“看见、震塌、学会、吃完”。2)必须带“得、不”。如“来得及、站得住、对不起、说不上、忙不开”。

跟动补结构有关的：1)动趋式。如“选上、走开、看上去、拿起来”；2)动介式。如“来自、献给、生于、坐在”。它们是介乎词和短语之间的形式，不妨看作词化短语。

复合词的结构就复杂起来了。

三个语素的主从复合名词，它的层次构造有 2+1 (“割草机”)和 1+2 (“副教授”)两种：

割 草 机 (2+1) 副 教 授 (1+2)



“割草”和“机”是主从关系，“割”和“草”是动宾关系。“副”和“教授”是主从关系，“教授”是并列关系。

a) 2+1, 后是名：五言诗 新闻片 青春期 糖醋鱼
金银花 消防队 高射炮 避雷针 殖民地 收音机
地动仪 鼓子词 慢性病 土敏土 乒乓球
科技组

b) 1+2, 后是名：冬小麦 鼻韵母 东半球 坏分子
亚热带 古文字

c) $\left. \begin{array}{l} 2+1 \\ 1+2 \end{array} \right\}$, 后是非名：细菌战 呱呱叫(蚰蚰) 公母俩

小广播 再生产 半封建

还有一种紧缩式或减缩式复合词，即所谓简称。如“民航——民用航空”、“师院——师范学院”、“科委——科学技术委员会”、“中文系——中国语言文学系”(以上为紧缩式)；“清华——清华大学”、“公社——人民公社”、“花生——落花生”、“中小学——中学小学”(以上为减缩式)。

紧缩式就是把一个较大的语言单位通过紧缩的方式简化为一个比较小的语言单位，一般由短语简化为一种特殊形式的词，简化前后，内容不变。减缩式是从全称中截取一部分，即用掐头或去尾的方式形成的。

紧缩或减缩都可能引起歧义。“人大”既是“人民大学”的

简称，也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紧缩。《红楼梦》要是减缩为《红楼》，听起来就可能跟作为地名的“红楼”（北京沙滩的红楼）相混。

最后提一提同位复合词。这类复合词两个语素所指相同，只用作名词，如“卡车、鳊鱼、柳树、a 音”。

（陈建民）

84

什么是偏义复词？

偏义复词是一种联合(或称并列)关系的合成词。

联合关系的合成词是由意义相同、相近、相反或相对的两个词根组成的。组成后,有三种情况:一是两个词根互相补充说明,如“平稳”、“孤独”、“伟大”、“语言”;一是两个词根合起来表示深一层的抽象意义,如“动静”、“笔墨”、“东西”、“横竖”;第三种就是偏义复词。偏义复词中两个词根只有一个词根表示意义,另一个则成为陪衬,如:

国家(只有“国”的意义)

质量(只有“质”的意义)

是非(只有“非”的意义)

兄弟(只有“弟”的意义)

偏义复词起意义作用的词根,有的在前,有的在后,并无固定的位置。“国家”、“质量”、“妻子”是前面的词根起意义作用,“是非”、“兄弟”、“褒贬”是后面的词根起作用。

偏义复词的两个词根,意义或是相反,或是相对,而不会是相同或相近。因为相同或相近的词根就是其中一个意义消失了也不容易在词的意义显现出来。例如“语言”中的“语”和“言”是同义,只要是一个表示了“语言”的意义,另一个也就

表示了意义。

偏义复词在由词组变成词的过程中或在成词初期两个词根意义并存,并没有发生偏义现象。例如“褒贬”,《春秋序》中“推变例以正褒贬”就是“褒”、“贬”两义俱存,现在说“怕落褒”

根据就容易看错偏义复词。“树木”是互相补充的联合复词：“树”和“木”是同义成分。“木”另一个意义是木头，但“树木”中的“木”是前者，不是后者，如果看成是后一意义，就会误认“树木”也是偏义复词，那就错了。

互相补充的联合关系复词，有的词根意义开始弱化，但在弱化了了的词根，其意义没有彻底消失以前，也还不能算作偏义复词。例如“城池”，“城”指城市，“池”指护城河，“城池”里的“城”的意义占主导地位，“池”的意义已弱化，“城池”并不完全是“城”。试比较：

钮文忠设宴管待，馈送礼物，一面准备擂木炮石，强弓硬弩，火箭火器，坚守城池，以待救兵。（《水浒传》九十二回）

安士荣、于玉麟等，领兵急拥进城，闭了城门。（同上）“坚守城池”，主要守城，也包括护城河，“进城”就是进“城”。类似的还有“坟墓”、“吊唁”等也有弱化现象。“坟墓”包括有土堆标志的“坟”和平地深葬的“墓”，但现实生活中“坟”多“墓”少，后者的意义受到限制。“吊唁”包括祭奠死者的“吊”和慰问死者家属（生者）的“唁”，由于使用上偏重死者而使慰问生者的意义略有弱化。但，这都还不是偏义复词。

（马国凡）

凡具有共同特点的语法形式概括起来就成为一种语法手段,换言之,语法手段就是把语法形式归类得出来的类名。

语言中任何语法成分都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都有语法意义和语法形式两个方面。表达一定的语法意义的语言形式为语法形式,通过语法形式表达出来的抽象意义为语法意义。语法意义靠语法形式来表达,语法形式是语法意义的表达者。例如汉语“同志们”“朋友们”,两个词的词汇意义是不同的,但他们有共同之点,就是都带“们”,并具有“复数”这一共同的附加意义。这“复数”的语法意义是由“们”表示出来的,这“们”就是“复数”这一语法意义的表达者。英语的 comrades 和 friends 同样如此。comrades 和 friends 都带-s,都具有复数的语法意义,这复数的语法意义则是由“-s”这一语法形式表示出来的,“-s”就是复数这一语法意义的表达者。

不同的语法意义往往由不同的语法形式来表达,如汉语“好生活”和“生活好”,这是两个不同的句法结构,前者是限定结构,后者是主谓结构。这两种不同的结构表达了两种不同的关系意义,前者是修饰关系,后者是陈述关系。这两种不同的关系意义由不同的语法形式表达出来,前者是限定成分在

前,受定成分在后,后者是主语在前,谓语在后。这虽是两种不同的语法形式,但这不同的语法形式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用词的顺序来表达。词的顺序虽然不同,但可以概括为一种共同的语法手段——词序。

相同的语法意义可以由不同的语法形式来表达,如表人的复数的语法意义,在汉语由“们”来表达,在英语则由“-s”来表达。这“们”和“-s”是不同的语法形式,但这不同的语法形式之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附加”。把这具有共同特点的语法形式概括起来就成为另一种语法手段——附加法。

在阿拉伯语里,“书”的单数和复数的对立是由元音屈折这一语法形式来表示的:单数(kitab)复数(kutub)。在意大利语里,阳性和阴性的对立可以用后补屈折的语法形式来表示,如“儿子”为figlio(阳性),“女儿”为figlia(阴性)。这元音屈折和后补屈折可以概括为一种共同的语法手段——内部屈折法。

由以上例子可知,语法手段就是具有共同特点的语法形式的概括。

各个语言中的语法形式虽然纷繁多样,但归纳成语法手段,却是有限的,主要有词序、虚词、附加法、内部屈折、重迭、异根法、重音、语调等八种。

词序 用词在词组或句子中的先后次序来表示语法意义的手段叫词序。在词形变化较少的语言如汉语里,词序较固定,词序就是一种重要的句法手段,如“我爱祖国”、“祖国爱我”这两个句子,主语和宾语完全靠词序来确定,“生活好”、“好生活”的不同结构关系也全靠词序来表达。

不同的语言,词序不尽相同。以主语、谓语、宾语在句中

的位置来说，汉语用“主——谓——宾”的次序，而日语则是“主——宾——谓”的次序。以定语和中心词的位置来说，汉语用“定语——中心词”的次序，而法语、越南语、傣语则用“中心词——定语”的次序。

在同一语言的不同方言中，词序也有不同。以双宾语的位置来说，汉语普通话说“给你钱”，在湘语、吴语和粤语里都说成“给钱你”。以副词的位置来说，普通话中，副词总是放在动词之前，而客家话中有些副词的位置却放在动词之后。例如普通话说“多吃一些，多拿一些”，客家话说成“食多兜、拿多兜”。

虚词 虚词又称辅助词。它本身没有词汇意义，是专表语法意义的词。它表示实词的语法变化，表示实词与实词、句子与句子间的相互关系，表示说话内容与主客观的关系。

各种语言中都有虚词，如冠词、介词（前置词和后置词）、连词、助词、语气词等。虚词数量不多，但使用频率很高，是常用的语法手段。虚词是实词的外部的语法形式，也叫外部形态。

附加法 给一个词增添或变换词缀来表示词的语法意义的方法，叫附加法。常见的是前加和后加：词缀附加在词根前叫前加，附加在词根后叫后加。前加的，例如俄语的 на—писать（写，完成体），爱努语的 u—kema（脚，复数），汉语的“老——师”（名词的标志）。后加的，例如英语 read—ing（读，现在分词），hot—ter（热，比较级），俄语 дела—л（做，过去时），维吾尔语 at—lar（马，复数），汉语的“同志——们”（人的复数）。

有变格或变位的词中，变换词缀以表示不同的语法关系，

例如俄语名词“报”газета 单数的主格、所有格、与格、宾格、造格、前置格分别是 газета、газет—ы、газет—е、газет—у、газет—ой、газет—е、除主格外，其余各格都是通过词尾变化来表示的。至于 газета 因没有词尾而表示主格，这叫做零词尾，与有词尾的相比，零词尾也是一种词形。在有词形变化的语言中，零形式的运用是很普遍的，比如英语，单数和复数的对立中，复数用附加法表示，单数都是用零形式表示的。

内部屈折 屈折就是以语音变化为手段的一种词形变化，内部屈折就是用词根内部的语音变化来构成同一个词的词形变化的方法，它属于内部构形形态，包括元音屈折、前后屈折、后补屈折等多种形式。例如：

英 语 foot (脚、单数) (元音屈折)

feet (脚、复数)

满 洲 语 ama (父亲、阳性) (元音屈折)

eme (母亲、阴性)

富尔贝语 pulo (人、单数) (前后屈折)

fulbe (人、复数)

意大利语 figlo (儿子、阳性) (后补屈折)

figla (女儿、阴性)

重叠 重叠是整个词或词根重复出现以表示语法意义的手段。在汉语里，重叠是一个重要的语法手段。如动词的重叠“说说、走走、讨论讨论、调查调查”，表示“试一下”的意思或动作只进行一阵子。形容词的重叠“快快、轻轻、高高兴兴、浩浩荡荡”，多表示程度的加强。单音名词和量词的重叠“人人、户户、个个、条条”，则表示“每一个”的意思。

其他语言中也有重叠，如：

梵 语	danie	(房子)
	danie danie	(各个房子里)
拉丁语	quis	(谁)
	quis quis	(无论谁)
越南语	nguai	(人)
	nguai nguai	(人人)
英 语	long	(长)
	long long ago	(很久以前)

异根法 异根法是用不同的词根来表示同一词汇意义的不同的语法意义。印欧语中的人称代词构成格变时，多用异根法。如“我”的主格——宾格：

	主格	宾格
英 语	I	me
法 语	je	me
俄 语	я	меня
拉丁语	ego	me

具有“好、坏”意义的形容词的比较级也多采用异根法。

如：

	原级	比较级
英 语	good	better (好)
	bad	worse (坏)
俄 语	хороший	лучше (好)
	плохой	хуже (坏)
拉丁语	bonus	melior (好)

异根法在现代语言中是一种不能产的形式。

重音 重音是几个相连的音节中发音突出的某个音节，

它出现在句子中(句重音),也出现在单词中(词重音)。词重音按照它在词中所处位置的情况,可以分为固定重音和不固定重音。只有后者才能作为表达语法意义的手段。例如自由重音中的移动重音,由于位置不同,而表示不同的语法意义。如俄语:

手 руки (单数、属格) ру́ки (复数、主格)

城市 города́ (单数、属格) горóда (复数、主格)

用音强的增加来表示的叫力重音,用音高的变化来表示的叫乐重音。乐重音作为一种语法手段比较少见,如在塞尔维亚、霍尔瓦特语言中,ное(鼻)、град(雹)的第三格是 носу、гра́ду(抑低语调),而处所格(第六格的另一形态)则为 носу́, гра́ду́(音高上扬)。

语调 整句话或整句话中的某个片段有语音上的抑扬顿挫,这就是语调。语调是句子必要的特征,包括音高的变化、句重音、停顿等。语调作为一种语法手段,它可以表示整个句子的语法意义。例如:

老师来了。(平降调:表陈述语气)

老师来了?(升调:表疑问语气)

老师来了!(降调:表感叹语气)

停顿可以区别不同的句法关系。如:

他说,不来。 (“不来”是宾语)

他说不来。 (“说不来”是谓语)

哥哥,他走了。 (“哥哥”是呼语)

哥哥他走了。 (“哥哥他”是同位语)

停顿还可以区别单句和复句:

你爱他不爱? (单句)

你爱，他不爱。（复句）

上述八种语法手段可以分成两类。通过含有词汇意义的实词本身以外的成素表示语法意义的，叫分析性语法手段，如词序、虚词、语调。语法意义由具有词汇意义的实词本身表示的，叫综合性语法手段，如附加法、内部屈折、异根法、重迭、重音。

在不同的语言中，各种语法手段的作用大小不一样。例如俄语，虽然八种语法手段都有，但内部屈折、附加法是最重要的。而汉语、英语，词序和虚词又是最重要的。

（周家筠）

“范畴”是一个科学概念，它表示现实生活中最一般、最本质的现象。通俗地讲，“范畴”就是“类”。“语法范畴”就是语法意义的归类。这些类不是主观决定的，而是对同类语法现象所包含的共同语法意义所作的抽象概括和归纳，如俄语名词有阳性、阴性、中性，这是语法成分所具有的语法意义，把这些语法意义归为一类，就成为“性”这个语法范畴。又如“过去时”、“现在时”、“将来时”都是语法成分所具有的语法意义，把这些语法意义归为一类，就成为“时”这个语法范畴。语法意义指的是任何语法成分所包含的意义，而语法范畴则指的是某些可以概括成类的语法意义的总和。语法范畴和具体语法意义是一般和个别、共性和个性的关系。一般的（或狭义的）语法范畴，指的是各词类内部各类型语法现象所包含的共同语法意义的概括和归类，如印欧语里名词的“性”、“数”、“格”，动词的“时”、“体”、“式”等范畴。广义的解释，把词类也看作是不同的语法范畴，如名词范畴、动词范畴等等。更广义的解释，则把各种句法关系也包括在语法范畴内。

语法范畴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各种语言的语法范畴的

系统各不相同。为便于大家理解，现将常见的一些语法范畴加以说明。

性 一般是名词、代词所具有的。有的语言(如俄语)的形容词也具有“性”的区别。“性”一般分阳性、阴性、中性三类。俄语中如 отец(父亲, 阳性), мать(母亲, 阴性), 表示人的名词的语法性属一般和天然性属一致, 而表示物体的名词的语法性属则比较复杂, 不一定是中性, 如俄语 дом(房子, 阳性), комната(房间, 阴性), поле(田野, 中性)。现代汉语仅仅在文字上区分出代词第三人称的三个性, 如“他”、“她”、“它”。

数 有些语言在名词、代词、形容词、动词方面有“数”的语法范畴。一般分单数、复数, 如汉语中“我”(单数), “我们”(复数); 英语中 book(书, 单数), books(书, 复数); 俄语中 стол(桌子, 单数), столы(桌子, 复数)。

格 是通过词的语法形式表示出来的名词、代词与句子中其他词的关系。各种语言的格的数目不一样, 英语名词有属格和非属格, 如“his brother's book”(他兄弟的书), brother's 是属格, book 是非属格。俄语则有六个格, 如“Учитель идет в школу.”(教师到学校去)中, учитель 同 идет 发生主谓关系, учитель 是主格(第一格), школу 受前置词 в 支配, 表示去的方向, 是宾格(第四格)。

时 表示行为发生的时间与说话时的关系。一般分三种: 现在时, 过去时、将来时。如英语“I study”(我学习, 现在时), “I studied”(我曾学习, 过去时), “I shall study”(我将学习, 将来时)。

体 表示行为或动作进行的情况。一般有完成体、进行

体两种。如英语“I have read”(我已经读了,是完成体),“I am reading”(我正读着,是进行体)。

“体”和“时”的语法范畴密切相关,但并不相同,是两个不同的范畴。

式 也叫“语气”。通过一定的语法形式,说明动作或过程进行的方式,即说话人对行为或动作的态度。如英语有陈述式(语气)、祈使式(语气)、虚拟式(语气):“you are late.”(你迟到了。陈述语气)“Don't be late!”(不要迟到!祈使语气)“If I were you, I would not be late.”(假如我是你的话,就不会迟到。虚拟语气)。现代汉语用“的、了、吗、呢”等语气助词和语调表示各种语气。

态 表示动作或过程同主体的关系。一般分两种:行为动作由主体发出的,称主动态;动作由主体来承受的,称被动态。“Every body likes the teacher.”(大家都喜欢这位教师)是主动态;“The teacher is liked by every body.”(这位教师被大家喜欢)是被动态。现代汉语的被动态往往用“被”、“给”等来表示。

人称 也叫“身”,通过一定的语法形式表示行为、动作是属于谁的。属于说话人的,是第一人称;属于听话人的,是第二人称;属于说话人、听话人以外的,是第三人称。人称是和动作发生关系的,因为发出动作的人可以是单数,也可以是复数,于是动词不只是有人称,而且相应的有数的语法范畴,如英语“I am a teacher.”(我是个教师。第一人称单数)“We are teachers.”(我们是教师。第一人称复数)“You are a student.”(你是个学生。第二人称单数)“You are students.”(你们是学生。第二人称复数)“He (she) is a soldier.”(他

(她)是一个战士。第三人称单数)“They are soldiers.”(他们是战士。第三人称复数)。

以上是常见的语法范畴。这些语法范畴都有其特殊的语法意义，并有特殊的语法形式作为其外部标志。应该注意的是这些语法范畴所包含的语法意义，在不同的语言里，范围并不相同。

(徐立芳)

划分汉语词类只能一次用一个标准，不能同时用几个标准。否则，各个标准有相互打架的可能。每一大类下面再分小类时，却不妨几个标准配合起来运用。名、动、形的问题最复杂，下面专门讨论名、动、形的分类问题。

分类的标准就是根据语法功能。语法功能包括词与词的结合关系，词在句子中的用途，范围较大。分大类往往只拿其中一项语法功能作为分类的主要依据。鉴定名词，主要看加不加副词“不”。名词普遍不加“不”，这跟一般动词、形容词有对立。名词能加“不”的仅限于以下三种固定格式（其中，大部分是文言格式）：1）名₁ + 不 + 名₂。如“管他队长不队长”。名₁名₂必须同形。2）（名₁ + 不 + 名₁） + （名₂ + 不 + 名₂）。如“人不人鬼不鬼”。名₁和名₂分别同形。3）（不 + 名₁） + （不 + 名₂）。如“不人不鬼”、“不男不女”。名₁与名₂是相对待的名词。

名词一定不加“不”，但不能加“不”的不一定就是名词。下边三组词都不能加“不”：1）“不及、不合、不用、无用、无意、满怀、懒得、多于、好象”。2）“永别、无效、使得、请便、永生”。3）“绝对、间接”。这些词里有的构词成分含有“无、不”，自然不能加“不”；有的跟“不”不发生联系，如“永别”“绝对”。然而，

这些词都出现在谓语的位置上,都可以看作动词。

鉴定动词通常是拿带宾语作标准的。绝大部分动词后边可以出现名词、动词、小句以及名量、计量、动量、时量。绝对不能带这些成分的动词,即一般所谓封闭形式,数量极少。如“呜呼、再见、料峭、呐喊”,可以加“不”,不能加“很”或其他表示程度的成分,可以断定不是名词和形容词。

形容词做谓语时带程度副词“很”,或带比况性的词语,如“冰凉、雪白”。还有象“红红的、干干净净的、黑乎乎的、怪可怜的”,不出现“的”时是所谓状态形容词。

根据上述分类标准,下面具体谈谈名、动、形划界中的问题。

一、形容词和动词的划界

a. 形容词带上宾语就变为致使义动词:正音、暖手、红了脸、密切关系、方便群众、纯洁队伍、明确态度、端正思想、丰富生活、麻痹人的思想、模糊了视线。

带动量、时量的形容词也变为动词:静一下、晴了两天、热了一阵子、乱了七八年。

此外,有些形容词进入“把+名+动”的格式(“把腰一弯”),用在比较句里(“比他小五岁”),或者按动词的重迭方式重迭(“端正端正态度”),它们都取得了动词的资格。

形容词有了上述这些特殊变化,因而引起形容词词性的改变。至于形容词后边加“一点、一些、好多”之类(“白一点、冷一些、胖了好多”),这种变化对形容词来说是一般的,不能改变它的词性。“一点、一些、好多”是表程度的形容词补语。能加“很”的形容词绝大多数就能加这些。只有“伟大、反常、无聊、气愤、破落、齐心、眼红、失望、带劲、腐败、抵触”等,因词义

排斥不能加“一点、一些、好多”，但它们都能加“很”，所以仍是形容词。

b. 动词前加“很”，后加宾语的仍是动词。“很解决问题”、“很看了几本书”里，不能说“很解决”、“很看了”，它们都是“很+动词结构”。但是，不能同时加“很”加宾语的动词，是否动词则要看具体情况而定。如“死”，当“失去生命”讲，可以带宾（“死了一头牛”）；当“不活动、不灵活”讲，可以受“很”修饰（“办法很死”）。但是，不能说“很死了一头牛”。这样就得承认有两个“死”：动词的“死”（带宾）和形容词的“死”（前加“很”）。

c. 形动词。表示心理活动的“喜欢、高兴、同意、赞成、信任、感谢”等，它们能进入①很+动，②动+名/动，③很+动+名/动三式。进入①式时具有一般形容词的特点，进入②③两式时具有动词的特点。这类双音词不妨就叫做形动词。类似的有“怕、想、懂、敌视、体贴、可怜、尊重、重用、珍视、优待、相信、欢迎、偏重、热心、怀疑、拥护、懊悔、照顾、固执、亲近、谅解、留恋、吝惜、适应”。不能全部进入以上三种格式的还不是形动词。例如，“有”可以进入③式②式：“很有水平、有水平”，不能进入①式。即“有”不具备形容词的特点，纯粹属于动词，同上述“看、解决”一样。

二、动词和名词的划界

a. 比较：

一把锁	锁上门
两包药	药死老鼠
两份计划	计划买书
来了几位代表	代表群众利益

做了一个报告 报告派出所

左右两边的“锁、药、计划、代表、报告”是明显的同音词，宜分属名、动两类。有的最初是名词，后来借作动词，如“锁”。有的是三音节名词，如“指挥员、翻译员、记录员、保管员、招待员、介绍人、主管人、建筑物、障碍物”，由于现代汉语双音节化，就减缩为双音节，恰好与双音动词“指挥、翻译、保管……障碍”同形，因而名、动混淆。区分这两类词并不难，能加数量词的是名词，带宾的是动词。

b. 动名词。有些双音词具有动词的特点(带宾)，又具有名词的特点(作“有”的宾语，或直接带上受事性的修饰语)，如“研究”“改造”，可以说“研究语言，有研究、语言研究”，“改造思想，思想改造”。“研究”和“改造”的动词性质十分明显，可是它们又兼有名词的特点，可以称为动名词。这类动名词都是一些新兴的双音词。如“调查、建设、要求、分析、约会、比赛、训练、批评、改革、学习、保护、仇恨、斗争、教育、信仰、讨论、影响、负担、调整、转变、认识、威胁、生产、希望”。

三、形容词和名词的划界

有一些双音词可以受名词、形容词的直接修饰，又能做“有”的宾语，具有名词的特点，可是作为形容词的特点也没有消失，这类双音词就可以看作形名词。如“幸福”，既可以说“很幸福”，也可以说“真幸福、家庭幸福、有幸福”。又如“道德”，既可以说“不道德”，也可以说“共产主义道德、有道德”。“幸福”“道德”就是所谓的形名词。类似的还有“机密、规则、困难、民主、热情、自由、理想、系统、典型、痛苦、标准、卫生、规范”。

由于用法不同而引起意义上明显改变的，那就应当看作

名形两类。如作为形容词的“经济”有节省的意思(“用钱很经济”),作为名词的“经济”指生活上的开支(“家庭经济”),这样就得承认两个“经济”是同音词。类似的还有“科学、机械、现实、高明”等。

(陈建民)

88

什么是句子？

什么是句子？句子是前后都有停顿，并且带有一定的语调，通过一定的语法手段组织起来，表示相对完整意义的语言的实际使用单位。

句子前后有一定的停顿，标志着句子之间的界限。如果一个语言形式的前头和后头没有停顿，那就不成为句子了。陈述句、疑问句、感叹句、祈使句各有不同的语调。

有时候，书面上同是那几个字，口头上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念法，使句子的数目发生了变化。如：

1) 你看！我什么时候撒谎。——两个句子

2) 你看我什么时候撒谎。——一个句子

例1)是在感情激动的时候说的，“看”说得重，后边的停顿很明显，写的时候可以加个叹号，不妨看作两个句子。例2)是在心情平静的时候说的，“看”后没有明显的停顿，“我什么时候撒谎”可以看作“看”的宾语。

句子是通过一定的语法手段把词语组织起来的。汉语里主要的语法手段就是语序和虚词。

1. 语序。语序是指句子内部各个语言单位的先后次序。例如，修饰语只能在被修饰语前边，宾语一般在动词后边等，

就是现代汉语的语序。这是汉语区别于其他语言的重要标志。忽视汉语语序，随便写出“我电影看”之类就不象汉语了。语序不同往往引起意义的不同。如“不起来、不吃了”，表示“不干”的意思，而“起不来、吃不了”则表示“不能”的意思。

2. 虚词。虚词没有实在的意义，它在句子里起联系语言单位的作用，使不同的语言单位产生一定的关系，变成可以理解的句子。有时候没有虚词，不同的语言单位就联系不到一块儿。如“跑得满头大汗”(×跑满头大汗)。即使能联系到一起构成句子，但它的意思跟用了虚词的意思却不大一样。不用虚词还常常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如“病了不参加”。由于没有关联词，这个句子至少可以表达 1) 因为……所以……, 2) 既然……就……, 3) 如果……就……等几种意思。只有结合上下文, 才能明确作出哪种解释。

从内容上说，一个句子总是表示相对完整的意义的。例如：“对游泳技术较好的人，准备活动更重要，^①据实验，人在快速游进时，脉搏加快，氧的消耗量激增，每分钟达五公升左右，^②如果身体机能没有作好准备，适应这样大的负担量，显然是不适宜的，^③”这段话有三层意思，都是相对完整的。头一层提出游泳前作准备活动很重要，第二层通过实验加以证明，第三层象是结论。这①②③三层意思之间虽然有些联系，但它们还是三个独立的句子，①②后边的逗号宜改用句号。

从结构上说，句子大多具有主语和谓语两个部分(这不是绝对的)。除此以外，还可以有取舍部分。如：

喂，老张，昨天下午哇，在小徐的家里，对汉语句子如何分类的问题，我们几个人争论得面红耳赤。

“大家争论得面红耳赤”是句子的重要部分，前面一大串都是

从不同的角度帮助句子本身把意思表达得更准确、更详尽。在语法结构上,这一长串都是可以取舍的。既可以全部出现,也可以只出现一部分,甚至可以全部舍弃,而句子本身仍然站得住。这些取舍部分包括:1)表时间、处所的词语、介词短语。2)独立成分。如评注性词语、应对语、插入语等。3)语气词。4)连词和其他关联的词。通常说,句子由主谓两部分组成,这是就句子的本质说的。严格地说,句子应该是“主谓部分+取舍部分”。为了讨论方便起见,有时候,人们就把取舍部分撇在一边。

(陈建民)

跟印欧语比较，汉语语法的最大特点是没有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汉语名词无需按它在句子中所起的作用变格，没有阴性、中性、阳性的分别，也没有单复数的分别。例如“我说了他几句”、“他批评了我”、“你是我的老师”，在各种位置上都是同样的一个“我”。“一个男青年”、“两个女青年”里，“青年”这个词本身也没有什么两样。汉语动词没有人称的分别，没有单复数的分别和过去、现在、将来的分别。例如“你吃”、“我吃”、“他吃”、“大家吃”，都是同样一个“吃”；“刚才吃了”、“正在吃呢”、“一会儿再吃”，还是同样的一个“吃”。动词、形容词在主宾语位置上不变形。因此，汉语造句十分简便。

由于缺少形态变化，对某些非汉族人来说，汉语也有不容易学的地方。汉语里，词类转化和活用比较容易发生，句式变化比较灵活，常常省略，但都没有形态标志，因而比较难以掌握。同时，在汉语语法分析上也容易引起一些问题。例如，现代汉语里词和语素的分别，词和短语的分别，词类的划分，词类的转化，单复句的区分，等等，至今都还没有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主要也是由于汉语缺少形态变化，没有充分的形式依据。此外，还可以列举出一些特点来。

现代汉语里的构词方式,组成短语的方式,造句方式,三者基本上是一致的,这是汉语语法的一大特点,也是汉语语法简易性的又一证明。

	构词	组成短语	造句
主谓式	貌似	头痛	天/亮了
动宾式	注意	看书	看了/一场电影
动补式	提高	写清楚	累得/我满头大汗
并列式	模范	桌椅板凳	边看书/边写字
主从式	牛肉	老王送的牛肉	一会儿/听报告
同位式	柳树	首都北京	

省略也是汉语语法的特点之一。汉语不搞形式主义,能用几个词把意思说清楚就决不用十多个词,不求句子结构的完整性。比方说,乘客在公共汽车上掏出一毛钱买票时说:“沙滩一张”或“一张沙滩”,售票员立刻就领会了对方的意思。如果说成“我给你一毛钱买一张到沙滩下车的车票”,谁听了都会厌烦,会责怪你这是说外国话。“沙滩一张”或“一张沙滩”是省略句。在对话的环境下,只保留“沙滩”和“一张”这两个关键词,其余无关重要的词语都一概省掉,然而,别人一听都懂。汉语就是这样讲究简练的。

汉语常常省略代词、介词和关联词。在公共汽车上,我们经常听到售票员说:①票呢?②没有票的同志,买票呀?③和平里到了,车票打开往外走。④车要拐弯了,请扶好。第一句省掉了“你的”。当面说话,常常省掉“你、我”,不会误会。第二三句分别省掉介词“在”(“在车买票”)和“把”(“把车票打开”)。第四句的开头省掉连词“因为”。汉语就是这样灵活的。

还有一个特点是，现代汉语里的词语结构常常受单双音节的影响，双音节化和四音节化的倾向十分明显。单音节的活动远不如双音节自由，必须把单音节凑成双音节。比如你姓陈，别人就叫你“老陈”或“小陈”，你姓欧阳，别人决不叫你“老欧阳”或“小欧阳”，只叫你“欧阳”。单音的地名总带上类名，双音的就不需要。如通县、费县、顺义、川沙。双音化有很多手段，一是扩充：前加“老、第、初”，后加“儿、子、头”；动植物名字后加类名（杨柳）；单音名词后边加上量词（布匹、车辆）；同类字并列（身体），或以一字为主体，连上一个意义相近或相关的字作陪衬（打扫）；等等。二是压缩：通常由三音节词压缩为双音节。如落花生——花生，牛奶粉——奶粉，电影片——影片，川贝母——川贝，茅台酒——茅台。

四音节化表现在一个双音成分要求另一个也是双音节。如“进行学习”（×进行学），“给予批评”（×给予批），“日益增多”（×日益增）。可以说：“诗歌晚会”，不说“诗晚会”，可以说“依照法律”，不说“依法律”。这是因为“晚会”、“法律”这类双音词要求跟它搭配的也是双音词。汉语的四字语绝大多数都是两个双音节的组合。此外，五音节往往压缩为四个音节：小到中雨（“小雨到中雨”），外交部长（“外交部部长”）。这些都是“四音化”明显的倾向。

除四音节外，五音节、七音节等都有明显的节律，词话排列时也要考虑节奏顺序。明白汉语的这些特点，有助于我们进行语法分析。

（陈建民）

90

什么是中心词分析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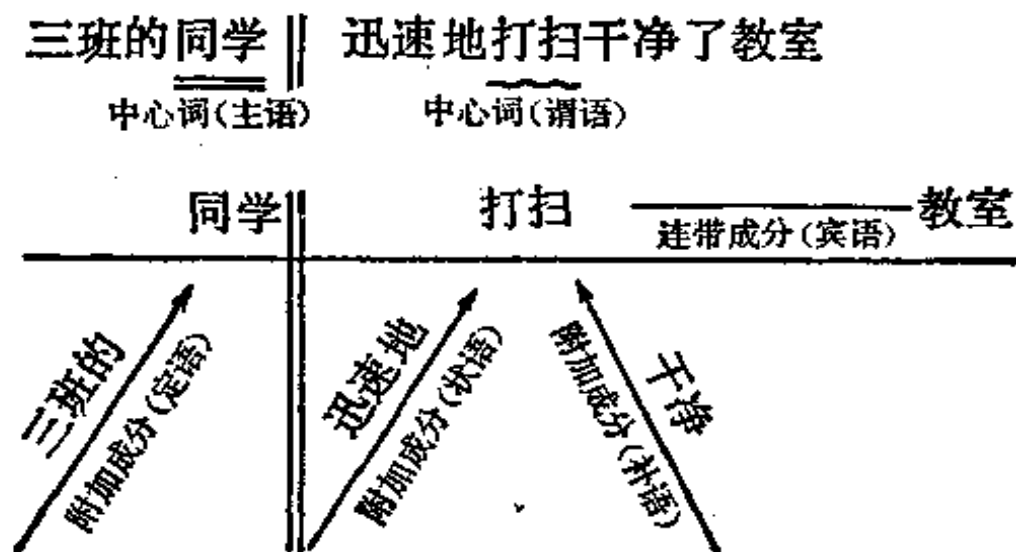
分析句子,可以有不同的方法。比方说,可以由大里往小里(即从句到词)分析,也可以由小里往大里(即从词到句)分析。由大里往小里分析,一般都着重句子的结构层次,叫做“层次分析法”(通俗点儿,可以叫做“二分法”)。例如:

英勇的工程兵		穿得透一座山	
主 语		谓 语	
修饰语	中心语	述 语	宾 语
		述语	补语
		修饰语	中心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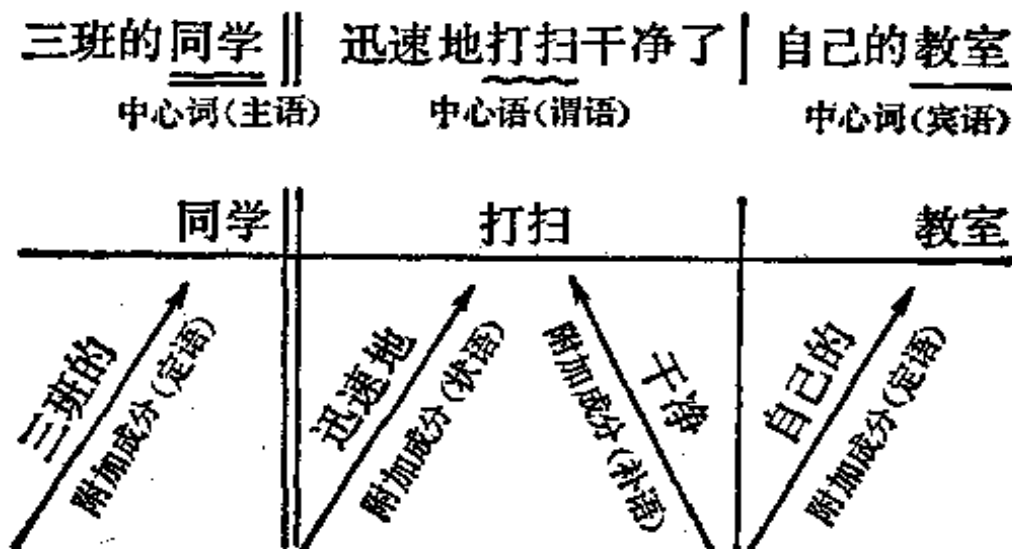
二分法的主要优点,是层次清楚,哪类词能够跟哪类词搭配一目了然;二分法的主要缺点,是有的性质相同的语言片段处在不同的层次中,无法说明这些片段的直接构成句子的作用和功能,因而也就不能在同一个平面上归纳出若干种简单明了的句子格式。

由小里往大里分析,往往是拿过来一个句子,先找出全句的中心词,比如先摘出两个词,说这个是主语,那个是谓语,然后再把这个那个连带成分,这个那个附加成分,一个一个地加上去,让这些成分分别依附于它们。这就是“中心词分析法”。这种分析法每走一步都得说出一个句子成分的名目,交代一

种结构关系。例如：



也有的中心词分析法是先摘出三个词，说这个是主语，那个是谓语，又那个是宾语，然后再把这个那个附加成分一个一个地加上去，让这些成分分别依附于它们。例如：



中心词分析法的优点是：1) 主次分明，句子的主干是主语、谓语(或是主语、谓语、宾语)，句子的枝叶是定语、状语、补语；2) 句子的六种成分(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各

自在构造句子中的作用和功能一目了然；3)处在同一个平面上的六种句子成分可以进行排列组合，从而归纳出若干种句型，收到提纲挈领的效果。

中心词分析法的缺点是：不怎么讲究层次分析，有时这些中心词在语法上其实是不能直接组合的，也就是说，有时光说主干部分句子就不通，比如“我们应尽最大的努力”，照层次分析法句子是通的：

我们 应尽最大的努力			
主语		谓语	
述语		宾语	
修饰语	中心语	修饰语	中心语

“应尽最大的努力”可以说，“应”和“尽”、“最大的”和“努力”也能够直接组合。可是如果缩句成“我们尽努力”，就不那么通顺了（光是“努力”不能做“尽”的宾语，没有人说“*尽努力”，必得是“尽最大的努力”）；又如“田真个种不得了”（叶圣陶：《多收了三五斗》），照层次分析法句子是通的：（“田真个种不得了”，

主语		谓语	
修饰语		中心语	
述语		补语	

“田 || 真个种不得了”“真个种不得了”“种不得”都可以说），可是如果缩句成“田种”，那不但不顺口，而且意思也搞颠倒了，由“不能种”变成了“能种”。再如“河水被晚霞照得有些微红”（老舍），照层次分析法句子也是通的：

河水 被晚霞照得有些微红			
主语		谓语	
修饰语		中心语	
述语		补语	

“河水 || 被晚霞照得有些微红”、“被晚霞照得有些微红”都可以说,但要是把句子缩成“河水照”,那就不可以,因为句子意思出入太大,已经由“河水被照”变成了“河水照……”了。这样看来,中心词分析法完全有必要吸收层次分析法的长处来丰富自己。

中心词分析法,人们通常叫做“句子成分分析法”,是一种传统的析句方法,多少年来,它一直为各级学校所采用。这种情况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大家知道,西方古代语言(如希腊语、拉丁语)的词有发达的形态变化,各种语法范畴都通过它表达出来,因此,词就成了天然的句法单位:以词为界,把语法分成两部分,讲词的内部情况的是词法,讲词和句之间的情况的是句法。根据词在句中的不同作用和功能,就有了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的名目。不过,近代的西方语言(如英语)形态变化有了不同程度的简化,词序比以前固定,所以这种分析方法已经不太合适,至于对缺少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主要依靠大小语言单位互相结合的次序和层次来表达语法范畴的汉语来说,那当然就更不合适了。

解放以后,汉语教学和研究中的句子成分分析法有所发展。大家在分析句子的时候,都是拿逻辑分析作背景,根据功能,把单句切分成几个功能段。这些功能段,既可以是一个词,也可以是一组词(“词组”),完全没有一定。这些功能段也就是我们平时所称的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等句子成分。目前比较流行的语法书,除列有专章讲述各类实词充当句子成分外,也列有专章讲述各类词组充当句子成分,这跟从前只拿词作为造句单位比较起来,不能不认为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龚千炎)

在语法学里，对“语法意义”有各种不同的理解。狭义的理解，认为语法意义就是一般所说的“语法范畴”(Grammatical Categories)，只指词法意义：有的只看作同各种词类有关的词法意义的概括，如性、数、格、人称、时、体、态、级等；有的则泛指词类。广义的理解，认为语法意义是跟具体的词义、句义相对而言的，既包括词法意义，也包括句法意义。本文所说的“语法意义”是指后一种。

语法意义的类型可以概括成词类(包括性、数、格、时、体、态、级等语法范畴)、句子成分、句类、句式(句型)。但从方法论的角度概括成抽象意义、关系意义、功能意义倒更方便，也更有概括性。

1. 抽象意义

抽象意义是从具体的词义、句义中按照语法特点概括而成的语法意义。比如，“学生”、“学校”、“北京”、“星期日”都有具体的、不同的词汇意义，而在语法里只认为这些词都是表示事物(包括人、时地)的，便在具体的词汇意义基础上把它们概括成“名词”这种更为抽象的语法意义。各类实词的定义，如动词是表示动作或变化的，形容词是表示性状的，数量词是表

示数量的,等等,都是就它们的抽象意义说的。又如,“你是学生吗?”“谁在唱歌?”“咱们还去不去啊?”都有具体的、不同的句义,而在语法里则认为这些句子都是提出问题的,便在具体的句义基础上把它们概括成“疑问句”这种更为抽象的语法意义。其它各类按照句子的语气和用途划分的陈述句、祈使句、感叹句也都是按抽象意义命名的。

作为一种分析方法,抽象意义分析法适用于划分各类实词和各类实词的再分,也适用于按照句子语气和用途划分的句类。按照谓语性质划分的动作句、判断句、存在句、形容句等,除了功能意义,也跟抽象意义有关。

抽象意义分析法是语法学里,特别是汉语语法学里具有传统性的分析方法。但抽象意义分析法不是唯一的特殊方法,也不是最普遍、最有效的特殊方法。比如,“买了一把锁”和“把门锁好”的两个“锁”是不是同类词?凭抽象意义难于捉摸,还须要借助于关系意义、功能意义以及各种形式上的特点来考虑。“你去上海”是祈使句,还是疑问句,也必须凭语调和可能加上的语气词来确定。

2. 关系意义

关系意义是各语法单位结合以后所发生的结构关系。这是语法学里比较典型、比较重要的意义。它适用于词法结构(合成词),也适用于句法结构(词组、单句和复句)。比如,“火车”,“火”是修饰“车”的,是个偏正关系的合成词。“看画报”,“看”和“画报”是动词和宾语的关系;而“看的画报”,“看”和“画报”则是附加和被附加的偏正关系。单句的各种句子成分,如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等,都是从关系意义上命名的。复句的各种类型,如并列、递进、选择、承接、让转、因果、

条件、目的等,也都是根据各分句之间的关系概括出来的。

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关系意义分析法在语法学里,特别是在汉语语法学里也是较早的一种分析方法。不过从前的语法著作对于“关系意义”的理解往往不是语法学的,而是逻辑学甚至是心理学的。比如,在确定主语和宾语时,根据的是逻辑上的施受关系,认为施事者都是主语,受事者都是宾语。在他们看来,“人来了”和“来了人”,两个“人”都是主语,“碗打了”和“打了碗”,两个“碗”都是宾语。直到现在,还有的语法著作使用“语法主语”、“逻辑主语”,或“表层主语”、“深层主语”之类的术语。

关系意义分析法也不是唯一的、万能的特殊方法,有一些结构,词素和词素、词和词、分句和分句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有时也会因人而异。比如,“台上坐着主席团”,“台上”同“坐着”有人说是主谓关系,有人说是偏正关系;“风大,我不上街”可以是因果关系,也可以是条件关系。可见,在语法分析中,要想得出正确的结论,还必须同语法形式方面的特点结合起来。

3. 功能意义

“功能”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在语言学里有不同的解释:美国学派(描写语言学),把“功能”归结为“分布”,是语法形式方面的问题;丹麦学派(语言单位论),把“功能”看作两个“功能体”之间的内部联系,跟美国学派基本相同;布拉格学派(功能语言学)则认为“功能”是跟“用途”或“用法”的概念相联系的,即某种语法单位在结构里担当某种成分的能力。虽然他们也是把“功能”看作语法形式方面的问题,但实际上跟语法意义非常接近。我们这里所说的“功能”是指各语法单位的用

途，是语法意义的一个类型。

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功能意义可以用来切分语法单位，可以帮助划分词类，也可以帮助确定句子成分、给句子分类等。比如，词和词素在功能上的区别是：词是造句单位，词素只能用来构词。实词和虚词在功能上的区别是：实词能作句子成分，虚词只表示成分和成分之间的关系，或者表示语气、情感。名词和动词在功能上的区别是：名词不能作谓语，动词经常作谓语。副词和名词、形容词在功能上的区别是副词只能作附加成分，不能作主语或谓语，名词经常作主语、宾语，形容词经常作谓语。主语和谓语在功能上的区别是：主语能回答“谁”、“什么”所提出的问题，谓语能回答“干什么”、“怎么样”、“是不是”所提出的问题。

布拉格学派实际上是把功能分析法当作语法学方法论的总原则，我们只是把功能分析法当作一种特殊方法，在语法分析中必须跟别的分析方法配合运用，因为它的适用范围是有限的。

（张 静）

在语法学里,对“语法形式”也有不同的理解。狭义的理解,认为语法形式就是一般所说的“形态”(morphology),只指词法形式:有的只指同一个词的语法变化形态——构形法形态,如“词缀”、“迭词”、“词根变音”等;有的则包括构词法。广义的理解,认为语法形式是跟词汇形式相对而言的,既包括词法形式,也包括句法形式,如虚词、词序、语调、上下文等。我们所说的“语法形式”是指后一种。

语法形式的类型可以概括成词缀、迭词、词序、虚词、语调、上下文等,但从方法论的角度概括成结合形式、增补形式、转换形式也是比较方便的,而且更有概括性。

1. 结合形式

结合形式是指某一语法单位能在哪些语言环境中出现和不能在哪些语言环境中出现的差别的总和。这种语法形式,在西方结构主义语言学里叫“分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语法形式;作为分析方法,叫“分布分析法”,差不多成了他们的方法论的总原则。在汉语里也有人叫“搭配能力”。比如,汉语的“了”、“着”、“过”等词素可以出现在动词或动词性词素后面;“们”、“子”、“头”等词素可以出现在名词或名词性词素后

面：因为这两类词素各有不同的结合形式(词法形式)，所以分属两类。又如，“教师”、“学校”、“现象”等词前面可以搭配上“一个”、“两所”、“几种”等数量词，而“聪明”、“健康”、“美丽”等词前面能搭配上“最”、“非常”、“很”等副词：因为它们各有不同的结合形式(句法形式)，也划为两类。现代汉语的介词只能出现在它所引介的附加成分(多是名词)前面；语气词只能出现在句末(少数也出现在句中停顿的地方)；别的词类不受这些限制：因为各有不同的结合对象，构成不同的结合形式，所以它们都是相互对立的词类。

作为语法形式方面的一种特殊方法，结合形式分析法是很有用处的，但它不能上升为方法论的总原则而成为一切特殊方法的出发点。因为这种分析法在形态语言，如俄语、英语的分析中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行之有效的体系，在属于非形态语言的汉语分析中，更难形成这种体系，必须跟别的分析方法，特别是意义方面的分析方法配合运用。比如，要是只根据可以同能愿动词或“了”、“着”、“过”结合的形式来确定动词，就得把所有的形容词也划归动词。区别动词和形容词还得考虑其它特点——动词表示动作或变化，形容词表示性状，二者抽象意义不同；动词一般不能直接作定语(作定语时须加“的”字)，形容词都能直接作定语(可以不带“的”字)，二者功能意义也不完全相同。

2. 增补形式

增补形式是指某一语法单位在某种结构里可能增加的语法形式。这种形式在结构主义语言学里包括在“分布”里，因为它在汉语里用处比较大，我们把它从“分布”(结合形式)里分出来独立成一个形式类型。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增补分析

法可以用来划分词类和句子成分，也可以用来划分句类。比如，“人民代表”和“代表人民”，两个“代表”是不是属于同一个词类？是不是相同的成分？除了用其它方法，用增补分析法也可以得到答案：前一个“代表”前面可以增加上“一个”、“好”等，这是名词的特点，整个结构是以名词为中心的偏正结构；后一个“代表”前面可以增加上“能够”、“应该”等能愿动词，后面可以增加上“了”、“着”、“过”等词缀，还可以重迭成“代表代表”，这都是动词的特点，整个结构是动宾结构。又如，“南方来了一个客人”和“南方很热”，两个“南方”是不是属于同一个句子成分？这种放在句首的地位名词，从语法意义上很难断定是主语还是状语。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用增补分析法：前者可以加上介词，说成“从南方来了一个客人”，原意不变，可以证明它是状语；后者不能在不改变原意的情况下加介词（如果加上介词，跟原意大不相同），可以证明它是主语。再如，“你有困难，我帮助你”，这个句子根据一定的上下文，要是能加上“如果”和“就”，它是条件复句；要是能加上“因为”和“所以”，它是因果复句。

增补分析法也不是唯一的、最有效的分析法，因为这种方法不适用于一切语法现象，而且有些语法单位能不能增补某种成分，往往是由意义决定的。在作语法分析时，不仅要跟语法意义分析法结合起来，有时还要跟其它语法形式分析法结合起来。

3. 转换形式

转换形式也是西方结构主义语言学非常重视的语法形式。所谓“转换”，是在一定的情况下，按照一定的规则把某种语法单位变换一下结构形式。能按同一种结构形式转换的单

位属于同一种结构类型，不能按同一种结构形式转换的属于不同的结构类型。

转换形式的类型，在美国描写语言学著作中有二十多种，常用的也有八九种，如倒装转换式、主动被动转换式、肯定否定转换式、联合转换式、陈述疑问转换式等。

作为一种分析方法，转换分析法在汉语里可以用来区分某些外型相同的语法单位，尤其适用于多义结构。例如：

墙上挂着一张照片。

区里支持这个同志。

这两个句子外型相同，都是“地位名词——动词——名词性词组”。它们是不是同类结构？除了其它方法，还可以用倒装转换式来分析：前一句可以转换成“一张照片挂在墙上”，后一句不能按这种形式转换，但可以按另一种形式转换成“这个同志区里支持”。根据它们的不同的转换形式，可以看出它们不是同类结构：前一句是“状——动——定——宾”结构，后一句是“主——动——定——宾”结构。又如：

解放军应该表扬。

解放军应该努力。

解放军应该学习。

这三个句子结构是否相同？用主动被动转换式也可以得到证明：第一句只有被动形式，可以转换成“应该表扬解放军”或“解放军我们应该表扬”。第二句只有主动形式，只能转换成“解放军应该努力学习”。第三句是个多义结构，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转换形式：一种可以按被动形式转换成“应该学习解放军”或“解放军我们应该学习”，可以这样转换的是被动句，跟第一句相同；一种可以按主动形式转换成“解放军应该学习技

术”或“解放军应该向工人学习”，可以这样转换的是主动句，跟第二句相同。

转换形式也包括“替代形式”。转换是由一种结构形式变成另一种结构形式；替代跟它稍有不同，是在不改变原来结构形式的前提下，用另一个语法单位来替代这个结构中的一个成分。能否替代，可以证明替代者和被代者是否具有相同的功能，是否属于一类。例如：

他是解放军。

你是很聪明。

第一句的“他”可以用“我”、“你”、“老王”、“哥哥”等来替代，“是”可以用“象”、“当”、“叫”、“爱”等来替代，“解放军”可以用“工人”、“学生”、“叔叔”等来替代；第二句的“你”可以用“他”、“小张”、“弟弟”等来替代，“是”可以用“的确”、“一定”、“不”等来替代，“很”可以用“非常”、“最”等来替代，“聪明”可以用“健康”、“勇敢”、“大方”等来替代；替代者和被代者是同功能或同属一类的。

转换分析法在描写语言学里虽然还没有形成一套完善的分析方法，却是一种引人注目的，也是非常时髦的分析方法。由于这种分析方法的人为性，或者说研究者的“语感性”太强，许多转换类型是由研究者随意制订的，并凭主观认识来决定这一语法单位和另一语法单位的异同，因而在语法分析中往往带有主观性的缺点；又由于有些语法单位虽然不同类，但它们在某种情况下是同功能的（如汉语的副词和形容词都能作状语，动词和形容词都能作谓语），因而在许多语法现象面前往往带有不肯定性的缺点，也必须同别的分析方法配合运用。

（张 静）

任何一种语法单位都是音义统一体，都有意义和形式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各种语法现象之所以互有区别，就是因为它们在语法意义和语法形式方面各有不同的特点。而语法分析的目的也正是要揭示各种语法单位用什么形式表达什么意义。在语法分析中，语法意义的分析是必不可少的。这一点连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鼻祖布龙菲尔德也不否认。他说：“要是我们不管意义，我们就无法断定两种说出的形式是不是相同的。”^①但是，意义分析法不能成为方法论的总原则，因为在这种分析法里研究者主观性、片面性的东西太多，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西方结构主义语言学，特别是美国学派之所以在原则上拒绝研究意义，就是因为他们看出了单纯意义分析法的这种弊病，他们认为每个语法单位的语法意义方面都有不确定性。因此，我们也认为在语法分析中，语法形式的分析同样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实践证明，这种分析方法是很有用处的。但是，形式分析法也不能成为语法学方法论的总原则，因为在这种分析法里，无论是结合形式分析法、增补形式分析法，或是转换形式分析法，不仅形式主义的东西太多，而且也

^① L. Bloomfield: «Language», 77 页。

有人为性、不肯定性的东西。语法形式方面的分析法要想发挥作用,必须同语法意义方面的分析法结合起来,完全抛开意义,不会达到语法分析的目的;语法意义方面的分析法一旦跟语法形式方面的分析法结合起来,我们就会看到它们的巨大威力。这一点,连丹麦学派和布拉格学派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鼻祖索胥尔也不否认。索胥尔说:“语言体系是一系列音素上的差别和另一系列意念上的差别的平列;保持这两类差别之间的平列关系,正是语言组织的基本特点。”^①布龙菲尔德也说:“在人类语言里,不同的声音具有不同的意义。研究一定声音和一定意义的这种配合,就是研究语言。”^②尽管他们在语法分析中都是把语法形式分析法当作方法论的总原则,但他们的这些认识——把语言看成音义统一体,应该说是正确的。

在具体的语法分析中,意义和形式(意义分析法和形式分析法)怎样结合?这的确是个非常复杂,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语法分析的基本问题不外三个方面:(一)切分语法单位,揭示各语法单位的本质属性,划清它们之间的界限;(二)分析各语法单位是怎么联系起来的,找出它们的结构规则;(三)在各个语法单位内部进行分类,指出这一类跟那一类的不同语法特点。

切分语法单位,或者说给各语法单位下定义,应该而且必须体现意义和形式相结合的精神。例如,词的定义如果是“语言中有固定声音和特定意义的最小造句单位”,那么其中的

① 索胥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俄译本,119页。

② L. Bloomfield:《Language》,138页。

“造句”就是指词的功能意义,是语法意义标准,“最小”就是指词的结构形式,是语法形式标准。由于词同时又是词汇单位,其中的“特定意义”主要是指词汇意义,也是用来区别词和词组的,“固定声音”既是指词汇形式,也是指语法形式。句子的定义如果是“具有一个说明语调、表达一个完整意思的独立的语法单位”,那么其中的“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就是语法意义方面的特点,是指能够简单地肯定或否定一件事情,或是提出一个问题、一种请求,或是抒发一种感情,并能叫听的人明白,其中的“具有一个说明语调”就是语法形式方面的特点。

分析各语法单位之间的联系,也应该而且必须用意义和形式相结合的方法。例如:“看书”的“看”和“书”是什么关系?它们构成的是什么结构?既要从意义方面分析它们是不是动词和宾语的关系,又要从形式方面分析各单位现有的和可能有的形式特点。“看”是动词的意义,表示动作,可以重迭成“看看”(第二音节读轻声),是动词的形式;“书”是宾语的意义,是动词涉及的对象,也是宾语的形式,在动词之后,前面可以加数量词定语,可以转换成“书看”。

在各语法单位内部进行分类或归类,更应该而且必须用意义和形式相结合的标准。例如,划分词类的标准应该是语法特点——语法意义和语法形式特点,如确定名词的标准是:语法意义特点是表示人、事物或时地、能作主语、宾语,不能作谓语;语法形式特点是能跟数量词结合成偏正词组,前面能加介词,指人名词后面能加“们”表示复数。给句子分类的标准也不能例外,如疑问句的语法意义特点是表示疑问,语法形式特点是用高升语调,能用疑问语气词等。

各种语法单位的意义和形式之间的关系在人们的认识中

是错综复杂的。有的意义和形式的关系在人们的认识中是协调一致的,即甲种语法意义是用甲种语法形式表达的,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同时指明它们的意义和形式,还是只指明意义或形式的一个方面,都容易得出相同的结论。有的形式比较明显,意义不好捉摸;有的正相反,意义比较明显,形式是模棱两可的;在这种情况下,同一种语法单位,往往因人而异,得出不同的结论。分析这样的语法单位,意义和形式怎样结合?形式明显的,可以先从形式入手,然后归结到意义上来;意义明显的,可以先从意义入手,然后印证形式。例如:

买了三斤油漆——油漆了家具

这里的两个“油漆”是不是同一个词?单从意义上看,可能有不同的意见。但形式很明显:前一个带有数量词,并且作了宾语中心语,是名词的形式,因而它必然也有名词的意义,可以肯定它是名词;后一个有动词后缀“了”,并且带着宾语,去掉“了”以后还可以重迭成“油漆油漆”,这都是动词的形式,因而也必然有动词的意义,可以肯定它是动词。又如:

我今天看电影——我时常看电影

这里的“今天”和“时常”都放在状语的位置上,而且前后的成分都相同,它们是不是同类词呢?单从形式上看,也可能有不同的意见,但它们的意义比较明显:“今天”表示某个具体的日子,能以同样意义作主语,这都是名词的意义,因而必然也有名词的形式(前面可以加介词“在”等);可以肯定它是名词;“时常”不表示具体的日子,永远不能作主语(也不能作谓语),这是副词的意义,因而也必然有副词的形式(前面不能加介词等),可以肯定它是副词。

问题最多的是同义结构和多义结构的分析。有人说,分

析同义结构和多义结构，不能用意义和形式相结合的方法，因为这些结构的语法意义和语法形式不是一对一的，而是一对多或多对一的。就是说，一种语法意义可以有几种不同的语法形式，一种语法形式也可以表达几种不同的语法意义。这种认识，从词汇学的角度说，问题不大，但拿到语法学里来是不恰当的。语法规则都是成套的，而且在任何一种语言里都是有限的，每一种规则都概括着无数个具体的语言事实，这跟词汇意义的具体性和词汇形式的个体性是很不相同的。所以在语法学里决不允许这一套规则跟另一套规则所表示的意义绝对相同，或者所使用的形式绝对相同。一种绝对相同的语法意义只能用一种语法形式来表达，一种绝对相同的语法形式只能表达一种语法意义。语法意义和语法形式是绝对统一的。所谓“同义结构”的“相同”意义和“多义结构”的“相同”形式，只是“大体相同”，不是“绝对相同”。不能根据这种“大体相同”来否认语法意义和语法形式的绝对统一性。下面咱们拿两个被认为意义和形式不统一的例子，从意义和形式相结合的角度进行分析：

汽车我不坐——我不坐汽车

有人说这是一种语法意义用两种不同的语法形式来表达。它们的语法意义真的相同吗？不。前者以“汽车”为话题，是“主——‘主——谓’”的关系；后者以“我”为话题，是“主——谓——宾”的关系。关系不同，语法意义就不同。硬说它们意义相同，显然是混淆了语法意义和逻辑意义。

鸡不吃了

许多人都说这是一种语法形式代表两种不同的语法意义：一是主动句，一是被动句。代表这两种不同意义的真是一种

绝对相同的形式吗？不是。它们所处的上下文、增补形式、转换形式都不相同。表示主动意义的可以增补成“鸡不吃食儿了，你别喂了”；表示被动意义的可以增补成“我鸡不吃了，想吃点鱼”，还可以转换成“不吃鸡了”。上下文不同，增补形式或转换形式不同，语法形式就不同。硬说它们是一种绝对相同的语法形式，是混淆了语法形式和词汇形式。

在语法研究中，特别是在汉语语法研究中，许多问题之所以久悬未决，都跟语法学的方法论以及为方法论服务的特殊方法有关。如果我们能够根据语法本身的特性和语法分析的目的，确定一个方法论的总原则，在具体的语法分析中确定一整套具体适用的分析方法，语法分析中的疑难问题肯定将会减少。确定语法学方法论的总原则和一整套前后一致的具体方法，虽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经过充分研究和讨论还是有可能的。希望语法学者们在这方面多作些研究工作。

（张 静）

94

古今汉语人称代
词有什么不同？

现代汉语的第一人称用“我”、“我们”；第二人称用“你”、“你们”，在北方话中表示敬称时用“您”；第三人称用“他”“他们”。单数与复数有明确区别。

在古代汉语中，人称代词比较多。第一人称有“吾”、“我”、“余”、“予”、“卬”^①等，第二人称有“尔”、“汝”（女）“若”“而”“乃”（迺）等，第三人称有“彼”、“其”、“之”等。

在古代汉语中，人称代词是单数、复数不分。例如：

① 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史记·项羽本纪》）

② 彼且奚适也？（庄子《逍遥游》）

③ 令之曰：“汝知而心与左右手、背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④ 彼竭我盈，故克之。（《左传·曹刿论战》）

例①中的“吾”、“我”是第一人称单数，“若”、“而”是第二

① 第一人称代词“卬”，后代用得不多，主要见于先秦文献。《尔雅·释诂》：“卬……我也。”《诗经·邶风·匏有苦叶》：“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须我友。”（大意是：船夫招招把船摆，旁人过河我等待；旁人过河我等待，我等情郎过河来。）

人称单数，例②中的“彼”（指“鵬”）是第三人称单数。而在例③中，“汝”“而”是第二人称复数（指吴王阖庐的一百八十名宫中美女），“令之”的“之”是第三人称复数（指众美女）。例④中的“我”是第一人称复数（指鲁国军队），“彼”“之”是第三人称复数（指齐国军队）。可见，古代汉语的人称代词，既可表示单数，又可表示复数，要在上下文中才能确定其具体意义。

但有时为了表意明确，也可在人称代词的后面加上“侪”（chái）、“属”、“辈”、“等”、“曹”等字来表示复数。如：

① 吾侪何知焉，吾子其早图之。（《左传·昭公二十四年》）

②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杜甫《戏为六绝句》）

③ 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史记·项羽本纪》）

④ 国家知汝等为贪吏所害，非有他恶，可悉归田。（《资治通鉴·唐纪十七》）

现代汉语里的人称代词，除了第二人称代词“您”有表敬作用外，其他的人称代词一般没有明显的敬谦区别，运用相当自由。而在古代汉语里，人称代词的运用常有一些限制，在有些场合不能随便用，而要另用一套尊称、谦称来代替人称代词。谦称主要用于第一人称，尊称主要用于第二人称。

第一人称“我”“吾”“余”等，在有些场合不能用，用了就显得傲慢自大。因此，在该用第一人称的地方，一般人要用“某”“愚”“仆”等，例如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中，有五处用“某”来代替“我”字。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用“仆”代替“我”字。女子常自称“妾”“奴”。

对君王常自称“臣”。如李斯《谏逐客书》：“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有时直接称自己的名，如《史记·平原君列传》：“平原君曰：‘胜也何敢言事！’”《战国策·冯谖客孟尝君》：“后孟尝君出记，问门下诸客：‘谁习计会能为文收债于薛者乎？’”“胜”是平原君赵胜的名，“文”是孟尝君田文的名，这里用来代替“我”字。至于君王，常用“寡人”、“不穀”①、“孤”、“朕”②之类的谦称来代替第一人称。

第二人称代词“尔”“汝”在有些场合不能用，用得合适，就有“粗俗”“轻贱”或“狎昵”的意思，显得不庄重，不尊敬。宋人洪迈《容斋随笔》卷一说：“凡人相与呼号者，贵之则曰公，贤之则曰君，自其下则尔汝之。虽王公之贵，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则进而君公，退而尔汝者多矣！”可见“尔”“汝”是不能随便用的。又例如，《魏书·陈奇传》：“游雅常众辱奇，或尔汝之。”杜甫《醉时歌》：“得钱即相觅，沽酒不复疑。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前者“尔汝”有“轻贱”之意，后者“尔汝”有“狎昵”之意。

第二人称若用尊称，对君王常用“上”、“王”、“陛下”，对一般人常用“君”、“公”、“子”、“先生”、“足下”、“左右”、“执事”等。所谓“陛下”、“左右”、“执事”之类，表示“不敢直接麻烦你，而请你手下办事人员转达”的意思，实际上还是指“你”。据《史记集解》说：“蔡邕曰：陛，阶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

① “不穀”是“不善”的意思，诸侯谦称。《老子》云：“故贵必以贱为本，高必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穀。”

② “朕”，本为古人自称之词，《尔雅·释诂》：“朕，身也。”郭璞注：“今人亦自呼为身。”屈原《离骚》：“朕皇考曰伯庸。”屈原自称为“朕”。当时无贵贱之分，均可自称为“朕”。从秦始皇起，才专用为皇帝的自称。《史记·秦始皇本纪》：“天子自称曰朕。”此后一般人就不能称“朕”了。

近臣立于陛侧以戒不虞。谓之陛下者，群臣与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与之言，因卑达尊之意也。”

有时用对方的身分、官职或对方的字号，来代替第二人称，以表示尊敬。如《战国策》中庄辛对楚襄王称“君王”，苏秦对秦惠王称“大王”，《史记·淮阴侯列传》中刘邦对韩信说：“丞相数言将军，将军何以教寡人计策？”这里“将军”就是代替第二人称“你”，以表尊敬。又如前面提到的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王安石用“仆”代替第一人称“我”，以表谦逊，又用“君实”（司马光的字）代替第二人称，以表尊敬，文中共用五次“君实”，全文无一“尔”、“汝”。

（严修）

句子较短，结构简单，有了毛病容易发现和纠正。如“墙上贴满口号”、“稻谷粒粒丰富”、“大家努力完成生产数量”，这些句子一眼就可看出它们不合语法，就象一部机器配错了部件，毛病症结明显，改正也较方便。这种检查句子方法姑且叫做“直接判断法”。

有些句子较长，结构较复杂，毛病也较隐晦，可以用“查干检叶法”来检查。即拿到一个比较复杂的句子，先找出其主干，删除其枝叶，然后在句子的主干部分进行检查。所谓句子的主干，这是对句子的主要成分主语、谓语、宾语的形象比喻；句子的枝叶，是对句子的次要成分定语、状语、补语的形象比喻。例如：

1. 这样的文章就能达到教育人民，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武器。

这个句子较长，毛病不容易一下子看出来。如果去掉连带成分，句子简缩后的主干就是“文章达到武器。”这就能明显地看出句子的毛病：谓语和宾语搭配不起来。只要把“达到”改作“成为”，句子就顺当了。

句子的成分如主语、谓语等是由几项并列的词语组成的，

那就要逐项进行检查：

2. 黄继光这位顶天立地的英雄，他那消灭世界上一切反动派的伟大志愿，他那冲向侵略者碉堡的英勇形象，永远屹立着，永远活在人们心里。

如将句子简缩去掉枝叶，主语是“英雄”、“志愿”、“形象”，谓语是“屹立着”“活在心里”，逐项检查，就发现，“志愿”跟后面的谓语不相配搭。

有时，经过简缩检查，句子的毛病不在主干上，那就要再在枝叶部分即次要成分上进行仔细检查。例如：

3. 来自全国各地的工农兵代表兴致地走进人民大会堂。

4. 他以自己所喜爱所熟悉的形式，创作了许多动人的、真挚优秀的诗歌。

例③句子的主干“工农兵走进人民大会堂”没有毛病，再看次要成分定语“来自全国各地”和状语“兴致”，“兴致”是名词，不能直接作状语修饰“走进”。例④是定语“真挚”同中心词“诗歌”不相配合。这两个句子主干之间的配搭都没有问题，毛病是在次要成分枝叶上。

运用“查干检叶法”检查病句大致是这样几个步骤：（一）先简缩句子找出其主要成分；（二）查看句子主干的各成分之间配搭是否得当；（三）再查看枝叶跟主干之间配搭是否得当；（四）枝叶内部之间即次要成分之间有没有错误。正如一部机器出了故障要进行检修，将机器拆开先检查主要部件有没有毛病，再一个个零件检查有没有毛病一样。

要是句子不算长，但结构可疑，毛病隐晦，不易一下子看出来，还可以运用“类比造句法”来检查。

“类比造句法”是按照原句格式仿造几个句子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如果仿造出来的句子都合乎语言规则，那就说明这种格式能够成立，原句是正确的；如果仿造出来的句子都不能成立，那就说明这类格式有问题，原句也不能成立。例如：

5. 河里水色呈暗绿色。

这个句子有没有语病，一下子不易判断，我们可以用类比造句法仿造几个句子：

a) 瓶里药色呈淡黄色。

b) 山腰间树色带橙红色。

这两句一般不这么说，如 a) 可以说成“瓶里药呈淡黄色”或“瓶里的药是淡黄色”，因而可见原先那句“河里水色呈暗绿色”有问题。因此，原句要表达的意思也有两种说法：“河里的水呈暗绿色”、“河里水色是暗绿的”。又，运用“类比造句法”要注意仿造的句子格式要力求跟原句相当。

运用以上这些方法一步一步进行检查，一般可以发现句子的错误，把话说通，把句子写正确。

(蒋荫楠)

在谈到“修辞”和“修辞学”之前，首先应当谈谈汉语中“修辞”这个词。

在汉语中，“修辞”两个字连用，早在先秦就开始了。《易经》上就有“修辞立其诚”的话。这里的“修辞”是动宾结构的词组，就是修饰文辞的意思。作为一个语言学术语的“修辞”，则是一个名词。在现代汉语中，“修辞”一词同“语法”一词一样，也有两个含义。一是指客观存在的那个东西；一是指人们对它的认识和描述，即关于它的知识。前者是客观存在物，后者总是带有主观色彩的。前者可以称之为“修辞”，后者可以称之为“修辞学”。同“语法”等术语不同的是，汉语中的“修辞”一词还可以作动词用。如清初的顾炎武说，“从语录入门者，多不善于修辞。”（见《日知录》十九）鲁迅说，“正如作文的人，因为不能修辞，于是不能达意。”（见《致李桦》）

在谈“修辞”之前，我们还应当谈一下“修辞活动”。我们知道，同一个思想，同一个意思，往往可以由不同的语言形式来表达。但是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总是只有一个语言形式的表达效果是最好的。在运用语言的时候，为了准确、鲜明、生动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求得最佳的表达效果，就有必要对

语言进行加工、修饰和调整，这一活动就是“修辞活动”。

修辞活动总是具体的，复杂多变的。但又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客观地存在于修辞活动中的规律，即提高表达效果的规律，就是“修辞”。人们对这些规律的认识和描述，即关于修辞的知识，就是“修辞学”。

修辞学是一门很古老的科学。

古代希腊人很重视修辞的研究。古代希腊的修辞学（或叫修辞术），指的是演说的艺术，包括立论的艺术和修饰词句的艺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322）就曾经写过一本《修辞学》。

近代，法国语言学家巴意（Ch. Bally）和日内瓦学派也十分重视修辞特别是语言风格的研究，提出了以表现手段为研究对象的风格学。

在我国，先秦的典籍中就有了一些关于修辞、风格的零星片断的言论了。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活动家们，是在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方面下过一番功夫的。如庄子，很重视“寓言”、“重言”的修辞方式。所谓“寓言”，就是引证神话式的幻想的故事——也包括通常说的寓言；所谓“重言”，就是引证历史故事和古人的话——其中有许多是作者的假托。与庄子同时代的惠施，曾经讨论过比喻，并为比喻下过一个很好的定义：“譬”，即比喻，是“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惠施十分重视比喻手法对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重要性。战国时代的大学者韩非，非常重视寓言、笑话、民间故事的修辞作用，在《说难》篇中，强调了看清交际对象对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重要性——“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

两汉时代的学者曾经热烈地讨论《诗经》最基本的修辞手

法——比、兴、赋。所谓比，即比喻和比拟；所谓兴，即“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有时兼有比义，有时起象征作用，有时只是为了趁韵；所谓赋，即平实地铺叙事实。

魏晋之后，出现了许多有关修辞学、风格学、文章学的专论和专著。有代表性的如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元代王构《修辞鉴衡》，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等。这些著作虽然并不是专门讲修辞的，但是比较系统地接触到了大量的修辞问题。历代的诗话、词话、文论中，也有不少修辞方面的论述。

五四以后，关于修辞的专著是很多的。这时候，修辞学摆脱了文学批评的范围，形成了一门独立的科学。当时的修辞研究有两种倾向，一是以模仿西方的修辞著作为主，一是以辑录古人的说法为主。前者以唐钺的《修辞格》为代表，后者以郑奠的《中国修辞学研究法》为代表。

在汉语修辞研究中，最有创造性的、最有成就的是陈望道。他的《修辞学发凡》（1932年初版）是汉语修辞著作中最好的、最重要的一部。解放后出版的修辞学专著中，重要的有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1950年）、张志公的《修辞概要》、张弓的《现代汉语修辞学》和倪宝元的《修辞》等。

同语音学、词汇学、语法学相比，修辞学的显著的特点是它的综合性。它不仅是从表达效果出发，研究语言材料的修辞特色，还要从表达效果出发，研究语言材料和各种语言之外的因素（如语言环境、交际对象等）的相互依存的关系。换句话说，修辞不仅同语音、词汇、语法密切相关，也同逻辑密切相关，还同语言环境、交际对象、文化背景、心理因素等密切相关。如果说，语法的研究，通常不超出句子的范围，那么，修辞则以整篇文章、整个言谈为其对象。

修辞研究的中心课题是各种同义手段的选择。修辞学通常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消极修辞，纠正不对、不通的地方；二，积极修辞，研究各种同义手段的选择问题，研究各种修辞方式的运用问题；三，语言风格。

（王希杰）

97

什么是同义异形?

同义异形现象是世界各种语言中都大量存在的。

所谓同义异形现象,指的是所表达的意义基本相同,但是表达的形式却不一样的现象。如:

赵老 西边的新厕所昨儿交工,今天没事。

大妈 真没想到啊!共产党给咱们修茅房,抓土匪,还要修沟;……

(老舍:《龙须沟》)

这里的“厕所”、“茅房”,虽然形式不一样,但指的是同一个东西,这就是同义异形。

由于“义”和“形”都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即在不同的层次有着不同的含义,所以同义异形也是多种多样的。

义,经常指词汇意义。基本相同的词汇意义有时可以采用不同的形式来表现,如:

看/瞧/望/视/见/盯/瞅/瞅

美丽/漂亮/好看

熟视无睹/视而不见/视若无睹

针锋相对/针尖对麦芒/刀对刀,枪对枪

这就是平常说的同义词。成语、谚语、歇后语通常也看作

为词汇成分，所以同义成语、谚语、歇后语也可以看作为同义词。

义，也可以指语法意义。基本相同的语法意义有时可以采用不同的语法形式来表现，如：

一本十分有趣十分有用的书/十分有趣十分有用的一本书

一个贫苦而善良的老人/贫苦而善良的一个老人

上例数量词组的位置虽然不同，但却表达了相同的语法关系：修饰关系。

义，也可以指句子的意义。基本相同的句子，有时可以采用不同的词语、不同的句子格式来表达。如同一件事，宋代文人写出了如下不同的句子：

有奔马践死一犬/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有犬死于马下/有奔马毙犬于道/有犬卧通衢，逸马蹄而死之/逸马杀犬于道

这些句子从语法上讲是不同的，但所表达的意义大体上是一回事。

对“形”也是可以有多多种多样的理解的：书写形式、语音形式、结构形式。

我们也可以说，同义异形可以分为语言体系中的同义异形和言语表达中的同义异形两种。所谓语言体系中的同形异义，是相对稳定的，对说这种语言的一切成员都是共同的。如同义词语、同义句式，决不会因人、因时而异。而言语表达中的同义异形，则是有条件的，指的是在特定的交际环境中可以互换的语言材料。这些语言材料只有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才能互换，才能反映同一客观现象，表达同一主观感情。如：

以太仓谷千斛，赐郎中令之家。

以垣下谷千斛，与曜卿家。

以太仓谷者，官法也；以垣下谷者，亲旧也。

（曹操：《赐袁涣家谷教》）

这里动词“赐”和“与”，都是给的意思。这是语言体系中的同义。“郎中令”和“曜卿”在这里指同一个人——袁涣，是同义异形。这是言语表达中的同义。因为换一个场合，“郎中令”指的就可能是别一个人了。

同义异形现象之所以特别值得我们注意，是因为它有助于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如：

当您痛骂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私通敌酋，求荣卖国，这一个何应钦就坐在您的背后。群众对您的每一句话，击出风暴一般的掌声。你骂得他面红耳赤，如坐针毡，还不得不跟着拍巴掌。您骂了他半个小时，连外交使团也鼓掌不已。

（徐迟：《悼念敬爱的郭沫若同志》）

“击出……掌声”、“拍巴掌”、“鼓掌”，这些同义异形形式用得恰到好处，准确而形象地再现了当时的情景。再如：

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贾谊：《过秦论上》）

一连串同义异形词语的运用，大大增加了文章的气势。

当然，有一些同义异形对提高表达效果是无益而有害的。如有时同一个词语而具有不同的书写形式：

年轻/年青

思惟/思维

本相/本象/本像 糟蹋/糟踏

再如同一个词语而有多种读音:

玢 读作 bīn 或 fēn

血 读作 xuè 或 xiě

这些都是应当加以规范化的。

在选择同义异形手段时,一般情况下,应当选择通行的、为大家所熟知的形式,而对生僻的形式则应当谨慎一些。故意选用生僻的形式来表示高深、吓唬读者,则是很不好的。

(王希杰)

“风格”一词很早就被用作科学术语。在外国，拉丁文 *Stylus* (风格) 最初属修辞学范畴，具有“作家的写作笔法”和“作品的特殊格调”等含义。我国传统文论讨论作家创作个性和作品写作特色，最先在用“体性”概念的同时，也用“风格”的术语。梁朝刘勰的《文心雕龙》，有论述作家创作个性和作品艺术特色的专篇，篇名就叫“体性”。同时，在该书《议对篇》中，他却用“风格”的术语来说明体性问题。稍后于刘勰的魏收，在论及作家作品的风格问题时，用的又是“风骨”一词。至北齐颜之推，才又把作家作品的个性特色称为“风格”。“风格”作为我国传统文论的术语，是经过词义的历史发展而逐渐被固定下来的。

传统文论所谓的“风格”，主要属于文艺学、风格学的范畴，它和作家、作品(言语)联系起来了，但还没有完全和语言联系起来。文论家们根据作家的个性特征来论述作品的写作特色。写作特色既包括作品的气质、格调，也包括修辞等语言运用方面，不过仅仅是很不全面地涉及了语言运用的某些特色。

真正明确提出“语言风格”，并把语言风格作为专门学科

的研究对象的,是近世的事。本世纪初,瑞士语言学者最先把研究语言风格的语言风格学从语言学那里独立出来,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此后半个多世纪来,语言风格的研究便获得了重大的发展。

对语言风格的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问题还不少。首先在“语言风格”的定义问题上就有争论,意见不统一。比较流行的见解,是把“语言风格”和“言语风格”等同起来解释,认为语言风格即言语风格。这种意见是欠妥当的。学者们都公认,瑞士语言学家巴意提出的两条原则是:1.语言和言语必须区分;2.语言的社会功能是区分语言风格的基本原则。这两条原则可以作为建立语言风格学的基础。如果承认第一条原则,那么,语言风格和言语风格就不可混而为一。事实上,语言风格和言语风格并不是一回事。所谓语言风格,指的是人们在运用语言材料(语言要素)进行交际时,由于受不同的交际场合、交际目的、交际任务(即语言的社会功能)的制约,或由于受不同的交际者的秉性、素质的制约,而采用各不相同、独具特色的语言材料和语言手段的系列。所谓言语风格,指的是在社会的具体交际活动中,由于交际功能或交际者个性的不同,采用了不同的、特殊的语言材料和语言手段,因而形成的具体作品(言语)所特具的气氛、色彩和格调。

语言的社会交际功能,是划分语言风格类别的主要原则。在历史上,语言风格的分类往往和文体的分类吻合。我国古代讲文体特征,实际上也就是在讲言语风格特征。如曹丕所说的“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典论论文》),还有陆机在《文赋》里讲的那段话:“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都是说的言语

风格。语言风格、言语风格的分类,在古代是和文体基本一致的,而在现代就不一定了。根据语言的社会功能、交际者个人的秉性和素养等原则,我们大致可以把语言风格分成四大类:日常口语体风格、应用文体风格、艺术文体风格和个人的语言风格。这是大类,有的大类下面还可以分小类,应用文体风格和艺术文体风格就更可以细分。各类风格,都拥有它自己独特的一套词汇、语法、语音和修辞手段等风格要素的系列。各类风格要素系列之间,虽然各具特色,但并不是“封闭的”,而有交错和流通的现象。

各类风格之间的风格要素虽然不是“封闭的”,但也不能乱交流。夸张修辞格作为文艺语言的风格要素,就不能用于新闻报导、政论和科学论著等文体的语言风格中。同样,公文事务文体的语言风格要素,如公文词汇,也不能随使用在艺术文体里。

语言风格学在我国还是一块空白。而这门学科对于语言应用有很大的实用意义,应该加紧进行研究。

(王伯熙)

人们运用语言,总是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进行的,为了某种目的,面对着特定的对象。交际的环境、目的、对象、内容等因素,对于语言材料和修辞方式的选择是有着极大的制约作用的。当这些因素相同的时候,在选择语言材料和修辞方式方面,便会出现一些共同之处,这些共同之处的概括就是语体。

语体是历史形成的。不同的语体,可以看作为统一的语言的变体。在现代汉语中,我们可以区分出如下几种类型:

A. 口头语体

a. 会话体

b. 讲演体

B. 书面语体

a. 公文语体 { ① 事务公文体
② 鼓动公文体

b. 科技语体 { ① 专门科技体
② 通俗科技体

- c. 政治语体 {
 - ① 一般政论体
 - ② 文艺政论体
- d. 文艺语体 {
 - ① 散文体
 - ② 韵文体
 - ③ 戏剧体

口头语体,有三个基本特征:多变性、粗略性、生动性。其中的会话体是人们自动不知不觉掌握了。一般说,大中学校的语文教学,已经不需要再加强学生会话体的训练了。其中的讲演体则接近了书面语,是应当列入大中学校语文基本功训练的范围的。

书面语体和口头语体相比,有两个显著的特点是:严密性和体系性。如果说,口头语体在入学前已经掌握,那么书面语体正是大中小学语文基本功训练的中心课题。

公文语体和人们的社会生活广泛地密切地联系着。党和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个人之间的各种联系,都离不开公文语体。平时讲的“应用文”就是属于公文语体的。以记述为特征,以实用为目的的公文语体,并不追求语言的艺术化,而是把准确性,简洁性当作它的最基本的也是最高的要求,而规格化则是它的另一个重要的要求。鼓动公文语体比较接近政论语体。

科技语体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的。在现代,科技语体的地位日益重要。在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历程中,科技语体同每一个人、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联系,必将日益密切。科技语体同公文语体一样,是记述的、实用的。它并不追求语言的艺术化,它的基

本要求是准确、简洁。同其他语体相比,科技语体有三个明显的特点:术语性、单一性和符号性。术语性指的是大量运用单义的术语,含义固定,概念明确。单一性指的是句式严整而少变化。符号性指的是它有一套特殊的表达方式,如用图表、符号和公式来代替语言表达。通俗科技体是给不熟悉本门科学的人们看的,为了适应对象,往往努力向文艺语体靠拢。

政论语体,包括直接评论社会生活和有关的各种问题的文章,如新闻报道、政治评论、文艺批评、思想杂谈、杂文小品等。它广泛地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直接联系着。鼓动性和综合性是政论语体区别于其他语体的重要特征。鼓动性指的是政论语体要求具有强烈的感情和鼓动人心的力量。综合性指的是它能够多方面地使用具有各种色彩的语言材料和修辞方式,并能协调一致地组合在一起。文艺政论体,包括杂文、随笔、小品等,它已经接近文艺语体了,也追求语言的艺术化。

文艺语体包括各种类型的文艺作品。它运用形象思维,形象地再现生活。它的特征是描绘性的,而不是记述性的。语言的准确性是它的基础,语言的鲜明性、生动性是它的基本要求,语言的艺术化则是它努力追求的目标。语言的形象性,平常词语的艺术化和人物语言的个性化是文艺语体区别于其他语体的主要特征。

散文体包括小说、散文特写等。多样性和统一性是散文体在语言运用方面的两个重要的特点。多样性指的是,在语言材料和修辞方式的选择方面,散文体比韵文体有着更为广阔的活动余地,它几乎不受什么限制。统一性指的是,散文体主要由作者叙述的语言和人物的语言组成,两者有区别,但又有相通之处,协调地构成了一个整体,表现了统一的语言风

格。

韵文体包括诗歌、唱词、快板等。它区别于散文体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押韵。它的特点是讲究语言的形式美,讲究节奏,因此常变动词语和句子的正常次序。

戏剧体包括话剧、歌剧、地方戏等。它以人物的语言为其主要构成部分。在书面语体中,戏剧体的语言最接近于口头语体。戏剧体语言的另一个特点是,富于动作性,一方面为舞台上的演员提供再创造的广阔的天地,另一方面也为阅读剧本的读者提供想象剧中人活动的基础。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语体和文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体指的是文章的体裁,仅仅指书面语的各种形式,并不包括口头语形式。语体则不限于书面语的各种形式,也包括口头语形式在内。一种语体还可以包括各种不同的文体,如散文体就包括了小说、散文、特写、童话等。再拿童话来说,可以属于散文体,也可以属于韵文体,这是就语体而言的;就文体而言,童话诗和散文童话都是童话,是同一文体。

掌握语体的区别,对于提高语言表达效果是大有好处的。所以它是语文教学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

(王希杰)

先要说明几点。

一、这个书目是供大学中文系语言专业的学生参考的。具有同等学力而希望自学进修的同志，也可以参考。

二、同一类的书，往往有好多种。我们只开了一种或几种，不是说这些书和这些版本就一定好些，只不过是先想到了或是觉得这些书可能比较好找一些。因为水平有限，有的重要的书肯定会有遗漏，而有的比较一般的书却收进来了。总之，这个书目本身也只是供参考的。

三、现代语言学同许多学科都有密切的关系，例如同自然科学里的数学、物理学、生理学、心理学、信息学和计算机科学，同社会科学里的哲学、逻辑学、文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和历史学。学习语言学也必须学习那些方面的知识。这里只开了学习语言学本身的参考书。

四、正式的教材一般不列入。

五、有些方面，至今还缺少参考书。不过，有些文章已经连载，只是没有汇编成册而已。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音研究室的《实验语音学知识讲话》，在《中国语文》1979年除第2期外的五期上连载。读者可以自行参阅。

六、专用工具书这里也没有开列，如《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历代职官表》及各种年表等。

七、我们把参考书目分成十类：理论、语音、词汇和训诂、语法修辞逻辑、文字、方言、民族语文、一般工具书、语文教学、其他。不标类目。为了节省篇幅，参考书名不标书名号。大都注明了出版社和出版年代，出版社名也只标头几个字。各类的书目多半分两部分，前一部分是最基本的，后一部分是可以参阅的。两部分之间以空两格为记。前一部分的书，有的也不必一字一句地细读，可以根据需要选读部分章节。

下面是书目。

一、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斯大林，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人民，1971)，反对党八股(毛泽东)，语言学概论(高名凯、王石安主编，中华，1979)，语言学名词解释(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商务，1960)，中国语言学史(王力，山西，1981)，语言学史概要(岑麒祥，科学，1958)，普通语言学教程([瑞士]索绪耳著，高名凯等译，岑麒祥、叶蜚生校，商务，1982)，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法]梅耶著，岑麒祥译，科学，1957)，语言([法]柯恩著，双明译，科学，1959)，句法结构([美]乔姆斯基著，邢公畹等译，中国社会科学，1979)，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丹麦]裴特生著，钱晋华译，科学，1958)，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丹麦]威廉·汤姆逊著，黄振华译，科学，1960) 国语学草创(胡以鲁，1914)，语言问题(赵元任，商务，1980)，语言论([美]萨丕尔著，陆卓元译，陆志韦校)，语言分析纲要([美]布洛克·特雷杰著，赵世开译，商务，1965)，语言论([美]布龙菲尔德著，袁家骅、赵世开、甘世福译，商务，1980)，语言学概论([苏]契可巴娃著，

周嘉桂、高名凯译,彭楚南校,高等教育,1956)

二、普通语音学纲要(罗常培、王均,科学,1957),语音常识(董少文,文化教育,1958),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普通话审音委员会,文字改革,1963),四声实验录(刘复,中华,1951),古今字音对照手册(丁声树编录,李荣参订,科学,1958),汉语音韵学导论(罗常培,中华,1956),汉语音韵学常识(唐作藩,上海教育,1979),古音说略(陆志韦,哈佛燕京学社),反切释要(殷焕先,山东,1979),诗词格律(王力,中华,1962),汉语语音史讲话(邵荣芬,天津,1979),音韵存稿(李荣,商务,1982) 汉语音韵论文集(周祖谟,商务,1957),中国音韵学研究([瑞典]高本汉,商务,1948),切韵音系(李荣,科学,1956),切韵考([清]陈澧),广韵([宋]陈彭年等,周祖谟校本,中华,1960),集韵([宋]丁度等,四部备要本),中原音韵([元]周德清,中华,1978),韵镜([宋]张麟之,丛书集成本),切韵指掌图([宋]司马光,中华,1962),音学辨微([清]江永),声韵考([清]戴震),毛诗古音考([明]陈第),音学五书([清]顾炎武),颜氏家训·音辞篇([南齐]颜之推),六书音均表([清]段玉裁),一切经音义([唐]慧琳),音学十书([清]江有诰),诗声类([清]孔广森),古今韵会举要([元]熊忠),中原音韵研究(赵荫棠,商务,1957),等韵源流(赵荫棠,商务,1957),中原音韵音系(杨耐思,中国社会科学,1981)

三、汉语词汇讲话(周祖谟,人民教育,1959),现代汉语词汇知识(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湖北,1979),词语的知识和运用(李行健、刘叔新,天津,1979),普通话三千常用词表(初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研究推广处,文字改革,1959),北京话单音词词汇(陆志韦,科学,1956),诗词曲语

辞汇释(张相, 中华, 1953), 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蒋礼鸿, 上海古籍, 1981), 小说词语汇释(陆澹安, 中华, 1964), 金元戏曲方言考(徐嘉瑞, 商务, 1956), 元剧俗语方言例释(朱居易, 商务, 1956), 文言虚字(吕叔湘, 上海教育, 1959), 词詮(杨树达, 中华, 1978), 古书虚字集释(裴学海, 中华, 1954), 辞通(朱起凤, 上海古籍, 1982) 助字辨略([清]刘琪, 中华, 1954), 古书疑义举例([清]俞樾, 中华, 1954), 广雅疏证([清]王念孙, 四部备要本), 尔雅义疏([清]郝懿行, 四部备要本), 经传释词([清]王引之, 中华, 1956), 经义述闻([清]王引之, 商务, 1935), 经籍纂诂([清]阮元主编, 中华书局影印琅嬛仙馆本, 1936), 经典释文([唐]陆德明, 丛书集成本)

四、语法和语法教学(张志公编, 人民教育, 1957), 汉语知识(人民教育, 1980), 语法修辞讲话(吕叔湘、朱德熙著, 陆俭明、胡双宝修订, 中国青年, 1979),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丁声树等, 商务, 1961), 现代汉语语法探索(胡附、文炼, 新知识, 1956), 北京口语语法(李荣编译, 1955), 汉语口语语法(赵元任著, 吕叔湘译, 商务, 1979),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吕叔湘, 商务, 1979), 汉语语法教材(黎锦熙、刘世儒, 商务, 1962), 汉语的构词法(陆志韦等, 科学, 1964), 汉语语法论文集(吕叔湘, 科学, 1955), 现代汉语八百词(吕叔湘主编, 商务, 1980), 马氏文通([清]马建忠, 章锡琛校注, 中华, 1954), 文言语法(杨伯峻, 北京, 1956), 修辞概要(张志公, 上海教育, 1982), 修辞学发凡(陈望道, 上海教育, 1982), 现代汉语修辞学(张弓, 天津, 1963), 文章评改(叶圣陶等, 上海教育, 1979), 文心雕龙([南齐]刘勰), 汉语语法修辞新探(郭绍虞, 商务, 1979), 高等国文法(杨树达, 商务, 1955), 国文法之研究(金

兆梓, 中华, 1955), 国文法草创(陈承泽, 商务, 1957), 中国文法通论(刘复, 中华, 1939), 新著国语文法(黎锦熙, 商务, 1957), 中国现代语法(王力, 中华, 1956), 中国文法要略(吕叔湘, 商务, 1982), 口语文法(廖庶谦, 三联, 1950), 春秋繁露([东汉]董仲舒), 实用国文修辞学(金兆梓), 修辞格(唐钺), 中国修辞学(杨树达, 科学, 1954), 中国修辞学研究法(郑奠)

五、中国文字学(唐兰, 商务, 1979), 汉字形体学(蒋善国, 文字改革, 1959), 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梁东汉, 上海教育, 1959), 文字(梁东汉, 上海教育, 1959), 中国文字的演变(曹伯韩, 三联书店上海联合发行所, 1949), 汉字改革概论(周有光, 文字改革, 1980), 简化字总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文字改革, 1964), 古文字学导论(唐兰, 石印本, 1935), 门外文谈(鲁迅, 人民, 1974), 说文解字([东汉]许慎, 中华, 1963), 说文解字注([清]段玉裁, 上海古籍, 1981), 说文通训定声([清]朱骏声, 世界, 1936), 干禄字书([唐]颜师古, 丛书集成本), 甲骨文编(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华, 1965), 金文编(容庚, 科学, 1959) 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郭沫若, 科学, 1957), 甲骨文字研究(郭沫若, 科学, 1962), 积微居金文说(杨树达, 中国科学院, 1959), 殷商贞卜文字考(罗振玉, 上虞罗氏玉简斋石印本, 清宣统二年), 殷虚文字研究(唐兰, 石印本, 1933), 观堂集林(王国维, 中华影印本, 1959), 匡谬正俗([唐]颜师古, 丛书集成本), 玉篇([南梁]顾野王, 四部备要本), 契文举例([清]孙诒让, 上海蟬隐庐影印本), 龙龕手鑑([辽]行均, 清道光二十年汪氏刊正谊堂丛书本)

六、汉语方言概要(袁家骅等, 文字改革, 1960), 现代汉语方言(詹伯慧, 湖北, 1981), 中国方音学概要(何仲英), 汉语

方言调查手册(李荣,科学,1957),方言调查词汇手册(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科学,1955),方言调查字表(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科学,1955) 昌黎方言志(河北省昌黎县志编纂委员会、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科学,1960),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调查指导组,江苏,1960),河北方言概况(河北北京师范学院、中国科学院河北省分院语文研究所,河北,1961),湖北方言调查报告(赵元任等,商务,1948),现代吴语的研究(赵元任,科学,1956),钟祥方言记(赵元任,科学,1956),中山方言(赵元任,科学,1956),厦门音系(罗常培,科学,1956),临川音系(罗常培,科学,1958),关中方音调查报告(白涤洲、喻世长,中国科学院,1954),闽音研究(陶燠民,科学,1956),唐五代西北方音(罗常培,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十二,1933),普通话潮汕方言常用字典(李新魁主编,广东,1979),广州话方言词典(饶秉才、欧阳觉亚、周无忌,商务香港分馆,1981),汉语方言词汇(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文字改革,1964),方言校笺及通检(周祖谟、吴晓铃,科学,1956),续方言([清]杭世骏,清刻本),新方言(章炳麟,章氏丛书本)。

七、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概况(中国语文杂志社编,中华,1955) 民族语文研究文集(青海民族,1982),布依语调查报告(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研究所,科学,1959),布依语语法研究(喻世长,科学,1956),龙洲土话(李方桂,商务,1947),撒尼彝语研究(马学良,商务,1951),傈僳语研究(傅懋勳),阿细民歌及其语言(袁家骅,中国科学院,1953),彝语语法研究(高华年,科学,1958)。

八、文史工具书及其使用法(朱一清,中华,1979),文史

哲工具书简介(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系、历史系,天津,1980)
新华字典(新华辞书社,商务,1976),现代汉语词典(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商务,1978),汉语词典(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商务,1959),中文大辞典(中文大辞典编纂委员会,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79),汉语成语词典(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汉语成语词典》编写组,上海教育,1978),辞海·语词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辞源(修订本,广东、广西、湖南、河南辞源修订组和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商务,(1979--1982),康熙字典([清]张玉书、陈廷敬等,中华,1980),佩文韵府([清]张玉书等,商务万有文库本),尔雅([晋]郭璞注,丛书集成本),广雅([魏]张揖,丛书集成本),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编写组,商务,1979),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分甲编、乙编修订本,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科学,1965)

九、语文教学问题(中国语文编辑部编,中国社会科学,1979),传统语文教育初探(张志公,上海教育,1979),语文教学篇目索引(中国语文编辑部,上海教育,1982),中学语文教师手册(姚麟园主编,上海教育,1982)

十、汉语讲话(王力,文化教育,1955),论汉语([苏]康拉德著,彭楚南译,中华,1954),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教研组,商务,1959),汉语史稿(王力,科学,1958),汉语研究小史(王立达编译,商务,1959),中国语文研究(周法高,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6),语言调查常识(中国语文杂志社编,中华,1956),词典学概论(胡明扬等,中国人民大学,1982),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会议秘书处,科学,1956),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文件汇编(会议秘书处,文字改革,1957) (岑 瑜)